

“不断革命”论

列夫·托洛茨基著

(供内部参考)



“不断革命”论

列夫·托洛茨基著



Leon Trotsky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本书各部分译文所据原文，见正文内题注

“不断革命”论

列夫·托洛茨基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1966年2月第1版

1972年2月北京第2次印刷

书号3002·136 每册0.66元

(内部发行)

出版者說明

本书包括托洛茨基有关“不断革命”論的两部主要著作：一是托洛茨基自詡为早期“論述不断革命論的基本著作”《总结与展望》（一九〇六年）；一是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九年被驅逐到土耳其后写成的《不断革命》。为了便于研究、批判，托洛茨基所著《俄国革命史》的附录：《关于“不断革命”論的一些历史材料》，也一并译出附后。

“不断革命”論是托洛茨基的主要理論。这个“理論”是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論的修正和否定。它在俄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問題上表現不一，时而表現为冒险主义，时而表現为投降主义。尽管它經常披着“极左”的外衣，妄图欺世惑众，但仍无法掩盖其反对革命、取消革命的本质。

早在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討論党綱中有关无产階級专政問題时，托洛茨基就一再強調，当工人階級尚未成为民族的多数、工人階級和它的政党尚未合成一体的时候，是不可能有无产階級专政的；未来的民主主义专政的領導权，无可爭議地属于資产階級。这是托洛茨基第一次暴露了他同列宁之間的分歧，并为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論定下了基調。

一九〇五年托洛茨基正式提出了他的“不断革命”論。在这以后，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两者間的相互关系問題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能否在一国内首先取得胜利等一系列問題上，同列宁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間的分歧

和由此产生的論战，直到列宁逝世，一直沒有間断。

列宁逝世以后，托洛茨基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被压迫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理論和策略上，又同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人和国际共产党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論战。在这场論战中，托洛茨基重新搬出了他的“不断革命”論，从各方面攻击所謂“一国社会主义論”，实际上是攻击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和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首先胜利的理論。这场論战的最后結果是托洛茨基在理論上和政治上被彻底粉碎了。尽管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論在理論上被駁得体无完肤，在革命实践中碰得头破血流，可是他二十多年来一直死抱住它不放。《不断革命》一书，就是托洛茨基以論战的形式为他的这个不断破产的“理論”塗脂抹粉、百般辯解的代表作。

按照托洛茨基的說法，他的“不断革命”論是由“互相联系的三个思想”构成的，这就是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和国际革命的“不断性”。实际上，有些思想，例如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問題，托洛茨基过去并没有明确論述过，在《不断革命》一书中也只是提了一下，并没有作系統的充分的闡述。

关于民主革命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問題，列宁在一九〇五年俄国无产阶级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而进行的第一次革命斗争中，曾經对这次革命的性质、动力和任务做出了完整的馬克思主义的論断。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在这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必須掌握領導权，把农民作为可靠的同盟軍，实现党的最低綱領，从而使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把民主革命比作第一步，把社会主义革命比作第二步，主张尽快地走完第一步，然后向第二步过渡。“我們主张不断革命。我們决不半途而废。”（《列宁全集》第9卷，第221—222頁）这就是列宁加以发展的馬克思在十九世紀

四十年代提出的不断革命的思想。

但是托洛茨基却从“左”的方面来修正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論。他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落后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任务可以直接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則可以把社会主义任务提上日程”。并且解释說，对于资产阶级发展較迟的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說来，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可能，而“无产阶级作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取得了政权以后所实行的专政，必然立即面临着要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权的各項任务”。这样，“民主革命立即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从而成为不断革命”。这就是托洛茨基所宣揚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間的“革命发展的不断性”。列宁曾明确地指出，“托洛茨基的根本錯誤，就在于他忽視革命（指民主革命。——引者注）的资产阶级性质，对于这种革命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問題，沒有明确的看法。”（《列宁全集》第15卷，第344頁）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問題，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以后，“必須采取不断革命的策略”，“向愈来愈激进的社会改革过渡”，于是它“将不得不甚至更为深刻地侵犯整个私有制关系”，“不得不把阶级斗争推进到农村中去”，而“农民的愚昧幼稚，常常使他們对无产阶级采取敌对的态度”；“因此，执政的无产阶级的政策愈明确、愈坚定，它的立足基础也就愈狭窄、愈不穩”。这样，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将不得不突破其民族国家的范围，主动把革命推行到其他国家去，从而激起反对世界資本主义的革命战争。按照托洛茨基的邏輯，“社会主义建設只有在民族范围和国际范围展开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才能进行”，“这种斗争必然要引起爆炸，即在國內引起內战，在国外引起战争”。这就是托洛茨基所說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斯大林批駁托洛茨基的这种謬論，指出无产阶级和农民有共同的利益，只要对农民采取正确的政

策，就完全能够克服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关于国际革命的“不断性”问题，托洛茨基断言，社会主义是在一国“开始”的，但不能在一国“完成”。“在一国范围内维持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暂时状态”。“在孤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各种国内外矛盾必然随着成就的增加而增加”。无产阶级国家只要是处在孤立的地位，最后必然会成为这些矛盾的牺牲品。摆脱这种状态的“唯一出路”就是依靠“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因此，“世界革命”是一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必要前提”。“从这个观点看来，一国的革命并不是独立的整体，它只是国际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国际革命是一个不断的过程”。他硬说，世界性分工、苏联工业对于外国技术的依赖，欧洲先进国家的生产力对于亚洲原料的依赖等等，这一切使得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建设社会主义成为不可能的事，而企图在民族范围内实现经济的所有部门的完全平衡，就是寻求反动的空想。托洛茨基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范围内完成是绝对不可能的，它在一国的舞台上开始，应当立即扩展到几个国家的舞台上，然后迅速地发展到世界的舞台。这就是托洛茨基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一种在更新和更广泛的意义上的不断革命”。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错误在于抹煞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规律的重大意义，否认在帝国主义时期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因而它不是发挥而是限制那些有可能单独突破资本主义战线的个别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主动性，它不是推动个别国家无产阶级积极进攻，而是要他们消极等待“总爆发”的时刻；它不是在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中间培养敢于革命敢于胜利的精神，而是制造耽心“万一别人不来援助”的犹豫心理。它的错误在于不相信一国无产阶级有条件并且有能力在一

国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把希望寄托在渺茫的西欧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上面，因而在世界革命延缓到来的情况下，或者滚到“革命的”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的立场上，或者滚到投降主义和失败主义的立场上。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实质上是一种用“左”的和“非常革命”的词句伪装起来的取消主义。

托洛茨基还在书中多处侈谈中国的革命问题，吹嘘他的“不断革命”论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在他看来，“在中国，从一九一一年以来，已经没有了君主政体，独立的地主阶级也不存在了，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掌握着政权，而农奴制已经同资产阶级剥削化学地融合在一起了”，因此“土地问题所占的比重”是无足轻重的，无需经过民主革命的阶段。这就是说，在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因此，中国的革命一开始就要走向无产阶级专政。他还别有用心地歪曲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借此攻击斯大林。并且胡说，“落后的中国”没有可能“在自己民族界限以内建设社会主义，因为已经超出民族疆界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抵制在一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的”。

托洛茨基的这些荒谬的论点早已被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论断和中国革命的实践驳倒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前途问题都做出了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早在一九三七年毛泽东同志谈到当时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时就曾经指出：“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6页）毛泽东同志还写道。“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我们反对尾巴主义，但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7页）“中国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

不到的。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如果说，民主革命没有自己的一定任务，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个时间去完成的另一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到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7页，678页）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也明白不过地指出：“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隔着也不允许隔着万里长城；我们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论者，我们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质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第15—16页）

书中各篇据以译出的原文版本均于各篇标题下面注明，原著页次附印在译文页边空白的地方，以便读者需要时查考。

目 次

总结与展望	1
一九一九年在莫斯科出版的重印本序言.....	1
第一章 历史发展的特点.....	8
第二章 城市和資本.....	15
第三章 一七八九——一八四八——一九〇五.....	21
第四章 革命和无产階級.....	30
第五章 掌握政权的无产階級和农民.....	35
第六章 无产階級政治制度.....	39
第七章 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	45
第八章 俄国的工人政府和社会主义.....	61
第九章 欧洲和革命.....	66
第十章 为政权而斗争.....	73
不断革命	80
初版序言(俄文版,在柏林出版)	80
德文版序言.....	97
第一章 本书的被迫性及其目的.....	111
第二章 不断革命不是无产階級进行一次“跳跃”, 而是在无产階級领导下进行民族改造.....	131
第三章 “民主专政”的三个要素:階級、任务和政治結構.....	141
第四章 不断革命論在实践中是怎样的?	157
第五章 “民主专政”在我国实现了嗎?如果实现了, 是什么时候实现的呢?	175

第六章	論跳過历史阶段.....	189
第七章	民主專政的口號今天对東方意味着什么?	193
第八章	从馬克思主义到和平主义.....	209
第九章	結束語.....	218
第十章	什么是不断革命?	222
关于“不断革命”的一些历史材料		227

总结与展望^①

161

一九一九年在莫斯科 出版的重印本序言

俄国革命的性质问题是使俄国革命运动的各种思潮和政治团体形成派别的根本问题。甚至在社会民主运动内，自从事态的发展使这个问题具有现实意义的时候起，就因这一问题而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从一九〇四年起，由于这些分歧而形成了两个主要派别：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的观点是：我们的革命将是资产阶级性质，也就是说革命的自然结果将是政权转归资产阶级并为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创造条件。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则是：承认就要到来的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性质，但是同时提出通过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来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这一点作为革命的任务。

孟什维克的社会分析是极端肤浅的，这种分析实质上只是粗俗的历史类比，这就是那些“有教养”的市僧们的典型方法。不论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在两极造成极大矛盾从而使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作用降至无足轻重的事实，或者是后来实际形势的教训，都没有能使孟什维克停止对“真正”、“现实”的民主派的不倦寻求，他们认为

^① 本书序言译自英文版《不断革命和总结与展望》一书，正文据圣彼得堡一九〇六年出版的《我们的革命》（《Наша революция》，Книго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 Глаголева. С.-Петербург）一书译出。正文的第十章是托洛茨基后来补写的，在《我们的革命》中未收入，现在据苏联国家出版社一九二二年出版的《一九〇五年》第287—293页所载原文译出。——中译者注

这种民主派将会领导“民族”并創造議會制的、尽可能民主的資本主义发展条件。孟什維克总是竭力到处去寻找資產階級民主派发展的迹象，在找不到的时候就加以臆造。他們夸大一切“民主”宣言和表現的重要性，同时輕視无产階級的力量及其斗争的前景。为了使俄国革命取得所謂历史規律所規定的“正当的”資產階級性质，他們是如此狂热地拚命寻找这种主要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在革命期間，当找不到主要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时候，孟什維克便自己来执行这种力量的任务，并且多少有些成就。

絲毫沒有社会主义思想和馬克思主义的階級鍛煉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在俄国革命形势下的行动当然不可能同二月革命中扮演“主要”政党的孟什維克有什么两样。資產階級民主派缺乏真实的社会基础这一点也表現在孟什維克身上，因为他們很快就夭折了，在革命进行了八个月之后便被階級斗争抛在一边了。

与此相反，布尔什維主义决不相信俄国革命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政权和力量。它从一开始就認識到工人階級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的决定性的意义，但是說到革命綱領本身，布尔什維克在最初把它限于千百万农民的利益，因为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或者和农民对立，无产階級就不可能把革命进行到底。因此他們（暫時）承认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性质。

至于对革命內部力量和革命前景的估計，作者在那时期沒有附和俄国劳工运动中的主要派別中任何一方的意見。他那时所支持的立場可以概述如下：以資產階級革命作为其首要任务的革命开始以后，会很快引起强大的階級冲突，并且只有当政权轉到唯一能領導被压迫群众的階級也就是无产階級手中，革命才能贏得最后胜利。无产階級一旦取得政权，它不仅不願而且也决不能把自己限于資產階級的民主綱領。它只有在把俄国革命变成欧洲无产階級革命的情况下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到那时候，資產階級民

主綱領連同它的国家界限将被抛弃，俄国工人階級的暫时的政治統治也将发展成为持久的社会主义专政。但是如果欧洲依旧停滞不前，資產階級反革命将不会容忍俄国劳苦大众的政府，并将迫使这个国家倒退，倒退到远远不及一个民主的工农共和国的地步。因此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不能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的限度內。它必須采取**不断革命**的策略，也就是必須打破社会民主党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的界限，向愈来愈激进的社会改革过渡，并从西欧革命寻求直接及时的支持。这种观点在現在重新发表的这篇原写于一九〇四至一九〇六年間的文章中要加以发展和論证。

但是十五年来作者在坚持不断革命观点的同时，在估計社会民主运动中敌对的派別的时候陷入了錯誤。由于双方的出发点都是**資產階級革命**，作者曾认为它們之間的分歧不致深刻到引起分裂的程度。同时，他希望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会清楚地证明俄国資產階級民主派的軟弱和微不足道，另一方面还会证明无产阶级客观上不可能受民主主义綱領的限制。他认为这一点足以根本消除派別分歧。

作者在侨居国外期間一直处在两派之外，他沒有充分認識到当时非常重要的情况：实际上，沿着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分歧的战綫，許多頑强的革命者正集中到战綫的一边，而愈来愈陷入机会主义和調和泥坑的分子則集中到战綫的另一边。在一九一七年的革命爆发的时候，布尔什維克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集中的組織，团結了先进工人和革命知識分子中一切最优秀的分子；布尔什維克(經過一些內部斗争)明白采取了旨在达到工人階級社会主义专政的策略，这完全符合俄国的整个国际形势和階級关系。而孟什維克派那时的成熟程度仅仅足以担負我前面說过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的任务。

現在在向公众发行这书重印本的时候，作者不仅希望解释一

下促使他以及其他多年来一直处在布尔什维克党外的同志有可能在一九一七年初同这个党共命运的理论原则（这样一个个人的理由并不能成为重印此书的充足理由），同时也希望追述一下对俄国革命动力的社会历史分析；从这个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可能而且必须成为俄国革命的任务，远在无产阶级专政成为既成事实之前就是如此。我们现在有可能毫无更改地重印这本写于一九〇六年而其基本路线在一九〇四年已经形成的小册子这一事实就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在替代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孟什维克方面，而是在实际执行工人阶级专政路线的政党方面。

一种理论的最后考验是实际经验。我们现在所参加的事件，以及我们参加的方式早在大约十五年前就在我们的基本路线中预见到这一事实，就是我们正确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165 我们重印了发表在一九一五年十月十七日巴黎《我们的言论报》上的一篇题为《为政权而斗争》的文章作为附录。这篇文章具有一个论战的目的，是对孟什维克领袖们写给“在俄国的同志们”的纲领性“信件”提出的批评。在文章里我们得出结论：一九〇五年以后十年中的阶级关系的发展已经进一步摧毁了孟什维克对资产阶级民主派所怀的希望，因此很显然，俄国革命的命运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密切地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在所有这些年来的思想斗争面前，如果有人说十月革命是“冒险主义”，那他必定是一个真正的白痴！

谈到孟什维克对革命的态度，不能不提一下考茨基的堕落成为孟什维克，他现在从马尔托夫、唐恩和策烈铁里的“理论”中找到了他自己的理论和政治堕落的词句。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后，我们曾听见考茨基说，虽然应该认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是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任务，但是由于俄国共产党并没有通过考茨基为它规定

的具体途径和具体时间表取得政权，所以苏维埃共和国应该交给克伦斯基、策烈铁里和契尔诺夫去纠正错误。对于考茨基的反动陈腐的批评，亲身经历过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并读过考茨基在一九〇五到一九〇六年間所写的文章的同志们一定更感到意外。在那时候，考茨基（他确实不是没有从罗莎·卢森堡得到有益的教训）充分理解到并承认：由于国内阶级斗争所达到的水平和资本主义的整个形势，俄国革命不可能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告终，而必不可免地将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考茨基那时坦白地写过关于社会民主党占多数的工人政府的文章。他甚至没有想到根据政治民主派的不断变化和外表上的结合情况来决定阶级斗争的实际进程的问题。

在那时候，考茨基懂得，革命将会第一次开始唤醒千百万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不是一下子唤醒，而是逐渐逐渐地，一阶层一阶层地唤醒，因此当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间的斗争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广大的农民群众仍处于很幼稚的政治发展水平而会把选票投给仅仅反映农民阶级的落后和成见的中间政党。那时考茨基懂得，由夺取政权的革命逻辑所引导的无产阶级不可能任意无限期地延迟夺取政权行动，因为自己否定这项行动只会为反革命清扫地盘。考茨基那时懂得，无产阶级一旦夺得革命政权，它不会把革命的命运寄托在任何特定时刻最没有觉悟、尚未觉醒的群众的偶然心情上，而是正相反，无产阶级会把政治权力集中在从事启发和组织这些落后和无知的农民群众的强大的国家机器手中。考茨基懂得，如果把俄国革命叫作资产阶级革命因而限制它的任务，那就意味着不了解世界上进行的任何事情。他和俄国和波兰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样正确地承认，如果俄国无产阶级在欧洲无产阶级之前夺取了政权，它必定会利用作为统治阶级的形势给予欧洲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强有力的帮助，而不是把它的地位

迅速让給资产阶级。所有这些充滿馬克思主义原則精神的世界范围的前景，都要看农民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和十二月的所謂制宪議會选举中怎样投票和投誰的票而定，这一点并不是由于考茨基或是由于我們的緣故。

現在当十五年前概述的展望变成了现实的时候，考茨基却拒絕給予俄国革命以出生证，原因是它的出生沒有及时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办公室里登过記。这是多么令人惊奇的事情！这是对馬克思主义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糟塌！人們可以完全正当地說，从第二国际最伟大的理論家之一对俄国革命所下的这个市儈的判断（一个比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贊成軍事撥款的投票更丑恶的表现）已經可以看到第二国际的墮落了。

167 几十年来考茨基发展并坚持了社会革命的概念。現在革命变成了现实，考茨基却在革命面前惊慌地退却了。他被俄国的苏維埃政权吓坏了，并且对德国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强大运动采取敌視态度。考茨基很像一个可怜的小学教师的一生，他多少年来一直在他的气悶的教室里向学生们重复春天的描述，可是最后当他結束他的教員生活，来到新鮮空气里的时候，他却不認識春天，因而大为生气（如果这个小学教員可能生气的話），并且力图证明春天并不是春天而只是自然的大混乱，因为它的发生违反了自然历史的規律。幸运的是，工人们并不信賴这位甚至是最权威的腐儒，他們信賴的是春天的声音！

我們馬克思的信徒和德国工人们一齐坚持我們的信念：革命的春天已經充分按照社会自然的規律同时也按照馬克思主义理論的規律到来了，因为馬克思主义并不是小学教师的脱离历史的教鞭，而是对实际正在进行的历史发展的方式方法所作的社会分析。

我对两篇文章（一篇是一九〇六年写的，另一篇是一九一五年写的）的原文都沒有作任何更改。原来我打算为原文加注，使它适

合于目前之用；但是在通讀原文的时候我不得不放弃这个打算。如果我要詳細加注的話，那会使本书的篇幅增加一倍，这样作我現在沒有時間。而且这种“两层”的书籍对讀者來說也不方便。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本文思想系統的主要分枝同我們当前的情况很相近，願意更彻底地熟悉本书的讀者可以很容易地从目前的革命經驗中找到补充本书所說明的观点的必要資料。

列夫·托洛茨基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二日

于克里姆林

俄国革命对于社会民主党人以外的任何人来说，都是出乎意料的。马克思主义早就预言了俄国革命的不可避免性，这一革命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力量同保守的专制制度力量之间的冲突而必然爆发。马克思主义事先估计了未来革命的社会性质。因此，马克思主义在称这次革命为资产阶级革命时，曾经指出：革命的直接的客观任务是为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创造“正常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原来是正确的，这一点现在已经用不着讨论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者目前所面临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任务：通过对发展中的革命的內部结构的分析去发现推进革命的“可能性”。把我们的革命同一七八九年到一七九三年的革命或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混为一谈，那是一个大错误。自由主义所依靠和赖以生机的历史类比，决不能代替社会分析。

俄国革命具有极其特殊的性质，这种性质是我国整个社会和发展的特点的总结，它反过来揭示了崭新的历史展望。

第一章 历史发展的特点

如果我们把俄国社会发展的情况同其他欧洲国家的社会发展情况（把共同特点极相似、其历史与俄国历史不同的一些欧洲国家作为一类）进行对比的话，我们可以说，俄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特点是比較原始和緩慢。

在这里我们不准备详述这种原始性的自然方面的原因，但是

我們认为这个事实本身是毫无疑問的：俄国的社会生活是建立在比較穷困和比較原始的經濟基础上的。

馬克思主义教导說，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历史前进的基础。經濟社团以及階級和等級，只有当这种发展达到一定高度时才能形成。等級、階級的分化取决于分工的发展和較专门的社会职业的形成，在发生等級和階級分化之前，必須有一部分从事直接物质生产的人創造出剩余产品，亦即除生产供自己消費的东西以外还有剩余，只是由于这种剩余产品同生产者的分离，非生产的階級才有可能兴起和形成。此外，生产階級本身內部的分工，也只有当农业的发展达到一定高度，能够保证对非农业人口的农产品供应的时候才有可能。这些有关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亚当·斯密已經确切地說明过了。

从这里可以得出結論：我国历史中的諾夫戈罗德时期虽然与欧洲中世紀的开端同时，但自然历史条件（不利的地理环境和人口稀少）所造成的經濟发展的緩慢速度，必然阻碍階級形成的过程，并使其具有較原始的性质。

如果俄国繼續处在孤立状态并且只受內部傾向的影响，那就很难說俄国的社会发展史会成什么样子。只要說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就够了。建立在某种內部經濟基础上的俄国社会生活，在所有各个时期都一直处在外部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之下，甚至处在这种环境的压力之下。

在这种正在形成的社会和国家組織同另一个毗邻的組織发生冲突的过程中，一方的經濟关系的原始性质和另一方較高的經濟关系起决定性的作用。

在原始的經濟基础上形成的俄国，同在較高和較稳定的經濟基础上形成的国家組織开始发生关系，并发生冲突。这就可能发生两种情况：要么俄国在对这些国家的斗争中屈服，像金帳汗国在

对莫斯科公国的斗争中屈服一样；要么俄国必须在经济关系的发展方面赶上它们，吸收比它在孤立发展的情况下所能吸收的更多得多的生命力。但是俄国的经济还没有原始到引起前一种情况。国家并没有垮台，而是在民族经济力量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开始成长。

因此，主要之点并不是俄国在各方面受到敌国的包围。单是这一点并不能说明问题。实际上，这一点可以适用于除英国以外的其他所有欧洲国家。但是这些国家在彼此进行的生存斗争中所凭借的是大致相同的经济基础，因此它们国家的发展并没有经受这种外来的强大压力。

对克里木和诺盖鞑靼的斗争要求尽极大的努力。但是这种努力当然并不比英法在百年战争期间所尽的努力更大。迫使罗斯采用火器和创设常备射手团的并不是鞑靼人；后来迫使俄国组织雇佣骑兵和步兵部队的也不是鞑靼人，而是立陶宛、波兰和瑞典的压力。

由于西欧的这种压力，国家消耗了过大的一部分剩余产品，也就是说，国家靠牺牲正在形成中的特权阶级的利益而存在下来，因而妨碍了这些阶级本来就很缓慢的发展。但是不仅如此。国家还极力抢夺农民的“必需产品”，剥夺了他们的生活来源，于是迫使他们逃离他们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定居的土地，因而妨碍了人口的增长，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既然国家消耗了过大的一部分剩余产品，它便妨碍了本来就很缓慢的阶级分化；既然国家夺走了必需产品的重要部分，它甚至还破坏了它所依靠的原始的生产基础。

但是，为了生存，为了执行其职能，尤其是为了夺取所需要的那部分社会产品，国家需要一套等级组织。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国家在破坏它赖以发展的经济基础的同时，又努力通过政府措施强迫这些基础发展，并且像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努力使等级的发展有

利于它自己。研究俄国文化的历史家米留可夫（Г. Миллюков）认为，这一点是俄国同西欧历史恰恰相反的地方。但是这里并没有什么相反的地方。

中世纪的等级君主制度（后来发展成为官僚专制制度），就是使一定的社会利益和关系巩固起来的一种国家形式。但是这种国家形式一旦形成和存在，就具有它自身的利益（王朝的、宫廷的、官僚的……利益），它的利益不仅同较低等级的利益有冲突，甚至同较高等级的利益也有冲突。构成人民群众和国家组织之间社会所必需的“间隔”的统治阶层，对国家组织施加压力，并使它自己的利益成为国家实际活动的内容。同时，作为一种独立力量的国家权力，也从它自身的观点来看待较高等级的利益，抵制它们的要求，力图使它们服从自己。国家和这些等级之间的关系的历史，就是沿着这种力量对比所决定的方向发展的。

在罗斯发生的也是基本上与此相同的过程。

国家力图利用正在发展的经济集团，企图使它们服从自己特殊的财政和军事利益。正在兴起的经济统治集团，则竭力利用国家来巩固它们表现为等级特权的优势地位。社会力量的这一较量得出的结果，比西欧历史上所发生的更有利于国家权力。国家和社会上层集团在牺牲劳动人民的情况下相互效劳，这表现在权利和义务、负担和特权的分配上，这同中世纪西欧的等级国家比起来，比较不利于俄国的贵族和僧侣。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说在西方是等级创造了国家，而在俄国则是国家权力创造了符合它自身利益的等级（像米留可夫所说的那样），那是过份的夸大，是对任何展望的破坏。

等级不能由国家或法律来创造。在这一个或另一个社会集团能够靠国家权力的帮助成长为特权等级之前，它必然由于享有一切社会优势在经济上已经形成。等级不能根据以前确立的官级表

或根据荣誉勳位^①法加以創造。国家权力只能用它各种工具来推动会促成較高的經濟結構的基本經濟过程。正如上面所指出，俄罗斯国家消耗了过大的一部分力量，因而妨碍了社会結晶化的过程，但是它又需要这个过程。假如俄罗斯国家在分化較剧的西方环境的影响和压力下（通过軍事国家組織而施加的压力），力图强制发展原始經濟基础上的社会分化，那是自然的。此外，由于社会經濟結構的弱点而造成的对强制的需要，如果国家以其保护措施，力图利用其統治权力按照自身的考虑来指导上层階級的发展，那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在这方面取得很大成就的过程中，国家首先碰到了本身的弱点和組織的原始性质，而这种原始性质，正如我們已經知道的，是由社会結構的原始性决定的。

因此，建立在俄国經濟基础上的俄罗斯国家，是由在較高經濟基础上成长起来的邻国国家組織的友好压力、尤其是敌对压力推动着向前发展的。从某一时期起（尤其是从十七世紀末叶起），国家竭力加速自然經濟的发展。新的手工业部門，机器，工厂，大生产，資本等，从某个角度来看，可以說都是人为地移植到自然經濟上来的。資本主义似乎是国家的产物。

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說俄国的全部科学都是政府人为努力的产物，是人为地嫁接在民族愚昧的自然基础上的。^②

俄国的思想，也和俄国經濟一样，是在西方較高的思想和較发达的經濟的直接压力下发展起来的。因此，由于經濟的自然經濟性质，也就是由于对外貿易不发达，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主要是国家性的，这些国家的影响在直接采取經濟竞争形式之前，首先表现为

① 荣誉勳位是拿破侖一世所創立。——中譯者注

② 只要回想一下国家和学校之間原有关系的特点就可以明白，至少学校也和工厂一样，也是国家“人为”的产物。国家在教育方面的压力可以說明这种“人为性”。那时逃学的学生們都要被加上鎖鏈。整个学校都是加鎖的。学习成了一种服役。学生都得到工資，等等。——列·托·

为国家生存而进行剧烈斗争的形式。西方的经济通过国家影响了俄国的经济。为了能够在武装较强的敌国中生存下去，俄国不得不建立工厂，创办航海学校，出版筑城学教科书等等。但是如果这个大国的国内经济的总趋势不是向这同一方向发展，如果这种经济的发展没有造成对一般科学和应用科学的需要，那末国家的一切努力也是徒劳无益的。正在自然地由自然经济向货币商品经济发展的国民经济，只是响应政府为促进其发展而采取的措施，并且只响应到这些措施适合于它的程度。俄国的工厂史，俄国货币制度史和国家信用史，都是上述观点的最好证明。

門德列耶夫教授曾写道：“大多数工业部门（金属，制糖，石油，酿酒，甚至是纺织工业），都是在政府措施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有时甚至得到政府的大量津贴，尤其是因为政府一向有意识地奉行保护政策。在亚历山大第三统治时代，政府公然把这项政策写在它的旗帜上……完全自觉地奉行适合俄国的保护关税原则的最高政府，表明比我们整个有教养的阶级还要进步。”（門德列耶夫（Д. Менделеев）：《了解俄国》，一九〇六年圣彼得堡版，第八十四页）这位称赞工业保护关税政策的学者忘记了补充一句，就是政府采取这种政策并不是出于对发展生产力的关心，而是纯粹出于财政上的考虑，部分是出于军事技术方面的考虑。由于这个原因，保护关税政策往往不仅违背工业发展的根本利益，而且甚至违背各企业主集团的私人利益。例如，棉纺厂厂主曾公开指出：“对棉花维持目前的高关税税率并不是为了鼓励种植棉花，而完全是为了国库的利益。”正如在“创建”等级的时候一样，政府所追求的首先是国家的赋税，在“移植”工业的时候，它主要关心的也只是国库的需要。但是毫无疑问，专制政府在把工厂生产移植到俄国土地一事上起了不小的作用。

在发展中的资产阶级社会开始感到需要西方政治制度的时

230 候，专制政府表明它已經掌握了欧洲国家所有的一切物质力量。它依靠的是一个集权的官僚机器，这个机器在調整新关系方面已完全无用，而在执行系統的镇压的时候倒能够發揮巨大的力量。国家广闊的幅員已經通达电报，这使行政机构对它自己的行动具有信心，并使它（在镇压方面）的行动比較一致和迅速。铁路使得它有可能在短時間內把軍隊从国家的一端調到另一端。而革命前的欧洲各国政府差不多是不知道铁路和电报的。专制政府可以調遣的軍隊是龐大的，这支軍隊虽然在日俄战争的严重考驗中表明完全无用，但用于国内統治却是够好的。不仅大革命前的法国政府，甚至是一八四八年的政府都沒有拥有过类似俄国今天拥有的軍隊。

政府在依靠国庫和軍事机器尽量剝削全国的同时，还把每年的預算提高到二十亿卢布的巨額数字。在軍隊和預算的支持下，专制政府还把这个欧洲的交易所当作自己的地方金庫，俄国的納稅人因而变成了这个欧洲交易所的毫无指望的屬民。

因此，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俄国政府在世界面前是一个拥有无敌力量的龐大的軍事官僚和財政一交易的組織。

这个专制王国的財政和軍事力量，冲昏了和迷惑了欧洲的资产階級以及俄国的自由主义，使他們对于同这个专制政府进行公开的實力較量是否能够取胜完全丧失了信心。专制政府的軍事和財政力量似乎排除了俄国革命的一切可能。

但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一个国家愈是集权、愈是脫离社会，它就愈迅速地成为高踞社会之上的独立組織。这样一个組織的軍事和財政力量愈大，它的生存斗争也愈能持久，愈能成功。拥有二十亿預算、八十亿債務和百万軍隊的中央集权国家，在已不再能滿足社会发展的最基本需要（不仅是国内行政的需要，而且还有軍事安全的需要，这个国家原来就是为維持軍事安全而組織的）以后，还能够繼續維持很长

時間。

这种情况拖得愈久，經濟文化发展的需要同发展自己强烈的“亿万倍”“惰性”的政府政策之間的矛盾就愈大。經過大修补时代（这个时代不仅沒有能消除这些矛盾，而且第一次把这些矛盾鮮明地暴露出来），政府自願地轉向議會道路在客观上愈困难，在心理上愈不能接受。它所处的形势向社会表明，摆脱这些矛盾的唯一出路是：在专制制度的鍋炉內积累足够的革命蒸汽来把它爆炸掉。

因此，专制政府的行政、軍事和財政力量（由于具有这种力量，它可以违背社会的发展而繼續存在），不仅沒有能如自由主义分子所設想的那样排除革命的可能性，而是正相反，却使革命成为唯一的出路，而且专制政府的势力把它自身和民族之間的鴻沟掘得越深，这次革命所具有的激进性质也将越大。

俄国真正的馬克思主义可以引以自豪的是，只有它解释了这一发展方向，預言了它的总的形式^①，而自由主义則是靠最烏托邦的“实用主义”为生，革命的民粹派則是靠幻影和对奇迹的信賴而生存。

迄今为止的社会发展使革命成为不可避免。那末，这次革命的力量又是什么呢？

第二章 城市 and 資本

俄国城市是現代历史的产物，更准确地說是最近几十年的产物。在彼得一世統治的末期，亦即在十八世紀的头二十五年，城市

^① 連門德列耶夫教授这样一个反动官僚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在談到工业发展的时候說：“社会主义者在这里觉察到了某种东西，甚至有部分的了解，不过他們走入了歧途，遵循着拉丁語风（！），劝告使用暴力，助长群众的殘酷本性，力图进行革命和夺取政权。”（見《了解俄国》一书第120頁）

人口的数目是三十二万八千多一点，也就是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三。在同一世纪末，城市人口达到一百三十万零一千人，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一。到了一八一二年，城市人口已上升到一百六十五万三千人，相当于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四·四。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城市人口仍然不过是三百四十八万二千人，即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八。最后，根据最近一次人口调查（一八九七年），城市人口的数目达到一千六百二十八万九千人，即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三。^①

如果我们把城市当作一种社会经济结构而不仅仅作为一种行政单位，那末我们必须承认，上述数字并不能提供城市发展的真实图景：俄罗斯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情况，往往为了很不科学的理由而颁发或撤消建立城市的敕书。但是这些数字仍然清楚地表明了俄国城市在改革以前并没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表明了城市在最近几十年来迅速成长的情况。根据米哈伊洛夫斯基先生的计算，城市人口在一八八五年到一八九七年間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三·八，比全俄人口总增长速度（百分之十五·二五）快一倍多，差不多是农村人口增长速度（百分之十二·七）的三倍。如果再加上有工厂的农村和小镇的人口，那末城市（非农业的）人口迅速增加的情况尤其明显。

但是现代俄国城市 and 旧俄国城市的不同不仅在于居民的数目，而且社会形式也不同：现代俄国城市是商业和工业生活的中心。我国旧时代的大多数城市在经济上差不多不起什么作用，它们是军事行政中心或堡垒；它们的居民都是国家雇员，靠国库的开

^① 这些数字摘自米留可夫的《论文集》。全俄的城市人口，包括西伯利亚和芬兰的城市人口在内，据一八九七年人口调查是一千七百一十二万二千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三·二五（門德列耶夫，《了解俄国》第二版，一九〇六年彼得堡版，第90页表）。——列·托·

支生活，一般說来，城市只是行政的、軍事的和征稅的中心。

如果非国家雇用的人在城市內或郊区定居以防止敌人侵襲，这絲毫不妨碍他們繼續从事以前的农业。据米留可夫先生說，甚至是旧俄国最大的城市莫斯科也仅仅是“沙皇的采邑，它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口都这样或那样同宫廷联系着，充当随从、卫士或是僕役。根据一七〇一年的人口調查，在莫斯科一万六千多戶中，仅仅七千戶亦即百分之四十四是工商业者和手工业工人，即使这些住戶也是为皇宫工作的城郊居民。其余九千戶属于僧侶（一千五百戶）和統治階級”。因此，俄国的城市同亚洲专制統治下的城市一样，只起到消費的作用，而与欧洲中世紀的手工业和商业城市不同。在同时期，西方的城市多少成功地确立了手工业工匠无权居住在农村这一原則。但是俄国的城市从沒有追求这类的目的。那末，制造业，即手工业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在农村，附属于农业。由于国家橫征暴斂下的經濟水平低，积累和社会分工都沒有进行。俄国的夏季較西方为短，因而冬閑較长。由于这些因素，制造业沒有同农业分开，沒有集中在城市，而是留在农村作为农业的副业。到了十九世紀后半叶，俄国的資本主义工业开始广泛发展，它沒有碰到城市手工业，碰到的主要是农村手工业。米留可夫先生写道：“俄国至今至多有一百五十万工厂工人，此外还有不下四百万农民在农村中自己家里从事制造业，同时繼續从事农业。欧洲工厂的兴起……所依賴的就是这个階級，但是俄国的这个階級却絲毫沒有参与……建立俄国的工厂。”

233

当然，人口及人們的生产率的进一步增长为社会分工創造了基础。这自然也适用于城市手工业。但是，由于先进国家的經濟压力，这个基础随即被大資本主义工业所夺走，因此城市手工业便沒有发展的机会了。

这四百万家庭手工业工人，正是在欧洲构成城市人口的核心，

作为师傅或工匠参加行会，然后又愈来愈被排除在行会之外的那些成分。正是这个手工业工人阶层构成大革命时期巴黎最革命的地区的大部分人口。单单是这个事实（我国的城市手工业很少）对于我们的革命就有不可估量的后果。^①

234 现代城市的经济实质是，它利用农村所提供的原料进行制造。因此，运输条件对于城市具有决定性意义。只有采用了铁路才能大大扩大供应城市的地区的范围，使它有可能集中多少万人口。集中人口的需要是由大工厂工业的发展引起的。现代城市（至少是具有经济和政治意义的城市）人口的核心是急剧分化的雇佣劳动阶级。正是这个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还不大为人们所知的阶级，注定要在我国革命中起决定性作用。

工厂工业制度不仅把无产阶级推到了最前列，并且剥夺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基础。在以前的革命时期，后者曾得到城市市民阶层，即手工业工人，小店主等等的支持。

俄国无产阶级所以能起到不成比例的巨大的政治作用的另一个原因，是俄国资本很大部分来自外国。据考茨基说，这个事实所造成的后果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增长同无产阶级的数目，力量和影响的增长不相适应。

正如以上所说的，俄国的资本主义不是从手工业发展起来的。它依靠整个欧洲的经济文明征服了俄国，而它面临的当前的竞争者，是无依无靠的农村家庭手工业工人或可怜的城市手工业工人，还有半沦为乞丐的农民这个劳动后备军。专制政府用各种办法帮助资本主义奴役全国。

首先，它把俄国农民变成了世界交易所的附属品。国家经常

^① 当人们把俄国革命不加批评地同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加以类比而成为老生常谈的时候，帕尔乌斯（Т. Парвусь）曾经有远见地指出了这个情况，即指出了俄国革命具有特殊命运的原因。——列·托·

需要金錢而國內缺乏資本的情況，為盤剝重利的外國貸款創造了活動的天地。從葉卡特林娜二世統治時代到維特^①和杜爾諾沃^②內閣為止，阿姆斯特丹、倫敦、柏林和巴黎的銀行家，一貫地盡力把這個專制制度變成一個巨大的投機交易所。相當大的一部分所謂內債，也就是通過國內信用部門籌得的貸款，同外債並沒有任何區別，因為這些債款也是由外國資本家貸給的。專制政府以沉重的賦稅把農民弄得無產階級化和貧困化，把歐洲交易所的大量財物變成了士兵、軍艦、單人監獄、鐵路。這些開支的大部分，從經濟觀點來說完全是非生產性的。有很大一部分國民產品以利息形式被送往國外，使歐洲的財政貴族更加富足更加強大。最近幾十年來歐洲財政資產階級在議會制度國家的政治影響不斷增長，迫使商業和工業資本家退居次要地位，它的确已把沙皇政府變成了它的附庸；但是它不可能也不願意、而且實際上也沒有成為俄國國內資產階級反對派的組成部分。它是抱同情還是懷敵意都受荷蘭銀行家霍普之流在一七九八年貸款給沙皇保羅的條件所規定的原則的左右，這個原則就是“不論政治情況如何利息必須償付”。歐洲交易所甚至直接關心專制政府的存在，因為再沒有別政府能夠保證這麼高額的利息。但是國家貸款並不是歐洲資本進入俄國的唯一途徑。耗費俄國國家預算相當一部分所償還的那些錢，又以工商業資本的形式回到了俄國，因為它們受到了這個國家未經觸動的天然資源的吸引，主要吸引它們的是那里沒有組織的、不習慣進行抵制的勞動力。一八九三到一八九九年是我國工業繁榮時期的後期，也是歐洲資本大量擁入的時期。因此，在俄國土地上把俄國工人階級動員起來的，大部分仍然是歐洲的資本，即在法國和比利時的議會里取得政治權力的資本。

235

① 維特，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任沙皇內閣總理。——中譯者注

② 杜爾諾沃，于一八九五年起任總理。——中譯者注

歐洲資本為了在經濟上奴役這個落後國家，為它設計了主要的生產部門和通訊部門，跳過了一整套中間的技術和經濟階段，而這些階段是擁有這些資本的國家過去必須經過的。但是這些資本在爭取經濟統治地位的道路上所碰到的障礙愈少，在政治上的作用也愈不足道。

歐洲的資產階級是從中世紀的第三等級發展起來的。它以人民的名義舉起了抗議上面兩個等級的掠奪和暴虐的旗幟，而它自己也是想剝削人民的。中世紀的階級君主制度在轉變為官僚專制制度的過程中，曾在反對僧侶和貴族的特權的鬥爭中依靠過城市人民。資產階級利用城市人民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此官僚專制制度和資產階級是同時發展起來的，而當兩者在一七八九年互相衝突的時候，資產階級得到了全民族的支持。

236 俄國專制制度是在西方國家的直接壓力下發展起來的。它早在本國經濟條件足以產生大資產階級以前，就抄襲了西方國家的行政和管理方法。在俄國城市所起的經濟作用還微不足道的時候，它就擁有龐大的常備軍和集權的、官僚的和財政的機器，並陷入了對歐洲銀行家的難以自拔的債務關係。

西方資本在專制政府的直接合作下闖進俄國，並在短時期內把許多古老的城市變成了工商業中心，甚至在短時期內把以前完全無人居住的地方變成了大工商業城市。這些資本常常以大股份公司法團的形式出現。在一八九三到一九〇二年工業繁榮的十年中，股份公司的固定資本增加了二十億盧布，而在一八五四到一八九二年年僅增加了九億盧布。無產階級立即集中而成為廣大的群眾，而在這些群眾和專制政府之間存在着為數不多的大資產階級，他們孤立在“人民”之外，一半是外國的，沒有歷史傳統，激勵他們的只是對利潤的貪欲。

第三章 一七八九——一八四八 ——一九〇五

历史不会重复。不論人們怎样把俄国革命同法国大革命相比，也决不能把前者变成后者的重复。十九世紀并不是白白地度过的。

一八四八年同一七八九年相比已經有了很大不同。同法国大革命相比，普魯士和奥地利的革命以它們微不足道的規模令人吃惊。从一方面說它們是发生得太早，而从另一方面說它們又发生得太晚了。资产階級集团为了同过去貴族进行根本清算所需的巨大力量，只有**或者靠反抗封建暴政的全民的强大团結，或者靠力图解放自己的民族内部的階級斗争蓬勃发展**才能取得。第一种情况在一七八九年到一七九三年間发生过，那时为了竭力抵制旧秩序而团結起来的民族力量，完全消耗于反对反动派的斗争；第二种情况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我們也只能认为是一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为战胜历史上黑暗势力所必需的实际力量，将通过资产階級国家内“自相殘杀”的階級斗争而产生出来。国内的严重摩擦将消耗掉很大一部分力量，因而使资产階級不再可能起主要作用；这种摩擦将推动其反对者——无产階級前进，使无产階級在一个月內获得十年的經驗，使它处于首要地位，并且迫使资产階級把紧紧掌握的政权交給它。这个坚决、毫不犹疑的階級，可以使事件获得巨大发展。

237

革命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完成，要么一个民族团結得像一头奋起前进的獅子，要么一个民族在斗争的过程中最后分裂，以便让其中最优秀的部分来完成这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所无力执行的任务。这是两种对立的情况，其純粹形式当然只有在邏輯对比中

才能得到。

这方面的中間情况，正如許多例子所表明，是最坏的情况。但是一八四八年正是这种中間情况。

在法国历史上的壮烈时期，我們看到一种资产阶级，它开明、活跃，但是还不知道它自己地位的矛盾，历史把领导爭取新秩序的斗争的任务交给它，这个斗争不仅反对法国的陈旧制度，而且也反对全欧洲的反动势力。资产阶级的各个派别始终认为自己是民族的领袖，他们把群众吸引到斗争中来，给予他们口号并授予他们以斗争的策略。民主派用政治思想把民族团结了起来。人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选举资产者作为他们的代表，选民给予代表们的命令是用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救世任务的资产阶级语言写出来的。在革命时期，虽然阶级对抗暴露了出来，但是革命斗争的强大惯性不断地把资产阶级中最保守的分子抛离政治轨道。每个阶层都是在其力量转移到随后一个阶层之后被抛离政治轨道。整个民族仍将继续以愈来愈尖锐、愈来愈坚决的方式为它的目标而斗争。当富有的资产阶级上层脱离运动中的民族核心、同路易十六结成联盟的时候，民族的民主要求便反对这个资产阶级，采取普选权和共和国这种逻辑上不可避免的民主形式。

法国大革命确实是一次民族革命。此外，资产阶级争取统治地位、政权和完全胜利的世界性斗争，也在民族范围内取得了阶级的表现。

238 **雅各宾主义**是现在一切自作聪明的自由主义分子口中的骂人话。资产阶级对革命的仇恨，对群众的憎恨，对于在街头形成的历史的力量和光辉的憎恨，都体现在这样一个愤怒和恐惧的吼叫中：**雅各宾主义！**我们共产主义的世界大军老早已经为雅各宾主义作了历史结论。现在的整个国际无产阶级运动都是在反对雅各宾主义的影响的斗争中形成和壮大起来的。我们批判了它的理

論，揭露了它的历史局限性、它的社会矛盾性、它的烏托邦主义，还揭露了它的用語，我們摒弃了它的传统，这些传统几十年来一直被认为是革命的神圣遗产。

但是我們保卫雅各宾主义使其不受貧血的、軟弱无力的自由主义的攻击、中伤和愚蠢的誹謗。资产階級已經可耻地背叛了它在历史上年輕时期的一切传统，它現在的雇用者辱歿他們祖先的坟墓，褻瀆他們祖先的理想。无产階級已經起来保护过去资产階級革命的光荣。无产階級不論在实践中怎样彻底地摒弃资产階級的革命传统，然而还是把这些传统作为伟大的热情，豪迈气概和主动精神的遗产而加以保护，常常怀着激动的心情同情雅各宾党人在国民議會里的演說和行动。

如果没有法国大革命的传统，自由主义又有什么魔力呢！……资产階級民主在什么时期曾經达到像一七九三年的雅各宾党、无套褲党、恐怖主义者、罗伯斯庇尔的民主所达到过的高度，和在人民心中燃起那样高涨的热情呢？

当德国和奥地利的资产階級激进主义以卑鄙可耻的事迹結束其簡短历史的时候，除了雅各宾主义外，又有什么能在过去和現在使法国各种色彩的资产階級激进主义把絕大多数人民、甚至今天的无产階級保持在其影响之下呢？

雅各宾主义的魔力、它的抽象的政治思想、它对神圣共和国的崇拜、它的堂皇的宣言，一直到現在仍然撫育着如克里孟梭、米勒兰、白里安和布尔日瓦这些法国激进党人和激进社会党人，以及撫育着在保卫社会基础方面并不亚于上帝保佑的威廉二世治下的愚鈍容克貴族的一切政治家，如果不是这些东西撫育着他們，那究竟又是什么呢？其他国家的资产階級民主派也对他們羡慕得要死，虽然他們同时仍在咒罵使他們取得政治优势的英勇的雅各宾主义。

甚至在許多希望已經破灭以后，雅各宾主义仍然作为一种传 239

統留在人們的意識里。有一个长时期无产階級曾經用过去的語言談論自己的前途。一八四〇年，即在“山岳党”政府执政以后差不多半个世紀，在一八四八年六月的日子之前八年，海涅曾参观了圣馬騷近郊的几个工厂，并見到了工人們——“下层階級中最健全的部分”——的讀物。他在写給一家德国报纸的文章中写道：“我在那里发现了大罗伯斯庇尔的几篇新的演說，还有馬拉 (Marat) 写的小册子的两銅币的版本；卡貝 (Cabet) 的《革命史》；卡門南 (Carmen) 的恶意的諷刺文；布那罗蒂 (Buonarroti) 的作品《巴倍夫的教訓和密謀》，都是热情洋溢的作品……”这位詩人預言說，“一个共和国迟早会作为这种种子的果实，在法国土壤上萌芽和成长。”

在一八四八年，資產階級已不能起到类似的作用。它不打算也不能够承担起清除妨碍它取得政权的社会制度的革命責任。現在我們已經知道这是什么緣故。它的任务(关于这一点它很清楚)是在旧制度中加进一些必要的保证，不是为了取得政治上的統治地位，而只是为了同旧势力分享权力。由于法国資產階級的經驗，它变得卑鄙地聰明起来，它被它的变节所腐化，被它的失敗吓倒了。它不仅不能領導群众向旧秩序冲击，反而依靠旧秩序来打退推动它前进的人民群众。

法国資產階級成功地发动了大革命。它的意識是社会的意識，如果不首先传播它的意識作为一种目标，作为一个政治創造的任务，那是什么制度也建立不起来的。它常常凭借动人的姿态来隱匿自己的資產階級世界观的局限性，但是它还是前进了。

而德国的資產階級从一开始就沒有“进行”革命，而是同革命断絕关系。它的意識反对爭取自己的統治地位的客观条件。革命不可能由它来进行，而它只能是反对革命。民主制度在它的心目中不是一个斗争的目标，而是对它的利益的威胁。

一八四八年需要一个能在沒有資產階級或不管資產階級的情

况下掌握形势的阶级，需要一个不仅能以其压力推动资产阶级前进并且能在紧要关头把资产阶级的政治尸体抛开的阶级。

当时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都作不到这一点。

城市小资产阶级不仅敌视过去而且也敌视未来。这个阶级仍然陷在中古的关系中，但是已经不能抵挡“自由”工业；它仍然在城市留下痕迹，但是在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面前已经退让了；它浸透了成见，事件的纷扰使它惘然若失，它受剥削同时又剥削人，贪婪而又毫无办法，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对于当代的大事是无能为力的。 240

农民甚至在更大程度上缺乏独立的政治主动性。农民多少世纪来在封建枷锁的束缚下，贫困不堪，怒气冲天，身上集中了新旧剥削的一切痕迹，他们在一定时期曾经是杂乱的革命力量的丰富源泉。但是他们分散，缺乏组织，被排除在作为政治和文化神经中枢的城市之外，愚昧无知，目光只限于他们自己的农村，对于城市里所想的一切都漠不关心，他们不可能起领导作用。农民一旦解除了压在身上的封建义务便立即感到满足，对于曾经为他们的权利而斗争的城市不知感恩。解放了的农民变成了“秩序”的狂热拥护者。

知识界民主分子也缺乏阶级力量。这个集团一会儿追随它的老大哥自由资产阶级作为它的政治上的尾巴，一会儿又在紧要关头抛弃自由资产阶级来揭露它的软弱无能。它处在没有解决的矛盾中彷徨混乱，并把这种混乱带到各处。

无产阶级还太软弱，太缺乏组织、经验和知识。资本主义的发展已达到必然取消旧封建关系的程度，但还不足以使工人阶级这个新生产关系的产物成为决定性的政治力量。甚至在德国国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抗已经严重到使资产阶级不可能大胆承担领导国家的任务，但还不足以使无产阶级承担这项任务。革命

內部的摩擦的确已經为无产階級政治上的独立准备了条件，但是这种摩擦在那时候也削弱了力量和統一行动，使努力白白浪費，迫使革命在取得初步成就后即令人厌烦地踏步不前，然后在反动派的打击下便告退却了。

奧地利的情况为革命时期政治关系的不完备性和不成熟性提供了极其明显和可悲的例证。

241

維也納的无产階級在一八四八年表现了惊人的英勇和无穷的力量。他們一再地冲向斗争，鼓动他們的只是一种模糊的階級本能，然而缺乏对斗争目标的总的概念，暗中摸索似地从一个口号轉到另一个口号。十分奇怪的是，无产階級的領導权轉到了**大学生們**手中，这个唯一活跃的**民主集团**由于其积极性而对群众有很大影响，因此对形势有很大的影响。大学生們无疑能够英勇地向障碍物冲击，光荣地同工人們結成兄弟关系，但是他們却完全不能指导把街头“专政”交給他們的革命的进程。

沒有組織、沒有政治經驗和独立領導的无产階級跟随着大学生。在紧要的关头，工人們一律給予“用脑工作的先生們”以“用手工作的人們”的援助。大学生一会儿号召工人战斗，一会儿他們自己又在城郊阻止工人們进城。他們时而利用他們的政治威信和依靠大学生軍团的武器，禁止工人們提出他們的独立要求。这是对无产階級实行仁慈的革命专政的非常鮮明形式。

这种社会关系的結果是怎樣的呢？是这样：在五月二十六日，当全維也納的工人在大学生的号召下，起来抵制解除大学生（大学生軍团）的武装的行動的时候，当全首都的人在全市布置下障碍物，表现了惊人力量并掌握了維也納的时候，当全奧地利都团結在武装的維也納的周围的时候，当国王在逃并已失去重要性的时候，当最后的軍队在人民的压力下退出首都的时候，当奧地利政府辞职而沒有提名继任人的时候，却沒有一种政治势力起来执掌政权。

自由資產階級故意拒絕執掌這種以土匪方式得來的政權；它一味夢想逃到蒂羅爾的皇帝回到無人照管的維也納來。

工人們有足够的勇氣打擊反动派，可是在組織上和覺悟上還不足以執掌政權。強大的工人運動存在着，但是具有明確的政治目標的無產階級鬥爭還沒有足够的发展。沒有能力執掌政權的無產階級不能完成這項偉大的歷史任務，而資產階級民主分子正如常常發生的那樣，在最緊要的時候偷偷地溜走了。為了迫使這些逃兵履行他們的義務，無論如何需要無產階級具備不少於它自己建立臨時工人政府時所需要的力量和成熟性。

242

總起來說，當時是造成了一種形勢，關於這種形勢，一位同時代的人曾經正確地說：“實際上維也納是建立了一個共和國，但是不幸的是，沒有一個人看到了這一點。”……那個沒有人注意到的共和國退出舞台，讓位給哈布斯堡王朝，至今已經很久了，……一個好機會，一旦失去再不復返了。

拉薩爾從匈牙利和德國革命的經驗得出結論說，從現在起，革命只有從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才能找到支持。

拉薩爾在一八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致馬克思的信中寫道：“匈牙利比任何其他国家更有可能把鬥爭進行到勝利的結局。這特別是因為那里的黨不是像西歐的黨那樣處在分裂和尖銳矛盾的狀態，因為那里的革命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民族獨立鬥爭的形式。但是匈牙利還是被擊敗了，並且正是由於民族黨的背叛。”

拉薩爾繼續寫道：“這件事以及一八四八到一八四九年的德國歷史，使我得出不可動搖的教訓，任何鬥爭，除非从一开始就宣布是純社會主義的革命，都不可能在歐洲取得勝利。任何鬥爭，如果社會問題在其中只是一個模糊的因素並繼續處在次要地位，如果鬥爭是在民族復興或資產階級共和主義的旗幟下進行，都不可能獲得勝利。”

我們不打算論述對於這些斷然的結論的批評。但是，早在十九世紀中葉，政治解放的任務就已經不可能靠全民族同心協力的壓力加以解決，這一點無論如何是正確的。只有從階級立場為鬥爭積聚力量的無產階級的獨立策略，才能保證革命的勝利。

243 一九〇六年的俄國工人階級同一八四八年維也納的工人毫無相似之處。這一點的最有力的證據是工人代表蘇維埃在全俄各地的成立。這些蘇維埃還不是為了在起義時奪取對無產階級群眾的統治權而事先準備的密謀組織。不，這些是群眾自己為了聯繫他們的革命鬥爭而有計劃地建立起來的機構。這些由群眾選出並對群眾負責的蘇維埃，毫無疑問是民主的機關，它們以革命社會主義的精神執行着最堅決的階級政策。

俄國革命的社会特点在武装人民的问题上特別明显。

民兵（國民警衛軍）是一切革命的首要口號和首要成果，在一七八九和一八四八年，在巴黎，在意大利諸邦，在維也納和柏林都是如此。在一八四八年，國民警衛軍（也就是把有財產和“有教養的”人武裝起來）是整个資產階級反對派的口號，甚至是最溫和的派別的口號，其任務不僅是保衛已贏得或者應該“賜與的”自由，以防來自上面的背叛，而且還保護資產階級所有制使其不受無產階級侵犯。因此，組織民兵顯然是資產階級的階級要求。英國一位自由主義的歷史家在談到統一的意大利的時候說：“意大利人很懂得，組織武裝的民兵會使專制制度不可能繼續存在。此外，這還是有產階級防止可能的混亂和隱在深處的任何混亂的保證。”^①而統治的反動派由於在行動的中心沒有足夠的軍隊對付“混亂”，亦即對付革命群眾，便把資產階級武裝起來。專制制度首先容許市民鎮壓和平定工人，然後又解除市民們的武裝並把他們平定。

^① 波爾頓·金格：《意大利統一史》俄譯本第一卷第220頁，一九〇一年莫斯科出版。——列·托·

在俄国，組織民兵的口号沒有得到資產階級政党的支持。自由主义分子实际上不得不承认武装的重要性，因为专制制度在这方面給了他們一些实例教訓。但是他們也理解到，在俄国，离开或者反对无产階級而要建立民兵是絕對不可能的。俄国的工人并不像一八四八年的工人，那时的工人口袋里装滿了石头，手持铁棍作武器，而店主、大学生和律师則扛着王室的毛瑟枪，腰間挂着劍。

在俄国，武装革命首先意味着把工人武装起来。自由主义分子知道并駭怕这一点，便完全避开民兵的問題。他們甚至未經一战就把他們的地位让給了专制政府，正如資產階級的梯也尔(Thiers)仅仅为了迴避武装工人就把巴黎和法国拱手让給了俾斯麦一样。

在自由民主联盟的宣言、名叫《宪政国家》的論文集中，泽維列戈夫(Дживелегов)先生論述了国内革命的可能性。他說得对：“社会本身必需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起来保卫宪法。”从这一点得出的当然結論，是需要人民的武装，而这位自由主义的哲学家却认为，“有必要补充”說“沒有必要每个人都拿起武器”^①来防止反复。需要作的只是社会准备进行抵抗。究竟用什么方式进行抵抗則沒有說明白。如果可以从这个詭辯得出什么結論来的話，那就是在我国民主分子的心目中，对武装的无产階級的恐惧比对专制制度的士兵的恐惧还要大。

244

因此，武装革命的任务完全落到了无产階級身上。一八四八年資產階級組織国民兵的階級要求，在現在的俄国已經以武装人民的要求，首先是武装无产階級的要求，开始提了出来。俄国革命的命运是同這個問題紧密联系在一起。

① 《宪政国家》，論文集，第一版第49頁。——列·托·

第四章 革命和无产階級

革命是社会势力在爭取政权的斗争中进行的公开較量。

国家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是統治的社会势力手中的一个工作机器。和各种机器一样,国家也有动力、传达和执行的机构。国家的动力是階級利益,它的机构是鼓动,报纸,教会和学校宣传,政党,街头集会,請願和起义。传达机构是以上帝意志的形式(专制制度)或国民意志的形式(議會制度)表达派系、王朝、等級或階級利益的立法組織。最后,执行机构是拥有警察的行政机关,拥有監獄的法庭和軍隊。

国家本身不是目的,但却是組織、解散和改組社会关系的最大工具。它可以是深刻革命的杠杆,也可以是有組織的反动工具,这要看掌握它的人究竟是誰。

245 每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党都要尽力夺取政权,从而使国家为它所代表的那个階級的利益效劳。社会民主党人既然是无产階級的政党,当然要尽力爭取工人階級在政治上的統治地位。

无产階級随着資本主义的发展而成长和日益壮大。在这个意义上,資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是无产階級向专政的发展。但是,政权轉到工人階級手中的时日,并不直接决定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而是决定于階級斗争中的关系,决定于国际形势,最后还决定于許多主观因素,如传统、首創精神和战斗的准备……

經濟比較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階級,有可能比发展得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階級更早地取得政权。在一八七一年,无产階級有意識地在小資产階級的巴黎把政权拿到了手,虽然只掌握了两个月,但是在英国和美国的大資本主义中心,无产階級却从沒有能掌握政权一个小时。认为无产階級专政在某种程度上机械地有

賴于一个国家的技術力量和資源，是一种簡化到极点的“經濟”唯物主义的成見。这种观点同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根据我們的看法，俄国革命将創造出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之下，政权有可能（在革命胜利时应该）在資產階級自由主义的政客們有机会充分施展其政治天才之前轉到无产階級手中。

馬克思在美国报纸《論壇报》上总结一八四八到一八四九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时候写道：“德国工人階級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发展比英国和法国的工人階級落后，正像德国資產階級比英国和法国的資產階級落后一样。主人是什么样，僕人也是什么样。人数众多、强大、集中而有觉悟的无产階級的生存条件，是与人数众多、富裕、集中而强有力的資產階級的生存条件同时发展的。在資產階級的各个部分，尤其是其中最进步的部分即大工业家还没有获得政权并按照他們的需要改造国家之前，工人階級运动本身就永远不会是独立的，永远不会具有純粹无产階級的性质。而在这以后，企业主与雇佣工人之間不可避免的冲突就会提到日程上来，要延緩这一冲突再也不可能了。……”^①这段引文也許是讀者所熟悉的，因为近来一些死啃书本的馬克思主义者多次濫用这段文字。它被用来作为反对在俄国建立工人政府这一思想的无可辯駁的論据。“主人是什么样，僕人也是什么样”。他們爭辯說，如果俄国的大資產階級还没有力量执掌政权，那末更談不上建立工人的民主，亦即建立无产階級的政治統治了。

246

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分析方法，——不是分析文句，而是分析社会关系。資產階級自由主义的軟弱必然意味着工人运动的軟弱，这对于俄国說来难道是真的嗎？对俄国來說，在資產階級夺得

^① 馬克思：《一八四八到四九年的德国》俄譯本，阿列克賽耶維奇版，一九〇五年，第8—9頁。——列·托·（見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11頁。——中譯者注）

政权之前，当真不能有独立的工人运动嗎？仅仅提出这些問題就可以明白：在这个把馬克思的附有历史条件的話变为超历史的定理的企图后面，隐藏着多么不可救药的形式主义。

在工业兴盛时期，俄国工厂工业的发展是带有“美国”性质的，但是俄国資本主义工业的实际規模，同美国的工业比起来只能算是一个嬰兒。現在俄国有五百万人（占經濟上独立人口的百分之十六·六）从事制造工业；而美国的相应数字是六百万和百分之二十二·二。这些数字告訴我們的是不很全面的情况，但是如果我們想一想俄国的人口差不多是美国的两倍，这些数字就更有說服力了。但是为了理解俄国和美国工业的实际規模，必須指出：在一九〇〇年，美国工厂和大手工业作坊生产出供銷售的貨物达二百五十亿卢布，而俄国工厂和作坊同时期生产的貨物的价值还不到二十五亿卢布。（門德列耶夫：《了解俄国》，一九〇六年版，第99頁）

247 毫無疑問，工业无产階級的人数、集中程度、文化程度以及在政治上的重要性，都依賴于資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程度。但是这种依賴性不是直接的。在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和它的各階級的政治力量之間，在每一个特定时刻，都夹杂着許多不同的国内和国际性质的社会和政治因素，这些因素会使經濟关系在政治上的表現发生偏差，甚至完全变形。尽管美国的工业生产力比我国高十倍，但是俄国无产階級的政治作用，它对本国的政治影响以及在最近将来影响世界政治的可能性，却比美国无产階級的作用和重要性大得难以比拟。

考茨基在他最近論美国无产階級的作品中指出，无产階級和資产階級的政治力量一方同資本主义的发展水平一方之間沒有直接关系。他說：“現在存在着两种情况完全相反的国家。在一个国家有一种生产因素过分地发展，也就是发展得同資本主义的生产

方式的发展水平不成比例，在另一个国家是另一种生产因素过分地发展。在美国这个因素是资产阶级，而在俄国，这个因素是无产阶级。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具备资本专政的基础，也没有一个国家的战斗的无产阶级像在俄国那样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重要地位应该而且无疑会继续增长，因为这个国家只是最近才开始参加现代的阶级斗争，只是最近才为阶级斗争提供某种迴旋的余地。”考茨基在指出德国的前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从俄国得到借鉴时继续说：“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情是，正是俄国无产阶级向我们指出了我国的前景，只是这不是表现在资本组织方面，而表现在工人阶级的抗议方面。”他评论说：“俄国是资本主义世界各大大国当中最落后的国家这个事实，似乎同唯物史观相矛盾，根据唯物史观，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的基础；”他继续说，“但是实际上这同我们的对手和批评者所描述的唯物史观相矛盾，他们认为唯物史观不是一种研究方法，而只是一种现成的死板公式。”（考茨基：《美国工人和俄国工人》一九〇六年彼得堡版第4、5页）我们特别把这几行推荐给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用从适用于生活的一切场合的条文得出的推论来代替对社会关系所作的独立分析。再没有比这些自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严重地损害马克思主义了！

因此，根据考茨基的意见，俄国在经济方面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较低，而在政治方面的特点是大资产阶级力量很小和革命无产阶级很强大。这就造成了这样的事实：“为全俄国利益而斗争的责任，已注定落在国内现有唯一强大的阶级——工业无产阶级身上。因此，工业无产阶级具有巨大的政治重要性，因此，俄国争取从窒息它的专制制度重压下解放的斗争，已变成单纯是专制制度和工业无产阶级间的决斗，在这场决斗中农民可以给予很大的支持，但是不能起领导作用。”（门德列耶夫：《了解俄国》一九〇六年版，第10页）

所有这些不是使我們有理由得出这样一个結論：俄国“僕人”将比他們的“主人”更早地取得政权嗎？

* * *

政治上的乐观主义可能有两种。它可能过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和革命形势的有利方面，并且給自己提出一些在現有的力量对比关系下解决不了的任务。但是相反地，它可能乐观地給我們的革命任务定下一个框框，而这个框框是我們的地位的邏輯必然会迫使我們打破的。

我們可以給一切革命問題定下一个框框，硬說我国的革命就其客观目的、从而就其必然結果說来是**资产階級革命**，我們也可以无視这一事实：这个**资产階級革命**的主角是无产階級，而且无产階級将被革命的全部进程推动着去执政。

你可以安慰自己說，在**资产階級革命**的范疇內，无产階級在政治上的統治地位只会是一种偶然的插曲；同时你可以忘記：无产階級一旦把政权握在手，那末不經過拚命抵抗，不到政权被武力夺走它就不放弃政权。

你可以安慰自己說，俄国的社会条件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建立社会主义經濟，同时你也可以不考虑这一事实：无产階級一旦取得政权，就必然会在它的地位的全部邏輯的逼迫下去組織国家管理的經濟。

249 一般社会学的定义——**资产階級革命**——决不能解决**某一**资产階級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政治策略任务、矛盾和困难。

在十八世紀末的其客观任务是建立資本統治的**资产階級革命**的范疇內，无套褲党的专政表明是可能的。这次专政并不单纯是一种偶然的插曲，它在随后整个一个世紀留下了痕迹，尽管这次专政由于**资产階級革命**的局限很快就被粉碎了。

在二十世紀初的就其直接客观任务而言也是**资产階級革命**的

一次革命中，出現了无产階級在最近的将来取得政治上的統治地位的必然性，或者至少是可能性。无产階級自己必須注意，使这种統治地位不致如某些现实主义的庸人所希望的那样，仅仅成为暫时的“插曲”。但是現在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問題：无产階級专政是不是不可避免地要打破資產階級革命的界限呢？或者在現有世界历史条件之下，它可不可以給自己开辟一个在打破这些界限之后取得胜利的前景呢？在这里，我們面临策略的問題：我們是不是該在革命发展越来越接近建立工人政府的阶段的时候，自觉地向这个目标奋斗，或者在那时我們必須把資產階級革命打算塞給工人的政权当作一种不幸，因而还是加以迴避的好呢？

难道我們應該听信“现实主义”政客福尔馬尔在談到一八七一年的公社社員时所說的話“他們不該去接管政权，还是去睡觉好……”？

第五章 掌握政权的无产階級和农民

249

一旦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政权就会轉到在斗争中起领导作用的那个階級手中，換言之，轉到无产階級手中。我們同时說明，这决不排除非无产階級的社会集团的革命代表参加政府。他們能够、也应该参加政府；健全的政策会迫使无产階級吸收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农民的有影响的領袖来参加政府。整个問題都在于：誰来决定政府政策的内容，誰构成政府中稳固的多数？人民的民主阶层的代表参加工人占多数的政府是一回事，而无产階級的代表以多少有点受尊敬的人质的身份参加明确的資產階級民主政府是另一回事。

250

自由主义的大資產階級的政策虽然是动摇、退却和背信弃义的，但却是十分明确的。无产階級的政策甚至更加明确和完备。但

是知識分子的政策，由于他們社会上的中間性质和政治上的順应性；农民的政策，由于他們的社会复杂性、中間地位和愚昧无知；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政策，仍然由于他們的优柔寡断、中間地位和完全缺乏政治传统——这三个社会集团的政策是完全不明确、不具体，充滿各种可能性，因而是充滿意外的。

只要想像一下一个沒有无产階級代表参加的革命民主政府，就立即可以明白这种想法是多么荒謬！社会民主党人拒絕参加革命政府，会使这样一个政府根本不可能存在，因而等于背叛革命事业。但是无产階級参加政府在客观上是极可能的，原則上也是可以容許的，只是这种参加要具有**統治的和領導的**性质。当然，人們可以把这样一个政府說成是无产階級和农民专政，无产階級、农民和知識分子专政，甚至說成是工人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联合政府。但是問題仍然在于：誰在政府中掌握領導权，并通过政府領導全国？当我们說到工人政府的时候，关于这一点我們的回答是，政府的領導权應該属于工人階級。

作为雅各宾党人专政机关的国民議會决不是单单由雅各宾党人組成的。不仅如此，雅各宾党人在其中甚至是少数派，但是无套褲汉在国民議會以外的影响以及为了拯救国家对坚决政策的需要，使得政权落到了雅各宾党人手中。因此，虽然国民議會形式上是国民的代表机构，其中包括雅各宾党人、吉伦特党人以及大批搖摆的被称为“沼泽派”的中間分子，本质上它仍然是雅各宾党人的专政。

251 当我们說工人政府的时候，我們指的是工人階級代表在其中占統治和領導地位政府。

无产階級不扩大革命的基础，就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

許多劳动群众阶层，尤其是农村中的劳动群众，只有在革命先鋒隊——城市无产階級掌握国家政权以后，才能第一次被吸收到

革命中来，并在政治上組織起来。革命的鼓动和組織工作将靠国家財力来进行。最后，立法权本身将成为使人民群众革命化的强大工具。

把資產階級革命的全部負擔放在无產階級肩上的我国社会历史关系的性质，将不仅給工人政府造成巨大困难，并且也会（至少在政府成立的初期）給予它难以估量的优越性。这会在无產階級和农民之間的关系当中表現出来。

在一七八九——一七九三年和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中，政权首先从专制制度轉到溫和的資產階級分子手中，是后者解放了农民（怎样解放的是另一回事）之后，革命民主派才接受或者准备接受政权的。解放了的农民对于“城里人”的政治花样，也就是对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再不感任何兴趣，并像一块沉重的基石堵在“秩序”的下面，把革命出卖給了霸权专制的或历来专制的反动势力。

俄国革命現在不容許，将来在一个长时期內也不会容許建立任何可以解决最起碼的民主任务的資產階級宪法秩序。至于維特和斯托雷平之类的官僚改革家所作的一切“启蒙”努力，都因他們自己的生存斗争而化为烏有了。因此，农民——甚至是作为一个阶层的全体农民——的最基本革命利益的命运，同整个革命的命运，即同无產階級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

执政的无產階級将作为解放农民的階級出現在农民面前。

无產階級的統治不仅意味着民主平等，自由的自治，整个賦稅負擔轉移到富裕階級身上，常备軍改为民兵，取消强制性的教会捐，而且还意味着承认农民在土地关系方面所进行的一切革命变革（沒收土地）。无產階級将使这些变革成为国家在农业方面采取进一步措施的开端。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农民在革命初期最困难时期对于維持无產階級政权（“工人民主”）的兴趣，无论如何不亚于法国农民对于維持拿破侖·波拿巴軍政府的兴趣（拿破侖政府

曾以刺刀的力量向新的有产者保证他們的土地的不可侵犯)。这意味着,在得到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召集的人民代表机构,无非是无产阶级統治的民主外衣。

但是,农民是否有可能把无产阶级推开并取而代之呢?

这是不可能的。一切历史經驗都駁斥这种假定。历史經驗表明,农民绝对不可能起**独立的**政治作用。^①

253 資本主义的历史是农村从属于城市的历史。欧洲城市的工业发展漸漸使得农业生产中的封建关系不可能繼續存在下去。但是农村本身从来没有产生出一个可以承担消灭封建制度的革命任务的阶级。使农业从属于資本的城市产生了一种革命力量,这种力量把对农村的政治领导权拿到了自己手里,并且把国家和财产关系中的革命传播到农村。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农村最后遭到了資本的經濟奴役,农民也受到資本主义政党的政治奴役。这些政党在議会政治中恢复了封建制度,把农民变成它們的政治領域,变成它們进行选举狩猎的場所。現代資產阶级国家通过賦稅和軍国主义把农民推入高利貸資本的罗网,靠全国的牧师、学校和营房

① 难道“农民联盟”以及后来的劳动派在杜馬里的兴起和发展,駁倒了这些以及后来的論据嗎?一点也不。“农民联盟”是什么?这个联盟包括一些寻求群众支持的激进民主派,再加上一些最有觉悟的农民(显然不是农民的最下层),联盟所依据的是民主革命和土地改革的綱領。

至于談到“农民联盟”的土地綱領(“平均使用土地”这就是它成立的目的),必須指出下面一点:农民运动发展得愈广泛愈深入,愈接近于沒收和分配土地,农民联盟就分裂得愈快,这是由于阶级、地区、日常和技术性质的无数矛盾的緣故。“农民联盟”的成員将在**农民委员会**、即地方的土地革命机关发生其一部分影响,但是不待說,作为**經濟**行政机构的农民委员会,是不能消除农村对城市的**政治上的**依附的,这是現代社会的根本特点之一。

劳动派的激进主义和缺乏固定形式,是农民革命願望中的矛盾的表现。在抱有立宪幻想的时期,劳动派毫无办法地追随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馬解散的时候,它当然就受社会民主派的领导了。农民代表的缺乏独立性,到了必須表现坚决主动亦即在政权轉到革命派手中的时候,将会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列·托·

把农民变成盘剥重利者政治上的牺牲品。

俄国资产阶级将把一切革命地位让给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也不得不交出对农民的革命领导权。在政权转归无产阶级的情况下，农民只能归附工人民主制度。即使农民在这样做的时候，其觉悟程度并不比他们归附于资产阶级制度的时候更高！但是，当每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在获得农民选票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利用其权力掠夺农民，使农民丧失对前途的一切希望和信心，然后在情况极其不妙的时候，把自己的位置让给另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这时候无产阶级便会依靠农民发动一切力量，以便提高农村的文化水平，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

从我们以上所说的，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怎样看待“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的概念。问题实际上并不是：我们是否认为这种专政在原则上可以允许，我们“是否想要”这种政治合作的形式。我们只是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至少在当前不可能。

实际上，这样一种联合首先必须有一个现有的资产阶级政党对农民有支配影响或者农民自己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独立政党，但是我们已经尽力证明，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可能的。

第六章 无产阶级政治制度

254

无产阶级只有依靠全国的觉醒和全民的热情，才能取得政权。无产阶级将作为民族的革命代表，作为反对专制制度和封建暴政的斗争中公认的人民领袖，参加政府。但无产阶级一旦执掌政权，就会开创一个新时代，一个具有革命立法和积极政策的时代，这里，它决不能保证其作为公认的民族代言人的作用。无产阶级为清除旧政权的垃圾和驱逐旧政权的寄生虫而采取的初步措施，将会得到全民族的积极支持，尽管自由主义的懦夫们会谈论人民群

众中的某些成見是如何頑固。

配合這項政治上的清洗工作的，还会有全部社会和国家关系的民主改組。工人政府在直接压力和要求的影响下，将不得不断然干預一切关系和現象……

工人政府的第一項工作，必須是把一切沾染人民鮮血的人从軍隊和政府中开除出去，把犯有最严重的反人民罪行的团队清除掉或解散掉。這項工作在革命最初的日子就得作，也就是早在有可能实行負責官員选举制度和組織国民軍之前就必須作。但事情并不是到此为止。工人的民主会馬上碰到工作日時間的問題，土地問題和失业問題。

有一件事是毫无疑問的。那就是执政的无产階級的政策将一天天地加深，其階級性质也将愈来愈明确。这样一来，无产階級和民族之間的革命关系将会破裂，农民的階級分化会以政治形式表現出来，农民各組成部分之間的对抗也将随着工人政府政策的明确化和由一般民主政策变为階級政策而逐漸增长。

255 虽然农民和知識分子当中沒有形成資產階級个人主义的传统和反无产階級的成見，有助于无产階級取得政权，在另一方面也必須注意，他們沒有这种成見并不是由于他們的政治觉悟，而是由于他們在政治上愚昧无知，缺乏社会形式，幼稚和优柔寡断。所有这些本性和特点，完全不能为无产階級的彻底有效的政策創造可靠基础。

消灭等級制的农奴制，将得到作为納稅等級的全体农民的支持。按收入征收的累进稅也会得到大多数农民的支持。但是为保护农业无产階級而实行的法律措施，不仅不会得到大多数人的积极同情，而且还会受到少数农民的积极反对。

无产階級会感到不得不把階級斗争推进到农村中去，从而破坏无疑每一个农民都有的——虽然是在比較狹小的範圍內——那

种共同利害关系。无产阶级在它刚刚实行统治的时刻，就必须从农村的穷人和富人之间、农业无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中寻找支持。但是如果农民成分的复杂性会为无产阶级的政策的推行造成困难，并使实行这种政策的基础缩小，那末农民的阶级分化的不成熟也会妨碍在农民中开展城市无产阶级可以信赖的阶级斗争。农民的愚昧幼稚常常使他们对无产阶级采取敌视态度。

农民的冷淡态度，他们在政治上的消极性，尤其是农民上层分子的积极反对，必然会对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发生影响。

因此，执政的无产阶级的政策愈明确愈坚决，它的立足基础也就愈狭窄和愈不稳。这一切都极有可能，甚至是不可避免的……

无产阶级的政策将会遭到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反对的两个主要特点是**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

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格和政治上的幼稚愚昧，他们的局限于农村的短浅眼光，他们的不理解世界政治联系和依存关系，都会为执政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的贯彻造成极大困难。

如果作一种设想，认为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只是这样参加临时政府，在实行民主改革时期领导政府，为取得最彻底的改革而斗争，并为此目的而依靠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然后在民主纲领实现后退出他们参与建设的大厦，以便让位给资产阶级政党而自己则退居反对派地位，因而开辟一个议会政治的时期，那末这种想法就破坏了工人政府的根本概念。这并不是因为这种想法“在原则上”不能容许（抽象地提出问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是因为这是完全不现实的想法，是最坏的乌托邦主义，是革命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主义。

256

原因就在于：

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下，把我们的纲领划分为最高纲

領和最低綱領具有巨大而深刻的原則意义。資產階級執掌政府這一事實，就使我們的最低綱領中同生產資料私有制不相容的一切要求不能存在。這些要求具有社會主義革命的內容，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先決條件。

但是政權一旦轉到社會主義者占多数的革命政府手中，那時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之間的區別，就失去了原則上的和直接實踐上的意义。無產階級政府無論如何不能把自己約束在這種區別的範圍之內。以八小時工作日制的要求為例。大家知道，這同資本主義關係並無矛盾之處，因此是社會民主黨最低綱領中的一條。但是讓我們設想一下在一切社會情緒激昂的革命時期實行這一措施的情況。新法令無疑會遭到資本家的抵制，譬如說，停工和關廠等有組織的堅決抵制。

數以十萬計的工人會被拋到大街上。政府該怎麼辦呢？一個資產階級政府，不論多麼激進，也決不會容許事態發展到這種地步，因為一碰到關廠，它就會毫無辦法。它就會被迫退却，八小時工作日制就會被取消，憤怒的無產階級會遭到鎮壓……

在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下，實行八小時工作日制就會導致完全不同的結果。如果一個政府希望依靠無產階級而不像自由主義那樣依靠資本家，如果這個政府不希望在資產階級民主派之下擔任“公正的”中間人的角色，那末對於這個政府來說，關廠就當然不能被資本家用來當作增加工時的借口。對於工人政府來說，解決糾紛的唯一辦法是，沒收關閉的工廠，由社會來組織這些工廠的生產。

當然人們還可以這樣爭辯：可以由忠於其綱領的工人政府頒布一項有關八小時工作日制的法令；如果資本家進行抵制，而這種抵制又不能依靠旨在保護私有財產制的民主綱領來加以克服，那末社會民主黨人可以辭職並求助於無產階級。這種解決辦法只是

从参加政府的人員的立場出发的解决办法，但不是从无产阶级观点出发的解决办法，也不是从发展革命观点出发的解决办法。因而在社会民主党人辞职以后，形势会和他們不得不执掌政权的时候完全一样。在資本家有組織的抵抗面前逃跑，是比在起初时拒絕执掌政权更为严重的对革命的背叛，因为不参加政府，比起参加政府只是为了暴露出自己的軟弱无能然后退出，的确更好得多。

讓我們再举另一个例子。执政的无产阶级不得不采取最有力的措施来解决失业問題，因为参加政府的工人代表，当然不能以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为理由来答复失业工人的要求，这是十分明显的。

但是如果单是由政府負責保证失业者的生活（以什么方式来保证，現在对我们說并不重要），那就意味着經濟权力立即在很大程度上轉到无产阶级方面。常常依靠存在劳动后备軍的情况来压迫工人的資本家們，会感到自己在經濟上軟弱无力，同时革命政府也使他們注定在政治上无能为力。

既然政府保证支持失业者，那末它也就担負了保证罢工工人的生活的任务。如果政府不这样作，那末它就会立即无可挽回地破坏它賴以存在的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工厂主除了停工，也就是除了关厂以外别无他法。十分明显，在生产停頓的情况下，雇主們能够支持的时间要比工人們长得多，因此，工人政府对于大規模的同盟歇业只能有一个回答，那就是沒收工厂，至少在最大的工厂中实行国营或社会經營的生产。

在农业方面，由于实行沒收土地也会发生类似的問題。决不能設想无产阶级政府在沒收进行大規模生产的私有土地后，会把这种土地分割成小块出售給小生产者經營使用。这方面唯一可行

258

但是这是社会主义道路。

所有这些都十分清楚地表明，社会民主党人在参加政府的时候，是不能一方面在事先对工人保证决不从最低綱領作让步，同时又向资产阶级保证不超越这个最低綱領的范围。这样一种两面的保证是绝对行不通的。无产阶级的代表不是作为无权的人质，而是作为领导力量参加政府这一事实，将消除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之间的界限，这就是说，它将把集体主义提到日程上来。无产阶级在朝这个方向前进中究竟该在什么地方停下来，这取决于力量的对比，而决不取决于无产阶级政党原来的意图。

因此，根本谈不上什么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专政特殊形式，即无产阶级的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工人阶级不可能在保持其专政的民主性质的同时又不越出其民主綱領的界限。对于这一点存任何幻想都是极端有害的。这种幻想从一开始就会危害社会民主党。

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要为政权斗争到底。在维持和巩固自己政权的这个斗争中的武器之一，是鼓动和组织工作，尤其是农村中；另一武器是集体主义政策。集体主义不仅将成为从执政党地位继续前进的必然的道路，而且也将成为在无产阶级支持下保持这个地位的一种手段。

当社会主义报刊上表述**不断革命**的思想时——这种不断革命由于日益增长的社会冲突、更多的群众阶层参加起义、无产阶级对统治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特权不断进攻，而把消灭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我们的“进步”报刊齐声发出了怒吼。啊，这种报纸忍受已经很多，但是这一点是不能容许的。

259 这种报纸嚷道，革命不是一条能够“合法化”的道路！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能容许采取例外的措施。解放运动的目的是把革命永

远持續下去，而是要尽快地把革命引上法律的途徑，等等，等等。

同一民主派的更激进的代表們，沒有从已經取得的宪法“成果”的观点出发，試圖采取反对革命的立場。因为甚至对他們來說，这种在議會制度本身兴起之前的对議會制度的迷恋，也不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有力的斗争武器。他們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他們用来作为他們的立場的根据的不是法律，而是他們所认为的事实，他們的根据是历史“可能性”，是政治“现实主义”，最后……最后甚至是“馬克思主义”。为什么不可以呢？那个虔诚的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不是很机智地說过：

“魔鬼也会引证聖經来替自己辯护。”^① 这样一句話嗎？

这些激进的民主分子不仅认为在俄国建立工人政府的想法是异想天开，而且否认在当前历史时期欧洲有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必要“先决条件”現在还不具备。真是这样嗎？問題当然不在于为社会主义革命指定一个日期，而在于必須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現实的历史展望。

第七章 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

259

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但是这并没有防止“某些馬克思主义者”把馬克思主义变成烏托邦。

罗日科夫在发言反对社会主义化和合作化綱領的时候，提出了“馬克思为未来制度断然規定的必要的先决条件”如下。罗日科夫問道：“現在难道已經具备了这种制度的物质的客观先决条件，包括这样的技术发展，它足以使个人追求利益和金錢〔？〕、个人努力、进取和冒险的动机减到最低限度，因而使社会生产提到首要

^① 引自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中譯者注

地位？同这种技术水平密切关联的是，大生产在一切（！）經濟部門中差不多占完全（！）統治的地位。难道現在已經达到这样的結果了嗎？現在連无产階級的階級覺悟的提高——提高到足以使絕大多數人民群眾达到精神上統一的程度这样一个主观心理上的先决条件还不具备。”罗日科夫繼續說：“其次，我們知道現在有像在法国阿耳比的著名的玻璃工厂和法国的几个农业协会这样一些生产者协会的例子……但是法国的經驗再好不过地表明：合作生产甚至在法国这样一个先进国家的經濟条件下，都还没有占統治地位。这些企业只是中等規模，它們的技术水平也没有超过一般的资本主义企业，現在它們还没有站在工业发展的前列，并没有领导工业发展，而只是接近中等水平而已。只有当个别生产者协会的經驗表明它們在經濟生活中起领导作用的时候，我們才能說我們接近了新制度，只有到了那时候我們才能确定，这种新制度实现的先决条件已經具备。”（罗日科夫：《論土地問題》〔Н. Рожков. «К аграрному вопросу»〕，第 21、22 頁）

我們尊重罗日科夫同志的好意，但是我們不得不遺憾地指出，在所謂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的問題上，即使在資產階級的文献里也很难找到像他那种混乱的概念。談論一下这种混乱是值得的——如果不是为了罗日科夫，那末也是为了弄清問題。

罗日科夫說我們現在还没有这样的“技术发展，它足以使个人追求利益和金錢〔？〕、个人努力、进取和冒险的动机减到最低限度，因而使社会生产提到首要地位。”这一段的意义很难明白。显然罗日科夫同志是想說，首先，現代技术还不足以消除工业中的人力劳动；其次，为了消除这种人力劳动，首先需要大国营企业在一切經濟部門中“差不多”占完全統治的地位，也就是說国内全体人民“差不多”已完全无产階級化。

據說这就是“馬克思断然規定的”社会主义的两个先决条件。

我們不妨設想一下罗日科夫认为社会主义将会碰到的资本主义关系的情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企业在一切工业部門中差不多占完全統治的地位”，正如上面已經說过，意味着工农业中所有的中小生产者的无产階級化，也就是全体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階級。但是机器技术在这些大企业中占完全統治的地位，会使人力劳动的雇用减到最低限度，因此国内絕大多数人口（譬如說百分之九十）会变成劳动后备軍，在济貧院里靠国家維持生活。我們說百分之九十的人口，但誰也不能說我們不合邏輯，也沒有什么东西妨碍我們設想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生产是一部自动化机器，属于一个辛迪加，只需要一个有訓練的猩猩作为一个活劳动力。我們知道，这是杜岡—巴拉諾夫斯基教授一貫持有的堂皇理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生产”不仅占据“首要地位”，并且支配一切方面。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全国除了百分之十拥有托拉斯的人以外，都靠公費生活在济貧院里，当然也就只限于社会消費了。因此，我們在罗日科夫同志身后看到杜岡—巴拉諾夫斯基先生的熟悉的面孔。社会主义这时候可以登台了。人們从济貧院里跑出来，剝夺剝夺者集团。革命或者无产階級专政当然就不需要了。

据罗日科夫說，表明一个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的时机成熟的第二个經濟方面的信号，是国内合作生产占統治地位的可能性。甚至法国阿耳比地方的合作玻璃工厂的水平，还没有超过其他任何资本主义企业。社会主义生产只有当合作社站在工业发展的前列，成为领导企业的时候才有可能实行。

这整个論据从头至尾是因果倒置。合作社在工业发展过程中是不可能領先的，这倒不是因为經濟发展沒有达到足够的程度，而是因为經濟发展已向前走得太远了。毫无疑问，經濟发展会为合作化創造基础，但是是为哪种合作化創造基础呢？是为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合作化創造基础，——每一家工厂都呈现出

这种资本主义合作化的图景。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种合作化也越来越重要了。但是资本主义发展究竟能以什么方式把合作社推到“工业中的前列地位”呢？罗日科夫同志希望合作社能够挤掉辛迪加和托拉斯，并且取代它们在工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他这种希望究竟有什么根据呢？显然，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时合作社将只需自动没收一切资本主义企业，然后只需相应地把工作日减少到足以全体公民提供工作的程度，并且规定各部门的生产数量协调一致，以避免危机。这样就可以得到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这又一次明显地表明，革命和工人阶级专政都完全没有必要。

第三个先决条件是心理方面的条件：需要“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达到能使绝大多数人民在精神上统一的水平。”在这一点上，精神上统一的意义显然必须认为是自觉的社会主义团结，也就是说罗日科夫同志认为把“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组织在社会民主党之内，是社会主义的心理方面的先决条件。因此罗日科夫显然假定：资本主义把小生产者投入无产阶级的队伍，把大部分无产阶级投入劳动后备军的队伍，就可以为社会民主党在精神上统一和启发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人民群众创造可能性。

罗日科夫的假定不可能在残暴的资本主义世界内实现，也和合作社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竞争领域内占统治地位一样。但是如果这个假定能够实现的话，那末自觉地在精神上统一起来的“绝大多数”人民当然会毫无困难地粉碎少数几个资本泰斗，并且在没有任何革命和专政的情况下组织社会主义经济。

但是这里我们会碰到下面的问题。罗日科夫是以马克思为师的。但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明“社会主义的基本先决条件”的马克思，认为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是表明社会主义逼近的前奏。当然现在，过了六十年，人们勿需多少洞察力就可以明白马克思是错了，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现在依然存在。但是马克思怎么会发生这

样錯誤的呢？当时大規模企业并没有在一切工业部門中占統治地位，生产者合作社也没有站在大企业的前列，絕大多数人民也还没有在《共产党宣言》的思想的基础上統一起来，难道这些他都没有看到嗎？如果我们现在看出还没有这些东西，那末馬克思又怎么看不出：在一八四八年这类东西連一点影子都没有呢？那末很显然，一八四八年的馬克思如果同当代許多不会錯的馬克思主义机械人相比，可以說是一个幻想的青年！……

因此我們明白，虽然罗日科夫同志决不属于批評馬克思的那伙人，但是他却完全抛弃了无产階級革命这个社会主义的基本先决条件。由于罗日科夫一貫表达了我党内两个派別中不少馬克思主义者所共有的观点，这里有必要詳細說明一下他錯誤的原則的、方法論的基础。

263

实在說，我們还必须說罗日科夫关于合作社的命运的論据完全是他个人的。我們还从沒有在任何地方碰到过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他們既相信生产的集中和人民群众的无产階級化这种簡直无法抗拒的过程，同时又相信生产者合作社在无产階級革命前会起領導的作用。在实际經濟发展中使这两个先决条件統一起来要比在人們脑中統一它們更困难得多；虽然甚至在人脑中統一它們在我們看来也永远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我們还要討論形成更典型的成見的另外两个“先决条件”。

毫無疑問，生产集中、技术发展和群众觉悟的提高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先决条件。但是这些条件的发展过程是同时发生的，它們不仅相互促进，并且也相互妨碍和限制。这些过程中的任何一个較高的发展水平，都需要另一种过程的某种发展处在較低的水平。但是，任何一种过程的充分发展同其他过程的充分发展都是不調和的。

技术发展的理想的极限无疑是只使用一部自动化机器，这部机器从大自然取得原料，然后把制成的消费品放在人的脚旁。如果资本主义的存在不受到阶级关系和从阶级关系所产生的革命斗争的限制，我们倒有某些理由可以假定：接近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只使用一部自动化机器这一理想的技术水平，会从而自动地取消资本主义。

从竞争规律引起的生产集中，有使全体人民无产阶级化的趋势。单就这个趋势而论，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假定：如果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不被革命所打断，资本主义是会把它的工作进行到底的；但是到了阶级力量对比达到某种程度，革命就会成为不可避免，在资本主义还远远没有把大多数人变成幽禁在监狱里的后备军之前就是如此。

264

其次，由于日常斗争的经验和社会主义政党的自觉努力，觉悟无疑会不断提高，单就这一过程而论，我们可以想像这一过程的发展可一直进行到大多数人民都参加了工会和政治组织、由于团结的感情和目标一致而联合起来为止。如果这个过程真能在数量上继续增长而在质量方面没有改变，那末社会主义可以通过二十一世纪或二十二世纪的一致自觉的公民法案而和平地实现。

但是重要之点在于：在历史上先于社会主义的这些过程不是孤立地发展的，而是相互制约的，并且在达到某一阶段的时候，受到许多情况的支配（但是这已远远超过这些过程的数学限制），会经历质的变化，并且在彼此错综复杂的情况下造成我们所理解的社会革命。

我们从最后一个过程，即觉悟的提高开始。如大家所知，这个过程不是发生在学院里，在那里可以把无产阶级人为地抑制五十年、一百年、五百年，但这个过程是发生在不断有阶级斗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过程中。无产阶级觉悟的提高可以改造这种阶级

斗争，使它具有更深刻、更具原则的性质，并引起统治阶级相应的反动。早在大企业开始支配一切经济部门之前，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愈来愈尖锐的阶级斗争就会达到它必然的结局。

此外，政治觉悟的提高又取决于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无产阶级的人数也必须增加到足以克服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抵抗的时候，才能够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绝大多数”人民必须先变成无产阶级，而“绝大多数”无产阶级也必须先变成有觉悟的社会主义者。下面这一点当然也很明白：无产阶级的自觉的革命大军必须比资本家的反革命大军更强大；而人民中的中间、可疑或冷淡的阶层所处的情况必须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能够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而不是把他们推到敌人方面去。不用说，无阶级的政策必须有意識地考虑到这方面。

这一切又必须先有工业对农业的领导，城市对农村的支配地位。

现在我们将尽力按一般性渐减规则和复杂性渐增规则来研究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 265

(一)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平均分配的问题，同时也是有计划生产的问题。社会主义，也就是大规模的合作生产，只有在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了大企业能比小企业生产出更多产品的阶段才可能实行。大企业愈胜过小企业，也就是技术愈发达，生产社会主义化在经济方面的优越性也就愈明显，因而在以计划生产为基础的平均分配的情况下，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也必然愈高。

社会主义的这第一个客观先决条件已经早已存在了，自从社会分工引起工场手工业中分工的时候起就存在着了；到了工场手工业被采用机器的工厂所代替的时候，这个条件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存在着。大企业已愈来愈显示出优越性，这一点也意味着如

果对大企业实行社会主义化，那就可以使社会愈来愈富足。很明显，如果把所有手工业作坊变为全体手工业工人的共有制，那并不会使手工业工人略为富足些，而当工场手工业转变为各业工人的共有制，或者工厂转到厂中雇佣工人手中（或者不如说把大工厂的生产资料转给全体人民），那末无疑会使人民的物质水平有所提高；大规模生产所达到的阶段愈高，物质水平也提得愈高。

在社会主义文献中常常引用英国下院議員貝勒斯^①的建議，貝勒斯早在一六九六年，也就是在巴倍夫密謀之前一个世紀，就曾經向議會提出一个建立独立供应自身一切需要的合作社的計劃。根据这个英国人計算，这种生产者合作社将由二百到三百人組成。在这里我們不能試驗他的論断，我們也沒有必要这样作。重要的是，即使是一百人、二百人、三百人或五百人組成的集体經濟，早在十七世紀末叶就已显示出生产的优越性了。

266 在十九世紀初，傅立叶設想了他的生产消費者合作社“法郎吉斯特”，每一个合作社有两千人到三千人。傅立叶的計算决不能說是很精确的，但無論如何，当时工场手工业发展情况已向他指出了
一个比前例更大得多的經濟集体化的場所。但是很明白，無論是約翰·貝勒斯的合作社或者是傅立叶的“法郎吉斯特”，在性质上都同无政府主义者所梦想的自由經濟会社十分接近，自由經濟会社的烏托邦性质不在于它的“无法实现”或“违犯自然”的特点（美洲的共产公社证明它們是可能的），而在于它落后于經濟发展的过程一百年到二百年。

一方面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机器生产，已經有人提出这样的主张：現在能够大规模利用集体經濟优越性的唯一合作体就是国家。此外，無論从經濟上和政治上看，社会主义生产

^① 約翰·貝勒斯(John Bellers)并不是議會議員，而是一个教友会的地主，他是向議會演讲的方式提出他的計劃的。——英譯者注

在个别国家閉关自守的范围内是容納不下的。

一位沒有接受馬克思主义观点的德国社会主义者阿特兰迪喀斯^①，在上一世紀末曾經計算过象德国这样一个单位实行社会主义經濟可以得到的經濟上的好处。阿特兰迪喀斯并不以好发奇想聞名。他的想法一般並沒有超出資本主义經濟常規的范围。他的論据是以現代权威的农学家和工程师的著作作为根据的。这一点不仅不能削弱他的論据，而且正是他的論据的有力的方面，因为这使得他不致于过份乐观。无論如何，阿特兰迪喀斯得出了这样的結論：如果适当地組織社会主义經濟，在运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中叶的技术能力的条件下，工人們的收入可以增加一倍或两倍，而工作日可以縮短一半。

当然我們不應該认为阿特兰迪喀斯第一次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方面，大企业的比較高的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为經濟危机所证明的实行計劃生产的必要性，证明社会主义經濟的优越性比阿特兰迪喀斯为社会主义所算的賬更具有說服力。阿特兰迪喀斯的功績只是在于，他以近似的数字表明了这种优越性。

从以上所說的，我們有理由得出結論：如果人的技术力量的进一步增长将会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愈来愈明显，那末足以实行某种規模的集体生产的技术先决条件已經存在了一二百年，而在目前，实行社会主义不仅在一国范围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在世界規模内都具有**技术上的利益**。

267

但是，单是社会主义的技术上的优越性还不足以使社会主义得以实现。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大規模生产的优越性不是以社会主义形式而是以資本主义形式表現出来的。然而貝勒斯的計劃和傅立叶的計劃都沒有能实现。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

^① 即格·杰克(G. Jaekh)。——英譯者注

还不存在准备并能够实现它們的社会力量。

(二)我們討論了社会主义的生产技术上的先决条件,現在再来談**社会經济方面**的先决条件,这不是一般的而是更复杂的条件。如果我們这里所談的不是阶级对抗的社会,而是能自觉地选择其經济制度的統一协作社,那末阿特兰迪喀斯的計算无疑已很足以证明可以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設了。阿特兰迪喀斯本人这个很庸俗的社会主义者,也正是这样看待自己的劳动的。

在目前条件下,这样一种观点只能适用于个人或股份公司之类的私人經济范围内。我們总可以这样假定:任何經济改革計劃,如采用新机器、新原料、新的劳工管理方式、新的报酬制度,只要这个計劃证明能提供商业上的利益,总是能被厂主接受的。但是这里我們所談的是社会經济,那就很不够了。在社会中对立的利益彼此冲突着。对一个集团有利的事往往对另一个集团不利。一个阶级的利己主义不仅同另一个阶级的利己主义对立,并且也违背整个社会的利益。因此,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必須在資本主义社会的对立的阶级中有一种社会力量,这种力量由于其客观地位而关心社会主义的实现,并且强大得足以克服敌对的利益和抵制,以便实现社会主义。

268 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功績之一,在于它从理論上发现了这样一种社会力量即无产阶级,并且表明这个必然随着資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的阶级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得救;无产阶级的整个地位驅使它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資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学說最后必然将成为无产阶级的意識形态。

因此不难了解,当阿特兰迪喀斯相信下述情况时,他离开馬克思主义后退了多远:一旦证明“生产資料轉到国家手中,不仅全体人民的福利可以得到保证,并且工作日也可以縮短,那末有关資本集中和社会中間阶层消失的理論是否会得到证实,便成为无关紧

要的事了”……

根据阿特兰迪喀斯的意見，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旦得到证明：“就勿需把希望寄托在对经济发展的迷信上了，为了从私有生产向国家或‘社会’生产过渡，我們應該作广泛的調查并开始〔！〕作全面而彻底的准备。”（阿特兰迪喀斯：《未来的国家》，彼得堡“事业”书籍出版社一九〇六年版，第22—23頁）

阿特兰迪喀斯在反对社会民主党人完全对立的策略并建議立即“开始”准备向社会主义改造过渡的时候，他忘記了社会民主党人仍然缺乏为作这种准备而需要的权力，而威廉第二，标洛（Bülow）和德国議會的大多数議員虽然大权在握，却絲毫沒有实行社会主义的意願。阿特兰迪喀斯的社会主义計劃对于霍亨索伦王朝并不比傅立叶的計劃对于复辟的波旁王朝更具說服力，虽然傅立叶的政治烏托邦是基于經濟創造方面的热情幻想，而阿特兰迪喀斯的同样烏托邦的政見則是基于有說服力的、庸人清醒的計算。

社会分化必須达到怎样的程度才能得到社会主义的第二个先决条件呢？換句話說，无产階級在数量上必須达到怎样的比重呢？它必須达到全人口的一半、三分之二还是十分之九呢？

企图为社会主义的第二个先决条件确定一个数字上的限度是完全无望的事。首先，在进行分类的时候，我們必須确定哪些人該归入“无产階級”。是不是應該把半无产階級一半农民的广大阶层包括进去？是不是也該把城市无产階級的后备群众（他們一方面摻和在乞丐和小偷的寄生无产階級中，一方面作为小商贩充斥市街，对整个經濟制度來說是起着寄生者的作用）包括进去？这决不是一个簡單的問題。

无产階級的意义完全决定于它在大規模生产中所起的作用。 269
資产階級在为政治統治地位而斗争的时候所依靠的是它自己的經

济力量。它在能够取得政权之前，必先把国家的生产资料集中到自己手里；这也就决定了它的重要性。但是无产阶级尽管有种种合作的幻想，在实际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之前一直是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它所以具有社会力量，是由于资产阶级手中的生产资料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才能运转起来。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无产阶级也是一种生产资料，它同其他工具一齐构成一架完整的机器。但是无产阶级是这架机器中唯一非自动的部分，不论资产阶级尽了怎样的努力也不能把无产阶级变成自动的部分。这种情况使无产阶级能够按自己的意志通过局部罢工或总罢工部分地或完全地停止社会经济的正常活动。

从这里可以明白，无产阶级（假定其数目不变）的重要性是随着它使之运行的生产力量的增加而增加的。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大工厂的无产者在社会上的地位比一个手工业工人更为重要，城市的无产者比农村的无产者更重要。换句话说，随着大规模生产支配小生产、工业支配农业和城市支配农村的发展，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是愈来愈重要了。

如果我们看一看英国或德国的这样一个历史时代，那时它的无产阶级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同现在俄国无产阶级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重相同，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一无产阶级不但没有起到俄国工人阶级在今天起到的作用，而且按照他们的客观地位也不可能起到今天俄国无产阶级起到的作用。

我们已经看到，同样的道理也可适用于城市的作用。当德国的城市人口同俄国今天的情况一样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的时候，自然不能想像那时的德国城市能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起到俄国城市在今天起到的作用。大工业和商业机构的集中在城市，以及城市和各省由铁路系统联接起来，这些情况使城市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城市居民所占的比重；城市重要性的增长已经大大

超过城市人口的增长，同时城市人口的增长也超过了全国人口的自然增长……在一八四八年，意大利的手工业工人（不仅是无产阶级而且还有独立的工匠）的数目达到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左右，也就是差不多同俄国手工业工人和无产阶级在今天所占的比例相同。但是他們所起的作用比现代俄国工业无产阶级所起的作用要小得不知多少。

从上面的说明可以明白，企图事先确定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时刻究应在全部人口中占有多大的比例是徒劳无益的。相反，我們要提出一些粗略的数字来说明目前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相对数字。

一八九五年德国有职业的人口是二千〇五十万人（不包括军队，国家官吏和沒有固定职业的人）。在这个数目中，有一千二百五十万无产阶级（包括农业、工业、商业中的雇佣工人和家庭僕役）；工农业工人的数目是一千〇七十五万。至于其余的八百万人，許多人实际上也是无产阶级（例如家庭工业中的工人，家庭中的劳动者等等）。单是农业中雇佣工人的数目就有五百七十五万。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六。我們再說一遍，这些都是一八九五年的数字。从那时以来的十一年中，无疑已有很大的变化——基本上是朝着一个方向：同农业人口相比，城市人口的比例增加了（一八八二年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二），与全国人口相比，无产阶级的比例增加了，与农业无产阶级相比，工业无产阶级的比例增加了，最后，与一八九五年相比，每一工业无产者的生产資本也增加了。但是，即使是一八九五年的数字也已表明，德国无产阶级老早已经成为国家的主要生产力。

比利时有七百万人口，是一个純工业化的国家。在每一个从事某种职业的人当中，有四十一人是在純粹的工业中工作，只有二十一人受雇于农业中。在三百多万自立的人口当中，大約有一

百八十万，也就是百分之六十是无产階級。如果我們在急剧分化的无产階級中再加上与它有关的社会成分——只是形式上独立而实际上受資本家奴役的所謂“独立”生产者、低級官員、士兵等等，那末这个数字就更具有說服力。

271 但是，在經濟工业化和人民无产階級化方面占第一位的无疑是英国。在一九〇一年，英国农业、林业和漁业中所雇用的人数是二百三十万，而工业、商业和运输业中雇用的人数是一千二百五十万。

因此，我們看到，在主要的欧洲国家中，城市人口在数量上超过了农村人口。但是城市人口的优势不仅在于它所构成的生产力大得多，而且在于它的质量方面。城市把农村中最强健、最能干和最有知識的分子吸引了来。要从統計上证明这一点很困难，虽然城市和农村人口的年龄构成为这一点提供了間接证明。而年龄构成本身也具有独立意义。例如，一八九五年德国有八百万人受雇于农业中，有八百万人受雇于工业中。但是如果我們把这些人按年龄分組，那末我們可以看到农业中从十四岁到四十岁的最有工作能力的人比工业中少一百万人。这一点表明，留在农村的主要是“老人和小孩”。

这一切使我們得出这样的結論：經濟发展（工业的增长，大企业的增长，城市的增长，整个无产階級的增长，尤其是工业无产階級的增长），不仅已經为无产階級**爭取**政权、并且为**夺取**这个政权**准备好了**战場。

（三）現在我們再来談社会主义的第三个先决条件——**无产階級专政**。

政治是社会主义的客观先决条件和主观先决条件互相交叉的場所。在一定技术和社会經濟条件下，一个階級会自觉地为自己定一个目标——夺取政权；它需要团結自己的力量，衡量敌人的实

力并估計形勢。

但是，即使在这第三个方面，无产阶级也不是絕對自由的。除了主观的因素，如阶级觉悟、准备程度、主动精神（这些因素也有它們发展的邏輯）以外，无产阶级在执行其政策时会碰到許多客观因素，如統治阶级的政策、現有的国家机关（军队，阶级学校，国教教会）、国际关系等等。

我們首先来談主观条件：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

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观点來說，技术水平已經使社会主义經濟具有优越性这一点当然是不够的。在这种技术基础上发展的社会分化已經造成了一个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由于其人数和經濟作用成为主要阶级，并且在客观上关心社会主义的实现这一点也是不够的。这个阶级还必须認識到它的客观利益，它必須認清除了社会主义一途外別无出路；它應該團結成为一支强大得足以在公开斗争中夺取政权的大軍。

在目前否认无产阶级有这样从事准备的必要是荒謬的。只有旧式的布朗基主义者，才会指望依靠脱离群众的叛乱組織的主动精神获得拯救；或者只有和他們正相反的无政府主义者才会期待群众自发的大暴动，这种暴动的目的誰也說不上来。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夺取政权是革命阶级的自觉行动。

但是許多社会主义思想家（坏意思的思想家，他們把一切都弄顛倒了），談論无产阶级从精神改革的意义上为社会主义进行准备的問題。无产阶级以及一般的“人”，都必须首先抛弃旧的自私性，让利他主义的动机成为社会生活中占优势的东西等等。由于目前我們距离这种情况还很远，“人性”的改变也非常緩慢，因此社会主义的到来还要推迟几个世紀。这种观点也許看起来很现实和渐进的，等等。但是这实际上只是肤浅的道德說教而已。

有人設想，在社会主义到来以前必須发展社会主义心理，換句

話說，群众在資本主义关系的基础可能形成一种社会主义心理。在这里，人們决不能把自觉地趋向社会主义同社会主义心理混淆起来。后者要求首先摒弃經濟生活中的自私动机；而趋向社会主义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則是由无产阶级的阶级心理所产生的。不論无产阶级的阶级心理和沒有阶级性的社会主义心理之間具有多少共同之处，它們之間存在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鴻沟。

273 反对剝削的联合斗争，在工人的心中引起了許多光輝的理想主义幼芽，同志式的团结感，和自我牺牲精神；但是同时，个人的生存斗争，永远敞开的貧困的深淵，工人队伍本身的分化，来自下面的无知群众的压力，资产阶级政党的腐蝕活动，却不容許这些光輝的幼芽充分发展。

但是主要問題在于：尽管一般工人还有小市民的自私残余，尽管他們在“人的”价值上还没有超过资产阶级的一般代表，他們都从生活經驗中确信，他們最起碼的願望和本性的要求，只有在資本主义制度的废墟上才能得到滿足。

理想主义者完全像基督教徒描繪第一个基督教公社的成員一样，来描繪配得上享受社会主义的遙远的后代。

不論第一批基督教新教徒的心理如何（我們从《使徒行传》中知道有过侵吞公社財產的案件），但无论如何，到了基督教更流行的时候，基督教不仅沒有能使一切人的灵魂获得新生，而且連它自身也墮落了，变成貪图物质和官僚主义的了，它从兄弟般輾轉相传的慣例变成了教皇政治，从流浪行乞变成了僧侶寄生制度，总之，基督教不仅沒有能征服它所流行的环境的社会条件，它自己反而被这些条件所征服了。这并不是由于基督教的神父和教士缺乏才能或貪得无厌，而是由于人的心理是从属于社会劳动和生活的条件的无情規律。基督教的神父和教士表明了他們自身的这种从属性质。

如果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在旧社会的范围内創造新的人性，那这种社会主义就仅仅是道学家的烏托邦的新的翻版……社会主义的任务并不是建立一种社会主义心理来作为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而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生活条件来作为社会主义心理的先决条件。

第八章 俄国的工人政府和社会主义

273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明，先进資本主义国家的經濟发展已經为社会主义革命創造了客观先决条件。但是，在这方面，关于俄国，我們能够怎样說呢？我們能不能希望，政权轉归俄国无产階級，会成为按照社会主义原則对我国国民經济进行改造的开端呢？

一年前我們在一篇文章中回答了这个问题，这篇文章受到了我們党的两个派别的机关报的严厉批評。在这篇文章中我們說了下面一些話：

“馬克思說，巴黎的工人並沒有向公社要求奇迹。現在也不能指望无产階級专政立即創造出奇迹。国家政权不是万能的。如果认为无产階級只要取得了政权，就可以用几道法令来使社会主义代替資本主义，那就荒謬絕伦了。經濟制度并不是国家活动的产物。无产階級只能尽一切力量运用国家政权，来促使經濟朝集体主义方向发展，并縮短它的道路。

“无产階級将从包括在名为最低綱領中的那些改革开始，并由于其地位的緣故将不得不直接从这些改革向集体主义的措施过渡。

“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制和累进所得稅将是比較容易办到的，虽然这里的重心也不在于頒布法令”，而在于組織执行这些措施的实际行动。但是主要的困难（即向集体主义过渡！），在于国家为执

行所頒布的法令，在被厂主关闭的工厂中組織生产。

頒布取消继承权的法律并付诸实施将是比較容易的事。货币資本形式的遗产也不会使无产阶级为难，或者成为它的經濟的負担。但是作为土地和工业資本的继承者，工人国家必須准备承担由社会組織經濟的任务。

“至于沒收方法(無論有償或无償)也同样必須进行准备，而且是更广泛的准备。有償的沒收有其政治上的好处，但在財政上有困难，而无償的沒收則在財政上有利而在政治上有困难。但是比这些更困难的将是經濟組織工作。

我們重述一遍，无产阶级的政府并不是能够創造奇迹的政府。

275

“生产社会化要从困难最小的部門开始。在最初时期，社会化的生产将像是沙漠中的綠洲一样，由商品流通規律同私营企业联系着。社会化的經濟占領的領域愈广，它的优越性就愈明显，新的政治制度就会感到愈稳固，无产阶级的进一步的經濟措施也就愈大胆。在实行这些措施的时候，它一定能够、并且一定会不仅依靠本国的生产力，而且依靠国际的技术，正如其革命政策一样，它不仅依靠本国阶级关系的經驗，而且要依靠国际无产阶级的全部历史經驗。”^①

无产阶级的統治地位同它在經濟上受奴役的地位是不相容的。不論无产阶级是在什么政治旗帜下取得政权，它都必須走上社会主义政策的道路。如果认为由于无产阶级是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內取得政治上的統治地位，就能够(即使有此願望)把自己使命限制在为资产阶级的社会統治創造共和民主的条件这一点上，那是最大的烏托邦。无产阶级的政治統治即使是暫时的，也要把資本(它是經常需要国家政权支持的)的抵抗削減到最低限度，

^① 引号里的話出自托洛茨基給馬克思著《巴黎公社》俄譯本(一九〇六年圣彼得堡版)写的序言第20頁。——中譯者注

并且要为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提供广阔的场所。工人们不得不要求革命政权支持罢工者，而依靠无产阶级的政府也不能拒绝给予这种支持。但是这一点意味着劳动后备军不再起作用，意味着工人们不仅在政治方面占统治地位，并且在经济方面也占统治地位，并把生产资料私有制变成了虚有其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些不可避免的社会经济后果，早在政治制度民主化完成以前就会很快地显露出来。无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最低”和“最高”纲领间的界限便立即不存在了。

无产阶级的制度一开始便必须处理与俄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攸关的土地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正和解决其他一切问题时一样，无产阶级要把自己的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作为出发点，就是说，要为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占领尽可能大的领域。在土地问题上的这种政策的形式和速度，应当决定于无产阶级所拥有的物质资源以及不要把可能的盟友推到反革命队伍中去的必要性。

276

土地问题，亦即农业的命运及其社会关系的问题，当然并不仅仅是土地问题，亦即土地所有制的形式问题。但是毫无疑问，土地问题的解决即使并不预先决定农业发展，至少会预先决定无产阶级的农业政策；换句话说，无产阶级就土地问题所作的事，必然同它对农业发展的方向 and 要求的总的态度有密切关系。因此，土地问题占着首要地位。

有一种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社会革命党人给了这种办法一种决非无可非议的名声），是实行全部土地社会化；这个名词如果去掉它欧洲的特征，意味着的无非是“土地使用平均化”或“黑土重分”（Чёрный Передел）。因此要实行平均分配土地的纲领必须首先没收一切土地，不仅是一般私有土地、农民的私有土地，而且还要没收村社的土地。如果我们心目中认为这种没收必须是新政权首先实行的步骤之一，而商品资本主义关系仍然完全占统治地位，

那末我們将会看到这种沒收的第一批“受害者”将会是农民(或者不如說农民会感到自己是第一批受害者)。如果我們記住农民几十年来一直偿付贖金使份地成为他自己的私有财产, 如果我們記住有些比較富裕的农民已經取得了大片土地(无疑是通过相当大的牺牲, 这种牺牲目前生存的一代仍然承受着)作为私有财产, 那末就很容易想像把村社的和小块私有土地变成国家所有制的尝试, 会激起多么巨大的抗拒! 新政权如果这样作, 那末在开始时就会引起广大农民群众的反对。

277 究竟为了什么目的要把村社的和小块的私有土地轉变为国家所有制呢? 是为了用某种办法, 使土地供一切土地所有者、包括現在的无地农民和雇农实行“平均”的经营。因此, 新政权沒收小块私有土地和村社的土地在經濟上并不会得到任何好处, 因为在重新分配以后, 国有或公有的土地都要作为私有财产来耕种。这样作新政权会在政治上犯一个很大的錯誤, 因为这会立即使农民群众反对作为革命政策的领导人的城市无产阶级。

此外, 要实行平均分配土地还必须先以法律禁止使用雇佣劳动。取消雇佣劳动能够而且必须是經濟改革的结果, 而不能事先由法律来加以禁止。禁止资本主义土地所有者雇用工人是不够的, 必須首先使无地雇农可以生活, 并且是从社会經濟观点來說一种合理的生活。根据平均使用土地的綱領, 禁止使用雇佣劳动, 将意味着一方面国家要迫使这种无地雇农定居在小块土地上, 另一方面国家必須供应他們必要的牲畜和农具, 以从事对社会來說是不合理的生产。

不用說, 无产阶级对农业組織的干涉, 当然不会从把分散的劳动者捆在分散的小块土地上开始, 而是从国家或公社利用大片土地开始。

只有等到生产社会化站稳了脚根, 进一步社会主义化的过程

才能向禁止使用雇佣劳动方面发展。这样将会使小規模資本主义农业經營成为不可能，但仍为种谷物或半种谷物的农户留有土地，强行沒收这些土地無論如何不能作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計劃。

无产阶级無論如何不能执行平均分配的綱領，这种綱領一方面要求无目的、純粹形式地沒收小片土地，另一方面又要求把大块土地完全分割成小片土地。这种政策从經濟观点来說完全是浪費，它只能有一种反动烏托邦的别有用心的动机，而尤其重要的是它会在政治上削弱革命的政党。

* * *

但是在俄国的經濟条件下，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策能走多远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种政策在遇到国家技术落后的阻碍之前很久，就会碰到政治上的障碍。沒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的暫时的統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这是一分钟也不能怀疑的。另一方面，也毫无疑問，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将使我们能够把工人阶级的暫时的統治直接变为社会主义专政。

278

一九〇四年考茨基在談論社会发展的展望和估計俄国早日实现革命的可能性的时候写道：“俄国革命不可能立即确立社会主义政权。对这一点来說，这个国家的經濟条件还远沒有成熟。”但是俄国革命一定会有力地推动欧洲其余地方的无产阶级运动，由于剧烈斗争的結果，无产阶级有可能在德国取得統治地位。考茨基繼續說，“这样的結果必然会对整个欧洲发生影响，必然会导致无产阶级在西欧取得政治統治地位，并使东欧的无产阶级有可能縮短其发展阶段，仿效德国的例子，人为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不能人为地跳过某些发展阶段，但是社会的某些組成部分可能通过模仿先进国家来加快落后的发展，这样作它們甚

至可以站到发展的前列，因为它们没有古老国家拖累自己的传统的累赘……”考茨基又说，“这是可能发生的，但是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这里我们离开了必然性的范围而进入可能性的范围，因此，完全可能发生其他的情况。”（考茨基：《革命展望》，基辅一九〇六年版）

这些话是这位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在讨论在俄国还是在西方会首先爆发革命的问题时所写的。

279 后来俄国无产阶级所表现的巨大的阶级力量，甚至超出了最乐观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意料之外。俄国革命的进程已由其基本特点决定了。在两三年前可能或者看来可能的事，已经接近于十分可能；一切情况表明，这种十分可能的事就要变成必然的事了。

279

第九章 欧洲和革命

一九〇五年六月我们曾经写道：

“自一八四八年以来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这是资本主义在全世界不断进行征服的半个世纪，也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和封建阶级反动势力‘有机地’互相勾结的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中，资产阶级暴露了它夺取霸权的疯狂贪欲，表明它准备为这种霸权进行凶残的战斗。

“正如追求永动机的幻想技师，碰到层出不穷的障碍，为克服这些障碍而搞了一个又一个机械一样，资产阶级在避免同敌对势力发生‘法律以外’的冲突的同时，一直在改变和重建它的国家机器。但是正如永动机的追求者终于会碰上能量不灭定律这个无法逾越的障碍，资产阶级最后也会在它的道路上碰上终于无法逾越的障碍，那就是必然要通过冲突才能加以解决的阶级矛盾。

“资本主义把它的经济方式和往来方式强加给一切国家，把整

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政治和经济机体。现代信用以无形的纽带把成千上万个企业缚在一起，使资本具有令人惊异的流动性，从而防止了许多小规模的地方的破产事件，但同时却引起空前规模的总危机；与此相似，资本主义的全部经济和政治活动，它的世界贸易，它的巨大的国债体系，以及把各种反动势力集合成为一个世界规模的合股公司似的国家政治集团，不仅阻止了一切局部的政治危机，而且为空前规模的社会危机准备了基础。资产阶级把一切病症发展过程都蒙蔽起来，并回避种种困难，拖延国内和国际政治上各种影响深远的问题的解决，掩饰种种矛盾，因而推迟了最后结局的到来，但也因此为在全世界根除其统治作了准备。资产阶级贪婪地紧紧抓住一切反动力量，而不问其渊源如何。教皇和苏丹并不是它最不重要的朋友。它所以没有和中国皇帝建立‘友谊’联系，其唯一原因是因为中国皇帝没有任何力量。对资产阶级说来，掠夺中国的领土，比用自己的钱支持它使之充当世界宪兵更为有利。由此可见，世界资产阶级已经深深地依赖资产阶级时期以前的稳定的反动堡垒，来维持它国家制度的稳定。

280

“这一点从一开始就使当前形势的发展立即具有国际性，并且打开了最广阔的展望：俄国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政治解放事业，将会把这个领导阶级的地位提到历史上空前的高度，使它掌握巨大的力量和资源，使它成为消灭世界资本主义的首倡者，历史已经为资本主义的消灭创造了一切客观条件。”^①

如果俄国无产阶级在暂时取得政权后，不主动把革命推进到欧洲土地上去的话，那末它在欧洲封建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逼迫下也不得不这样作。

当然现在要就采用什么方法把革命推向衰老的资本主义欧洲

^① 见我为斐·拉萨尔的《在陪审法庭上的演说》所写的序，“锤子”出版社版。——列·托·

作出决定，那是徒劳无益的事。将来这些方法的出現可能完全出人意外。現在我們以作为革命的东方和革命的西方之間的連接环节的波兰为例来加以說明，我們这样作只是为了說明我們的观点而不是作为实际的預言。

281 俄国革命的胜利意味着波兰革命必然胜利。革命政权在俄属波兰的十个省份的存在，必然导致加里西亚和波茲南的起义，这是不难想像的。霍亨索伦政府和哈布斯堡政府面对这一局面将派遣軍隊到波兰边境，以便随后越过边境，在敌人的中心(华沙)粉碎敌人。十分明显，俄国革命不能把它的西方前卫陣地置于普奥軍隊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对威廉二世政府和法兰西士·約瑟夫政府的战争就会成为俄国革命政府的自卫行动。那末在这种情况下奥地利和德国无产階級会采取什么态度呢？很明显，它們看到本国軍隊进行反革命进軍的时候，它是不会袖手旁观的。封建資產階級的德国对革命的俄国的战争，必然导致德国的无产階級革命。我們願意請那些认为这个断言过于武断的人，不妨考虑一下是否还有任何其他历史事件更有可能推动德国工人和德国反动派作一次公开的實力較量。

当我国十月內閣突然宣布在波兰实行戒严的时候，到处流行着一个似乎頗有根据的謠言，說这个行动是按照柏林的直接訓令而采取的。在杜馬解散的前夕，俄国政府各报发表了关于柏林政府和維也納政府为武装干涉俄国内政以鎮压暴动而举行会談的消息，并說这是对俄国的威胁。內閣所作的任何否认，都不能消除这一消息所引起的震惊。很清楚，这三个邻国的宫廷里正在筹划一次血腥的反革命报复行动。实际情况不正是这样嗎？当革命的火焰蔓延及这些半封建君主政权的領域的边界时，它們能袖手旁观嗎？

俄国革命虽然距离胜利还很远，但是它已通过波兰对加里西亚产生了影响。当波兰社会民主党今年五月在利沃夫举行代表大

会的时候，达辛斯基（Дашинский）在会上喊道：“在一年前誰能預見到目前在加里西亚发生的事情呢？这是一次伟大的农民运动，它震动了整个奥地利。茲巴腊日选出了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担任地方議会副議長。农民出版了一家名叫《紅旗》的农民社会革命报纸，三万农民举行了群众集会，举着紅旗、唱着革命歌曲的游行队伍在一直非常平靜、死气沉沉的加里西亚各村落到处游行示威……当土地国有化的口号从俄国传到这些穷困不堪的农民耳中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两年多以前，考茨基在和波兰社会党人卢斯尼亚爭論的时候指出：現在决不能再把俄国当作是波兰脚上的鐐铐，或者认为波兰是革命的欧洲楔入野蛮的俄国草原的一个东方支队。用考茨基的話來說，一旦俄国革命得到发展并取得胜利，“波兰問題将再度尖銳化，但不会像卢斯尼亚所想像的那样。革命矛头不会针对俄国而会针对奥地利和德国，既然波兰将为革命事业效劳，其任务将不会是保卫革命使其不受俄国的侵犯，而是把革命从俄国进一步推向奥地利和德国。”現在看来，这个預言比考茨基原来所想的更接近现实得多。

但是革命的波兰决不会是欧洲革命的唯一可能的起点。前面我們已經指出，几十年来资产阶级故意不去解决許多复杂而尖銳的国内和国际政治問題。各国资产阶级政府虽然已把大批人武装起来，然而它們并没有断然解决錯綜复杂的国际政治問題的決心。一国政府只有在根本利益受到損害的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或是由于丧失了立脚基础因而絕望地挺而走險的情况下，才会把数十万人投入战争。在現代政治文化、軍事科学、普选权和普遍兵役制的情况下，只有深刻的信心和疯狂的激情才能使两个国家发生冲突。在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战争中，我們看到一方面是为德国普魯士化而奋斗的俾斯麦，德国的普魯士化到头来意味着民族統一，这是每

一个德国人所認識到的基本要求；而另一方面是拿破侖第三的政府，这个政府魯莽、无能、遭到人民的鄙視，并准备进行任何冒险，只要有可能再把它的使用寿命延长十二个月的話。在日俄战争中也看到双方扮演的类似的角色。一方面是日本的天皇政府，这个政府还没有碰到强大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反对，正在为日本资本在东亚建立霸权而斗争；而另一方面则是一个衰老腐败的专制政府，正在拼命争取国外的胜利来挽救国内的失败。

283 在一些老资本主义国家里不存在这种“民族”的要求，亦即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要求，统治的资产阶级将是这种要求的保卫者。法国、英国、德国和奥地利的政府都不能发动民族战争。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被压迫民族的利益，或一个邻国的野蛮的国内政策，都不能驱使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去进行一场具有解放意义的、因而是民族性质的战争。另一方面，常常诱使这个或那个政府在世界面前挥刀跃马的资本主义掠夺利益，也完全不能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同情的反应。因此，资产阶级既不能也不愿挑起和发动民族战争。在现代条件下反民族的战争会导致怎样的结果，我们已从最近两个事件，即南非事件和远东事件看到。英国帝国主义保守党的惨重失败，并不是由于英国布尔战争的教训。对帝国主义政策更重要、更具威胁性（对资产阶级具有威胁性）的，是英国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活动，这种活动一旦开始，就会大踏步向前推进。至于日俄战争给彼得堡政府带来的后果，大家已经十分清楚，这里无需详述。但是，即使没有最近这两次事件的经验，欧洲各国政府自从无产阶级开始站起来的时候起，就愈来愈害怕把战争或革命的选择摆在无产阶级面前。正是由于害怕无产阶级起义，资产阶级政党即使在投票赞成拨付巨额军费时，也不得不庄严地宣称赞成和平，梦想国际仲裁法庭、甚至梦想组织欧洲联邦。当然，这种可怜的宣传既不能消除国家之间的对抗，也不能消除武装冲突。

普法战争后欧洲出现的武装的和平，是建立在欧洲的均势上的，保持这一均势的条件不仅有土耳其的不可侵犯，波兰的瓜分和保存奥地利这个民族丑角的外衣，而且还有充当欧洲反动派宪兵的武装到牙齿的俄国专制制度。但是日俄战争给了这个专制制度在其中占首要地位、人为地维持住的均势一个严重打击。俄国暂时退出了所谓列强协调。均势被打破了。另一方面，日本的胜利燃起了大资产阶级的掠夺本性，特别是在现代政治中起巨大作用的交易所。欧洲领土上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发展到了极高的程度。冲突的危机到处在趋于成熟，虽然到目前为止，由于外交手段的抑制，冲突并没有爆发，但是不能保证最近的将来不爆发。不过欧洲的战争必然意味着欧洲的革命。

在日俄战争期间，法国社会党宣布如果法国政府进行有利于专制政府的干预，它就要号召无产阶级采取最坚决的措施，甚至举行起义。一九〇六年三月，当法德因摩洛哥发生冲突的时候，社会党国际局通过决议：一旦发生战争的危机，“为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和所有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规定最有效的行动方针，以防止战争或结束战争”。当然这只是一项决议。其实际意义需要等待战争来考验。资产阶级有一切理由避免这种考验。然而对资产阶级来说不幸的是，国际关系的逻辑比外交手段的逻辑更为有力。 284

俄罗斯国家的破产，不论是由于官僚们长期当政的结果，或是由于拒绝为旧政权承当罪过的革命政府的宣告，都会对法国有巨大影响。现在掌握法国政治命运的激进党人，在执掌政权时也承担了一切保守的职能，其中包括保护资本利益。由于这个缘故，我们有一切根据认为，由于俄国的破产而产生的金融危机，在法国将会直接转化为尖锐的政治危机，这个政治危机只有在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的情况下才能结束。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或者通过波兰革命或者由于欧洲战争，或者由于俄国国家的破产，革命将进

入旧資本主义的欧洲領域。

但是即使沒有像战争或破产这类事件的外界压力，革命也可能由于阶级斗争的极端尖锐化而在最近的将来在某一个欧洲国家内发生。目前我們不打算推測欧洲哪个国家会首先走上革命的道路；但是无可怀疑的是：在最近几年所有欧洲国家的阶级矛盾都发展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

285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半专制政体的宪法范围内的巨大发展，必然使无产阶级同封建资产阶级的君主政府发生公开的冲突。用总罢工来抵制政变的问题，在去年已经成为德国无产阶级政治生活的中心问题。在法国，由于政权转移到激进党人手中，无产阶级双手彻底被解开了，过去无产阶级在对民族主义和教权主义进行斗争中很长时间受到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关系的束缚。有过四次革命的不朽传统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现在同戴上了激进主义假面具的保守资产阶级面对面地站着。在英国，两个资产阶级政党整整一个世纪来一直在有规律地进行着拉锯的议会活动，而无产阶级在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下一直到最近才走上独立的政治道路。在德国，这个过程花费了四十年的时间，拥有强大工会组织和丰富经济斗争经验的英国无产阶级，可能经过几次跃进就能赶上欧洲大陆上的社会主义大军。

俄国革命对欧洲无产阶级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这次革命除摧毁彼得堡的专制制度这个欧洲的主要反动势力外，还在欧洲工人阶级的意识和气质方面创造了革命的必要条件。

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使工人阶级的意识革命化，正如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关系革命化一样。但是无产阶级队伍中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具有一种内在的惯性。在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当中，首先是在其中最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当中，随着广大群众的接受社会主义并变得愈来愈有组织和有纪律，保

守主义也愈来愈发展了。结果是，作为体现无产阶级政治經驗的組織的社会民主党，可能在某个时刻成为工人和资产阶级反动派之間公开冲突的直接障碍。換句話說，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主义宣传家的保守主义，可能在某个时刻阻碍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俄国革命的巨大影响表明，它会打破党的常规和保守主义，并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反动派进行公开实力較量的問題提到日程上来。奥地利、薩克森和普魯士所进行的爭取普选权的斗争，在俄国十月罢工的直接影响下已經尖銳起来。东方的革命将把革命观念传播給西方的无产阶级，并引起一种以“俄語”向敌人发言的願望。

如果俄国无产阶级只是由于我国资产阶级革命形势中的暂时危机而执掌了政权，它将会遭到世界反动势力有組織的反对，在另一方面又会感到世界无产阶级极願給予它有組織的支持。俄国工人阶级如果孤立无援的話，那末它必然会在农民背弃它的时候被反革命势力所击潰。因此它除了把它的政权的命运也就是整个俄国革命的命运同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以外，別无他途。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形势中的暂时危机所給予它的巨大的政权力量，将会大大促进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阶级斗争。俄国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掌握在手中、前有欧洲的反动派，后有国内反革命的情况下，将向全世界的同志发出那个在这次作为最后一次进攻号召的老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286

第十章 为政权而斗争^①

我們面前有一张論綱領和策略的传单，題目是《俄国无产阶级

^① 原載一九一五年十月十七日巴黎出版的《我們的言論報》。我們現在把这篇属于稍后时期的文章重新发表出来，因为它对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年）向第二次革命（一九一七年）过渡的条件作了扼要的說明。——列·托·

的任务——致俄国同志们的一封信》。在这个文件上签名的有巴·阿克雪里罗得，阿斯特罗夫，亚·馬尔丁諾夫，尔·馬尔托夫和謝姆柯夫斯基。

这封“信”对革命問題作了极概括的叙述。当传单的作者們从說明战争造成的局势轉而談到政治前途和策略結論的时候，分析的明白性和准确性便消失了；連术语也变得模糊不清，社会的定义也变得含混了。

初看起来，在俄国的对外关系方面流行着两种情緒，第一种情緒是关心国防（从罗曼諾夫到普列汉諾夫），第二种情緒是普遍的不滿（从反政府的官僚分子的搗乱行为到街头爆发的叛乱）。这两种流行的情緒也造成一种关于将来人民革命的幻觉，以为这种革命会从国防事业中产生。但是这两种情緒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关于“人民革命”問題的提法的含糊性，即使这个提法形式上是同“国防”事业对立的（像在馬尔托夫等人那里一样）。

战争本身以及战争的失敗，既沒有引起革命的問題，也沒有造成解决这个问题的革命力量。我們的历史完全不是从华沙向巴伐利亚大公投降开始的。无论革命的矛盾或者各种社会力量，仍然和我們在一九〇五年第一次碰到的相同，不过最近十年来的事件使它們发生了很大的变异。战争只是以机械的直观性暴露出政府客观上的軟弱无能。同时，战争也使社会意識发生了混乱，似乎“所有的人”都沾染了反击兴登堡的願望和敌視六三政权的情緒。但是，正像組織“人民战争”的工作一开始就碰上了沙皇的警察，从而表明六月三日的俄国政府是事实，而“人民战争”是虛构一样，进行“人民革命”的工作也一开始就碰上了普列汉諾夫这个社会主义警察。的确，如果普列汉諾夫后面不是站着克伦斯基、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即一般說来不革命和反革命的民族民主派分子和民族自由派分子的話，人們本来可以把普列汉諾夫和他的全部跟班都看

成是虛構。

这封“信”当然不能无视民族的阶级划分，这个民族应该用革命的手段从战争的种种后果和现政权下拯救自己。“民族主义分子和十月党人、进步党人、立宪民主党人、企业家、甚至还有一部分(1)激进知识分子，都异口同声地说，官僚制度没有能力保卫国家，他们要求为国防事业而动员一切社会力量……”这封信完全正确地作出了关于这种立场的反革命性的结论，因为这种立场的前提是“同俄国目前的统治者——官僚、贵族和将军们联合起来保卫国家”。这封信也正确地指出，反革命立场是“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爱国派”的特点，我们还可以补充说，社会爱国派也有这个特点，这是这封信根本没有提到的。

由此必然得出结论：社会民主党不单是最彻底的革命政党，而且是国内唯一的革命政党；和它同时存在的不单是一些不那么坚决主张采取革命方法的集团，而且有一些不革命的政党。换句话说，尽管存在着“普遍的不满”，以革命方式提出任务的社会民主党在公开的政治舞台上是十分孤立的。这是第一个结论，我们必须最清楚地认识到。

当然，政党还不是阶级。政党的立场和它所依靠的社会阶层的利益之间可能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以后可能发展为深刻的矛盾。政党本身的行为在人民群众的情绪的影响下可能有改变。这是无可争辩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注意在作考虑时，不依靠像政党的口号和策略步骤这样一些比较不稳定和比较不可靠的因素，而依靠比较稳定的历史因素，即依靠如民族的社会结构，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和发展的趋势。

然而这封“信”的作者们完全回避这些问题。对于什么是一九一五年俄国“人民革命”这个问题，他们只告诉我们说，它“应当”由无产阶级和民主派来完成。什么是无产阶级，这我们知道。但是什

么是“民主派”呢？是政党嗎？从以上所說可以看出来：不是。那末是人民群众嗎？什么样的群众呢？显然，是小工商业资产阶级、知識分子、农民，——只能是指这些人。

我們在若干篇題为《战争危机和政治展望》的文章中，对这些社会力量可能具有的革命意义作了一般的估計。我們根据上次革命的經驗探討了一九〇五年的力量对比情况在最近十年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有利于民主派（资产阶级的）呢，还是对它不利呢？在討論革命的前途和无产阶级的策略时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心問題：一九〇五年以后，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强大了呢，还是更加衰落了昵？我們以前所有的爭論都圍繞着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命运問題，至今沒有找到这个問題的答案的人現在都在黑暗中摸索。我們对这个問題的回答是：**由于不存在真正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俄国不可能有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民族革命的时代，也像民族战争的时代一样，已經过去了（至少对欧洲是如此）。民族革命和民族战争是有深刻的內在联系的。我們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不仅是一种殖民掠夺的体系，而且也是一定的內政制度。它不是使资产阶级民族同旧制度对立起来，而是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

手工业和商业的小资产阶级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最近十年来这个阶层的社會意义已經无可爭論地变得更小了，因为我国资本主义对付中間阶级的办法比老的經濟上发达的国家要殘酷得多和劇烈得多。

知識分子在数量上无疑是增长了。他們在經濟方面的作用也增长了。但同时，他們以前那种虛伪的“独立性”也最終消失了；知識分子的社會意义完全决定于他們在組織资本主义經濟和资产阶级輿論方面的作用。他們同资本主义的物质联系使得他們充滿了帝国主义傾向。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这封信說：“甚至一部分激

进的知識分子……也要求为国防事业而动员一切社会力量”。这是完全不对的。不是一部分激进知識分子，而是全体激进知識分子。本来应该說，不仅是全体激进知識分子，而且甚至是相当大一部分(如果不是絕大部分的話)社会主义知識分子。我們不能用夸张知識分子的性质的办法来扩大“民主派”的队伍。

总之，工商业資產阶级进一步沒落了，知識分子放弃了革命的立場。城市民主派作为革命因素說来已不值一提了。剩下的是农民。但是就我們所知，不論是阿克雪里罗得还是馬尔托夫，都从来没有对农民的独立的革命作用寄予过分的希望。他們是否得出了在最近十年来农民不断分化的过程中这种作用已經增強了的結論呢？这样的假定既明显地违背理論見解，又明显地违背全部历史經驗。

然則这封信所指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民主派”呢？所謂“人民革命”又是什么意思呢？

立宪會議的口号需要有革命形势作为前提。存在这种形势嗎？存在。但只是它絲毫不取决于这一点：仿佛俄国終於出現了資產阶级民主派，这个民主派現在准备并且能够和沙皇制度进行清算。相反地，如果当前的战争十分明显地表明了什么的話，那恰恰是表明了国内缺乏革命民主派。

六月三日的俄国企图在帝国主义的道路上解决国内的革命問題。这种企图遭到了明显的破产。这并不是說，六月三日的那些負責或半負責的政党会走革命的道路。但是这意味着：由于軍事上的慘敗而暴露出来的革命問題（这个問題将驅使統治阶级进一步走帝国主义的道路上），将使这个国家里唯一革命的阶级加倍地重要起来。

六三集团动搖了。它的内部有傾軋和斗争这并不意味着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在自己面前提出了革命的政权問題，并且准

备冲击官僚制度和联合的贵族。但是这意味着政府抵抗革命的冲击的力量在一定时期内无疑是削弱了。

君主制度和官僚制度信誉扫地了。这不是说它们不经战斗就会交出政权。杜馬的解散和最近內閣的更迭，向一切需要证明的人说明：离开这种情况还很远。但是官僚制度的政策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还将进一步发展），会大大有助于社会民主党人对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动员。

城市和农村的下层人民将越来越贫困，越来越受欺骗，越来越不满，越来越顽强。这并不意味着会有一支独立的革命民主派的力量起来同无产阶级并肩进行活动。这支力量既没有社会基础，也没有领导成员。但是这无疑意味着，下层人民中间深刻不满的气氛会有助于工人阶级实行革命的冲击。无产阶级越是不等待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出现，它越是不迁就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被动性和局限性，它越是坚决地和不妥协地进行斗争，它打算走“到底”即夺取政权的决心越是让大家看得清楚，那么在决定性的时刻它就越有可能把非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靠没收土地之类的口号当然无济于事。对于关系着国家政权的成败的军队说来情况尤其如此。只有当军队群众深信革命的阶级不单是表示不满和举行示威，而是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并且有可能夺得政权时，军队的大多数才会倒向革命的阶级。

国内存在着一个客观的革命问题——国家政权问题。战争和败北使得这个问题更加尖锐了。统治阶级越来越趋于瓦解。城乡群众的不满情绪正在增长。而能够利用这种形势的革命因素只有无产阶级。现在这种情况和一九〇五年比较起来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信”里有一句话似乎接近全部问题的这个中心点。这句话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应当“在推翻六月三日君主制度的全民斗争中为首”。我们刚才已经指出“全民”斗争可能是什么意思

思。但是如果上面所引的“为首”一詞不应当简单地理解为进步的工人們不弄清楚后果究竟如何，就比誰都慷慨地流血，而应当理解为他们應該担当整个斗争的**政治领导**（这场斗争首先将是无产阶级本身的斗争），那么很明显，**这个斗争的胜利一定会使政权落到领导斗争的阶级手上，即落到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手上。**

因此，这不单是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問題（这是空洞的形式，历史进程将用某种内容来充实它），而是关于**革命的工人政府**的問題，是关于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問題。

全民立宪會議、共和国、八小时工作制、沒收地主的土地——所有这些都是口号，它們将和立即停止战争、民族自决权和欧洲联邦等口号一起在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中起巨大的作用。但是革命首先是政权的問題——不是国家的**形式問題**（立宪會議，共和国，联邦），而是政权的**社会内容問題**。如果无产阶级不直接准备为夺取政权而斗争，那末立宪會議或沒收地主土地的口号在目前条件下便会失去直接的革命意义。因为如果无产阶级不从君主制度手中夺取政权，那就誰也夺不了。

革命进程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这是特殊問題。这取决于許多因素：軍事和政治方面的因素，国内和国际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能够延緩发展或加快发展，保证革命的胜利或再一次导致失敗。但是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无产阶级必須看清楚自己的道路，并且自觉地走这条道路。首先它必須摆脱幻想。无产阶级在它至今为止的全部历史中的最坏的幻想一直就是指靠別人。

（蔡汉敖譯）

不断革命^①

初版序言(俄文版,在柏林出版)

- 1 本书所探讨的一项争论,同三次俄国革命的历史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是只同这段历史有联系。近年来,这项争论在苏联共产党的内部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以后,它又转移到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的发展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决定了有关东方国家革命斗争问题的许多最重要的决议。这项争论还和不断革命论有关系,按照列宁主义的不肖门徒(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布哈林等)的学说来说,这个理论是“托洛茨基主义”所特有的罪恶。

- 不断革命的问题是在一九二四年重新提出来的,这次提出经过了一段长的间隔,乍看起来,十分出乎意料。政治上的理由是沒有的;这是一个很久以前就有意見分歧的问题。但是,有重要的心理方面的动机。曾经展开斗争反对我的所谓“老布尔什维克”集团,开始把自己装扮成“布尔什维克老卫士”来同我对抗。但是在他們的道路上有一个巨大的障碍,那就是一九一七年。不管以前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斗争和准备这一段历史,对全党以及不同的个人来说,可能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整个准备时期所遇到的最大的和毫不含糊的考验却是十月革命。不肖门徒当中沒有一個人

① 本文据英文版《不断革命和总结与展望》(Permanent Revolution and Results and Prospects. New Park Publications. London. 1962)译出。其中《德文版序言》又据《托洛茨基文选》(Écrits, t. I. Paris. 1955)法文版校订过。——中译者注

經受住这次考驗。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时期，他們毫无例外地都采取了民主左派的庸俗立場。他們当中沒有一個人提出工人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口号。他們都认为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針是荒謬的，或者——更要坏些——是“托洛茨基主义”。他們就以这种精神領導着党，一直到列宁从国外回来和发表了他的著名的四月提綱。在这以后，已經直接对列宁展开斗争的加米涅夫，便公开試图組織布尔什維主义民主派。后来，同列宁一道回国的季諾維也夫，参加了加米涅夫一伙。斯大林則因深受社会爱国主义立場的影响而采取了旁观的态度。他使党忘記了他在三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那几个星期所发表的可悲的文章和演說，然后逐步轉移到列宁的立場上来。正因为这样，才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样一个問題：他們当中既然沒有一個人表明自己在最重要最严酷的历史时刻能够独立地运用党在理論上和实践上的經驗，那末，这些主要的“老布尔什維克”当中的任何一个究竟从列宁主义得到了一些什么呢？但是，無論如何要使注意力离开这个問題，而轉到另一个問題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便决定了把火力集中在不断革命論上面。我的对手們当然沒有預見到，他們創造了一个虛假的斗争中心以后，自己就会不知不觉地被迫围着这个軸心旋轉，而且会用轉換的方法为自己制造一种新的世界观。

不断革命論，就其基本特点來說，甚至在一九〇五年的决定性事件发生以前就已經由我闡述过了。当时俄国日益临近資產階級革命。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当时我們都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的队伍中，沒有一個人对于这样一点有过任何怀疑，即我們正在日益临近資產階級革命，也就是資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农奴制时期和中世紀的那种过时的階級与国家关系之間的矛盾所产生的一种革命。在反对民粹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中，我在那些日子

3

級性质进行馬克思主义的分析。

然而，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质并不能事先回答这样的問題，即究竟由哪些階級来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这些階級的相互关系究竟如何。而基本战略問題正是从这一点上开始的。

普列汉諾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馬尔托夫，以及追随他們的所有的俄国孟什維克，都是以这样一种想法作为出发点，即在資產階級革命中，领导角色是属于作为政权的天然要求者的自由資產階級的。根据这种图案，无產階級政党被指定担任的角色是民主陣綫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要支持自由資產階級来反对反动，同时要保卫无產階級的利益，使之不受自由資產階級的侵犯。換句話說，孟什維克所理解的資產階級革命，基本上是一种自由立宪改革。

列宁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提出問題的。对列宁來說，資產階級社会的生产力从农奴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这一点，首先意味着，在彻底消灭地主階級和用革命方法重新分配土地这一意义上，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問題。与此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是，摧毁君主政体。列宁以一种真正革命的勇气进攻了土地問題，因为這個問題影响絕大多数居民的切身利益，同时它也是資本主义市場的基本問題。由于把工人当作敌人的自由資產階級，同大地主有千絲万縷的密切联系，农民的真正民主的解放，就只有在工人和农民进行革命合作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根据列宁的看法，工人和农民反对旧社会的共同起义，如果贏得胜利的話，必然会导致“无產階級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建立。

4 在共产国际中，目前把这个公式当作一种超历史的教条来重复，而沒有试图分析一下近二十五年来活生生的历史經驗——就好像我們沒有亲眼看到过并且亲身参加过一九〇五年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以及最后，十月革命。然而，对这段历史进行分

析是格外必要的，因为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政权。

在一九〇五年，对列宁来说，这个公式是一个战略上的假设问题，它还有待阶级斗争的实际发展情况来加以证实。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公式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一种假设的代数学性质。列宁没有事先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假想的民主专政的两个参加者，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究竟会形成什么样的政治关系。他并没有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农民在革命中将会有一个代表自己的独立的政党——一个在双重意义上独立的政党，即不仅对资产阶级保持独立性，而且对无产阶级也保持独立性——同时能够在同无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的情况下在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实现民主革命。列宁甚至还承认这样的可能性——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一点——即革命的农民政党在民主专政政府中有可能形成多数。

在土地革命对我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命运的决定性意义这个问题上，至少从一九〇二年秋天起，也就是从我第一次逃亡外国的时候起，我是列宁的学生。土地革命，因而还有一般民主革命，只有工人和农民的联合力量在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实现，同近年来所有毫无意义的神话相反，我对这一点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但是，我起来反对了“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这个公式，这是因为我从这一事实中看到了它的缺点，即它没有明确究竟由哪个阶级掌握真正的专政这个问题。我曾努力表明，农民尽管在社会方面和革命方面占有巨大的比重，但是不能建立一个真正独立的政党，尤其不能把革命权力集中在这样一个政党手中。正如过去的革命一样，从十六世纪的德国宗教改革起，甚至还要早些，农民在起义中支持某一部分城市资产阶级，往往保证了胜利。同样，在我们的姗姗来迟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农民也可能在斗争达到

最高峰时給予无产階級类似的支持，帮助它掌握政权。我从这一点得出了这样的結論，即只有无产階級在千百万农民的援助下证明自己能够把革命专政集中在自己手中的情况下，我們的資產階級革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自己的任务。

这种专政的社会內容是什么呢？首先，它必須彻底完成土地革命和国家的民主重建工作。換句話說，无产階級专政将变成解决从历史上看为时已晚的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务的工具。但是，事情还不能到此为止。无产階級掌握政权以后，将不得不甚至更为深刻地侵犯整个私有制关系，即不得不走上采取社会主义措施的道路。

“但是你当真相信俄国已經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嗎？”从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七年，斯大林之流、李可夫之流以及莫洛托夫之流等就曾經几十次地这样表示异議。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总是这样：不，我并不相信。不过，整个世界經濟，首先是欧洲經濟，已經完全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无产階級专政在俄国是否可以导向社会主义，采取什么速度，以及通过哪些阶段，这些将决定于欧洲和世界資本主义的命运。

这就是在一九〇五年头几个月里最初提出的不断革命論的基本特点。从那以后，发生了三次革命。俄国无产階級依靠农民起义的强大浪潮掌握了政权。无产階級专政在俄国变成了事实，比世界上任何发达得无可比拟的国家还要早。到一九二四年，也就是在不断革命論的历史性預断以十分罕見的力量得到证实以后还不到七年的时候，不肖的門徒們反而从我当时已經完全忘記的旧著作中断章取义地摘引一些句子和論战中的答辯，对这个理論展开了瘋狂的进攻。

这里正好回顾一下，第一次俄国革命爆发的时候，欧洲的資產階級革命浪潮已經过去半个多世紀，巴黎公社的插曲性的起义也

已經过去三十五年。欧洲已經有一段时间对革命漸漸生疏下来。俄国却沒有任何这种經歷。革命的所有問題都是重新提出来的。不难理解,在那些日子里,未来的革命对我们來說具有多少未知的和猜測的成分。所有的集团虽然做法各有不同,但都在进行种种假設。誰要是現在,即事后,能够把对一九〇五年的分析和估价看成好像就是昨天才写出来的,誰就完全不能进行历史的預断,同时也一定完全不懂得預断的方法。我常对自己、也对我的朋友說:我并不怀疑我对一九〇五年的預断有許多缺陷,这些缺陷在事后的今天是不难指出来的。但是,批評我的人是不是看得更正确些更深远些呢?尽管我已經很久沒有重讀我的旧著作,我还是預先就願意承认,那些著作中的缺陷比实际上存在的缺陷还要严重还要重要。我在一九二八年深深地相信了这一点,当时我流亡在阿拉木图,强加給我的政治上的空閑使我有机会手拿鉛笔,重讀我过去就不断革命問題发表的著作。我希望讀者讀了后面的內容以后,也会完全确信这一点。

但是,在这篇序言的范围内,还是有必要尽可能确切地說明不断革命論的要点以及最重要的反对意見。爭論已經达到这样广泛这样深入的程度,以致目前实质上包括了世界革命运动所有最重要的問題。

不断革命,从馬克思賦予这个概念的意义來說,意味着一种同階級統治的任何形式都不妥协的革命,这种革命并不停留在民主主义阶段,而要进一步采取社会主义措施并进行反对外国反动势力的战争;这就是說,这种革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同前一阶段相衔接,它只有在階級社会完全消灭的时候才能够結束。

为了澄清圍繞着不断革命論所产生的各种混乱思想,必須弄清楚这一理論中互相联系三个思想。

第一,就是关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問題。这一

点实质上是这个理論的历史根源。

不断革命的概念是十九世紀中叶的伟大共产主义者馬克思和他的信徒們提出来同民主主义思想相对立的，大家知道，民主主义思想所主张的是，“合理的”或民主的国家建立以后，一切問題都可以通过改良主义的或进化的措施和平地加以解决。馬克思曾經把一八四八年的資產階級革命看作是无产階級革命的直接序幕。馬克思“犯了一个錯誤”。不过他的錯誤性质是事实上的，而不是方法論上的。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沒有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这也正是为什么它沒有获得民主的原因。至于一九一八年的德国革命，它并不是完成了民主任务的資產階級革命，而是被社会民主党人扼杀了的无产階級革命；更确切些說，这是一种在战胜无产階級以后被迫保持假民主形式的資產階級反革命。

庸俗的“馬克思主义”設計出一套历史发展图式，按照这种图式，每个資產階級社会迟早要建立民主制度；有了民主制度以后，无产階級就会在民主的条件下为社会主义而逐渐組織起来并受到教育。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际情况，有許多不同的設想：自称的改良主义者設想，这种过渡就是用改良的办法以社会主义的内容来充实民主制（如饒勒斯）；正式的革命家則承认，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必須使用革命的暴力（如盖得）。但是这两种人都认为，对于一切民族和国家說来，民主和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中的两个阶段，由于在時間上彼此相距很远，这两个阶段不仅完全不同，而且是彼此割裂的。在那些一九〇五年时期属于第二国际左翼的俄国馬克思主义者当中，这种观点也占支配地位。俄国馬克思主义的杰出先驅者普列汉諾夫认为，在当代的俄国，无产階級专政的思想是一种空想。为这种观点辯护的，不仅有孟什維克，而且还包括絕大多数布尔什維克领导人，特别是現在党的领导人。当时他們毫无例外地都是坚决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不过在他們看来，不仅在一九〇

五年，而且在一九一七年前夜，社会主义革命的問題仍然是遙远的未来的音調不清的音乐。

在一九〇五年重新提出的不断革命論，向这些思想情緒宣了战。这个理論指出，在我們这个时代，落后資产階級国家的民主任务可以直接导致无产階級专政，而无产階級专政則可以把社会主义任务提上日程。这就是这个理論的中心思想。传统的观点认为，通向无产階級专政的道路要經歷一段漫长的民主制时期；不断革命論則肯定，落后国家通向民主制的道路要經過无产階級专政。因此，民主制不是在数十年之內停滯不前的制度，而只不过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序幕。两者由一条牢不可破的鏈条互相联結在一起。因此，在民主革命和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間存在着革命发展的不断性。

“不断”論的第二个方面是，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不断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在不能确定的长时期內和經常不断的內部斗争中得到改造的。社会繼續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性质。改造的每个阶段都直接从前一个阶段产生出来。这个过程必然带有政治性质，就是說，它是通过改造中的社会的各种各样的集团之間的冲突来发展的。国内战争和对外战争的爆发是同“和平”改革时期互相更替的。經濟、技术、科学、家庭、道德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革命，是在錯綜复杂的相互影响中发展的，它不让社会达到平衡状态。这就是这种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

不断革命論的第三个方面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这一点是从人类的經濟和社会結構的現狀中产生的。国际主义决不是抽象的原則，而是世界經濟的性质、生产力的世界性发展、階級斗争的世界規模在理論上和政治上的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国的基础上开始的——但是它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完成。在一国范圍內維持无产階級革命只能是一种暫時状态——尽管像苏联的經

济所表明的，是一种长时期的暂时状态。在孤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各种国内外矛盾必然随着成就的增加而增加。如果无产阶级专政继续处于孤立状态，那末，无产阶级国家最后就必然成为这些矛盾的牺牲品。摆脱这种状态的唯一出路就是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从这个观点来看，一国的革命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它只是国际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国际革命是一个不断的过程，尽管它有暂时的衰退和低潮。

不肖門徒們反对——尽管并不总是同样明确地反对——不断革命論的所有这三个方面。既然这个问题是一个整体中不可分割地連結在一起的三个部分，那末事情又怎么能够不是这样呢？不肖門徒們机械地把民主专政同社会主义专政割裂开来。他們把一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同国际的社会主义革命割裂开来。他們认为，从本质上說，在一国范围内取得政权不是革命行动的开始，而是革命行动的終結；随后就是走向一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时期。在一九〇五年，他們甚至不承认无产阶级在俄国可以比在西欧更早取得政权的思想。在一九一七年，他們鼓吹在俄国进行独立自主的民主革命而拒絕无产阶级专政。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他們提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要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方針。后来，他們給中国提出了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来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相对立。他們宣称在苏联有可能建設孤立无援的和自給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对他們說来，世界革命已經不是胜利的必要前提，而只不过是一种有利的环境而已。不肖門徒們就这样在反对不断革命論的不断斗争的过程中大大背离了馬克思主义。

这种从人为地复活历史的回忆和歪曲久远的过去而开始的斗争，使得革命领导阶层的世界观完全改变了。我們已經一再說明，对于准則的这种重新估計，是在苏联官僚集团的社会需要的影响下进行的，而这个集团已經变得空前保守，它拚命維持国家秩序，

并要求现在应当把已经实现的革命——这次革命保证了这个集团享有特权地位——看成是适合于和平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我们不想在这里再来谈论这个课题。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官僚集团深刻地意识到，它在物质上和思想意识上的地位是同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有联系的。这一点现在表现得非常明显，尽管有这样的事实，或者不如说是由于有这样的事实，即斯大林主义的政府机器在它没有预见到的矛盾的压力之下，现在正在拼命向左转，正在狠狠地打击昨天的右派鼓动家。官僚分子虽然急急忙忙借用了马克思主义反对派的口号和论据，但是大家知道，他们对反对派的敌对态度丝毫没有改变。当反对派成员为了支持工业化方针等而提出恢复党籍的问题时，就被要求首先谴责不断革命论，并且承认——即使只是间接地——一国社会主义理论。通过这一点，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表明，它在保持民族改良主义战略基础的同时向左转这种做法，纯粹是策略性质的。这意味着什么，用不着多加解释；在政治上如同在军事上一样，归根到底策略是从属于战略的。

11

问题早已超出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特有范围。这个问题逐渐扩大，今天实际上已经涉及到革命世界观的一切问题。是不不断革命还是一国社会主义？——这个抉择同时涉及到苏联的国内问题和东方革命的前途，最后，还涉及到整个共产国际的命运。

本书没有从所有这些方面来考察这个问题；重复其他著作中已经说过的话是没有必要的。在《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判》^①中，我竭力从理论上揭露了民族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脆弱无力。共产国际的理论家们对此保持沉默。这的确是他们的唯一办

^① 收在《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一书中，三联书店一九六五年版。——中译者注

法。在本书中，我首先恢复了一九〇五年在俄国革命内部问题方面所阐述的不断革命论。我说明了我的立场同列宁的立场的实际分歧在哪里，以及我的立场如何和为什么在每个决定性的情况中同列宁的立场都是一致的。最后，我竭力说明这个问题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对整个共产国际的决定性意义。

不肖门徒们究竟给不断革命论加了些什么罪名呢？如果我们把批评我的人的无数矛盾撇开不谈，那末，他们的真正庞大的全部著作可以归纳为下列几个命题：

一、托洛茨基忽视了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在一九〇五年他就已经认为俄国无产阶级直接面临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12 二、托洛茨基完全忘记了土地问题。对他来说，农民并不存在。他所描述的革命仅仅是无产阶级和沙皇制度之间的战斗。

三、托洛茨基不相信世界资产阶级会容忍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存在任何一个时期，他认为这种专政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除非西方无产阶级在非常短的时期夺取了政权并给予我们援助。因此，托洛茨基低估了西欧无产阶级对本国资产阶级的压力。

四、托洛茨基总的来说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不相信它有能力独立地建设社会主义；因此，他过去和现在都把他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国际革命上。

这几个要点不仅贯穿在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布哈林以及其他人的无数著作和演说中，而且还写在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最有权威的决议中。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不能不说，这些要点是建立在无知和欺骗的混合物上面的。

批评家们提出的头两点（后面将要说明）是彻头彻尾虚伪的。不对的是，我正是从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民主的性质出发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土地危机的深刻化有可能使落后俄国的无产阶级

取得政权。对的是，这正是我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夜所维护的想法。这正是被称之为“不断”的革命所表明的想法，这种革命也就是一种不间断的革命，一种从资产阶级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的革命。为了表达这同一想法，列宁后来使用了这样一种出色的表达方法，即资产阶级革命长入社会主义革命。事件^①发生以后（一九二四年），斯大林把“长入”的概念同不断革命对立起来，他把不断革命说成是从专制政治领域直接跳到社会主义领域。这个不幸的“理论家”甚至不屑于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如果整个问题仅仅是一次跳跃，那末，革命的**不断性**，也就是革命的**不间断的发展**，还可能有什么意义呢？

至于第三条罪状，这是由于不肖门徒们拥有这样一种不攻自破的想法而提出来的，即在不产阶级“严格”组织的压力的帮助下，有可能使**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无限期中立化**。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那几年，这就是斯大林的中心想法。英俄委员会^②就是这种想法的产物。对依靠柏塞尔^③、拉狄克、拉弗莱特^④以及蒋介石的帮助来束缚世界资产阶级手足的可能性失望以后，便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心惊胆战起来。共产国际还处在这样一个时期。

反对不断革命论的第四点也不过是等于说，我没有在一九〇五年维护一国社会主义论的观点，而这种理论是斯大林到一九二四年才为苏维埃官僚第一次提出来的。这一条罪状不折不扣地是历史上的一件妙事。人们可能真会以为，我的对手们——要是他

① 指列宁逝世。——中译者注

② 指一九二五年四月苏联工会和英国工会组织的英俄工会统一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争取国际工人运动的统一，反对资产阶级的进攻和帝国主义战争危险。——中译者注

③ A. A. Purcell, 英国工会的中派领袖。——中译者注

④ La Follette, 美国参议员，曾主张承认苏联，对苏进行贸易。——中译者注

們在一九〇五年畢竟還是從政治上考慮問題的話——當時就抱着這樣的看法，即俄國已經成熟到可以進行獨立的社會主義革命了。實際上，在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七年期間，他們却在無休止地譴責我有無政府主義思想，因為我承認有這樣的或然性，即俄國無產階級可能在西歐無產階級之先取得政權。加米涅夫和李可夫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指責列寧有無政府主義思想，他們用簡單的語言向列寧說明，社會主義革命必須首先在英國以及其他先進國家實現，然後才有可能輪到俄國。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四日以前，這種觀點也受到斯大林的維護。後來斯大林才漸漸地困難地接受了不同於民主專政的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公式。在一九二四年春天，斯大林還在重復別人早就說過的話：如果是單獨一個國家，那末，在俄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還不成熟。到一九二四年秋天，斯大林在反對不斷革命論的鬥爭中第一次發現了在俄國單獨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只是到了這個時候，紅色教授們才為斯大林收集引語，這些引語就給托洛茨基定了罪，說他在一九〇五年曾經認為——多麼可怕！——只有在西方無產階級的幫助下，俄國才能走上社會主義道路。

14 如果有人把二十五年的思想意識鬥爭史剪成小碎片，放在研鉢里攪亂，然後讓一個盲人把這些碎片重新接起來，那末，它在理論上和歷史上所達到的荒謬混亂程度，恐怕不會比不肖門徒們告訴他們的讀者和聽眾的更為嚴重。

為了說明昨天的問題同今天的問題之間的聯繫，人們必須在這裡回顧一下——即使僅僅是非常概括地——共產國際的領導，即斯大林和布哈林，究竟在中國干了些什麼。

一九二四年，他們在中國面臨民族解放革命的借口下，把領導角色派給了中國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政黨國民黨被正式地承認為領導黨。甚至俄國的孟什維克在一九〇五年對立憲民主黨人

(自由資產階級政黨)所採取的態度，也沒有走得這麼遠。

但是，共產國際的領導並沒有到此為止。它還強迫中國共產黨參加國民黨並服從它的紀律。斯大林在專電中勸告中國共產黨人制止農民運動。參加暴動的工人和農民被禁止組織自己的蘇維埃，以免同蔣介石鬧翻。一九二七年四月初，即上海反革命政變發生前幾天，斯大林在莫斯科黨的一次會議上還把蔣介石當作“可靠的同盟者”來加以維護，不許反對派反對。

共產黨的正式服從資產階級領導和正式禁止組織蘇維埃（斯大林和布哈林教導說，國民黨“代替了”蘇維埃），比孟什維克在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七年期間所干的一切事情更為明目張膽地背叛了馬克思主義。

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政變以後，在汪精衛領導下的左派從國民黨中暫時分裂出來。汪精衛立即被《真理報》歡呼為可靠的同盟者。從本質上看，汪精衛同蔣介石的關係就像克倫斯基同米留可夫的關係一樣，所不同的是，在中國，米留可夫和科爾尼洛夫體現在蔣介石一個人身上。

15

一九二七年四月以後，中國的黨被命令加入“左派”國民黨並被命令服從中國克倫斯基的紀律，而不是去準備反對他的公開戰爭。結果“可靠的”汪精衛摧毀了共產黨，還摧毀了工農運動，其殘酷程度並不亞於曾被斯大林宣布為自己的可靠同盟者的蔣介石。

孟什維克雖然在一九〇五年以及以後的時期里支持了米留可夫，但是並沒有加入自由派政黨。孟什維克雖然在一九一七年同克倫斯基攜手並進，但是依然保持了自己的組織。斯大林在中國的政策甚至是對孟什維主義的惡毒丑化。這就是第一章也是最重要的一章的內容。

在不可避免的後果產生以後，即工人和農民運動完全停頓，共產黨士氣低落和瓦解以後，共產國際的領導又命令“向左轉！”並要

求立即过渡到工农武装起义。年輕的、遭到摧殘的和損失慘重的共产党，直到昨天还是蔣介石和汪精卫的馬車上的第五个車輪，因此一点独立的政治經驗也沒有。而現在，这个党突然接到命令去領導工人和农民——共产国际直到昨天还在国民党的旗帜下抑制他們——发动武装暴动，反对这个在这段期間已經得到時間把政权和軍隊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国民党。于是在二十四小时以內，一个虛构的苏維埃便在广州成立起来。这个为了配合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開幕而事先規定好時間的武装暴动，表现了先进的中国工人的英雄主义，同时也表现了共产国际領袖們的罪恶。在广州暴动以前和以后，冒险行动都比較少。这就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战略的第二章。这一章可以說是布尔什維主义的最恶毒的丑化。

自由一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篇章使中国共产党受到了打击，即使执行正确的政策，它也要在若干年以后才能恢复过来。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对所有这些工作进行了总结。它毫无保留地批准了这些工作。这并没有什么值得惊异的地方，因为这次代表大会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召开的。对于未来，代表大会提出了“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口号。至于这种专政究竟同右派国民党或左派国民党专政有什么区别，同无产阶级专政又有什么区别——这一点沒有向中国共产党人說明，也不可能說明。

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宣布民主专政口号的同时，却又不許提出民主口号（立宪會議，普选权，言論和出版自由，等等），这样就使中国共产党在軍事寡头专政的面前完全解除了武装。許多年来，俄国的布尔什維克就是圍繞着民主口号动員工人和农民的。民主口号在一九一七年起了巨大的作用。只是在苏維埃政权实际上已經存在并且同立宪會議发生了不可調和的政治冲突，同时全体人民都已看得清清楚楚以后，我們党才取消了形式民主即资产阶级

民主的机构和口号，而贊成实行真正的苏維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领导下，却把所有这一切整个顛倒过来。一方面它为党規定了“民主”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同时它却又禁止党为了准备这种专政而利用民主口号。中国共产党不仅被解除了武装，而且被剝得精光。最后，为了安慰它，才准許它在无期限的反革命統治时期运用苏維埃口号，而这个口号在整个革命高潮中是遭到禁止的。在俄国民間傳說中，有一个很著名的英雄，他在参加葬仪的时候唱結婚曲，在参加婚礼的时候唱挽歌。在这两种場合下，他都挨了一頓痛打。如果問題只不过是給目前領導共产国际的战略家們一頓痛打，那倒也許可以听之任之。但是問題要严重得多。这里所牵涉到的是无产阶级的命运。共产国际的策略对中国革命是一种不自觉的但格外有成效有組織的破坏。这种破坏的确成功了，因为共产国际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的右傾孟什維克政策上披上了布尔什維主义的全部权威，同时苏維埃政权通过它的强有力的鎮压机器压制了左翼反对派的批評。 17

結果，我們看到，斯大林主义战略的完整实验完成了，这种实验自始至终是在反对不断革命的斗争旗帜下进行的。因此，十分自然，主张中国共产党从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的主要斯大林主义理論家本应当是馬尔丁諾夫。就是这个馬尔丁諾夫，从一九〇五到一九二三年一直是批判不断革命論的主要孟什維克批評家，而在一九二三年才开始执行他在布尔什維主义队伍中的历史使命。

有关本书来龙去脉的主要事实，已經写在第一章中。在阿拉木图，我从容不迫地准备了我要同不肖門徒們进行的理論上的論战。不断革命論在本书中要占一个巨大的地位。我写作的时候收

到拉狄克的一部手稿，这部手稿专门论述不断革命同列宁战略路线的对立。拉狄克之所以需要这种出其不意的袭击，是因为他本人已经深深地陷入斯大林的中国政策：拉狄克（同季诺维也夫一道）不仅在蒋介石政变以前，甚至在政变以后，还维护共产党从属于国民党的政策。

拉狄克为了给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的奴役提供基础，自然要提出同农民结成联盟的必要性，同时说我“低估了”这种必要性。他追随着斯大林也用布尔什维克的词汇维护孟什维克的政策。拉狄克还追随着斯大林用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公式又一次掩盖这一事实，即中国无产阶级被人引得离开了领导农民群众夺取政权的独立斗争。我揭露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假面具以后，拉狄克感到迫切需要证明这一点：我之所以进行斗争，反对用列宁的话来打掩护的机会主义，实际上是由于不断革命论同列宁主义之间存在着矛盾。儼然以检察官的口吻来维护自己的罪恶的拉狄克，又把自己的话转变为起诉人对不断革命的起诉。这只不过是他走向投降的一座桥梁。我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怀疑这一点，因为拉狄克在好几年以前就曾计划写一本小册子来维护不断革命。然而，我并没有急于把拉狄克一笔勾销。我设法坦率地明确地答复他的论文，而同时并没有截断他的退路。我完全照原稿印出我对拉狄克的答复，使自己只限于增加少数注释和作一些文字上的改正。

拉狄克的论文没有在报刊上发表，我相信以后也不会发表，因为照它在一九二八年所写的那种形式，是通不过斯大林主义的检查的。甚至对拉狄克本人来说，这篇论文在今天也成了真正致命的东西，因为它清楚地描绘了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演变”，而这种“演变”使人非常强烈地想起一个从六层楼窗口跳下去的人的“演变”。

本书产生的根源充分地说明了为什么拉狄克在本书中所占的

地位也許比他有权要求的还要大些。拉狄克沒有想出一条新的論据来反对不断革命論。他只不过是作为不肖門徒的一个門徒往前走而已。因此,本书让讀者所看到的拉狄克并不仅仅是拉狄克,而是某个公司的代表,在这个公司里,他是用抛弃馬克思主义的代价才买到一个預备成員的資格的。如果拉狄克个人觉得他受到的責难太多了,那末,他完全可以把这些責难轉移給更为适当的人。这是商行内部的私事。在我这方面,我沒有反对意見。

德国共产党的各种派別取得政权或者为取得政权而斗争,都是通过反对不断革命的严酷实习来显示自己的領導資格的。但是,所有的这种著作——馬斯洛夫的,塔尔海默^①的,以及其他人的——是这样可怜的水平,以致甚至沒有为认真的答复提供一个借口。台尔曼之流、雷梅累之流以及当前的其他指定的領導人,对待这个問題的水平甚至还要低些。所有这些批評家只不过做到了一点,即证明他們甚至沒有能力探索到問題的門徑。对馬斯洛夫、塔尔海默等人的理論性批評有兴趣的任何人,讀完本书以后都可以去看看他們的著作,以便确信这些作者的无知和欺詐。这将是——姑且这么說——我奉献給讀者的这本书的一件副产品。

列夫·托洛茨基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于太子群島

德文版序言

在本书德文版将要出版的时候,世界工人階級的整个有思想的部分以及在一定的意义上整个“文明的”人类,正在以特別濃厚

^① 馬斯洛夫和塔尔海默是当时德国共产党的領導人,他們都曾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后来因叛变活动被开除。——中譯者注

的兴趣注視着目前正在大部分前沙皇帝国发生的經濟轉变及其反响。这方面的最大注意力是农民土地集体化問題所引起的。这是毫不足怪的,因为在这个領域,同过去决裂具有一种特別彻底的性质。但是,如果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一个总的概念,那末,要对集体化作出正确的估价是不可想象的。而在这里,我們在高得多的水平上再一次确认了一点,即在馬克思主义理論的領域,沒有一件事情不是落脚于实际活动。最細微的分歧意見,以及看来最“抽象的”分歧意見,如果思想上毕竟存在的話,那末,迟早一定会在实践中表現出来,而实践是不容許任何一个理論上的錯誤太平无事地存在的。

农民土地集体化,当然是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必要最根本的部分。但是,集体化的規模和速度并不仅仅决定于政府的意志,而是归根到底决定于一些經濟因素,即决定于国家經濟水平的高度,决定于工农业之間的內在联系,因而也决定于农业本身的技术資源。

工业化是整个現代文化的推动力,因而也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可以設想的基础。在苏联的条件下,工业化首先意味着加强作为統治階級的无产階級的基础。同时,工业化还为农业集体化創造物质和技术前提。这两种进程的速度是互相依賴的。无产階級关心这两种进程尽可能达到最高的速度,以使正在建立的新社会得到最好的保障,使它消除外来的危險,同时为有步驟地提高劳苦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創造一个泉源。

然而,可以达到的速度是受到国家总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限制的,是受到城乡关系的限制的,同时也受到群众最迫切的需要的限制,因为群众为了明天而牺牲今天只能达到一定的程度。最适当的速度,即最好和最有利的速度,是不仅能够促使工业和集体化在一定的时期得到最迅速的发展,而且还能保障社会制度的必

要稳定性，也就是說，要能首先加强工农联盟，从而为未来的成就准备可能性。

从这个观点出发，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在指导计划经济下的工业发展时所运用的一般历史标准。在这里，主要有两种可能采取的方针：（一）上面所概述的方针，即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进一步的胜利以前，从经济上加强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俄国左翼反对派的观点）；（二）另外一种方针：建设一个孤立的民族社会主义社会并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做到这一点（这是目前官方的立场）。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并且归根到底直接对立的社会主义概念。从这里就产生了根本不同的路线、战略和策略。

在本序言的范围内，我们不能详尽地论述一国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我们已写了一些著作论述这个问题，特别是《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判》。这里我们只限于谈谈这个问题的根本性因素。首先，让我们回忆一下，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是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秋天首先提出来的，这个理论不仅同马克思主义的所有传统和列宁学派完全矛盾，而且甚至同斯大林本人在同年春天所写的东西完全矛盾。从原则的观点来看，斯大林“学派”在社会主义建设这一问题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和严重性，并不亚于，例如，一九一四年秋天即斯大林转变以前整整十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战争和爱国主义的问题上同马克思主义的决裂。这个对比，从性质上说，完全不是偶然的。斯大林的“错误”，正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错误”一样，也是民族社会主义。

22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经济并不是各民族部分的总和，而是一种由国际分工和在我们这个时代专横地统治着民族市场的世界市场所形成的强有力而独立的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早已发展得超过了民族界限。（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帝国主义战争

就是这种事实的表现之一。在生产技术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代表比资本主义更高的阶段。如果要在**民族范围内孤立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那末，不管暂时取得多少成就，都意味着把生产力拉回到甚至比资本主义还落后的境地。不顾构成世界统一体的一部分的国家发展在地理、文化和历史方面的条件，而试图在一个民族范围内实现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经济各部门的平衡，那就意味着追求一种反动的乌托邦。如果这种理论的先驱和追随者还参加国际革命斗争（取得什么成就，是另一个问题），那是因为作为不可救药的折衷主义者，他们把抽象的国际主义同反动的乌托邦民族社会主义机械地结合在一起了。这种折衷主义的最高表现就是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

为了生动地揭露作为民族社会主义概念的基础的主要理论错误之一，我们最好引用最近出版的一篇斯大林的演说中所说的话，这篇演说是论述美国共产主义的内部问题的^①。斯大林在同美国的一个派别争论的时候说，“不考虑美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点，那是不对的。共产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必须考虑到这些特殊点。但是，把共产党的活动建立在这些特殊点上，那就更加不对了，因为包括美国共产党在内的任何一个共产党的活动基础（任何共产党都必须立脚于这种基础之上），必须是对所有的国家来说都是一样的资本主义的共同点，而不是某一国家的特殊点。**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正是建立在这一点上的。特殊点只不过是共同点的补充。**”（《布尔什维克》一九三〇年第一期第8页。黑体是我们标的。）

这一段话没有一点谈得上是清清楚楚的。斯大林借口为国际

^① 斯大林发表这篇演说是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六日，一九三〇年初在使它得到一种“纲领性”意义的情况下才第一次出版。——列·托·（这篇演说刊载在《共产党人》（美国）一九三〇年六月号上。见威·兹·福斯特著《美国共产党史》一九五二年版第273页。《斯大林选集》中没有收入这篇演说。——英译者注）

主义提供經濟上的理論根据，实际上是为民族社会主义提供理論根据。說世界經濟只不过是同一类型的民族部分的总和，那是荒謬的。說特殊点“只不过是共同点的补充”，像脸上的瘕子一样，也是荒謬的。实际上，民族特点所代表的是世界进程基本特点的一种原始的結合。这种原始性在許多年中对于革命战略可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只要回顾这一点就够了：一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階級比先进国家的无产階級取得政权早許多年。单单这个历史教訓就表明，不管斯大林怎么說，把共产党的活动建立在一些“共同点”的基础上，也就是說，建立在一种抽象的民族資本主义类型的基础上，那是絕對錯誤的。坚持“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正是要建立在这一点上”，那是完全荒謬的。实际上，它是建立在民族国家的无能为力上，这种民族国家早已过时了，它已經变成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民族資本主义，除非是作为世界經濟的一部分，否則，不用說建立这种社会，連理解它也不可能。

24

不同国家的經濟特点絕不是从属性的。只要比較一下英国和印度、美国和巴西就够了。但是，民族經濟的具体特点，不管有多么大，都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更高级的現实的組成部分，这种现实就叫做世界經濟，归根到底，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正是建立在这种經濟上的。

斯大林把民族特点說成只不过是共同类型的一种“补充”，这种說法同斯大林对資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規律的了解（也就是不了解）显然是极其矛盾的，而且这种矛盾不是偶然的。大家知道，这个規律被斯大林宣布为最根本最重要的普遍規律。斯大林借助于这个已經被他改变成一个空洞概念的发展不平衡規律，企图解决一切現存的謎。但是，令人惊异的是，他竟沒有注意到，民族特点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发展不平衡性最一般的产物，也可以說就是它的最終結果。唯一需要的是正确地理解这种不平衡性，全面地考

虑它，同时要把它扩展到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生产力較快或較慢的发展；整个历史时期扩大或者相反縮小的性质，例如，中世紀，基尔特制度，启蒙的专制政体，議會政治；不同經濟部門、不同階級、不同社会机构、不同文化領域的不平衡发展——所有这些构成这些民族“特点”的基础。一个民族社会型式的特点就是它本身的形成所具有的不平衡性的集中表现。

25 十月革命就是历史进程不平衡的最重要的表现。不断革命論对十月革命作出了預断；由此可見，这个理論所依据的是不平衡发展的規律，不过不是依据它的抽象形式，而是依据它在实质上对俄国社会和政治特点的具体化。

斯大林牵强附会地运用不平衡发展的規律，并不是为了及时地預見到一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階級能够夺取政权，而是为了事后即一九二四年擅自把建設一个民族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强加在已經取得胜利的无产階級的身上。但是，恰好是在这里，不平衡发展的規律是用不上的，因为这个規律既沒有代替也沒有废除世界經濟的規律；相反地，不平衡发展的規律是从属于世界經濟的規律的。

斯大林把不平衡发展的規律奉为偶像，說它是民族社会主义的充分根据，不过这种民族社会主义不是一切国家共同的型式，而是例外的、救世主的、純粹俄国的型式。据斯大林看来，只有俄国有可能建設一个自給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他就从这一点出发，把俄国的民族特点不仅提高到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点”之上，而且提高到整个世界經濟之上。斯大林的全部概念的致命的裂口正是从这里开始的。苏联的特点是那样强有力，以致它可以使苏联在自己的边界以內建設自己的社会主义，而不管人类的其他部分发生了什么事。至于其他国家，由于救世主沒有批准，它們的特殊点只不过是共同点的“补充”，只不过是脸上的一顆瘡子。

斯大林教导說，“把共产党的活动建立在这些特殊点上，那是不对的。”这条教訓适用于美国、英国、南非以及塞爾維亞的共产党——但是不适用于俄国共产党，因为俄国共产党的活动不是建立在“共同点”的基础上，而正是建立在“特殊点”的基础上的。从这里就产生了共产国际的彻头彻尾二元論的战略。当苏联在“消灭階級”和建設社会主义的时候，所有其他国家的无产階級却完全不顾現有的民族条件而被迫按照日历(八月一日、三月六日，等等)进行一模一样的活动。救世主的民族主义以官僚的抽象的国际主义为补充。这种二元論貫穿在共产国际的整个綱領中，使它失去了任何原則性的意义。 26

如果我們把英国和印度当作两种截然相反的资本主义类型国家，那末，我們就不得不說，英国和印度无产階級的国际主义决不是建立在同样的条件、任务和方法上，而是建立在不可分割的**相互依靠关系上**。印度解放运动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是英国展开革命运动，反过来說也是一样。無論印度或者英国，都不可能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二者都必須作为一部分加入更高的整体。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就建立在这一点上，而且只建立在这一点上。

最近，即一九三〇年三月八日，《真理报》重新解释了斯大林的不走运的理論，这家报纸說，“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經济結構”，即作为生产关系的一定形式，可以“在苏联的民族范围内”完全实现。把“**社会主义的最終胜利**”說成是保证不受资本主义包围的干涉，那就又是另一回事了——因为社会主义的这样一种最終胜利，“实际上要求无产階級革命在几个先进国家中取得胜利”。在列宁党的中央机关报上，摆出一种学識淵博的姿态来解释这样拙劣的經院哲学，要理論思想堕落到多么严重的程度才行呵！如果我們有一刹那的可能在孤立的苏联范围内实现作为一种完善的社会制

度的社会主义，那末，那就是“最終胜利”——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还談得上什么可能的干涉呢？社会主义秩序的先决条件是高度的技术、文化水平和居民的团结一致。由于苏联到完成社会主义建設的时候，可以設想，将拥有两亿到两亿五千万人口，我們不免要問：到那时候还有什么干涉可言呢？在那种情况下，哪个国家或者国家联盟还敢于妄想进行干涉呢？可以想像的干涉只有可能来自苏联方面。但是有这种必要嗎？几乎沒有。一个落后的国家用几个五年計劃的时间有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榜样对于世界資本主义将意味着一个致命的打击，将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要付出的代价减少到如果不是零的話，至少也是最低的程度。这就說明了为什么斯大林主义的全部概念实际上是导致共产国际的消灭。的确，如果社会主义的命运是由可能有的最高权威即苏联国家計劃委员会来决定的話，那末，共产国际还有什么历史意义呢？在那种情况下，共产国际的任务将是同臭名远揚的“苏联之友”一道保障社会主义建設，使它免遭干涉，也就是說，从实质上看，扮演边防哨兵的角色。

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企图用这样最新奇最新鮮的經濟論据来证明斯大林主义概念的正确性：《真理报》說，“……正是現在，一种社会主义型式的生产关系正在不仅更深地扎根于工业，而且通过国营农場的增长、通过在全盘集体化的基础上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大大开展集体农庄运动和消灭富农阶级而也更深地扎根于农业，正是現在，最清楚的一点就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失敗理論的可悲的破产，这种理論从本质上說就是‘孟什維克对十月革命的合理性的否定’（斯大林）。”（一九三〇年三月八日《真理报》）

这一段話的确值得注意，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花言巧語掩盖的是十分混乱的思想。《真理报》文章的作者同斯大林站在一起，譴責“否定十月革命的合理性”的“托洛茨基”概念。但是，本书的

作者正是在这个概念也就是在不断革命論的基础上，在十月革命发生以前十三年預告过十月革命的不可避免性。而斯大林呢？甚至在二月革命以后，也就是在十月革命以前七八个月，他摆出的还是一种庸俗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姿态。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到彼得格勒同那些自命不凡的、当时被他嘲笑为“老布尔什維克”的人們展开无情的斗争是有必要的，而斯大林小心翼翼地、不声不响地从民主主义立場滑到社会主义立場上也是必要的。斯大林的这种秘密的“长入”（順便說一句，这种“长入”从来没有完成），无论如何，不早于我证明俄国工人阶级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开始以前夺取政权的“合理性”以后十二年。 28

但是，在从理論上提出对十月革命的預断时，我一点也不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夺取了国家政权以后，就会使前沙皇帝国离开世界經濟的軌道。我們馬克思主义者知道国家政权的作用和意义。国家政权絕不像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僕从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經濟进程的消极反映。政权可以具有巨大的意义，进步的以及反动的，这一点决定于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中。但是，国家政权仍然还是上层建筑的一种工具。政权从沙皇和资产阶级的手中轉移到无产阶级的手中，既沒有废除世界經濟的进程，也沒有废除世界經濟的規律。的确，十月革命以后有一个时期，苏联和世界市場的經濟联系削弱了。但是，如果从只不过是辯证的进程的一个短暫阶段这样一种現象中作出論断，那就大錯特錯了。国际分工和現代生产力的超民族性质，对苏联來說不仅保持着它們的意义，而且还会随着苏維埃經濟上升的程度而使它們的意义增加两倍和十倍。

构成資本主义的一部分的每个落后国家，都经历过各种各样对其他資本主义国家的依賴减少或增加的阶段，但是，总的來說，資本主义发展的趋势是走向世界联系的大大加强，这一点表现在

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額上，其中当然也包括資本輸出。英国对印度的依賴同印度对英国的依賴，从性质上說自然有其不同之处。但是，这种不同从根本上說决定于它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而絕不是决定于它們在經濟上自給自足的程度。印度是一个殖民地；英国是一个宗主国。但是，如果今天英国处于經濟封鎖的情况下，那末，它会比印度处于类似的封鎖下毁灭得更快些。順便說一句，这就是世界經濟现实的令人信服的說明之一。

資本主义发展——不是根据《資本論》第二卷的那些作为一个分析阶段來說保持其全部意义的抽象公式來說，而是根据历史现实來說——是而且只能是通过有步驟地扩大自己的基础来进行的。在資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中，因而也是在資本主义同其内部矛盾进行的斗争中，每个民族資本主义都是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轉向“外部市場”的潜力，即世界經濟的潜力。从資本主义不断发生的内部危机当中产生出来的不可控制的扩张，构成一种进步力量，一直到它轉变成一种对資本主义來說是致命的力量时为止。

十月革命从旧俄国继承下来的，除了資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以外，还有同样深刻的整个資本主义同資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之間的矛盾。这些矛盾曾經拥有并且依然拥有物质的性质，也就是說，这些矛盾体現在城乡之間的物质关系中，表現在不同工业部門之間的具体比例和比例失調以及整个国民經济等等当中。这些矛盾的某些根子直接生长在国家的地理和人口条件中，也就是說，养育这些根子的是这种或那种丰富的或缺乏的民族資源，是历史形成的居民群众分布情况，等等。苏維埃經濟的力量在于生产資料的国有化以及对生产資料的計劃領導。苏維埃經濟的弱点，除了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落后以外，則在于目前的那种革命后的孤立状态，也就是說，它不仅在社会主義基础上，甚至在資本主义基础上，即在对落后国家可以起相当决定性作用的正常国际信貸和一般

“提供資金”的形式下，都沒有能力得到世界經濟的資源。在這種情況下，蘇聯在資本主義時期以及資本主義以前時期的矛盾不僅沒有消失，恰恰相反，在蘇聯從衰退和毀滅的年代中恢復過來以後又出現了；隨着蘇維埃經濟的增長，這些矛盾在恢復和加劇，要使這些矛盾得到克服或甚至減輕，就要求在每個階段能夠接近世界市場的資源。

要瞭瞭解被十月革命喚醒而進入新生活的廣大領土上目前正在發生的事情，必須清楚地考慮到，除了最近由於經濟上取得成就而重新出現的舊矛盾以外，還增加了一種新的最強有力的矛盾，這種矛盾就是蘇聯工業的集中性質和蘇聯經濟的孤立處境之間的矛盾；蘇聯工業的集中性質為空前的发展速度提供了可能性，蘇聯經濟的孤立處境則排除了正常利用世界經濟潛力的可能性。舊矛盾加上新矛盾就導致這樣一種情況，即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令人感到痛苦的困難也產生了。這些困難最直接最強烈地表現在這樣一件每個工人和每個農民天天都感覺到的事實上，即勞苦群眾的生活條件並沒有隨着經濟的普遍增長而改善，而是由於糧食困難目前正在日益惡化。蘇聯經濟的嚴重危機說明，資本主義所創造的生產力不適應於民族市場，只有在國際的規模上才能做到社會主義式的協調和一致。換句話說，蘇聯經濟的危機不僅是成長期間產生的病症，一種初期的病態，而且表明了更加有意義得多的事情——即世界市場的嚴格控制，這個市場用列寧的話來說就是，“我們從屬於它，我們同它結合在一起，我們擺脫不了它。”（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在第十一次黨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然而，不能根據上面說的話就得出結論，否定十月革命的歷史“合理性”，這是一種可恥的實利主義的結論。國際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不可能是一樁單一的、同一個時間採取的行動。政治上层建築——革命是這種“上层建築”的一部分——有它自己的辯證法，

它专横地打断世界經濟的进程，但是它并不废除这种經濟的根深柢固的規律。十月革命作为世界革命（这种革命不可避免地要經歷几十年的時間）的第一阶段是“正当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間的時間要比我們所預料的长得多。虽然如此，它仍然是一个間隔，而絕不能变成一个自給自足地建設民族社会主义社会的时期。

两种革命概念，在（苏維埃）經濟問題上产生了两条基本路綫。最初迅速取得的經濟成就是完全出乎斯大林的意料的，这些成就促使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秋天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理論，这是为孤立的民族經濟提出的实际前景的頂点。正是在这个时期，布哈林提出了他的著名公式：由于可以通过对外貿易的垄断来保护自己，使自己不受世界經濟的影响，我們能够建設社会主义，“即使是以烏龟速度”。这是中派（斯大林）和右派（布哈林）集团的共同公式。早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就无尽无休地提出一种想法：我們的工业化速度是我們“自己的事”，同世界經濟沒有任何关系。这样一种民族自給自足自然不能維持很久，因为它所反映的是經濟恢复的最初的很短暫的阶段，而經濟恢复却需要恢复我們对世界市場的依賴。国与国相互依賴所产生的最初冲击，出乎民族社会主义者的預料，产生了一种不安情緒，这种情緒到下一个阶段变成了惊慌失措。我們必須在尽可能迅速的工业化和集体化速度的帮助下尽可能迅速地取得經濟的“独立性”！——这就是民族社会主义的經濟政策在过去两年中所发生的轉变。爬行的和小手小脚的做法完全被冒险主义代替了。而两种做法的理論基础却是一样的：民族社会主义概念。

正如上面所表明的，基本困难来自客观环境，主要是来自苏联的孤立处境。我們在这里将毫不犹豫地考虑，这种客观环境本身究竟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是領導方面的主观錯誤所造成的（如一九

二三年在德国、一九二四年在保加利亚和爱沙尼亚、一九二六年在英国和波兰以及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在中國执行的錯誤政策；当前“第三个时期”^①的錯誤战略，等等，等等）。但是，苏联最剧烈的震动是这一事实造成的，即目前的领导設法装成心甘情愿的样子，他們从工人国家的政治孤立中制訂出一个經濟上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綱領。这就导致試图在資本主义以前的农具的基础上把农民土地全盘社会主义集体化——一种最危险的冒险，这种冒险有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合作的可能性遭到破坏的危险。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种情况变得极其尖锐的时候，布哈林这位昨天的“烏龟速度”理論家已經为今天的“瘋狂奔馳”的工业化和集体化創作了一首动人的贊美歌。令人担心的是，这首贊美歌不久恐怕也会被宣布为最大的异端。因为在空中已經出現了新的曲調。在經濟现实抵制的影响下，斯大林不得不退却。現在的危險是，昨天的那种由惊慌情緒所产生的冒险主义的攻势可能变成一次惊慌失措的退却。这种阶段的变来变去就是民族社会主义的性质无情地带来的結果。

如果一个孤立的工人国家为自己制訂一个现实主义的綱領，那就不可能为自己規定脱离世界經濟而“独立”的目标，尤其不可能为自己規定“在最短的时期內”建設一个民族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任务并不是要达到抽象的最高速度，而是达到最适宜的，也就是根据国内和世界的經濟条件来决定的最好的速度，这种速度可以加强无产阶级的陣地，准备未来的国际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因素，同时首先有步驟地提高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和加强无产阶级同农村非剝削群众的联盟。这种前景应当在整个准备时期都如

^① 在一九二八年八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曾討論資本主义总危机的分期問題。第三个时期指資本主义經濟和苏联經濟几乎同时开始超出各自的战前水平时期。——中譯者注

此，这就是說，一直到先进国家的革命取得胜利，把苏联从目前的孤立处境中解放出来为止。

33 这里談到的某些思想在作者的其他著作中有更詳尽的闡述，特别是在《共产国际綱領草案批判》一书中。在最近的将来，我希望出版一本小册子，专门評述苏联经济发展的現阶段。我不得不請希望更加了解今天对不断革命論的提法的讀者看看本书。但是，上面提到的种种考虑已經足以——我不揣冒昧——显示近年来就原則問題所进行的斗争的充分意义，这场斗争目前正在以两种对立的理論的形式进行着，即**一国社会主义論对不断革命論**。只有問題的这种现实意义足以說明，为什么我們在这里呈獻給外国讀者的一本书，大部分是批判地重估革命以前的預断和俄国馬克思主义者在理論方面的論战。当然，对于我們所关心的問題，本来是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方式来加以說明的。但是，目前这种方式絕不是作者創造出来的，也不是按照作者的本意选择的。这种方式之所以强加于作者，部分是由于敌对者的意志，部分則是由于政治发展的实际进程。甚至科学中最抽象的数学真理，如果同其发现史联系起来，也可以透彻地領会。这一点甚至更加有力地适用于馬克思主义政治的比較具体的即为历史所决定的真理。我想，要使讀者更加接近更加明确世界无产階級革命任务的本质，是把**在革命前的俄国条件下对革命所进行的預断的来龙去脉說清楚**，而不是脱离产生这些政治思想的斗争条件来对这些政治思想进行經院式的和夸夸其談的說明。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九日

第一章 本书的被迫性及其目的

在右派一中派集团的领导下，面对着党内对理论的需要，却是 34
連續六年的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这是唯一在数量上没有限制而可以
自由分配的产品。斯大林第一次从事理论工作是在一九二四年，当
时他写了一些不朽的文章反对不断革命论。甚至莫洛托夫也在这个洗
礼盘内作为一名“领袖”而受到了洗礼。目前伪造之风大为兴盛。几
天以前，我偶然看到列宁一九一七年的著作将用德文出版的通告。这
是給先进的德国工人阶级的一件难以估价的礼物。然而，人们预先就
可以想像得到，在正文中，尤其是在注释中，将会有多少伪造的地方
呵。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目录的首位居然让给了列宁在纽约写給
柯伦泰的一些信。为什么这样做呢？只不过是因为这些信里对我进行
了粗暴的批评，而这些批评所根据的却是柯伦泰的彻头彻尾伪造的
报道；在那些日子里，柯伦泰已经把歇斯底里的极左主义灌輸到她的
有机的孟什维主义当中。在俄文版中，不肖的門徒們不得不說明——
即使只不过是含糊不清地——列宁是偏听偏信了錯誤的报道。但是，
可以設想，在德文版中連这样含糊的保留也不会有。我們还可以补
充一点，就在列宁給柯伦泰的那些信中，布哈林遭到了猛烈的攻击，
而当时柯伦泰同布哈林是一致的。然而，信中的这个方面是暂时被
隱瞞起来了。只有到发动了公开反对布哈林的运动的时候，这个方面
才会公諸于世。我們用不着等待太久的時間就可以看到这一点。① 另
一方面， 35

① 这个預言不久就应驗了。——列·托·

列宁的若干很有价值的文件、文章和演说以及笔记、信件等等至今还隐藏起来，这只不过是因为这些东西是反对斯大林及其伙伴们的，同时危害到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神话。关于三次俄国革命的历史以及党的历史，简直没有一个地方是原封不动的：理论、事实、传统、列宁的遗产，所有这些都成了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牺牲品，这场斗争在列宁病倒以后就被作为反对托洛茨基的个人斗争而制造出来和组织起来，到后来则发展成为一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

又一次证实了这样一点，挑起早已熄灭的争论，看来可能最没有用处，却常常可以满足当时某些不自觉的社会需要，虽然这种需要本身并没有追逐旧争论的路线。反对“老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实际上就是反对十月革命传统的运动，对于新官僚来说，这种传统已经变得越来越碍手碍脚和不可忍受了。新官僚开始把他们要消灭的一切东西都说成是“托洛茨基主义”。这样，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便逐渐变成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反动在广大的非无产阶级范围内以及部分地也在无产阶级范围内的表现，变成这种反动在党内的反映。具体说来，把不断革命论同列宁的“与农民联合”路线对立起来是在一九二三年全部形成的。这种对立被丑化了，从历史上看被歪曲了。这种做法是同社会、政治以及党的反动时期一道出现的，是这一时期最生动的表现，它表明了官僚和有产者同世界革命及其“不断”动乱之间的有机的对抗，表明了小资产阶级和官吏对安宁和秩序的渴望。对不断革命论的恶毒的咒骂，到头来只不过是为一国社会主义论即民族社会主义的最新变种扫清道路。当然，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这些新的社会基础本身，并没有提供任何一点证明来肯定或否定不断革命论的正确性。然而，如果不了解这些隐蔽的基础，这场论战就必然不可避免地要具有一种无聊的学院性质。

近年来，我发觉我不能撇开新的問題而回到那些同一九〇五年革命时期分不开的老問題上去，如果这些問題只不过是主要关系到我的过去并且被人为地用来反对我的过去的話。要分析过去的意見分歧、特別是我过去所犯的錯誤——而且要分析得那样透彻以致这些爭論和錯誤将为年輕的一代所容易理解，当然更为那些在政治上曾經返老还童的老前輩所容易理解——那就需要写一大部书。在具有巨大重要性的新問題不断地提上議事日程的时候，把我自己以及別人的時間浪費在这上面，对于我来说，这似乎是一件很糟糕的事。这些新問題是：德国革命的任务，英国的未来命运問題，美洲和欧洲的相互关系問題，英国无产阶级罢工所提出的問題，中国革命的任务，最后一个也是主要的一个是，我們自己內部的經濟和社会—政治矛盾及任务——我认为，所有这些充分地說明了为什么我要把关于不断革命論的历史—論战工作繼續放在一边。但是，社会意識是厌恶真空状态的。近年来，正如我所說过的，这种理論上的真空已經被反托洛茨基主义的糟粕所填补。不肖的門徒、党的反动的哲学家和掮客墮落得越来越厉害，他們竟至于向头脑迟鈍的孟什維克馬尔丁諾夫求教，把列宁践踏在脚底下，在泥沼里拚命掙扎，而他們把所有这些統統称之为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在所有这些年代里，他們沒有从事过撰写一本认真或重要到可以讲得出口而毫无羞愧心情的著作；他們沒有提出过一个繼續有效的政治評价，沒有提出过一个得到证实的預断，沒有提出过一个曾在意識形态上推动我們前进的独立口号。沒有別的，到处都是无聊的低級的工作。

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問題》是这种思想垃圾的一部法典，是心胸狹隘的一部官方手册，是充滿陈詞濫調（我尽可能使用最适当的詞汇）的一部文集。季諾維也夫的《列宁主义》是……季諾維也夫主义的列宁主义，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季諾維也夫几乎是按

37

照路德^①的原則行事的。不过，路德說的是：“我站在这儿；我不能改变做法。”而季諾維也夫說的却是：“我站在这儿……但是我也可以改变做法。”在这两种情况下閱讀这些不肖門徒的理論产物是一样难以忍受的，不同之处在于：讀季諾維也夫的《列宁主义》的时候，有一种棉花塞在喉嚨里的感觉；而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問題》所引起的則是碰到精心切好的猪鬃的感觉。这两本书虽然各有其特点，却都是意識形态反动时期的形象和最高象征。

为了把一切問題都对准托洛茨基主义，不管是从右面还是从左面，从上面还是下面，从前面还是后面，不肖的門徒們終于設法使每桩世界事件都直接或間接地取决于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是怎样看待不断革命的。充滿伪造的托洛茨基主义神話，在一定的程度上已經成为当代历史的一个因素。近年来，右派一中派路綫由于一系列历史性的破产而在世界各大洲遭到了損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对一九〇五年初出現的旧爭論和預断加以估价，那末，今天同共产国际內的中派意識形态进行斗争是不可想像的，或者至少是很困难的。

如果不通过論战对不肖門徒的濫著作出判决，如果不把党机器的看管者^②在理論上无情地处死，那末，要在党内恢复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从而恢复列宁主义思想，那是不可想像的。写这样一本书，的确并不困难。所有的有关材料都在手边。但是，写这样一本书也并不容易，这完全是因为如果这样做，用伟大的諷刺作家薩尔蒂科夫的話來說，就必然要陷于“ABC臭气”〔即辛辛苦苦写成的廢話。——英譯者〕的境地，在相当长的時間里停留在这种几

① 指宗教改革者馬丁·路德。——中譯者注

② 这里的俄文字 *эксекутор* 是一个很难翻譯的語义双关的字，意思就是看管者。——英譯者注（*эксекутор* 一詞的原意是指旧俄官僚机构中掌握机关总务的官吏。——中譯者注）

乎沒有一点芳香的气氛中。虽然如此，这项工作已經絕對不能再拖延下去，因为在东方問題上也就是在一大半人类的問題上对机会主义路綫的維護，正是直接建筑在反对不断革命論的斗争上面的。 38

在我已經担負起同季諾維也夫和斯大林进行理論上的論战这项几乎沒有一点魔力的任务而把用来消遣的俄国古典作品抛在一边的时候（甚至潜水的人也要不时地升到水面上来吸一口新鮮空气），十分出乎我的意料的是，拉狄克写了一篇文章并且开始传播，这篇文章所論述的是不断革命論同列宁对于这个問題的看法的“更为深刻”的对立。最初我想把拉狄克的文章放在一边，以免无法对付命运給我安排的棉花和精心切好的猪鬃双管齐下的局面。但是，朋友們給我写了不少信，劝我更仔細地看看拉狄克的文章，結果我得出这样的結論：对于能够独立思考而不是唯命是听和有意識地学习馬克思主义的一小部分人來說，拉狄克的文章比官方书籍还要危險——正如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一样，伪装得越是厉害和用来掩飾它的个人声望越大，危險也就越大。拉狄克在政治上是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这一点已为最近一个时期的事态发展所充分证明。然而，最近几个月来，許多同志以不安的心情注視着拉狄克的演变，他从反对派的极左翼一变而为反对派的右翼。所有我們这些拉狄克的亲密朋友都知道，他那卓越的政治和文学天賦是同一种少有的冲动和敏感結合在一起的，这种品质在集体工作的条件下是首創性和批評精神的一种寶貴的泉源，但是在孤立的条件下却可以产生完全相反的结果。拉狄克的最新著作——这是同他过去的若干行动有联系的——引起这样一种看法，即拉狄克已經失去了指南針，或者他的指南針經常受到磁性干扰的影响。拉狄克的著作絕不是对过去的片断回顾。不，这篇著作虽然不是經過充分思考写出的，但是，由于它的全部理論上的神話，在支持官

方路綫方面却是同样有害的东西。

39 上面所說明的当前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政治职能，自然一点也不意味着，在反对派（它已經形成反对意識形态反动和政治反动的馬克思主义支柱）当中不容許进行內部批評，特別是对我过去同列宁的意見分歧进行批評。相反，这样一种自我澄清的工作只能是有成果的。在这里，無論如何，对于历史前景采取一种認真維護的态度，对于根源进行一次严肃的調查，并且根据目前的斗争來說明过去的分歧，是絕對必要的。而在拉狄克方面，所有这些連一点影子也沒有。拉狄克就好像沒有注意到自己在做什么一样，他干脆就同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亦步亦趋，不仅利用片面挑选的引語，而且利用官方对这些引語作出的完全虛假的解释。他在表面上使自己同官方运动分开，可是他这样做的时候所采取的态度是这样曖昧，以致于实际上他是以一个“重要”見证人的資格給予官方运动双倍的支持。正如在意識形态墮落的情况下所經常发生的一样，拉狄克最新的著作一点也沒有表现出他的政治头脑和文学才能。这是一篇沒有眼光沒有深度的著作，一篇只限于引证水平的著作，而正因为这一点，所以也是一篇肤浅的著作。

这篇著作是由于什么样的政治需要才产生的呢？是由于拉狄克同反对派絕大多数人在中国革命問題上发生了意見分歧。的确，我們也听到一些反对意見，說什么在中国問題上的意見分歧“今天沒有关系”了（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語）。但是，这种反对意見不值得认真地考虑。全部布尔什維主义就是在批評和吸取一九〇五年的嶄新經驗当中成长起来和定型的，而这些經驗还只是第一代布尔什維克的直接經驗。难道不是这样嗎？今天，新一代无产階級革命者如果不从新鮮的、还没有凝結的、还有血腥气的中国革命經驗当中学习，那末，还能从什么事情当中学习呢？只有毫无生气的学究才能把中国革命問題“擱置”下来，以便以后在閑暇

的时候和“宁静”的时候进行研究。这绝不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所应该做的事，因为东方国家的革命一点也没有从议事日程上取消，同时谁也不知道哪天到来。

拉狄克由于在中国革命问题上采取了一种虚伪的立场，便试图用过去的事情来为这种立场辩护，把我过去同列宁的意见分歧片面地和歪曲地加以陈述。正因为如此，所以拉狄克才不得不从别人的武库中借用武器和不用指南针而在别人的航道上航行。 40

拉狄克是我的朋友，但是我更敬爱的是真理。为了驳斥拉狄克，我不得不再一次把关于革命问题的、范围更为广泛的著述放在一边。提出来的问题太重要了，以致于不能予以忽视，同时这些问题是直截了当地提出来的。我在这里有三重困难要克服：拉狄克著作中的错误又多又复杂；二十三年来（从一九〇五到一九二八年）可以用来驳斥拉狄克的文字上和历史上的事实不胜枚举；第三，我能够用在这本书上的时间很短，因为苏联的经济问题日益居于突出的地位。

所有这些情况决定了本书的性质。本书没有把问题说透。还有许多没有谈到的——顺便说一句，部分原因是由于这是其他著作（主要是《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判》）的一个续篇。我在这个问题上所收集的大量事实材料必须保留下来，以便以后撰写我计划要写的书来反对不肖的门徒们，也就是反对反动时代的官方意识形态。

拉狄克关于不断革命的著作得出的结论如下：

“党的新派别（反对派）有发生某些倾向的危险，这些倾向将使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离开它的同盟者——农民。”

在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对于党的一个“新”派别提出这样的结论作为一种新的结论，这首先要使人惊异。从一九二三年秋天以来，我们就经常听到这种说法。但是，拉狄克是怎样为他转向官方

的主要提綱辯護的呢？又是那條老道路：他又回到不斷革命論上來。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拉狄克不止一次想寫一本小冊子來證明這種想法：不斷革命論同列寧的無產階級和農民民主專政口號，用一種歷史尺度來衡量，即根據我們三次革命的經驗來衡量，絕不能彼此對立起來，恰恰相反，二者基本上是一樣的。而現在，拉狄克在透徹地“重新”考察了問題以後——正如他寫給他的一位朋友的信中所說的——却得出了這樣的結論：過去的不斷革命論使黨的“新”派別所遭到的威脅，不多不少正是同農民破裂的危險。

但是，拉狄克是怎樣“透徹地考察”這個問題的呢？關於這一點，他向我們提供了一點情況：

“我們手頭沒有托洛茨基在一九〇四年為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寫的序言中所作的論斷，也沒有他在一九〇五年寫的《我們的革命》中所作的論斷。”

這裡所說的年份是不對的，但是，不值得為此多費筆墨。整個問題在於，我或多或少比較系統地提出我對革命發展的看法的唯一著作，是一篇內容相當廣泛的論文《總結與展望》（《我們的革命》彼得堡一九〇六年版第224—286頁）。拉狄克所提到的那篇在羅莎·盧森堡和梯什科所主辦的波蘭文機關報上刊載的論文（不幸，他竟像加米涅夫那樣地加以解釋），並沒有想寫得很全面很充分。從理論上說，這篇論文所依據的是上面提到的那本書《我們的革命》。現在誰也沒有必要去閱讀這本書。從那個時候以來已經發生了這樣一些偉大的事件，而我們從這些事件中又學到了這樣多的東西，以致說實話，我討厭不肖門徒們目前的那種對待新歷史問題的態度，他們考慮這些問題所根據的不是我們已經實現了的革命的活生生的經驗，而主要是只同我們當時對未來的革命所作的預測有關的那些引語。自然，我並不想因此而剝奪拉狄克也從歷史文獻方面考察問題的权利。不過，在那種情況下，必須做得恰如其

份。在几乎占一个世紀四分之一的時間里，拉狄克一直承担着說明不断革命論的命运的任务，而現在竟然随口說出他“手头沒有”的正是我提出这个理論的那些文件。

我要在这里指出，列宁从来沒有讀到过我那本上面提到的基本著作，这在我現在閱讀他的旧論文时看得特別清楚。这一点也許可以由这一事实來說明，即《我們的革命》在一九〇六年出版以后不久即被沒收，同时我們所有的人不久都逃亡国外，除此以外，也許还可以由这本书的三分之二篇幅是重印旧論文这一事实來說明。后来我曾听到許多同志說，他們之所以沒有閱讀这本书，是因为他們以为书中收入的全部是旧論文。無論如何，列宁对不断革命作的少数零散的評論所依据的，几乎完全是帕尔烏斯为我的小册子《一月九日以前》写的序言、帕尔烏斯的《不要沙皇！》宣言（这篇宣言一直到現在我都沒有看到）以及列宁同布哈林等人所进行的內部爭論。列宁从来沒有在任何地方分析过或者引用过《总结与展望》，甚至连偶尔提到也沒有过；而列宁对不断革命提出的某些反对意見（这些意見显然沒有提到我）也直接证明了他沒有讀过这本书。^①

42

① 一九〇九年，列宁在同馬尔托夫进行論战的一篇文章中的确引用过我的《总结与展望》。然而，不难证明，列宁所援用的引語都是間接得到的，即从馬尔托夫本人那里得到的。这是列宁針对着我而提出某些显然出于誤解的反对意見的唯一可能的解释。

一九一九年，国家出版社用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了我的《总结与展望》。在列宁全集的注释里，有一句类似这样的話：不断革命論在十月革命以后的“現在”特別值得注意，这句注释差不多也是在同一个人时候写出来的。列宁在一九一九年究竟是讀过我的《总结与展望》呢，还是仅仅翻閱了一下呢？关于这一点，我完全不能肯定。当时我经常旅行，在莫斯科逗留的时间很短，我在这个期間同列宁会晤的时候——即內战最激烈的时候——从来沒有想起过派別之間的理論問題。但是，越飞的确就在这个时候同列宁談論过不断革命論。越飞去世以前在給我的告别信中把这次談話告訴了我（見《我的生活》，紐約版第535, 537頁〔伦敦版第456, 458頁。——英譯者注〕）。越飞的說法能不能这样解释呢；即列宁在一九一九年才第一次了解《总结与展望》这本书并且承认书中

然而，如果认为这就是列宁的“列宁主义”的全部内容，那就輕率了。但是，这好像就是拉狄克的意見。无论如何，拉狄克的那篇我不得不在这里予以考察的論文，不仅說明他“手头沒有”我的基本著作，而且說明他从来沒有閱讀过它們。如果說他讀过的話，那也是很久以前，十月革命以前的事了。无论如何，留在他記憶中的东西已經很少了。

但是，事情还不是到此为止。在一九〇五年或一九〇九年，就当时人們注意的个别論文，甚至就各不相干的論文中的一句話展开論战，是容許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特別是在分裂的条件下。但是今天，一个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如果要回顾这个伟大的历史时期而不向自己提出下面一些問題，那就是不能容許的，这些問題是：那些被討論的公式是怎样运用到实践中的？它們在行动中是怎样解释的和怎样分析的？运用了些什么策略？只要拉狄克

43 的历史預断是正确的？关于这个問題，我只能作一些心理推测。这种推测是否具有令人信服的力量，决定于对所爭論的問題本身的核心如何估价。越飞說列宁肯定了我的預断的正确性，对于在列宁逝世以后的时期里那些依靠理論上的人造牛油成长起来的人來說，这种說法一定是不能理解的。另一方面，凡是仔細思考过列宁在革命本身的发展方面的思想演变情况的人都会了解，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必須也不能不对不断革命論作出新的估价，这种估价不同于他在十月革命以前的不同时期所作出的一些估价，那些估价都是根据孤立的引語、甚至連一次也沒有考察过我的整个立場而杂乱地、順便地乃至常常显然自相矛盾地提出来的。

一九一九年列宁既然要证实我的預断是正确的，就沒有必要把我的立場同他的立場对立起来。只要思考一下这两种立場的历史发展情况就够了。这里沒有必要重复列宁經常为他的“民主专政”公式提出的具体内容，这种内容与其說是从一个假設的公式中产生出来的，不如說是从分析階級关系的实际变化当中产生出来的——这种策略上和組織上的内容已經作为革命现实主义的典范永远載入史冊。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無論如何在所有最重要的場合下，只要我在策略上和組織上同列宁处于对立地位，正确总是在他那一方面。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过去的历史預断只要看来只不过是一些历史回忆，我就不想去維護它們。我觉得自己不得不回到这个問題上来，只是由于不肖的門徒們对不断革命論的批評不仅开始在整个国际中培育理論上的反动，而且已經变成直接顛覆中国革命的一种工具。——列·托·

耐心浏览一下《我们的第一次革命》那两本书（我的《全集》第二卷），他就不会那样冒昧地写出现在的这样一本书；无论如何，他会删去一系列气势汹汹的论断。至少，我是愿意这样希望他的。

从这两本书当中，拉狄克首先会了解到这样一点，即在我的政治活动中，不断革命对于我来说一点也不意味着跳过革命的民主阶段或者它的任何具体步骤。他会使自己确信，虽然整个一九〇五年我在俄国过着秘密的生活，但是我所表述的革命的各个连续阶段的任务，是同列宁完全一样的；他还会了解，一九〇五年布尔什维克中央报纸所发表的对农民的基本呼吁是由我执笔的；列宁主编的《新生活》在一篇编者按中坚决地维护了我在《开端报》上写的关于不断革命的论文；列宁的《新生活》以及有时列宁个人，都坚定地支持和维护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那些由我执笔的政治决议，同时在工人代表苏维埃，十次就有九次是由我担任报告人；十二月失败以后，我在狱中写了一本关于策略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我指出，无产阶级进攻同农民土地革命结合起来是中心的战略问题；列宁把这本小册子交给了布尔什维克的“新潮”出版社出版并通过克努尼扬茨^①告诉我，他是非常同意的；一九〇七年列宁在伦敦党代表大会上说，我对于农民和自由资产阶级的看法是同布尔什维主义“一致”的。对于拉狄克来说，所有这些都不存在；显然，这些也都不在他的“手头”。

那末，拉狄克对列宁的著作又是怎样的呢？不见得好些，或者不见得好多少。拉狄克把自己局限于那些列宁直接反对我的引语，其实那些引语往往是说别人的（例如，布哈林和拉狄克；拉狄克本人曾经公开提到过这一点）。拉狄克无法援引一句新的反对我的引语；他只不过是利用现在几乎每个苏联公民“手头”都有的现成

^① Богдан Мирзаджановичу Кнунянц, 1878—1911,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曾任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委员，拥护列宁。——中译者注

的引語材料。拉狄克仅仅增加了少数引語，这些引語是列宁向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人闡明关于資產階級共和国和社会主义之間的差別的基本真理的——而拉狄克却把事情說成好像是，这些引語也是針對着我的。簡直令人难以相信，但这是事实！

拉狄克完全迴避了过去的一些声明，在那些声明中，列宁很謹慎地很有分寸地但也格外有份量地承认，在革命的基本問題上，我同布尔什維主义是一致的。在这里，一刻也不能忘記，列宁发表这种声明的时候，我并不属于布尔什維克派，当时列宁无情地（也是十分正确地）攻击我是由于我的調和主义——不是由于不断革命論（在这一点上他只限于偶尔提出一些反对意見），而是由于我的調和主义，由于我对孟什維克向左演变抱着希望。列宁比較更为关心的是反对調和主义的斗爭，而不是孤立地在論战方面給予“調和分子”托洛茨基以打击的“正当性”。

一九二四年，斯大林在維護季諾維也夫一九一七年十月的行动而反对我的时候写道：

“托洛茨基同志不了解列宁的信（关于季諾維也夫——列·托·），不了解这些信的意义和目的。列宁在他的信中有时候故意跑在前面，把那些可能犯的錯誤提到首位，預先批評这些錯誤，目的是警告党，防止党犯錯誤。他有时候夸大‘小事情’，‘把蒼蠅說成大象’，这也是为了达到教育的目的……但是从列宁的这样一些信（他有不少这样的信）中做出关于‘悲剧性’意見分歧的結論，并且对这一点大加宣揚，这就是不了解列宁的信，不懂得列宁。”^①

这种想法在这里是表述得粗野的——“什么人什么文风”——不过这种想法的实质是正确的，即使它极少有可能运用到十月时

^①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294頁。（托洛茨基的引文有时同原著稍有出入，这里完全根据托洛茨基的引文翻譯。以下同。——中譯者注）

期的爭論上去，因为当时的爭論并不像“蒼蠅”。但是，如果列宁对自己的一派最亲密的成員都慣于采取“教育的”夸张手法和預防性的論战办法，那末，他对一个当时站在布尔什維克派以外并且宣传調和主义的人就更其是这样了。拉狄克从来沒有把这种必要的校正系数放在那些旧引語当中。

46

我在我的《一九〇五年》一书的一九二二年前言中写过这样的话，我对于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将早于在先进国家建立这种专政的可能性和或然性的預断，十二年以后已为事实所证实。拉狄克模仿一些并不很吸引人的做法，竟把事情說成好像我把这种預断同列宁的战略路綫对立起来了。然而，从那篇前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是从那些符合布尔什維主义战略路綫的基本特点的立場上提出对不断革命的預断的。一九一七年初我在一个脚注中談到“重新武装”党的时候，我的意思絕不是說列宁承认党过去走的道路是“錯誤的”，而是說列宁回到俄国（即使迟了一点，然而对革命取得成功來說还是很凑巧的）教导党抛弃那个过时的而斯大林之流、加米涅夫之流、李可夫之流、莫洛托夫之流以及其他一些人还紧抓着不放的“民主专政”口号。一提起“重新武装”，加米涅夫之流就发怒，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样做就是要反对他們。但是拉狄克呢？他在一九二八年才第一次开始发怒，也就是說，仅仅是在他自己开始反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必要的“重新武装”以后才发怒。

請让我提醒拉狄克，我的《一九〇五年》（以及那篇罪恶的前言）和《十月革命》两本书，在列宁在世的时候曾經起了这两次革命的基本历史教科书这样一种作用。在那个时候，这两本书用俄文和一些外国文字重版了无数次。从来沒有一个人告訴过我，說我的书里有两条路綫的对立，因为当时，在不肖的門徒們轉变为修正主义者以前，沒有一个思想健全的黨員把十月的經驗从属于那些

旧引語，而是相反，借助于十月革命来察看那些旧引語。

47 与此有关的，还有一点也是拉狄克胡乱利用到不可容許的程度的，那就是：拉狄克說，托洛茨基承认列宁反对他是正确的。当然，我承认过。而且，在这种承认中，沒有一点点外交辞令。我的心里牢记着列宁的整个历史道路、他的整个理論立場、他的战略、他的建党工作。然而，这种承认肯定不适用于論战中說过的任何单独一句話——論战中說过的那些話今天已經进而被濫用来实现同列宁主义敌对的目的。一九二六年，在同季諾維也夫組成集团的时期，拉狄克警告过我，說季諾維也夫需要我发表声明：宣布列宁反对我是正确的，以便多少掩飾一下他（季諾維也夫）反对我是錯誤的。自然，我很了解这一点。正因为这样，所以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會議上說，我指的是列宁和他的党的历史正确性，而不是說目前那些批評我的人是正确的，这些批評家是在竭力从列宁那里摘引一些引語来掩盖自己的。今天不幸，我不得不把这几句話扩大到拉狄克身上。

关于不断革命，我所說的仅仅是它的缺点，而只要这个理論是一个預言問題，这些缺点就是不可避免的。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會議上，布哈林正确地着重指出，托洛茨基並沒有放弃整个概念。关于这些“缺点”，我将在另外一本范围更为广泛的著作中加以說明，在那本书中我将努力提出三次革命的經驗以及这些經驗如何运用到共产国际未来的方針上去，特别是在东方。但是为了不致于引起誤会，我願意在这里扼要地說几句：不断革命論尽管有那么多个缺点，而且即使像我最早期的著作（主要是《总结与展望》〔一九〇六年〕）当中所說的那样，也还是不可估量地充滿了馬克思主义精神，因此它比目前斯大林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那种事后聪明以及拉狄克的最新著作都远为接近列宁和布尔什維克党的历史路綫。

我提出这一点絕不是要說，我的革命概念在我的所有著作中都遵循着同一条不可动搖的路綫。我没有从事于收集旧引語——現在我被迫这样做，只是由于处在党的反动和不肖門徒主义时期——但是我曾不管好坏試图分析生活的实际进程。在我的十二年（一九〇五到一九一七年）革命新聞活动中，也写过这样一些論文，其中有一些插曲性的情节，甚至論战中不可避免的插曲性的夸张，突出地违反了战略路綫。因此，例如，这样的論文是可以找到的，即我对农民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階級来說的未来革命作用表示怀疑，而由于这一点，我就拒絕把未来的俄国革命規定为“民族的”，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因为我觉得这种規定是含糊不清的。但是，在这里絕不能忘記，我們感到兴趣的历史进程，包括农民的进程，在已經完成的現在是比还在发展的时候明显得多了。让我也說明这样一点，列宁（他从来没有片刻忽視过农民問題的全部巨大历史意义，我們所有的人都从他那里学习了这一点）甚至在二月革命以后也还是认为不能肯定我們是不是能够使农民摆脱资产階級而追随无产階級。我还要很概括地向那些对我提出严酷批評的人說明这一点：在一小时内找出別人在四分之一世紀里在报纸上发表的論文当中的表面上的矛盾，要比保持自己的基本路綫一致容易得多，即使只保持一年。

在这緒論部分中还有一点完全形式主义的考虑要提一下：如果不断革命論是正确的——拉狄克說——托洛茨基就会在那个基础上組成一个巨大的派別。但是，这种情况沒有发生。因此，必然……这个理論是不正确的。

拉狄克的这个論据，作为一个一般的命題来看，没有一点辯证法的痕迹。人們可以从这个論据得出这样的結論：过去反对派对中国革命的观点或者馬克思对英国事件的立場是不正确的，現在共产国际对美国、奥地利以及——如果你願意的話——所有国家

的改良主义者所采取的立場也是不正确的。

49 如果拉狄克的論据不是从其一般的“历史—哲学”形式方面看，而只不过是作为运用到正在討論的問題上的論据，那末，这个論据所打击的正是拉狄克自己。如果我曾經认为，或者更加重要的是，如果事态发展說明，不断革命的路綫同布尔什維主义的战略路綫是矛盾的，是冲突的，而且同后者分离得越来越远，那末，这个論据还可能多少有一点意义。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根据談得上有两个派別。这正是拉狄克所要证明的。与此相反，我要表明的是，尽管在派別論爭上有种种夸张的地方和对問題作出缺乏根据的強調，基本战略路綫还是一样的。那末，从哪里来的第二个派別呢？实际的情况是，在第一次革命中我同布尔什維克是手携手地一道工作的，后来我又在国际报刊上維護这种共同工作，反击孟什維克叛徒們的批評。在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中，我同列宁是一道反对一些“老布尔什維克”的民主机会主义的，这些“老布尔什維克”今天已經被反动的浪潮高高地举起来，而他們的唯一軍备是打击不断革命論。

最后，我从来沒有努力在不断革命的思想基础上創建一个組織。我在党內的立場是一种調和主义立場，在某些时候我曾爭取建立組織，但那也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建立。我的調和主义是从一种社会革命的宿命論中产生的。我认为，階級斗争的邏輯会迫使两个派別奉行同一革命路綫。当时我还看不清楚列宁的政策伟大历史意义，他的政策是在意識形态上要不可調和地划清界限，如果必要的話也不惜分裂，以便团結和鍛炼真正革命政党的核心。一九一一年，列宁在这个問題上写道：

“調和主义就是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一九〇八——一九一一年反革命时代的历史任务的本质有密切关系的各种情緒、意图、观点的总和。因此，在这个时期，許多社会民主党员从各种非常不

同的前提出发，陷入了調和主义。托洛茨基的調和主义表现得比任何人都彻底，几乎只有他一个人曾企图給这个派別建立理論基础。”^①

由于不惜一切代价地努力爭取統一，我不自觉地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把孟什維主义中的中派傾向理想化了。尽管我进行了三次短暫的尝试，但是我沒有达到同孟什維克担起共同任务的地步，也不能达到那种地步。然而，与此同时，調和主义路綫却使我同布尔什維主义的冲突更为尖銳，因为列宁既然同孟什維克对立，就要无情地否定調和主义，也不能不这样做。显然，根据調和主义的綱領是不能創建什么派別的。

由此得出的教訓是，为了庸俗的調和主义而破坏或削弱一种政治路綫，是不能容許的和致命的；在中派主义向左搖摆的时候粉飾它，是不能容許的；在追逐中派主义鬼火的时候夸大和渲染同真正革命的具有共同思想的人的意見分歧，也是不能容許的。这些就是托洛茨基的真正錯誤的真正教訓。这些教訓非常重要。甚至到今天它們还保持着充分的效力，而应该对这些教訓加以思考的正是拉狄克。

有一次，斯大林以其特有的在意識形态方面的玩世不恭态度說：

“托洛茨基不会不知道，列宁是至死一直反对不断革命論的。但是这竟沒有使他感到不安。”（《真理报》第二六二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二日）^②

这是对现实的粗暴的和不忠实的歪曲，也就是对现实的純粹

^① 《論調和分子或好心人的新派別》，《列宁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240頁。

^② 《〈論我們党內的社会民主主义傾向〉报告的結論》，《斯大林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301頁。

斯大林主义的歪曲。列宁在给外国共产党人的一封信中解释说，共产党人之间的意见分歧是同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见分歧很不相同的。他写道，这种意见分歧，布尔什维主义在过去也有过。但是，“……在夺取政权和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刻，布尔什维主义是统一的。它把接近自己的各种优秀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第十六卷第333页）^①

51 列宁在写这一段话的时候，心中所想到的最接近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是什么呢？是马尔丁诺夫或者库西宁吗？或者是加香、台尔曼和什麦拉尔吗？在列宁看来，这些人是有些像“最接近的流派中的优秀流派”吗？还有什么别的倾向比我在一切根本问题（包括农民问题）上所表现的倾向更接近布尔什维主义呢？甚至罗莎·卢森堡最初对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土地政策也是望而却步的。然而，对我来说，这一点是根本没有疑问的。列宁在拿着铅笔起草他的土地法的时候，我是同他围着一张桌子坐在一起的。当时我们几乎只简短地交换过十几次意见，其主要内容如下：这个步骤是一个矛盾的步骤，但是从历史上看却又是一个绝对不可避免的步骤；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下，在世界革命的规模中，各种矛盾是会得到调整的——我们所需要的只是时间。如果说不断革命论和列宁的辩证法在农民问题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对抗，那末，我没有放弃关于革命发展过程的基本看法，同时又一点也没有像当时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那样在一九一七年在农民问题上蹒了跬，拉狄克如何解释这一事实呢？二月革命以后，目前这些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家和政治家——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李可夫、莫洛托夫，等等，等等——采取的都是庸俗的民主主义立场而不是无产阶级立场，拉狄克又如何解释这一事实呢？还有：列宁在

^① 《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列宁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37页。

談到布尔什維主义同与它最接近的馬克思主义流派最优秀的分子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誰呢？列宁在这种估价中对过去的意見分歧作出了确切的分析，这种估价是不是表明他根本没有看到有两种不可調和的战略路綫呢？

在这方面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一日（十四日）列宁在彼得格勒委员会會議上的演說。^①在这次會議上討論了是不是同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达成協議的問題。贊成联合的人甚至在會議上都竭力——說实在的，是非常胆怯地——对“托洛茨基主义”作了暗示。列宁是怎么回答的呢？

“达成協議嗎？我甚至不能认真地談到这一点。托洛茨基早就說过，联合是不可能的。托洛茨基了解了这一点——而从那时以来就再沒有更好的布尔什維克。” 52

在列宁看来，使我同布尔什維主义分开的不是不断革命論，而是調和主义。这样說来，要成为“最优秀的布尔什維克”，我只需要了解不可能同孟什維克达成協議就可以了。

但是，拉狄克突然之間正好轉到不断革命的問題上来，这又如何解释呢？我认为有一种解释。我們可以从他的論文中了解到，拉狄克在一九一六年是同意“不断革命”的，不过他的同意是布哈林所解释的同意，根据那种解释，資产階級革命在俄国已經完成——不仅資产階級的革命作用已經完成，甚至不仅民主专政口号的历史作用已經完成，而且資产階級革命本身也已完成——因此无产階級必須在純粹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夺取政权。拉狄克显然是以布哈林主义的态度解释我当时的立場的，否則，他就不可能在同一个时候宣称他既同布哈林一致，也同我一致。这一点也說明了为什么列宁同跟他一道工作的布哈林和拉狄克进行論战，而假借

^① 大家知道，这次历史性會議的卷帙浩繁的記錄在斯大林專門发出的命令下从文献中刪掉了，并且一直到現在还对党保守着秘密。——列·托·

反对托洛茨基的名义来反对他们(拉狄克在他的论文中也承认这一点)。我还记得,波克罗夫斯基^①(他同布哈林的思想相同,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历史方案的创建者,他非常有技巧地把这种方案粉饰成马克思主义的)在巴黎同我谈话时,在这个问题上半信半疑地表示“一致”,这一点使我感到惊讶。在政治上,波克罗夫斯基过去和现在都是反对立宪民主党人的,他老实地认为这种立场就算是布尔什维主义。

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拉狄克在意识形态方面显然还是依靠一九一六年的布哈林主义立场过日子,他依然认为这种立场也就是我的立场。拉狄克在飞快地研究了列宁的著作以后,正确地抛弃了这种毫无希望的立场,而正如在这种情况下所常发生的一样,他在我的头顶上画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弧。这是十分可能的,因为这是典型的做法。这样一来,布哈林(他在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五年把自己整个颠倒过来,即从一个极左分子一变而为一个机会主义分子)也就经常把他自己过去的思想归罪于我,并把这种思想说成是“托洛茨基主义”。在反对我的运动的第一个时期,我还不时地强迫自己阅读布哈林的论文,当时我常常问自己:他是从哪
53 里弄到这个的?——但是很快我就猜到,他是看了他过去的日记。而现在我怀疑,拉狄克从不断革命论的保罗转变为这种理论的扫罗^②,是不是也是这样一种心理基础。我不愿坚持这种假想。但是我也找不到别的解释。

① 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кровский, 1868—1932, 苏联历史学家和社会政治活动家,一九〇五年加入联共(布)党。一九一八至一九三二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中译者注

② 据《新约全书》,保罗原名扫罗,本来是一贵族,性残暴,反对基督徒。后来耶稣显灵,感召了他,变成耶稣最积极的使徒之一。扫罗传道后,改名保罗。在这里保罗指卫道者,扫罗指毁道者。见《新约全书》《使徒行传》。——中译者注

無論如何，正如法國諺語所說的：酒已經倒出來，非喝不可了。我們是被迫深入舊引語的領域的。我尽可能地減少引語的數目。但還是有很多。那末就以這樣一點作為我的理由吧，即在被迫從這些舊引語中進行挑選的時候，我將自始至終竭力找出同當前迫在眉睫的問題有聯繫的線索。

第二章 不斷革命不是無產階級進行一次“跳躍”，而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民族改造

拉狄克寫道：

54

“被稱為‘不斷革命’的理論和策略（注意：也有策略。——列·托·）的思想體系，區別於列寧理論的基本特點在於把資產階級革命階段同社會主義革命階段混在一起了。”

同這條基本罪狀有聯繫的，或者由此產生的，還有其他一些嚴重性一點也不小的罪狀：托洛茨基不了解“在俄國的條件下，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不從民主革命當中產生出來”；因而得出結論要“跳過民主專政階段”。托洛茨基“否認”農民的作用，而這正是“托洛茨基和孟什維克的觀點的共同性”所在。正如已經說過的，所有這些都是要用間接證據來證明我在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上的立場是不正確的。

說實在的，從表面的文字來說，拉狄克是到處都可以引用列寧的話的。他可以做到這一點；每個人“手頭”都有這一部分引語。但是，正如我就要在下面說明的，列寧的這些同我有關的爭論具有一種插曲的性質，是不正確的，也就是說，這些爭論根本沒有說明我的真正立場是什麼，甚至包括我在一九〇五年的立場。在列寧本人的著作中，關於我對革命基本問題的態度，有十分不同的、直接

55

相反的和有根据得多的評論。拉狄克甚至沒有試圖把列宁各种各样的和直接矛盾的評論統一起来，通过把这些評論同我的实际观点作一比較而闡明这些論战中的矛盾。^①

一九〇六年，列宁出版了考茨基論俄国革命动力的一篇論文，并为它写了序言。我在獄中一点不知道这件事，也翻譯了考茨基的这篇論文，同时也写了一篇序言，把它收在我的《保卫党》一书中。列宁和我都对考茨基的分析表示完全同意。普列汉諾夫提出的問題是：我們的革命是資產階級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考茨基的回答是：我們的革命不再是資產階級的了，但也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这就是說，它代表从資產階級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形式。关于这一点，列宁在序言中写道：

“就一般性质說来，我国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呢，还是社会主义革命？考茨基說，这是老一套的說法。不能这样提問題，这是非馬克思主义的。俄国革命不是資產階級革命，因为資產階級不是俄国目前革命运动的动力。俄国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②

但是，在列宁写这篇序言前后所发表的文章中，我們也可以找到不少段落，他都明确地把俄国革命称为資產階級革命。这是不是矛盾呢？如果用目前批評“托洛茨基主义”的那些人們的方法来对待列宁，那末，这样的矛盾可以毫不困难地找出几十个几百个，而在严肃的和正直的讀者看来，这些矛盾只不过說明了对不同时期的問題采取不同的态度，一点也沒有破坏列宁概念的根本統一性。

① 我記得，当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會議上引用这些同样的引語时，我对他大声說：“但是列宁的言論里也有直接相反的話。”布哈林有一刹那很窘，然后他反駁說：“我知道，我知道，不过我引用的是我所需要的，而不是你所需要的。”这就是这位理論家的心理状态！——列·托·

② 《卡·考茨基〈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一书的俄譯本序言》，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列宁全集》第十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 395 頁。

另一方面，从革命的当前历史任务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从来没有否认过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只是从革命的动力和前途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才否认那种性质。那个时候（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我论述不断革命的基本著作是以下面的话开始的：

“俄国革命对于社会民主党人以外的任何人来说，都是出乎意外的。马克思主义早就预言了俄国革命的不可避免性，这一革命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力量同保守的专制制度力量之间的冲突而必然爆发……马克思主义在称这次革命为**资产阶级**革命时，曾经指出：革命的**直接客观**任务是为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创造‘正常的’条件。马克思主义原来是正确的，这一点现在已经用不着讨论或者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者目前所面临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任务：通过对发展中的革命的**内部结构**的分析去发现推进革命的‘可能性’……俄国革命具有极其特殊的性质，这种性质是我国整个社会和历史发展的特点的总结，它反过来揭示了崭新的历史展望。”（《我们的革命》，一九〇六年，《总结与展望》一文，第224页）^①

“一般社会学的定义——**资产阶级**革命——决不能解决某一**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政治策略任务、矛盾和困难。”（同上，第249页）^②

由此可见，我并没有否认当时已经列在议事日程上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我也没有把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混淆起来。但是我努力表明，在我们的国家里，**资产阶级**革命的**阶级辩证法**将会使**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连民主任务也不能解决。

在同一篇论文（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中，我写道：

“**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成长和日益壮大。在这个

① 见本书第8页。

② 见本书第34页。

57 意义上，資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是无产階級向专政的发展。但是，政权轉到工人階級手中的时日，并不直接决定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而是决定于階級斗争中的关系，决定于国际形势，最后还决定于許多主观因素，如传统、首創精神和战斗的准备。

“經濟比較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階級，有可能比发展得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階級更早地取得政权……认为无产階級专政在某种程度上机械地依赖于一个国家的技术力量和资源，是一种簡化到极点的‘經濟’唯物主义的成見。这种观点同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根据我們的看法，俄国革命将創造出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之下，政权有可能（在革命胜利时应该）在資产階級自由主义的政客們有机会充分施展其政治天才之前轉到无产階級手中。”（同上，第245頁）^①

这几段話包含着同庸俗的“馬克思主义”进行的一次論战，这种“馬克思主义”不仅流行于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而且規定了列宁回国以前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举行的布尔什維克會議的調子，并且在李可夫在四月會議上发表的演說中得到了最彻底的表現。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这种假馬克思主义，即被經院哲学所败坏了的实利主义的“常識”，构成庫西宁以及其他許許多多人的演說的“科学”基础。这种情况居然发生在十月革命以后十年！

由于我不能在这里陈述《总结与展望》的整个思想体系，我将再从我在《开端报》（一九〇五年）发表的論文中摘引一段概括的話：

“我們的自由資产階級甚至在革命达到最高潮以前就以反革

^① 見本书第31頁。

命力量出現了。在每次严酷的时刻，我們知識界的民主分子都只表現了无能。农民整个來說是一种反叛的自发力量，——只有一种把国家政权掌握在手中的力量才能使农民为革命服务。……工人階級在革命斗争中的先鋒地位，它同革命农村之間直接建立的联系，以及它借以使军队服从自己的那种吸引力——所有这些都必然推动工人階級去取得政权。革命的彻底胜利意味着无产階級的胜利。而这一点又意味着革命的进一步的不間断的性质。”（《我們的革命》，第 172—173 頁）

58

因此，无产階級专政的前途在这里正是从資产階級民主革命当中发展出来的——这一点同拉狄克所写的全部东西正好相反。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把革命称为不断的（不間断的）革命。但是，无产階級专政并不是像拉狄克所认为的那样在民主革命完成以后才到来。如果是像他所說的那样，那在俄国簡直就不可能，因为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如果农民的任务在前一个阶段已經解决了的話，数量很少的无产階級就不可能取得政权。不，无产階級专政有可能甚至不可避免地在資产階級革命的基础上出現，正是因为沒有别的政权和別的方法能够解决土地革命的任务。但是，正是这一点开辟了民主革命长入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

“无产階級的代表不是作为无权的人质，而是作为领导力量参加政府这一事实，将消除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之間的界限，这就是說，它将把集体主义提到日程上来。无产階級在朝这个方向前进中究竟該在什么地方停下来，这取决于力量的对比，而决不取决于无产階級政党原来的意图。

“因此，根本談不上什么資产階級革命中无产階級专政特殊形式，即无产階級民主专政（或无产階級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工人階級不可能在保持其专政的民主性质的同时又不越出其民主綱領的界限……

59 “无产階級一旦取得政权，就要为政权斗争到底。在維持和巩固自己政权的这个斗争中的武器之一，是鼓动和组织工作，尤其是在农村中，另一武器是集体主义政策。集体主义不仅将成为从执政党地位继续前进的必然的道路，而且也将成为在无产階級支持下保持这个地位的一种手段。”（《总结与展望》，第 258 页）^①

請讓我們进一步看下去：

“我知道一次革命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在一九〇八年反对孟什維克切列瓦宁时这样写道），在这次革命中，资本主义资产階級統治的条件是胜利的无套褲汉^②的恐怖专政所准备的。这是一个大多数城市居民由手工业者和商人类型的小资产階級組成的时期。結果带来了雅各宾党人的领导。俄国的大多数城市居民今天是由产业无产階級組成的。仅仅这种对比就指出了这样一种历史局势的可能性，在这种局势中，‘资产階級’革命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只有通过无产階級取得革命政权才会得到证明。那末革命是不是因此就不再是资产階級革命了呢？也是，也不是。这一点并不决定于形式上的定名，而决定于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无产階級被各种资产階級的联合力量（其中也包括被无产階級解放了的农民）所推翻，那末，革命就会保持它的有限的资产階級性质。然而，如果无产階級证明有能力并且认为有可能使它的全部政治統治工具开动起来以便突破俄国革命的民族界限，那末，俄国革命就可以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大变动的序幕。俄国革命将达到什么阶段呢？这个问题自然只容許一种有条件的回答。只有一件事是绝对地无疑地正确的，那就是：把俄国革命的特点只說成是资产階級的这样一点，并没有向我们說明它的内部发展型式，同时也不意味着，无

^① 見本书第 44 页。

^② 无套褲汉(Sans-Culottes)，是十八世紀法国资产階級革命时期反革命貴族对广大革命群众的蔑称。——中譯者注

产阶级作为国家政权的唯一合法要求者，必须使自己的策略适应资产阶级民主的行为。”（列·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第 263 页）

同一篇论文中还說：

“我们的革命是一种同产生它的那些直接任务有关的资产阶级革命，由于工业人口的极端阶级分化，这种革命认为资产阶级不能通过把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经验同人民群众的革命能力结合起来而使自己居于人民群众的前列。被压迫的工人和农民群众必须运用自己的力量担负起责任来，在难以和解的冲突和残酷的失败的严酷锻炼中为自己的胜利创造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必要前提。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没有别的道路。”（列·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第 267—268 页）

60

必须再引用几段《总结与展望》中的话，这几段话是关于受到最猛烈的攻击的一点即农民问题的。在专门论述“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一章中，有下面几段话：

“无产阶级不扩大革命的基础，就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许多劳动群众阶层，尤其是农村中的劳动群众，只有在革命先锋队——城市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才能第一次被吸收到革命中来，并在政治上组织起来。革命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将靠国家财力来进行。最后，立法权本身将成为使人民群众革命化的强大工具……

“农民——甚至是作为一个阶层的全体农民——最基本的革命利益的命运，同整个革命的命运，即同无产阶级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

“执政的无产阶级将作为解放农民的阶级出现在农民面前。无产阶级的统治不仅意味着民主平等，自由自治，整个赋税负担转移到富裕阶级身上，常备军改为民兵，取消强制性的教会捐，而且还意味着承认农民在土地关系方面所进行的一切革命变革（没收土地）。无产阶级将使这些变革成为国家在农业方面采取进一步措

61 施的开端。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农民在革命初期最困难时期对于维护无产阶级政权（“工人民主”）的兴趣，无论如何不亚于法国农民对于维护拿破仑·波拿巴军事政府的兴趣（拿破仑政府曾以刺刀的力量向新的有产者保证他们的土地的不可侵犯……

“但是，农民是否有可能把无产阶级推开并取而代之呢？

这是不可能的。一切历史经验都驳斥这种假定。历史经验表明，农民绝对不可能起独立的政治作用。”（第 251 页）^①

所有这些都不是一九二九年写的，也不是一九二四年写的，而是一九〇五年写的。我很想知道，这些话像是“忽视农民”吗？在这里哪儿说“跳过”土地问题呢？朋友们，这不是应当多少更加谨慎一些的时候吗？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是多么“谨慎”的。我在纽约写的关于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的论文在一切主要问题上同列宁在日内瓦写的论文都是一致的，而这位党的反动理论家在提到我那些论文时却写道：

“……托洛茨基的信无论在精神上或在结论上‘完全不像’列宁的信，因为托洛茨基的信完全反映着托洛茨基的‘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这个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鼓吹不要农民参加革命。”（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说）^②

在“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这个（硬说是托洛茨基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口号”方面所说的这些话，听起来是令人惊异的。按照斯大林的意見，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应当是这样：“不要工人政府，而要沙皇”。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这个硬说是托洛茨基的“口号”。

^① 见本书第 38 页。

^②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 290 页。

这里首先让我们听一听另外一个冒充的当代思想大师是怎么说的，这位大师也许没有那末愚昧，不过他已經同任何理論上的謹慎永远告別了——我說的是卢那卡爾斯基，他說：

“一九〇五年，列夫·达維多維奇·托洛茨基傾向于这种想法：无产階級必須保持孤立(1)，并且必須不要支持資產階級，因为那样就会是机会主义；然而，只靠无产階級是很难完成革命的，62因为当时无产階級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八，人数这样少，不能贏得胜利。因此，列夫·达維多維奇决定，无产階級在俄国必須保持不断革命，即为可能取得的最大成果而斗争，一直到这場大火的火花使整个世界火药庫爆炸为止。”(《苏維埃政权》，一九二七年第七期，卢那卡爾斯基：《論十月革命的特点》，第10頁)

无产階級“必須保持孤立”，一直到火花使火药庫爆炸为止……許多人民委員写得多么好，他們当时还没有“孤立”，尽管他們自己的小脑袋^①已經处于危险的境地。但是，我們不願让卢那卡爾斯基感到过分为难；每个人只能各尽所能。归根到底，他那看来胡里胡塗的荒謬并不比其他許多人的荒謬更沒有意义。

但是，按照托洛茨基的意見，究竟如何使“无产階級必須保持孤立”呢？让我们引用一段我为反对司徒卢威^②而写的一本小册子(一九〇六年)里的話。順便提一笔，当时卢那卡爾斯基曾經過分贊誉这本小册子。在关于工人代表苏維埃的一章中，我說，在資產階級政党离开正在觉醒的群众而“完全站在旁边”的时候，“政治生活便集中在工人苏維埃周围。小資產階級城市群众对苏維埃的态度(在一九〇五年)很明显是同情的，即使不是很有意識的。所

① 在上段譯作“火花”的俄文字，也可作“小脑袋”解释。——英譯者注

② Петр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Струве, 1870—1944,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合法馬克思主义者。一九〇五年革命后成为自由派右翼领导人，十月革命后在邓尼金和弗兰格尔政府中任部长。——中譯者注

有被压迫的和受損害的都寻求苏維埃的保护。苏維埃那种深得人心的威望远扩展到城市的范围以外。它收到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农民送来的‘請願书’，农民的決議源源不断地送交苏維埃，村鎮的代表团紛紛到苏維埃来。在这里，正是在这里集中了民族的注意和同情，集中了真正的而不是虛假的各个民主的民族的注意和同情。”（《我們的革命》，第 199 頁）

63 在所有这些引語中——这种引語的数目可以輕而易举地增加到两倍、三倍乃至十倍——不断革命都被描述为这样一种革命，它把城市和乡村被压迫的群众团結在已經組織在苏維埃中的无产階級的周围，它使无产階級取得政权从而为民主革命长入社会主义革命提供可能性。

不断革命不是无产階級孤立地来一次跳跃，而是整个民族在无产階級的領導之下进行改造。这就是从一九〇五年起我所想像的和所說明的不断革命的前景。

拉狄克重复一套陈辞濫調，說帕尔烏斯^①的看法是从沙皇政府“跳跃”到社会民主政府，他对帕尔烏斯的这种說法也是錯誤的。帕尔烏斯在一九〇五年对俄国革命的看法是同我的看法很接近的，但并不完全一样。拉狄克在他的論文的一部分，十分正确地順便指出了我同帕尔烏斯在对革命的看法上的真正不同之处，这实际上就是駁斥他自己。帕尔烏斯并没有这样的看法：在俄国，一个工人政府可以朝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发展，即并不认为工人政府在实现民主任务的过程中可以长入社会主义专政。正如拉狄克自己所引用的一九〇五年引語所证明的，帕尔烏斯把工人政府的任务只限于民主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哪里有什么向社会主义跳跃呢？甚至在当时，帕尔烏斯心中所想的就是按照“澳大利亚

① 应当記得，当时帕尔烏斯是站在国际馬克思主义的极左翼的。——列·托·

的”型式建立一个工人政权，作为革命的结果。十月革命以后，帕尔烏斯还把俄国和澳大利亚并列起来，当时他早已站到社会改良主义的极右翼方面了。关于这一点，布哈林断言，帕尔烏斯是在事后才“想出”澳大利亚的，以便掩盖他过去在不断革命方面所抱的目的。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一九〇五年，帕尔烏斯就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所出现的是走向民主的道路，而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说，他给无产阶级所规定的只是十月革命以后的头八个月到十个月中它在俄国实际上所扮演的那个角色。更确切地说，帕尔烏斯甚至在当时就指向了当时的澳大利亚式民主，也就是说，指向了这样一种政制，即工人政党在其中的确是在进行管理而不是在进行统治，它实现它的改良主义要求只是作为资产阶级纲领的一种补充。在命运作弄之下，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八年的右派一中派集团的基本倾向正好就是使无产阶级专政接近澳大利亚式的工人民主，也就是接近帕尔烏斯的预断。二三十年前的俄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在俄国报刊上不断地把澳大利亚描述成一个工农国家，它用高筑关税壁垒的办法同外部世界隔绝，发展“社会主义”立法，并且用这样的方法在一个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如果回想到这一点，上面所说的就更清楚了。如果拉狄克把问题的这个方面提出来，而不是去重复那些关于我的想入非非的跳过民主的神话，那他就做对了。

64

第三章 “民主专政”的三个要素： 阶级、任务和政治结构

“不断”观点和列宁主义观点之间的分歧本身，在政治上表现为依靠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口号同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口号的对立。争论并不在于资产阶级民主阶段是否可以跳过和工农联

65

盟是否必要——而在于无产階級和农民在民主革命中合作的**政治结构**。

拉狄克的論点太狂妄了，更不用說是輕率的了。他說，只有“沒有想透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复杂方法”的人才有可能提出民主专政的**政党—政治表現**的問題，而列宁据說把整个問題降低为两个階級在客观历史任务中合作的問題。不，不是这样。

66 如果我們在这个問題中撇开革命的主观因素：政党及其綱領——无产階級和农民合作的**政治和組織形式**——那末，所有的意見分歧都会消失，不仅是列宁和我之間的标志着同一革命派的两种意見的分歧，而且更糟的是，布尔什維主义和孟什維主义之間的意見分歧，最后，还有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和一八四八年革命、甚至一七八九年革命之間的分歧，如果无产階級能够談得上同后者有关系的話。所有的資產階級革命都是以城市和乡村被压迫群众的合作为基础。正是这一点使革命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具有一种民族性质，即全民性质。

我們在政治上以及理論上所爭論的，并不是工人和农民的合作本身，而是这种合作的綱領以及合作后党的形式和政治方法。在过去的革命中，工人和农民是在自由資產階級或者它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领导下“合作”的。共产国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然重复过去革命的經驗，竭尽全力使中国的工人和农民服从民族自由派蒋介石的政治領導，后来則是服从“民主派”汪精卫的政治領導。列宁提出了同自由資產階級不可調和地对立的工农联盟問題。这种联盟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就其方法來說，这是城乡被压迫階級进行合作的一种新的实验。因此，合作的政治形式問題重新提出来。而拉狄克簡直忽略了这一点。这就說明了为什么他不仅使我們从不断革命的公式向后轉，而且使我們从列宁的“民主专政”向后轉——而回到一种空虛的历史抽象概念

当中。

的确，列宁若干年来是拒絕**事先断定**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政党—政治和国家組織采取什么形式这样一个問題的，他首先提出用这两个階級的合作来反对同自由资产階級的联合。列宁說：在某一历史阶段，从整个客观形势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工人階級和农民的革命联盟，以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农民能够建立一个独立政党并且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嗎？这个政党在专政政府中是占多数呢，还是占少数呢？无产階級的代表在革命政府中所占的具体比重有多大呢？这些問題没有一个能够得到**必然的答案**。“經驗将会表明！”只要民主专政的公式沒有完全明确工农联盟的政治結構問題，那末，它在一定的程度上——絕不是轉变成拉狄克的那种貧乏的抽象概念——依然是一个代数公式，它容許将来作出极其不同的政治解释。

此外，列宁本人絕沒有这样的意思，即問題会为专政的階級基础及其客观历史目的完全解决。主观因素——目的、有意識的方法、党——的意义，列宁知道得很清楚，并且把这一点教导了我們所有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列宁在对他的口号所作的注释中，对于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工农联盟可能采取的政治形式問題，並沒有拒絕作出大体上的和假定的預断。然而，列宁在不同的时期对待这个問題的态度远远不是一样的。列宁的思想絕不能教条地而必須历史地去理解。列宁並沒有从西奈山^①带来完善的戒律，而是找出一些适合现实思想和口号，使这些思想和口号具体并且准确，同时在不同的时期給予它們不同的內容。但是，問題的**这个方面**（它后来具有了决定的性质，并且在一九一七年初把布尔什維克党带到了分裂的边緣）拉狄克根本沒有研究过。他干脆不理睬这

^① 据《旧約全书》記載，耶和華曾在西奈山頂向摩西传十誡。見《旧約全书》《出埃及記》第十九、二十章。——中譯者注

个方面。

然而，事实上，列宁在说明两个阶级联盟可能拥有的政党一政治表现和政府形式时并不总是一样的，以免党为这些假定的说明所束缚。这样谨慎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在于这个代数公式包含着一个在重要性上很大而在政治上却极不明确的数量：农民。

我只想引用列宁说明民主专政的几个例子，因为全面说明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演变需要单独写一本书。

68 一九〇五年三月，列宁发展了无产阶级和农民将成为专政的基础这一思想，他写道：

“我们所希望的和可能的这种革命民主专政的社会基础的成分，自然要反映到革命政府的成分上，使革命民主派中形形色色的代表必然要参加这个政府，或者甚至在这个政府中占优势。”（黑体是我标的。——列·托·）^①

在这几句话中，列宁不仅说明了专政的阶级基础，而且扼要地说明了专政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可能占优势的情况下的具体政府形式。

一九〇七年列宁写道：

“先生们，你们说的‘农民土地革命’，要想获得胜利，就应该成为全国范围的中央政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农民革命。”^②

这个公式甚至走得还要远些。它可以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即革命政权必须直接地集中在农民手中。这个公式用事态发展过程本身对它所作的更为深远的解释来说，还包括使无产阶级作为农民革命的“代理人”而取得政权的十月革命。这就是无产阶级和

^① 《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列宁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261页。

^② 《社会民主党在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310页。

农民民主专政公式可能作出的最充分的解释。我们可以这样假定，在一定的程度上，这个公式的强有力的方面就在于这种代数的性质，但是它的危险性也正在于此，这一点在二月以后在我们中间很生动地显露出来，而在中国则导致灾难。

一九〇五年七月，列宁写道：

“没有人说党夺取政权——我们说的只是参加革命，尽可能以领导的地位参加革命……”（第六卷，第278页）^① 69

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列宁认为，关于由党夺取政权的问题，可以同意考茨基的意见，他说：

“考茨基不仅认为‘在革命进程中社会民主党取得胜利’‘是非常可能的’，而且他还表示社会民主党人有责任‘使自己的支持者具有胜利信心，如果在斗争以前就抛弃胜利的信念，斗争是不可能成功的’。”^②

列宁自己所作的这两种解释之间的距离，并不小于列宁同我的公式之间的距离。我们在后面甚至还要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这里，我们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列宁的这些矛盾意味着什么呢？这些矛盾所反映的是革命政治公式中同一个“巨大的未知数”：农民。激进的思想家有时把农民当作俄国历史的斯芬克司^③，并不是毫无理由的。关于革命专政性质的问题——不管拉狄克愿意不愿意——是同敌视自由资产阶级而又不依靠无产阶级的革命农民政党是否有可能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后一问题

① 托洛茨基这里引的是列宁没有定稿的一篇文章《巴黎公社和民主专政的任务》，此文在《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九卷中只收入了列宁后来增写的结尾部分。——中译者注

② 《无产阶级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同盟者》，《列宁全集》第十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356页。

③ 斯芬克司是希腊神话中的女面狮身怪物，常出谜给过路行人，如不能解谜，则被杀死。——中译者注

的决定性意义是不难掌握的。如果农民能够在民主革命时期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那末,民主专政就可以在最真实最直接的意义上实现,而无产阶级少数参加革命政府的问题就会具有一种的确重要然而却是从属性的意义。农民由于其中間地位和社会成分的复杂性,既不可能有一个独立的政策,也不可能有一个独立的政党,而是在革命时期不得不在资产阶级政策和无产阶级政策之間进行选择,如果我们从这一事实出发,那末,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只有这样估价农民的政治性质,才有可能直接从民主革命当中出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在这一点上,自然并没有“否认”、“忽视”或者“低估”农民。如果土地问题对整个社会生活没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农民革命不是具有巨大的深度和广度,那末,在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甚至根本无从谈起。但是,土地革命为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条件这一事实,是由于农民没有能力用自己的力量和在自己的领导下解决自己的历史性问题才产生的。在资产阶级国家甚至落后国家的目前条件下,只要它们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工业时期并且被铁路和电报联结成一个整体——这一点不仅适用于俄国,也适用于中国和印度——农民充当一个领导的政治角色或者甚至只是一个独立的政治角色的能力,就比在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还要小些。我坚持不渝地强调这种想法(这种想法是不断革命论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这一事实,也成了谴责我低估农民的一种十分不充分的和实质上根本没有根据的借口。

列宁对农民政党问题的看法是怎样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广泛地回顾列宁在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七年时期对俄国革命的看法的演变。我在这里将只限于提出两段引语:

一九〇七年,列宁写道:

“也许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团结还有客观困难,使这样的政党不能成立,并使农民的民主派在长期中依然象现在那样只是一种

脆弱的、不定形的、軟弱的劳动派^①群众。”^②

一九〇九年，列宁对于同一个题目提出了不同的說法：

“……毫无疑問……革命……达到高度发展，实现了革命专政 71 的时候，就一定会使更定形的和更强大的革命农民政党产生。誰不是这样地看問題，他就是认为在一个成年人的身上，某些重要器官的大小、形态和发育程度仍然会象儿童时期的一样。”^③

这种假定得到证实了嗎？沒有，沒有得到证实。而正是这一点，促使列宁在历史完全证实的时刻到来以前对革命政府問題作出一种代数学的回答。自然，列宁从来沒有把他的假設公式置于现实之上。为建立无产阶级的独立政党而斗争是他的生活中的主要内容。然而，可悲的不肖門徒們追逐农民党的結果却是，使中国工人从属于国民党，在印度以“工农党”的名义絞杀了共产主义，危险地假造农民国际，伪装反帝联盟，等等。

目前盛行的官方思想并沒有努力詳述上面引证的列宁的矛盾，这些矛盾部分是外形上的和表面上的，部分却是真实的，但它們总都是从問題本身产生出来的。現在，我們当中涌现了一批特殊类型的“紅色”教授，他們同过去的反动教授不同之处，往往不在于脊骨更硬些，而只不过是更加无知，他們用学者的态度修剪和清洗了列宁的一切矛盾，即修剪和清洗了列宁思想的动力；标准的引語用不同的綫串起来，然后按照“当前”的需要使这一“串”或那一“串”引語流通。

一刹那也不能忘記，在政治上还是“处女”的国家里，在巨大的历史間隙以后，在欧洲和全世界經過漫长的反动时期以后，革命的

① 劳动派是农民在四届杜馬中的代表，他們經常搖摆在立宪民主党人（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間。——列·托·

② 《革命和反革命》，《列宁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104頁。

③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列宁全集》第十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347頁。

72 問題变得尖銳起来，同时仅仅由于这个原因而使革命的問題有了許多未知数。列宁通过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表达了俄国社会条件的特殊性。他对这个公式作过不同的解释，但是在彻底調查清楚俄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以前，他并没有放弃这个公式。那末，这种特殊性究竟何在呢？

土地問題和一般农民問題——作为所有其他問題的基础或者基础的基础——的巨大作用，农民知識分子以及对农民及其民粹派意識形态、“反帝”传统和革命鍛炼表示同情的人的巨大数量——所有这些整个來說意味着，如果一个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的农民政党毕竟在什么地方有可能建立的話，那末，正是并且首先是在俄国有这种可能。

事实上，在努力建立一个有别于自由派政党或无产阶级政党的农民党或者工农党的过程中，各种可能的政治形式在俄国都尝试过了，非法的、議会的以及二者結合起来的，如土地与自由社、民意党、重分黑土党、合法民粹派、“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劳动派”、“左翼社会革命党”，等等，等等。有半个世紀的时间，我們好像在进行一次巨大的实验，来建立一个对无产阶级政党來說拥有独立地位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农民党。大家知道，社会革命党的实验达到了最大的規模，它在一九一七年的一个时期实际上成为絕大多数农民的政党。但是，結果怎么样呢？这个政党利用它的地位只是把农民完全叛卖給了自由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人同协約国的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同他們一道进行了反对俄国无产阶级武装斗争。

这个真正典型的实验表明，在議程上是一些次要問題的平靜的历史时期，以农民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政党还能够保持一种执行独立政策的姿态，但是在社会革命危机把所有制的根本問題提上議事日程的时候，小资产阶级“农民”党就会自动地变成资产阶

級手中用来反对无产階級的一种工具。

如果分析过去我同列宁的意見分歧，不是不管哪年哪月哪日的話一律引用，而是考虑到正确的历史前景，那末，十分清楚，爭論——至少在我这方面——并不在于是否需要无产階級和农民联盟来解决民主任务，而在于无产階級和农民的革命合作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政党—政治和国家形式，以及它可以产生什么样的結果来使革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当然，我說的是我在这次爭論中的立場，而不是当时布哈林和拉狄克的立場，他們的立場必須由他們自己来回答。

“不断革命”的公式究竟同列宁的公式多么接近，可以用下面的对比作一生动的說明。一九〇五年夏天，也就是十月总罢工以前和莫斯科十二月暴动以前，我在为拉薩尔的一篇演說写的序言中写道：

“不言而喻，无产階級正像資产階級在它的时代一样，也是在农民和城市小資产階級的支持下实现它的使命的。无产階級領導农村，引导它参加运动，并使它对实现自己的計劃感到兴趣。然而，无产階級必須是領袖。这不是‘农民和无产階級专政’，而是**依靠农民支持的无产階級专政。**”^①（列·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第281頁）

現在可以把我在一九〇五年写的而后来在一九〇九年我在波兰文报纸上发表的一篇論文中又引用过的这些話和下面列宁的話比較一下。列宁的这一番話也是在一九〇九年写的，正好是在党代表會議在罗莎·卢森堡的压力之下采納了“依靠农民支持的无产階級专政”公式以代替旧的布尔什維克公式以后。孟什維克說

^① 这段引語同成百段的其他引語一样也順便表明，我暗示到农民的存在和土地問題的重要性，远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前，也就是說，在馬斯洛夫、塔尔海默、台尔曼、雷梅果、加香、蒙穆索、貝拉·庫恩、佩珀、庫西宁以及其他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向我說明农民的重要意义以前一个时期。——列·托·

列宁的立場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列宁对他們的答复是：

74 “……布尔什維克在这里給自己选择的公式是說明：‘无产階級領導农民。’”^①

“……所有这些說法的意思都是一样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嗎？难道这种意思不正是体现了无产階級和农民的专政嗎？无产階級依靠农民这个‘公式’不是也完全包括在无产階級和农民专政的範圍以內嗎？”（黑体是我标的。——列·托·）^②

由此可見，列宁在这里对“代数”公式所作的說明，排除了一个独立的农民政党的概念，甚至还排除了农民在革命政府中起統治作用的概念；无产階級領導农民，无产階級依靠农民，因此革命政权是集中在无产階級政党手中。但这正是不断革命論的核心。

今天，也就是說，在经历了历史考驗以后，关于过去在专政問題上的意見分歧，最多只能这样說：

列宁总是从无产階級的領導作用出发，竭力強調和突出工农进行革命民主合作的必要性——他向我們所有的人教导了这一点——而我，也是坚决地从这种合作出发，不过我竭力強調的是，不仅在集团中而且在被要求来領導这个集团的政府中都有必要实行无产階級領導。在这件事情上，不可能还有別的分歧。

接着上面所說的，讓我們再引用两段話：一段是《总结与展望》中的，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曾用来证明我的观点同列宁的观点之間的对立；另外一段是列宁写的一篇同我論战的文章中的，这段話被拉狄克也用来实现同样的目的。

这里是第一段話：

① 在一九〇九年党代表會議上，列宁提出了“无产階級領導农民”的公式，但是，最后他同意了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公式，他們在代表會議上反对孟什維克赢得了多数。——列·托·

② 《无产階級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列宁全集》第十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335—336頁和341頁。

“无产階級参加政府在客观上是极可能的，原則上也是可以容許的，只是这种参加要具有統治的和領導的性质。当然，人們可以把这样一个政府說成是无产階級和农民专政，无产階級、农民和知識分子专政，甚至說成是工人階級和小資产階級的联合政府。但是問題仍然在于：誰在政府中掌握領導权，并通过政府領導全国？当我们說到工人政府的时候，关于这一点我們的回答是，政府的領導权應該属于工人階級。”（《我們的革命》，一九〇六年，第250頁）^①

季諾維也夫（在一九二五年！）大叫大嚷，原因是我（在一九〇五年！）曾把农民和知識分子相提并論。在上面引的一段話中，他再沒找出別的东西。知識分子被提到是那个时期的条件所决定的，当时知識分子在政治上起着和今天完全不同的作用。当时只有純粹由知識分子組成的团体以农民的名义說話；社会革命党人正式地說来是在无产階級、农民和知識分子“三位一体”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政党的；孟什維克——正如我当时所写的——为了证明資产階級民主的繁荣昌盛而紧紧地跟随着每个激进的知識分子。在那些日子里，我曾經好几百次地說明知識分子沒有能力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集团，同时还說明革命农民的决定性意义。

但是，說來說去，我們在这里肯定不是在討論論战中的一句話，这种句子我根本不想維護。引語的实质在于：我完全接受列宁主义的民主专政內容，而只不过要求給它的政治結構一个更加正确的定义，也就是說，排除无产階級在小資产階級多数中只不过是人质的那种联合。

現在讓我們考察一下列宁在一九一六年写的一篇論文，正如拉狄克本人所指出的，这篇論文是“形式上反对托洛茨基，实际上

^① 見本书第36頁。

76 却是反对布哈林、皮达可夫和我自己（即拉狄克）以及若干其他同志”。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供认，因为它完全肯定了我当时的这样一种印象，即列宁只是在外表上把論战的鋒芒針對着我，至于从內容方面（我馬上就写出来）來說，实际上根本不是指我。这篇論文（有两行）提到据說我“否定农民”的那条罪状，这条罪状后来成了那些不肖門徒及其信徒的主要資本。这篇論文的“核心”——这是拉狄克的說法——是这样一段話：

“托洛茨基也不想一想，”列宁引用我的話說，“如果无产階級能够带动农村非无产階級群众去沒收地主土地，推翻君主制度，那也就是‘民族資產階級革命’的完成，而在俄国这正是未来的无产階級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①

列宁对于我“否定”农民而提出的这种責难，沒有寄往“正确的地址”，实际上他指的是真正跳过民主革命阶段的布哈林和拉狄克，这一点不仅从上面說过的一切看来是清楚的，而且从拉狄克本人所引用的那段他正确地称之为列宁那篇論文的“核心”的引語看来也是清楚的。事实上，列宁直接引用我那篇論文中的話是这样的意思，只有无产階級的独立的和勇敢的政策才能“带动农村非无产階級群众去沒收地主土地，推翻君主制度”，等等——然后列宁才补充說：“托洛茨基也不想一想……这正是未来的革命民主专政。”換句話說，列宁是在这里肯定并且证明（如果可以这样說的話），托洛茨基实际上接受布尔什維克公式的全部实际內容（工农合作和这种合作的民主任务），但是拒絕承认这就是未来的民主专政，民族革命的完成。因此，在这篇显然“尖銳”的論战文章中，所爭論的并不是革命及其階級推动力量在下一阶段的綱領，而正是**77 这些力量的政治关系，专政的政治和政党性质。**如果說一方面由

^① 《論革命的两条路綫》，《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398頁。

于当时的进程本身还不清楚,另一方面由于派別之間有些夸张,因而論战中的誤解在**那些**日子里是可以理解的和不可避免的,那末,拉狄克怎样在事后想尽办法把問題攪得这样混乱就完全不可理解了。

我同列宁所进行的論战,实质上是爭論农民在革命中独立的可能性(以及独立的程度),特别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农民政党的可能性。在这場論战中,我責备列宁过高地估計了农民的**独立**作用。列宁則責备我低估了农民的**革命**作用。这是从論战本身的邏輯当中产生的。但是,在二十年以后的今天,有人还利用过去說过的这些话,把它們同当时党的前后关系割裂开,并且把論战中所有夸大的地方或者偶尔发生的錯誤都絕對化,而不是根据我們已有的伟大革命經驗来揭示分歧的实际焦点何在以及这些分歧的真正的而不是字面上的范围究竟有多么大,这不是卑鄙的做法嗎?

由于我不得不在选择引語方面限制自己,我将在这里只提出列宁論革命阶段的簡要提綱,这个提綱是在一九〇五年底写的,但是到一九二六年才第一次在《列宁文集》第五卷中发表^①。我記得,所有的反对派分子(包括拉狄克)都认为这个提綱的发表是給反对派的最好的礼物,因为从所有按照斯大林主义法典所写的文章来看,列宁在这个提綱中原来犯了“托洛茨基主义”的罪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會議的決議虽然是譴責托洛茨基主义的,但是它的最重要的几点却好像是公然故意地反对列宁的根本提綱的。斯大林主义分子对于这个提綱的发表咬牙切齿,怒不可遏。这一卷《列宁文集》的編者加米涅夫以其特有的那种并不太感到羞慚的“好脾气”直截了当地告訴我,如果不是由于我們之間正在准
78

^① 《革命的阶段、方向和前途》,《列宁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68—71頁。

在《布尔什維克》上刊載的一篇柯斯特采娃写的論文中，这个提綱被欺詐地窜改了，其目的正是为了使列宁在对待整个农民特别是中农的态度上摆脱托洛茨基主义的罪名。

此外，我在这里引一段列宁自己在一九〇九年对于他同我的意見分歧所作的估价：

“托洛茨基同志本人在这个論断中，认为‘民主居民的代表可以参加’‘工人政府’，就是說，认为政府可以由无产階級和农民的代表組成。至于无产階級在什么条件下才可以参加革命政府，这是另外的問題，在这个問題上，布尔什維克很可能不但同托洛茨基有分歧，甚至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也有分歧。但是革命階級专政的問題，无论如何不能归结为在这个或那个革命政府中占‘多数’的問題，不能归结为社会民主党可以参加这个或那个政府的条件問題。”(黑体是我标的。——列·托·)①

在列宁的这段話中，又一次证实托洛茨基是接受由无产階級和农民的代表組成的政府的，因此并没有“跳过”农民。列宁还进一步着重指出，专政的問題不能归结为政府中的多数問題。这是完全没有爭論的。这里的問題首先是无产階級和农民共同斗争，因而也是无产階級先鋒队为反对自由資产階級或民族資产階級影响农民而斗争。但是，如果說工农革命专政問題不能归结为在政府中这个或那个多数的問題，那末，在革命胜利的情况下，这个問題还是不可避免地要作为决定性的問題出現。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列宁抱着一种謹慎的保留态度(以防万一)是有这样的含意的：如果事情达到党参加革命政府的地步，那末，在这样参加的条件上也許有可能同托洛茨基和波兰同志們发生分歧。因此，只要列宁从理論上认为无产階級的代表作为少数派可以参加民主政府，那

① 《无产階級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列宁全集》第十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 346—347 頁。

末，这就是一件有可能发生意见分歧的事情。然而，事态的发展表明，我們之間沒有产生分歧。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党的最高领导在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組織联合政府这一問題上突然爆发了激烈的斗争。列宁原則上并不反对在苏維埃的基础上联合，但是他明确地要求坚决维护布尔什維克的多數。当时我同列宁肩并肩地站在一起。

現在讓我們来听听拉狄克說的話。看看他把无产階級和农民民主专政的整个問題归結成什么。

拉狄克問道，“一九〇五年的老布尔什維克理論，在什么地方证明是根本正确的呢？在这件事情上：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农民（彼得格勒卫戍軍队的士兵）推翻了沙皇制度（在一九一七年。——列·托·）。归根到底，一九〇五年的公式从根本上只是預見到階級对比关系，而沒有預見到具体的政治制度。”

請稍微等一下！我把旧列宁主义公式叫做“代数”公式，并沒有包含这样的意思：可以把它归結为一句空話，就像拉狄克非常輕率地所做的那样。“带有根本性的一点实现了：无产階級和农民共同推翻了沙皇制度。”但是，这个“带有根本性的一点”毫无例外地在所有胜利的或半胜利的革命中都实现了。沙皇、封建地主和牧师在任何地方都經常尝到无产階級或者无产階級的先鋒以及平民和农民的拳头。这种情况早在十六世紀在德国就已經发生，甚至还要早些。在中国，也是工人和农民打倒了“軍国主义分子”。这同民主专政有什么关系呢？这种专政在过去发生的革命中从来沒有出現过，在中国革命中也沒有出現过。为什么沒有出現呢？因为完成革命的艰苦工作的虽然是工人和农民，但是騎在他們背上的却是資產階級。拉狄克这样极端地使自己脫离了“政治机关”，以致他忘記了革命中“最根本的一点”：誰领导革命和誰取得政权。然而，革命就是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是一场各階級不是赤手空拳

而是通过“政治机关”（政党，等等）的媒介来进行的政治斗争。

拉狄克向我们这些罪人大发雷霆说，“那些没有彻底思考过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方法的复杂性的人”才会抱着这样的概念：“整个问题最后必然是一个工人和农民共同管理的政府，有一些人甚至认为这必然是一个工人党和农民党的联合政府。”

这“一些人”是些什么样的傻子啊！那末拉狄克本人是怎样想的呢？难道他认为胜利的革命不一定要反映并且保证革命阶级的具体关系吗？拉狄克已经把这个“社会学”问题弄得艰深到这样的程度，除了文字的空壳以外已经一无所有了。

一个人使自己脱离工农合作的政治形式问题到多么不可容许的程度，我们可以从这位拉狄克一九二七年三月对共产主义学院发表的一篇讲话中最好地看出来：

“一年以前，我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这个（广州）政府的文章，我把它称为**农民和工人的政府**。而编辑部的一位同志却认为这是我的笔误，把它改成**工人和农民**的政府。我没有提出抗议，就让它保持那个样子：**工人和农民**的政府。”

81 由此可见，在一九二七年三月（而不是一九〇五年），拉狄克认为可以有一个农民和工人的政府，以区别于一个工人和农民政府。这一点是《真理报》的编辑所没有了解的。我承认，要我的命也不懂得这一点。我们很了解什么是工人和农民政府。但是，同工人和农民政府有区别而且对立的农民和工人的政府是什么呢？请费神解释这种把形容词调换一下的神秘做法。我们在这里接触到了问题的核心。一九二六年，拉狄克认为蒋介石的广州政府是一个农民和工人的政府。一九二七年，他重复了这个公式。然而，实际上，这个政府却被证明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它利用了工人和农民的革命斗争，然后把他们推进血泊中。这个错误怎么解释呢？难道拉狄克只不过是判断错误吗？离得很远是容易

判断錯誤的。那末,为什么不这样說:我不了解,也看不見,因此我犯了錯誤。但不是这样,这并不是由于缺乏情报而犯的事实上的錯誤,而是正如現在已經清楚了,是一个原則性的严重錯誤。同工人和农民的政府对立的农民和工人的政府,不是别的而是国民党。这不可能再有别的意思。如果农民不追随无产阶级,那就会追随资产阶级。我认为,在我对“两个阶级的工农党”这个宗派性的斯大林主义概念的批評中(見《共产国际綱領草案;要点批判》),这个問題已經充分闡明。同工人和农民的政府对立的广州“农民和工人的政府”,用当前中国政治的話來說,也就是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的“民主专政”的唯一可以想像的表現;換句話說,也就是同布尔什維克政策(共产国际标之为“托洛茨基主义”)对立的斯大林主义国民党政策的化身。

第四章 不断革命論在实践中是怎样的?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拉狄克在批評我們的理論的时候还附加了“由此产生的策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补充。官方在这个問題上对“托洛茨基主义”所进行的斯大林主义的批評还小心翼翼地限于理論方面……然而,对拉狄克來說,这是不够的。他正在进行一場斗争,反对在中国执行一条明确的(布尔什維克)策略路綫。他設法用不断革命論来貶低这条路綫,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須表明,或者假装別人已經表明,过去的錯誤策略路綫就是从这个理論产生出来的。拉狄克在这里是在直接地迷惑讀者。他本人可能不熟悉革命的历史,因为他从来没有直接参加过革命。但是显然,他没有进行一点努力通过文件来考察問題。而这些文件的最重要的部分收集在我的《全集》第二卷中。任何可以閱讀的人都可以核对这些文件。因此,让我告訴拉狄克,差不多在第一次革命的所有

82

阶段中，我在对革命的力量及其一系列任务进行估价方面都是同列宁完全一致的，尽管整个一九〇五年我是秘密地居住在俄国，而一九〇六年是呆在监狱里。我在这里不得不使自己只限于提出最低限度的证据和文件。

83 我有一篇论文是在一九〇五年二月写的，三月发表的，也就是在第一次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在历史上称为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以前两三个月，我在这篇论文中写道：

“人民和沙皇之间进行的只知道胜利而没有别的地方的激烈斗争；作为这个斗争的最高峰的全民起义；作为人民战胜衰老的敌人的革命高潮的临时政府；临时政府的解除沙皇反动的武装和把人民武装起来；立宪会议在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基础上的召开——这些就是客观情况所表明的革命各个阶段。”（《全集》，第二卷，上册，第 232 页）

为了认识在阐明根本问题方面我同布尔什维克是完全一致的，只要把这一段话同一九〇五年五月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对比一下就够了。

这还不完全说明问题。我在彼得堡曾以同这篇论文一致的精神在克拉辛同意之下表述了临时政府提纲，这个提纲当时是秘密发表的。克拉辛在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上维护了这个提纲。下面是列宁说的一段话，这段话说明了他是多么赞同这个提纲：

“整个说来，我同意季明同志的意见。我是一个写文章的人，自然要注意问题的文字上的提法。季明同志非常正确地指出了斗争目的的重要性，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不指望占领争夺据点就不能作战……”①

①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修改临时革命政府决议案的发言》，列宁实际上使用的是克拉辛在党内的名字：季明。（《列宁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 369 页。——中译者注）

克拉辛提出的內容广泛的修正（我希望讀者去看看这篇东西），其主要部分已經体現在代表大会的決議中。其实，这个修正正是我写的，这一点可以用克拉辛写的一个便条来证明，这个便条到現在我还保存着。关于党的历史上的这整个插曲，加米涅夫和其他一些人是都很清楚的。

农民問題，吸引农民接近工人苏維埃和同农民协会协同工作的問題，引起彼得堡苏維埃一天比一天多的注意。也許拉狄克知道苏維埃的領導权交给了我这一点吧？这里就是当时我在革命的策略任务方面所写的千百条意見之一：

“无产階級創建了城市范围的‘苏維埃’来領導城市群众的战斗行动，并把同軍隊和农民結成战斗联盟提到議事日程上。”（《开端报》，第四期，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新历十一月三十日〕）

我承认，引用一些引語来证明我从来没有說过从专制主义“跳”到社会主义这种話，确是令人厌烦甚至感到困惑的事。但是实在沒有办法。例如，一九〇六年二月，关于立宪會議的任务我写了下面一段話，我根本沒有把立宪會議同苏維埃对立起来，像拉狄克追随着斯大林，为了用极左的扫帚清除昨天的机会主义政策，目前在中国問題上所仓促从事的那样。

“解放了的人民将运用自己的权力召开立宪會議。立宪會議的任务将是巨大的。它将必須根据民主原則即根据人民絕對主权的原則来改造国家。它的职责将是組織民兵，实行广泛的土地改革，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累进所得稅。”（《全集》，第二卷，下册，第349頁）

一九〇五年，在一份專門論述“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問題的鼓动性传单中，我这样写道：

“在俄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这难道是可以想像的嗎？不，我們的农村还太蒙昧和太落后。农民中的真正社会主义者还太少。

我們必須首先推翻使人民群眾處於黑暗中的專制制度。農村的窮人必須免除一切捐稅；必須實行累進所得稅和普遍義務教育；最後，農村的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必須同城市無產階級聯合組成一支社會民主大軍。只有這支軍隊才能完成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全集》，第二卷，上冊，第228頁）

由此可見，早在拉狄克尾隨着斯大林和台爾曼開始對我大談這個問題以前，我就已經指出革命的民主階段和社會主義階段之間的某些區別。二十二年以前，我寫道：

“當社會主義報刊上表述不斷革命的思想時——這種不斷革命由於日益增長的社會衝突、更多的群眾階層參加起義、無產階級對統治階級的經濟和政治特權的不斷進攻，而把消滅專制制度和封建制度同社會主義革命聯繫起來——，我們的‘進步’報刊齊聲發出了怒吼。”（《我們的革命》，一九〇六年，第258頁）^①

首先，我願意提請大家注意在這一段話中對不間斷革命所下的定義：它通過若干日益尖銳的社會衝突把消滅中世紀思潮同社會主義革命連接在一起。跳躍在哪裡呢？什麼地方忽略了民主階段呢？歸根到底，難道這不正是一九一七年實際上所發生的情況嗎？

順便說一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進步”報刊在一九〇五年對不間斷革命發出的吼叫，一點也不能同當前那些在二十五年的短短耽擱以後才參預這件事的僱用文人所發出的很難說是進步的吼叫相比。

當我在報刊上提出不斷革命問題的時候，那個在列寧的機警的主編下出版的布爾什維克派主要機關報《新生活》採取的是什麼態度呢？當然，這一點是不會不使人們感到興趣的。“激進的”資

^① 見本書第44頁。

产阶级报纸《我们的生活》发表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竭力用列宁的“更加合理的”观点来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关于这篇论文，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在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作出了这样的答复：

“这种毫无根据的假定当然是荒谬绝伦的。托洛茨基同志说，无产阶级革命可以不用在第一阶段停顿就继续前进，把剥削者推在一边；另一方面，列宁指出，政治革命只是第一步。《我们的生活》的政论家是乐意在这里找出矛盾来的……整个误解的产生，首先是由于《我们的生活》对于社会革命这个名词感到恐惧；其次，由于这家报纸想在社会民主党人当中发现某种尖锐而很有份量的意见分歧；再次，是由于托洛茨基同志使用了‘给予一次打击’这样的字眼。在《开端报》第十期上，托洛茨基同志毫不含糊地这样解释了他的概念：

86

“‘革命的彻底胜利意味着无产阶级的胜利，’托洛茨基同志写道。‘而这种胜利又意味着未来革命的不间断性。无产阶级要实现基本民主任务，而巩固其政治统治的直接斗争在某一时刻必然向无产阶级提出的却纯粹是社会主义问题。在（社会民主党人的）最低和最高纲领之间，规定了一种革命的连续性。这并不是一个“打击”或者一天一个月的問題，而是一整个历史时期的問題。试图事先确定这种革命的持续时间荒谬的。’”

这一段引语在一定的程度上完全说明了这本小册子的主题。对于不肖门徒们后来的一切批评所进行的驳斥，有哪个能够比列宁的《新生活》那样赞同地引用我在报纸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所进行的这种驳斥更加清楚、更加确切和更加不可辩驳呢？我的那篇论文说明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在实现民主任务的过程中，由于其地位的关系，在一定的阶段就会不可避免地面临纯粹社会主义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产生的那种最低和最高纲领之间的连续性

正在于此。这并不是一次打击，也不是一次跳跃——我对当时小资产阶级阵营中批评我的人这样解释——而是一整个历史时期。而列宁的《新生活》是完全赞同这种前景的。更加重要的——我希望——是这一事实，它已经为事态的实际发展所证实，它的正确性在一九一七年已经决定性地得到了肯定。

87 除了《我们的生活》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分子以外，主要是孟什维克在一九〇五年、特别是一九〇六年革命开始走向失败以后谈论从民主主义“跳跃”到社会主义的幻想。在孟什维克当中，特别是马尔丁诺夫和已故的约尔丹斯基在这方面最为突出。应当在这里顺便说一句，这两个人后来都变成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我在一九〇六年写的一篇专论中，向那些设法把“跳到社会主义”的帽子扣到我头上的孟什维克作家们详尽地通俗地说明了，这种争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愚蠢的。今天我可以几乎毫不删节地把这篇文章重印出来，以反驳不肖门徒们的批评。但是，也许这样说就够了：这篇文章的结论已经概括在下面的一句话当中：

“我完全了解——让我向批评我的人（约尔丹斯基）提出保证——在报纸上一篇论文中跳过政治障碍同在实践中越过这种障碍远不是一回事。”（《全集》，第二卷，上册，第454页）

也许这就够了吧？如果不够的话，我还可以继续援引一些引语，以使像拉狄克这样的批评家们不能够说，他们“手头”没有那种他们可以非常勇敢地作出判决的材料。

一九〇六年我在狱中写了一本小册子《我们的策略》，这本小册子随即由列宁出版。其中提出了这样一段具有特点的结论：

“无产阶级将能够依靠农村的起义来使自己得到支持，将能够在城市（政治生活的中心）使它已经能够着手的事业取得胜利的结果。无产阶级依靠农民的基本力量并领导他们，就不仅会给予反动势力以最后的胜利的打击，而且还会了解如何保障革命的胜

利。”（《全集》，第二卷，上册，第 448 頁）

难道这像是忽視农民嗎？順便提一下，就在这本小册子里，还发展了这样一种概念：

“我們的策略所指望的是革命的不可抗拒的发展，它当然絕不忽視革命运动的不可避免的或者可能的或者甚至仅仅是或然的局面和阶段。”（《全集》，第二卷，上册，第 436 頁）

难道这看起来像是幻想的跳跃嗎？

在我写的《第一个苏維埃的教訓》这篇論文（一九〇六年）中，我这样描述了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或者，正如事实所表明的：新的革命）的前景： 88

“历史是不会重演的——新苏維埃也不会再一次經歷那五十天的事件（一九〇五年十月到十二月）；但它完全能够从这个时期得出它的行动綱領。这个綱領是非常清楚的。同军队、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最低平民阶层进行革命的合作。废除专制制度。摧毁它的物质組織：部分通过改組，部分通过立即解散军队；摧毁官僚警察机关。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武装居民，首先是武装无产阶级。苏維埃轉变为革命的城市自治机关。建立农民代表苏維埃（农民委员会）作为地方的土地革命机关。組織立宪會議的选举，在明确的行动綱領的基础上为人民代表进行竞选斗争。”（《全集》，第二卷，下册，第 206 頁）

难道这看起来像跳过土地革命或者低估整个农民問題嗎？难道这看起来好像我看不见革命的民主任务嗎？不，不像。那末，拉狄克画的政治画究竟像什么呢？什么也不像。

拉狄克超然地但很曖昧地在我一九〇五年时的立場（这个立場被他歪曲了）和孟什維克的立場之間划了一条界限，他没有想一想，他自己正是在重复孟什維克的四分之三的批評；拉狄克狡猾地解释說，說实在的，即使托洛茨基运用的方法与孟什維克一样，他

的目的也是不同的。由于这个主观的公式，拉狄克完全損害了他自己接近問題的能力。即使拉薩尔也知道，目的是依靠手段的，并且归根到底是为手段所决定的。他甚至还写了一个关于这个主題的戏剧(《弗朗茨·馮·西金根》)。但究竟是什么东西使我的手段同孟什維克的手段一样了的呢？那就是对待农民的态度。为了证明这一点，拉狄克从上面引用过的列宁一九一六年的論文中引用了89 了三行論战的文字，但是得順便說明，列宁在这里虽然指名說的是托洛茨基，实际上却是同布哈林和拉狄克本人論战。除了列宁的这段引語(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这段引語已为列宁那篇論文的整个內容所否定)，拉狄克还引用了托洛茨基本人的話。我在一九一六年写的一篇論文中揭露了孟什維克概念的空虛以后問道：如果不是由自由資產階級来領導的話，那末是由誰来領導呢？說來說去，你們孟什維克根本就不相信农民的**獨立**政治作用。就这样，拉狄克當場抓住了我：托洛茨基“同意”孟什維克对于农民的作用的看法。孟什維克认为，由于同农民結成联盟是沒有把握的和不可靠的而“拒絕”自由資產階級，那是不能容許的。这就是孟什維克的“方法”；而我的方法是撇开自由資產階級，为革命农民的領導地位而斗争。在这个根本問題上，我同列宁沒有分歧。在我同孟什維克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我对他們說：“你們根本就不想使农民担任一个**領導**角色，”这句话并不是像拉狄克所設法偷偷販卖的那样：同意孟什維克的方法，而只是清楚地提出了另外一种选择：**或者是自由財政寡头专政，或者是无产階級专政。**

我在一九一六年提出来反对孟什維克的这个完全正确的論据，現在拉狄克背信弃义地試圖用来也反对我，其实，九年以前在一九〇七年伦敦党代表大会上，我就已經运用过这个論据，当时我所維護的是布尔什維克关于对待非无产階級政党的态度的提綱。我在这里引用的是我在伦敦代表大会上那篇演說的主要部分。在

革命的头几年中，我那篇演說常常收入各种文集以及教科书，作为布尔什維克在革命中所表明的对待階級和政党的态度。这里就是我在这篇演說中說过的話，这些話簡單明了地說明了不断革命論。

“对孟什維克同志們來說，他們自己的观点是极其复杂的。我曾經一再听到他們的責难，說我对俄国革命方針的概念太簡單了。然而，孟什維克的观点尽管极其变化无常（这是复杂的形式之一），也許正是由于这种变化无常，却成为連米留可夫先生也明白的非常簡單的东西。”

90

“在最近出版的《第二屆国家杜馬选举是怎样进行的？》一书的后記中，立宪民主党的思想領袖写道：‘至于狭义的左派集团，即社会主义革命集团，同他們达成協議將是比較困难的。但是，甚至这里也是一样，如果没有明确的积极原因，那末，至少也有一些很有份量的消极原因，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促使我們彼此之間达成協議。他們的目的是批評和不信任我們；仅仅由于这一点，我們就必須挺身而出并且采取行动。我們知道，对于社会主义者來說，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目前正在进行的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要由資產階級民主派来完成的革命。找一种东西来代替这种民主……是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还没有准备好的行动，如果国家把他們这样大量地送进杜馬，那肯定不是为了現在实现社会主义，或者为了用自己的手实现准备性的“資產階級”改革……对他們來說，把議會政治家的角色交給我們来担任，远比他們由于担任这种角色而有失体面要好得多。’

“我們可以看到，米留可夫直截了当地把我們引到問題的核心。上面的引語把孟什維克对革命以及对資產階級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之間的关系所采取的态度所有最重要的因素都表現出来了。

“‘正在进行的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

命’——这是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资产阶级革命‘必须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来完成’——这是第二点。社会主义民主派不能用自己的手来实现资产阶级改革，它的作用依然是纯粹反对派的作用：‘批评和不信任’。这是第三点。最后，即第四点，为了使社会主义者能够保持反对派的地位，‘我们（即资产阶级民主派）必须挺身而出并且采取行动’。

“但是，如果‘我们’不挺身而出，那该怎么办呢？如果没有能够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前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那该怎么办呢？那就必须捏造了。这正是孟什维主义所得出的结论。它所制造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及其特点和历史，都是从它自己的想像中产生出来的。

“作为唯物论者，我们必须首先提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基础问题：它可以依靠的是什么阶层或者什么阶级？”

“作为一种革命力量来说，大资产阶级是不能依靠的——我们都同意这一点。甚至在法国大革命（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这是一次民族革命）时期，里昂的某些工业家所起的就是反革命作用。但是我们听说，中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那末，这个小资产阶级代表的是什么人呢？”

“雅各宾党人依靠的是城市民主派，这个民主派是从手工业行会中生长起来的。小店主、工匠以及同他们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城市居民，构成革命的无套裤汉队伍——主要的政党山岳党的支柱。正是这个经历了手工业行会的漫长的历史性锻炼的大批城市居民群众，把革命的整个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革命的客观结果是为资本主义剥削创造‘正常的’条件。然而，历史进程的社会结构却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即‘群氓’、街头的民主派、无套裤汉为资产阶级统治创造了条件。他们的恐怖专政为资产阶级社会清除了旧的渣滓，然后，资产阶级在推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专政以后掌握

了政权。

“现在让我提出一个问题——哦，这可不是第一次了！——如果无产阶级仍旧站在反对派的地位上，那末，在我们国家内，由哪个社会阶级产生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使它掌握政权并使它能够实现巨大的任务呢？这就是中心问题，我再一次把这个问题向孟什维克提出来。

“的确，在我们的国家里，有广大的革命农民群众。但是，孟什维克的同志们正同我一样地知道，不管农民有可能多么革命，他们是不能担任独立的政治角色的，更不用说担任领导的政治角色了。毫无疑问，农民是可以被证明为一支为革命服务的巨大力量的；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屑于这样看，即一个农民政党能够使自己居于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地位，同时依靠自己的主动性能够把民族的生产力从折磨着他们的古老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城市是现代社会的主宰者，因此，只有城市能够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担任主宰者的角色。^① 92

“那末，在我们的国家里，能够领导民族的城市民主派在哪里呢？马尔丁诺夫同志曾经手里拿着放大镜一再地寻找它。他所发现的是萨拉托夫的教师们、彼得堡的律师们以及莫斯科的统计学家们。同他的所有志同道合的人一样，他拒不正视的唯一一点是，产业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所夺取的地盘就同十八世纪末半无产阶级手工业民主派无套裤党人所夺取的地盘一样。同志们，我提请你们注意这个根本事实。

“我们的大型工业并不是从手工业逐步发展起来的。我们的城市经济史上根本没有出现过任何基尔特时期。在我国，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欧洲资本的直接的和随之而产生的压力之下兴起的。

^① 不断革命论的落后的批评家们是不是同意这一点呢？他们是不是准备把这个基本命题扩大到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去呢？是这样呢，还是并非如此？——列·托·

它所占有的一片土地，基本上是未开垦的、处于原始状态的，它沒有遇到手工业文化体系的一点抵抗。外国資本是通过国家借債的途徑和私人主动性的孔道而流入我国的。它把产业无产階級大軍聚集在自己的周围，而阻碍了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由于这种进程，在資产階級革命时刻，我們中間就出現了一个具有极高度发展的社会型式的产业无产階級，作为城市的主要力量。这是事实。这是无可辯駁的，同时必須作为我們的革命的策略性結論的基础。

93 “如果孟什維克同志們相信革命会取得胜利，或者即使他們只承认有取得这种胜利的可能性，那末，他們就不能反駁这一事实，即在我国，除了无产階級以外，再沒有别的階級可以成为革命政权的历史要求者。正如小資产階級城市民主派在法国大革命中使自己处于領導革命民族的地位一样，无产階級（我們城市中的唯一革命民主派）必須在农民群众中得到支持，必須使自己掌握政权——如果革命毕竟有任何胜利前景的話。

“一个直接依靠无产階級并通过无产階級而依靠革命农民政府，还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专政。我在这里不准备論述呈现在无产階級政府面前的进一步前景。也許无产階級注定要失敗，就像雅各宾民主派一样，为資产階級統治扫清道路。我要确立的只有一点：如果革命运动在我国，像普列汉諾夫所預言的那樣，作为工人运动而取得胜利，那末，革命的胜利只有作为无产階級革命的胜利才有可能——否則，这种革命就根本不能取得胜利。

“我坚持这个結論，而且以最断然的态度坚持。如果假定，无产階級和农民群众之間的社会对抗性将妨碍无产階級領導农民群众，同时无产階級本身也沒有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那末，人們就只能得出这样的結論：我們的革命根本得不到胜利。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自然結果必然是自由資产階級同旧当局达成協議。这是一种变种，这种变种的可能性是絕對不能否认的。但是显然，

这种变种就摆在革命失败的道路，并且为其内部的弱点所决定。从本质上说，孟什维克的全部分析——首先是他们对无产阶级及其与农民可能建立的关系所作的估价——无情地把他们引导到革命悲观主义的道路上。

“但是，他们坚决地离开这条道路，而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基础上发扬革命的乐观主义。

“从这一点产生了他们对待立宪民主党人的态度。对他们来说，立宪民主党人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象征，而资产阶级民主派是革命政权的天然要求者……

“那末，你们根据什么认为立宪民主党人还会起来并且会屹立不动呢？是根据政治发展的事实吗？不，而是根据你们自己的方案。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你们需要资产阶级城市民主派，你们迫不及待地寻找它，而找到的只不过是立宪民主党人。你们向他们表现出令人惊讶的乐观主义，你们把他们打扮起来，你们要迫使他们扮演一种他们不愿扮演、不能扮演也不会扮演的创造性角色。对于我的基本问题——我一再提出这个问题——我没有听到回答。你们对革命没有作出预断。你们的政策缺乏任何广大的前途。 94

“同这一点有关的是，你们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是用代表大会应当牢记的一句话来表述的，这句话就是‘按照情况可能提出的要求’。无产阶级的职责并不是进行争取影响人民群众的有步骤的斗争，也不是只根据这样一种指导思想来决定它的策略步骤，即把所有的劳苦者和被蹂躏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成为他们的先驱和领袖。”（《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记录和决议》，第180—185页）

这篇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我一九〇五年和一九〇六年的全部论文、演说和行动的演说，得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完全赞同，更不用说

罗莎·卢森堡和梯什科了(在这篇演說的基础上,我們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这种关系导致我在波兰文报纸上同他們合作)。列宁不原諒我对孟什維克的妥协态度——而他是正确的——他本人对我这篇演說表現了一种审慎着重的保留态度。下面就是他說过的話:

“我只想指出,托洛茨基在《保卫党》这本小册子中公开表示他同意考茨基的看法,即在俄国当前革命中,无产階級和农民的利益在經濟上是一致的。托洛茨基承认成立反对自由資产階級的左派联盟是可以允許的,是适宜的。在我看来,这些事实足以說明托洛茨基是接近我們的观点的。撇开‘不間断革命’問題,这里在对資产階級政党的态度問題的基本点上是一致的。”^①

列宁在演說中並沒有对不断革命論作出总的估价,因为我在演說中也沒有对无产階級专政的进一步前景进行闡述。他显然沒有讀过我論述这个問題的基本著作,否則他就不会在談到我“日益接近”布尔什維克的概念时当成一件新鮮的事情,因为我在伦敦发表的这篇演說只不过是扼要地重述我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发表的著作中說过的話。列宁表現的态度很有保留,因为当时我是站在布尔什維克派外面的。尽管如此,或者更正确地說,正因为如此,他說的話是不可能解释錯誤的。关于对待农民和自由資产階級的态度問題,列宁确认“我們之間在这个問題的基本要点上是一致的”。这种一致不能运用到我的目的方面(就像拉狄克顛倒黑白地所說的那樣),而恰恰可以运用到方法方面。至于民主革命长入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列宁在这里作了“撇开‘不間断革命’問題”的保留。这种保留是什么意思呢?显然,列宁絕沒有把不断革命同忽視农民或者跳过土地革命混为一談,就像无知的和无耻的不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对資产階級政党的态度的报告的結束語》,《列宁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456頁。黑体是托洛茨基标的。——中譯者注

肖門徒們所慣常做的那樣。列寧的思想是這樣的：我們的革命將走多麼遠，無產階級在俄國是不是比在歐洲能夠更早地取得政權，以及這一點為社會主義展現了什麼樣的前景——這個問題我沒有接觸到；然而，在無產階級對待農民和自由資產階級的態度這一基本問題上，“我們之間在這裡是一致的。”

我們從上面已經看到，在不斷革命論差不多剛剛誕生的時候，即遠在一九〇五年，布爾什維克的《新生活》就作出了什麼樣的回答。讓我們再回憶一下，列寧《全集》的編輯們在一九一七年以後是怎樣表明他們對這個理論的意見的。在第十四卷下冊第四八一頁的注釋^①中說：

“甚至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前，他（托洛茨基）就提出了新奇的而現在特別值得注意的不斷革命論，在這個理論中，他斷言，一九〇五年的資產階級革命將直接轉入社會主義革命，構成一系列民族革命的第一個革命。” 96

我認為，這絕不是承認我對不斷革命問題所寫的一切都是正確的。但是無論如何，這是承認了拉狄克對這個問題所寫的東西是不正確的。“資產階級革命將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這正是**長入**理論，而不是**跳過**理論；從這種理論所產生的是一種現實主義的而不是冒險主義的策略。那末，“目前特別值得注意的不斷革命論”這幾個字是什麼意思呢？這幾個字意味着，十月革命以一種新的光輝照亮了這個理論的那些對許多人來說還含糊不清或者干脆看來“未必然”的方面。列寧《全集》第十四卷下冊出版的時候，列寧還活着。幾萬幾十萬黨員都讀到了這個注釋。直到一九二四年以前，沒有人說它是虛假的。只是到了一九二八年，拉狄克才想起來這樣說。

^① 這是指在列寧生前出版的《列寧全集》第二版的注。另見本書第 229 頁。——中譯者注

但是，既然拉狄克談論的不仅是理論，而且還有策略，那末，我实际参加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性质，就依然是反对他的最重要的論据。一九〇五年我在彼得堡苏維埃所做的工作，同我对革命性质的看法（这些看法都是不肖門徒們現在不間断地予以攻击的）所作的决定性努力是一致的。这些所謂錯誤的看法怎么可能一点也沒有反映在我在每个人眼前所进行的和天天在报刊上記錄下来的政治活动中呢？如果假定这种錯誤的理論反映在我的政治見解中，那末，为什么現在当了官的那些人当时保持沉默呢？更加重要的是，为什么列宁当时在革命的最高潮时期以及革命失敗以后都那样坚决地維護彼得堡苏維埃的路綫呢？

97 同样的問題也适用于一九一七年革命，只不过是形式也許更加尖銳罢了。我在紐約写了若干論文，在这些論文中，我用不断革命論的观点对二月革命作了估价。所有这些論文現在都重新印出来了。我在策略上的結論同列宁当时在日內瓦得出的結論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同加米涅夫、斯大林以及其他不肖門徒們得出的結論是有同样不可調和的矛盾的。我到彼得格勒以后，沒有人問我是不是放弃了不断革命論的“錯誤”。甚至沒有一個人問。斯大林窘困不安地从这个角落懾手懾脚地走到另一个角落，他只怀着一个願望，希望党尽可能迅速地忘掉他在列宁回国以前所鼓吹的政策。当时雅罗斯拉夫斯基还不是監察委員會的鼓舞者^①；他同孟什維克一道，同奥尔忠尼启則等人一道在雅庫茨克出版一种淺薄的半自由派報紙。加米涅夫譴責列宁是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他遇到我的时候宣称：“現在輪到你笑我們了。”在十月革命的前夕，我在布尔什維克中央机关报上写文章論述了不断革命的前景。任何人都

^① 雅罗斯拉夫斯基从一九二三年起担任联共（布）党中央監察委員會党書記，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这里所指的当系这两項职务。——中譯者注

从来没有想到出来反对我。我同列宁的一致是彻底的和无条件的。那末，批评我的人（其中包括拉狄克）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难道我自己完全不了解我所鼓吹的理论，难道在最严酷的历史时期我的行动直接违背这个理论并且这样违背才十分正确吗？如果说批评我的人就像不了解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也不了解不断革命，不是更简单些吗？因为假定这些落后的批评家不仅完全能够分析他们自己的思想，而且也完全能够分析别人的思想，那末，他们这些人毫无例外地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中采取这样一种可悲的立场，并且在中国革命中永远蒙受耻辱，这又该怎么解释呢？

但是，话说回来，也许读者会忽然想起来：你的最重要的策略性口号“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某些集团中，这种论辩被认为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托洛茨基的可恶的口号“不要沙皇！”贯穿在所有批评不断革命的人写的所有著作中；有些批评家把这一点当作最后的、最重要的和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论辩；有些批评家则把它当作厌倦思想的现成避难所。

这种批评在无知和背信弃义的“大师”^①方面自然达到了最深渊的地步，他在那本无可比拟的《列宁主义问题》一书中说：

“我们不来多讲（绝对不是！——列·托·）托洛茨基同志在一九〇五年的立场，当时他‘简直’忘掉了农民是革命力量，提出了‘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口号，即不要农民参加革命的口号。”（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第174—175页）^②

尽管面对着这种毁灭性的批评，我的立场几乎是毫无希望的（这种批评不愿“详述”这一点），我还是愿意提到一些似乎没有那

① 指斯大林。——中译者注

② 《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316页。

么严重的情况。这种情况是有一些的。請大家看下去。

即使我在一九〇五年写的論文当中有一篇提出一个孤立的、暧昧的或者不适当的、可能引起誤会的口号，今天，在二十三年以后，这个口号也不应当就其本身来加以理解，而应当同我論述这个問題的其他著作联系起来看，同时，最重要的是，同我参加事态发展的政治活动联系起来看。不容許只是告訴讀者一个他們所不知道的（連批評家也不知道的）著作的題目，然后給这个題目加上同我所写的和所做的完全相反的意思。

但是，补充这样一点也許不是多余的——哦，我的批評家們！——即我从来沒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写过或者說过或者提出过“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这样一个口号。在我的法官們提出的主要論据的基础上，除了所有其他的东西以外，还有一个可耻的事实上的錯誤。这个事实是，一个題为“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声明是帕尔烏斯一九〇五年夏天在国外写的和发表的。当时我已經在彼得堡秘密地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無論是在思想上或者是在行动上，我都同这个传单沒有一点关系。我是过了很久才从論战文章中知道这个声明的。我从来沒有际遇或者机会来表明我自己对这个口号的意見。至于声明，我（以及所有批評我的人）既沒有看見过，更沒有閱讀过。这就是这件怪事的事实。我很抱歉，我必須使所有的台尔曼之流和塞瑪尔之流抛弃这个不費力气的和显而易見的論据。但是，事实比我的慈悲感情要有力得多。

这還沒完。事有湊巧，就在帕尔烏斯在国外发表那个我不知道的传单“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时候，我也写了一篇声明在彼得堡秘密地散发，这篇声明的題目是：**既不要沙皇，也不要земля^①，而要人民！**这个題目在传单中作为一个包括工人和农民

① 即地方自治机构自治局的成員，这种机构是在沙皇統治末期建立的，只拥有有限的权力，自由派貴族在其中占統治地位。——英譯者注

的口号而不断地重述着，它本来是打算用一种通俗的形式来反駁后来关于跳过革命的民主阶段的爭論的。这项呼吁已經收入我的《全集》(第二卷,上册,第256頁)。我还有些声明是由布尔什維克中央委员会公布的,这些声明都是对斯大林巧妙地說成是我“干脆忘記了”的农民发表的。

但是,即使这样,也还没完。就在不久以前,尊貴的拉斐斯(他是中国革命的理論家和領袖)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理論机关报上論述了托洛茨基在一九一七那一年提出的这个可恶的口号。不是在一九〇五年,而是在一九一七年!对于孟什維克分子拉斐斯來說,无论如何,是可以原諒一些的——几乎到一九二〇年以前,他还是彼特留拉^①內閣的“大臣”,被反对布尔什維克的斗爭搞得心神不定的他,怎么可能注意十月革命的陣营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呢!那末,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的編輯部又怎样呢?这是一件怪事。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是一群白痴……

“但这怎么可能呢?”一个讀过近几年来无聊书刊的正直讀者会喊叫道,“成千上万的书籍和文章难道不是教导我們……?”

“是的,朋友們,教导过;正因为如此,所以你們必須从头学起。这就是反动时期的总开銷。这是毫无办法的事。历史并不是沿着一条直綫发展的。它已經暂时走进斯大林的死胡同。” 100

第五章 “民主专政”在我国实现了嗎? 如果实现了,是什么时候实现的呢?

拉狄克在求助于列宁的情况下爭辯說,民主专政是以双重政 101

^① С. В. Петлюра, 1877—1926, 乌克兰資产階級民族主义分子,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曾在乌克兰建立反动的統治。——中譯者注

权的形式实现的。不错，列宁曾经偶然地——而且有条件地——把问题说成是这个样子；这一点我是承认的。“偶然地？”拉狄克变成怒不可遏，指责我攻击列宁最根本的概念之一。但是，拉狄克生气来，只不过是因为他错了。在《十月的教训》一书中（这本书在过了差不多四年以后，也成了拉狄克批评的对象），我对列宁关于民主专政的“实现”所说的话是这样解释的：

“民主的工人和农民联合，只能成为一种不能取得真正政权的不成熟的政权形式——它只能成为一种倾向，而不能成为一个具体的事实。”（《全集》，第三卷，上册，第21页）^①

关于这个解释，拉狄克写道：“对于列宁著作中最杰出的理论章节之一的内容作出这样一种解释，完全没有价值。”拉狄克说了这句话以后，便可悲地求助于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最后得出结论说：“这些问题太重要了，以致不可能用列宁偶然地说过的话来给以答复。”

102 拉狄克想用这一番话造成一种形象：我漫不经心地对待列宁概念中“最杰出的一个”概念。但是，拉狄克的愤怒是徒劳的，激动也是没用的。在这里，稍微了解一点情况是比较适当的。我在《十月的教训》中所作的论述，即使是很简短的，也不是出自一种根据间接引证而突然产生的灵感，而是依靠对列宁著作的真正彻底的研究。它转述了列宁关于这个问题的概念的本质，而拉狄克的冗长论述，尽管引证很多，却一点也没有把列宁思想中活生生的见解保留下来。

为什么我使用了“偶然地”这个带有限制性的词汇呢？因为事情本来就是那样。关于民主专政是以双重政权的形式“实现”的（“以一定的形式和达到一定的限度”）这一点，列宁只是在一九一

^① 《十月的教训》，美国一九三七年版第37页。本书一九二五年英文版第35页的这段译文欠确切。——英译者注

七年四月到十月期間提到过，也就是在民主革命实际上实现以前提到过。拉狄克对这一点既沒有注意到，了解到，也沒有加以估价。在反对目前的不肖門徒的斗争中，列宁是极其有条件地談到民主专政的“实现”的。他这样做，并没有給予双重政权时期一种历史特点——如果是这样，那就荒謬絕伦了——而是反对那些期待独立的民主专政能够修訂再版的人們。列宁的話只有这样的意思，即除了双重政权的悲惨流产以外，沒有也不会有任何民主专政，因此必須“重新武装”党，即改变口号。把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資產阶级的联合（这种联合拒絕給予农民土地，同时迫害布尔什維克）說成是“实现”布尔什維克的口号——那就意味着，不是有意顛倒黑白，就是完全失去了理智。

关于孟什維克，有一种論据是可以提出来的，这种論据在一定的程度上同列宁反对加米涅夫的論据类似：“你們等待着資產阶级在革命中完成一种‘进步的’使命嗎？这个使命已經实现了；罗将科^①、古契可夫^②和米留可夫所起的政治作用是資產阶级可以給予的最大限度的政治作用，正如克伦斯基主义是民主革命可以作为一个独立阶段来实现的最大限度一样。”

103

确切无誤的解剖学形迹——退化器官——表明，我們的祖先是尾巴的。这些形迹足以证实动物界的起源是一致的。但是，十分坦率地說，人并没有尾巴。列宁向加米涅夫指出了民主专政在双重政权制度下的退化器官，并警告他說，不应当希望从这些退化器官中长出新器官来。我們沒有建立过独立的民主专政，即使我們完成的民主革命比任何其他地方所完成的更加深刻，更加坚决，更加純粹。

① Михаил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Родзянко, 1859—1924, 俄国十月党領袖之一，曾任第三、四届国家杜馬主席。——中譯者注

②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учиков, 1862—1936, 俄国“十月十七日同盟”的建立者之一，曾任第一届临时政府陆海軍部长。——中譯者注

拉狄克应当想一想这一事实，如果民主专政在二月到四月期间**实际上**已经实现，那是连莫洛托夫也会承认它的。党和阶级所了解的民主专政是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它将无情地摧毁旧的君主政体国家机器和彻底地消灭庄园土地所有制。但是，在克伦斯基时期，这种情况一点也没有出现。然而，对布尔什维克党来说，这是一个**实际上实现民主任务**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显示某些社会学的和历史学的“退化器官”的问题。列宁为了从理论上启发他的对手们，杰出地指出了这些没有得到发展的形迹——而这就是他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事情。然而，拉狄克却满认真地努力使我们确信，在双重政权时期，也就是在**没有政权**时期，“专政”的确存在过，同时民主革命已经实现。可是，你们看，这是这样一种“民主革命”，以致需要列宁的全部天才去认识。但是，正是这一点意味着，民主革命并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革命是俄国或中国每个不識字的农民都容易认识的东西。但是，就形态学的形迹来说，这是一件更加困难的事。例如，尽管加米涅夫在俄国提供了教训，还是不能使拉狄克最终注意到这一事实：在中国，民主专政也一样地在列宁所规定的意义上“实现了”（通过国民党）；同时比我国通过双重政权机构实现得更为彻底，其形式也更为完善。只有毫无希望的傻子，才有可能期待“民主”在中国修订再版。

如果民主专政在我国只是以克伦斯基主义（它所扮演的角色是劳合·乔治和克雷蒙梭^①的走卒）的形式实现，那末，我就不得不說，历史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战略口号作了残酷的嘲弄。幸运的是，情况并不是这样。布尔什维克口号事实上是实现了——不是作为一种形态学上的特征，而是作为一种非常伟大的历史现实实现了。可是，这个口号的实现**不是在十月以前而是在十月以后**。农民战争，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支持了无产阶级专政。两个阶级的

^① 劳合·乔治和克雷蒙梭是当时英国和法国的总理。——中译者注

合作是通过十月在巨大的規模上實現的。当时，即使沒有列宁的注释，每个无知的农民还是領悟到和感觉到，布尔什維克口号已經實現了。列宁自己的估計是，十月革命——它的第一个阶段——是民主革命的**真正**實現，因而也是布尔什維克战略口号的**真正的**（即使是改变了的）体现。列宁的**整个**精神必須加以考虑。首先是十月以后的列宁，当时他从一个更高的有利地位考察了并且估計了事态的发展。最后，对于列宁，必須以列宁主义的方法来考虑，而不是以不肖門徒的方法来考虑。

关于革命的階級性质及其“长入”問題，列宁（在十月以后）在一本反对考茨基的书中曾加以分析。下面就是拉狄克应当稍微思索一下的一段話：

“是的，**当我们同全体农民一起前进时，我們的革命（指十月革命。——列·托·）是資產階級的革命。这是我們十分清楚地意識到的，是我們在一九〇五年以来說过千百次的，我們从来没有试图跳过历史过程的这个必經阶段，也沒有试图用法令把它取消。**”

列宁接着說：

“**結果正同我們所說的一樣。革命进程证实了我們的論断的正确。起初同‘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君主制度，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紀制度（因此，革命还是資產階級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然后，同貧农一起，同半无產階級一起，同一切被剝削者一起，反对資本主义，反对农村的富人、富农和投机者，于是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①

105

列宁在对革命（包括十月革命）作出完善的、概括的和完整的估价时，就是这样說的——不是“偶然地”而是經常地，或者更确切地說，是始終不变地。“結果正同我們所說的一樣。”資產階級民主

^① 《无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 280 頁和 281 頁。

革命是作为工人和农民的联合而实现的。是在克伦斯基时期吗？不是，是在十月以后的第一个时期。是这样吗？是这样。但是，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以民主专政的形式而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实现的。而由于这一点，旧代数学公式的必要性也就消失了。

如果一九一七年列宁反对加米涅夫的有条件的论据，同随后几年列宁对十月革命所作的完善的概括毫无批判地并列起来，那末可以说，俄国已经“实现了”两次民主革命。这种说法太过分了，特别是因为无产阶级的武装暴动把第二次革命同第一次革命分开了。

现在可以把刚才从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所引证的话和我在《总结与展望》中所说的话对比一下，在后者论《无产阶级政治制度》一章中，关于专政的第一阶段及其进一步发展的前景是这样概述的：

“消灭等级制的农奴制，将得到作为纳税等级的全体农民的支持。按收入征收的累进税也会得到大多数农民的支持。但是为保护农业无产阶级而实行的法律措施，不仅不会得到大多数人的积极同情，而且还会遭到少数农民的积极反对。

106 “无产阶级会感到不得不把阶级斗争推进到农村中去，从而破坏无疑每一个农民都有的——虽然是在比较狭小的范围内——那种共同利害关系。无产阶级在它刚刚实行统治的时刻，就必须从农村的穷人和富人之间、农业无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中寻找支持。”（《我们的革命》，一九〇六年，第255页）^①

所有这些话哪里有一点像是我“忽视”农民和列宁同我的两条路线之间存在着完全的“对抗”呢！

① 见本书第40—41页。

上面援引的列宁的話在列宁著作中并不是絕无仅有的。恰恰相反，正如列宁常有的情况那样，比較透彻地說明事态发展的新公式往往变成他在一整个时期所发表的演說和論文的軸心。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宁說道：

“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我們同全体农民一起去夺取政权。这是資產階級革命，因为农村中的階級斗爭还没有展开。”^①

下面一段話是列宁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党代表大会上說的：

“在无产階級在农民的帮助下取得政权、充当了小資產階級革命的代理人的国家里，在組織貧农委员会以前，也就是在一九一八年夏天甚至秋天以前，我們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資產階級革命。”^②

這些話是列宁經常在不同的場合以不同的形式所重复的。然而，拉狄克却干脆避开列宁的这个在爭論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本思想。

列宁說，无产階級在十月是同农民一道取得政权的。就因为这一点，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这种說法正确嗎？在一定的意义上，是正确的。但是这一点意味着，真正的无产階級和农民民主专政，也就是实际上摧毁了专制和农奴政制并夺取了封建主的土地的那种专政，不是在十月以前而只是在十月以后才完成的；这种专政，用馬克思的話來說，是以依靠农民战争的无产階級专政的形式完成的——然后，經過几个月，开始长入社会主义专政。107
这一点真是那么难以理解嗎？今天在这一点上还可能有意見分歧嗎？

①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174頁。

②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132頁。

在拉狄克看来，“不断”論的罪恶在于把资产阶级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合起来了。然而，实际上，阶级的动力是这样彻底地“混合了”即合并了这两个阶段，以致我们的不幸的形而上学家落到連綫索也不再能找到的地步。

的确，在《总结与展望》中有許多缺陷和許多不正确的論点。但是，这本书毕竟不是写于一九二八年，而是远在十月以前——在一九〇五年十月以前。不断革命論中的缺陷問題，或者更确切地說，当时我对这个理論所提出的基本論据中的缺陷問題，拉狄克甚至沒有接触到；因为他追随他的老师們——不肖門徒們——攻击的不是这个理論的缺陷，而是这个理論的那些已为历史发展进程所证实了的有力方面；同时他是从列宁的論述（拉狄克並沒有彻底研究过或者透彻地思考过）中得出完全錯誤的結論并用这些結論来攻击那些有力方面的。

总的來說，整个不肖門徒派引用过去說过的話来騙人达到了十分特殊的水平，这种做法一点也沒有切断真正的历史进程。但是，当“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对者不得不去分析十月革命的实际发展情况，不得不认真地和誠实地进行这种分析的时候（他們当中有些人还能断断续续地这样做），他們却不可避免地得出一些符合他們所反对的那种理論的論点。关于这一点，我們可以在阿·雅柯夫列夫专门論述十月革命史的著作中找到最明显的证据。这位作者目前是統治派的一根支柱^①，毫無疑問，他比其他斯大林主义者，特别是比斯大林本人要有学問些，他对旧俄的阶级关系是这样說的：

“我們看到农民暴动（一九一七年三月到十月）的双重局限性。这种暴动本身发展到农民战争水平，並沒有克服它的局限性，沒有

^① 雅柯夫列夫最近已被任命为苏联农业人民委員。——列·托·

打破摧毀周围地主这项紧迫任务的范围；沒有使自己轉变为有組織的革命运动；沒有超过农民运动所特有的原始暴乱的性质。

“农民暴动就其本身來說——一种其目的只限于消灭周围地主的原始暴动——是不能取得胜利的，是不能摧毀敌視农民而支持地主的国家政权的。这就說明了为什么土地运动只有在相应的城市階級的領導之下才有可能取得胜利……正因为如此，所以土地革命的命运，归根到底不是决定于几十万个农村，而是决定于几百个城市。只有在全国中心地点給予資产階級致命打击的工人階級，才能使农民暴动取得胜利；只有工人階級在城市中取得胜利，才能使农民运动突破亿万农民同成千上万的地主发生原始冲突的框框；最后，只有工人階級取得胜利，才能为新型的农民組織（它使貧农和中农所联合的不是資产階級而是工人階級）奠定基础。农民暴动取得胜利的問題就是工人階級在城市中取得胜利的問題。

“当工人在十月給予資产階級政府决定性打击的时候，他們也就順便解决了农民暴动取得胜利的問題。”

他又說：

“……問題的整个实质在于这一点，即由于历史所决定的条件，資产階級俄国在一九一七年同地主結成了联盟。甚至最左的資产階級派別，如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只不过是安排一种有利于地主的交易。俄国革命的条件和一百多年以前法国革命的条件之間最重要的差別就在于此……农民革命在一九一七年作为資产階級革命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完全正确！——列·托·）有两条道路展現在农民革命的面前。或者是在資产階級和地主的打击之下失敗，或者是作为一种伴随并輔助无产階級革命的运动取得胜利。俄国工人階級由于接受了法国大革命中資产階級的使命，由于接受了領導土地民主革命的任务，因而才有可能实现胜利

109

的无产階級革命。”（《一九一七年的农民运动》，国家出版社一九二七年版，第X—XI、XI—XII頁）

在雅柯夫列夫的論据中，有些什么基本要素呢？农民沒有能力担当独立的政治角色；由此而产生的城市階級担任領導角色的不可避免性；俄国資产階級在土地革命中难以担任領袖角色；由此而产生的无产階級担任領導角色的不可避免性；无产階級作为土地革命的領袖夺取政权；最后，建立依靠农民战争和开辟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无产階級专政。这些要素从根本上摧毁了关于革命的“資产階級”性质或者“社会主义”性质这一問題的形而上学的提法。問題的要点在于这一事实，即构成資产階級革命基础的土地問題，在資产階級的統治之下是不能得到解决的。无产階級专政在舞台上出現，不是土地民主革命完成以后的事，而是完成这一革命的必要先决条件。一言以蔽之，在雅柯夫列夫的这一回顾过去的概述中，我們可以看到我在一九〇五年所表述的关于不断革命論的所有基本要素。对我來說，这是一个历史預断的問題；而雅柯夫列夫在第一次革命以后二十二年和十月革命以后十年，才根据全体青年研究工作者的初步研究对三次革命事件作出結論。那末以后呢？雅柯夫列夫就几乎完全重复我在一九〇五年所提出的論点。

然而，雅柯夫列夫对不断革命論采取的究竟是什么态度呢？他所采取的态度适合于每个想保住职位和甚至想爬得更高的斯大林主义官員。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雅柯夫列夫怎样把他对十月革命动力的估价同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調和起来呢？非常简单，他根本沒有考虑这种調和。正如沙皇时代的一些自由派官員一样，他們承认达尔文的理論，但同时也定期参加圣餐礼。雅柯夫列夫也是用参預形式主义地欺侮不断革命这一代价，买到了不时地表达馬克思主义思想的权利。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十几个。

还有一点要补充，雅柯夫列夫完成上面所引用的那部关于十月革命史的著作，并不是出自他自己的倡議，而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的一项決議，这项決議同时委托我編审雅柯夫列夫的著作。^①当时，列宁还有恢复健康的希望，因此任何一个不肖門徒都沒有想到就不断革命論掀起一場人为的爭論。无論如何，作为前者，或者更确切地說，作为被推荐的十月革命史的編者，我可以十分滿意地指出，在所有引起爭論的問題中，这位作者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使用了我在那本遭到禁止、被认为异端的不断革命論著作（《总结与展望》）中所提出的那些論点。

列宁本人对布尔什維克口号的历史命运所作的全面估价肯定地表明，两条路綫即“不断”路綫和列宁路綫之間的差別只有次要的和附属的意义；而使二者联系起来的東西倒是最根本的。这两条被十月革命完全揉合在一起的路綫的这种基础，不仅同斯大林的二——三月路綫和加米涅夫、李可夫和季諾維也夫的四——十月路綫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不仅同斯大林、布哈林和馬尔丁諾夫的整个中国政策有不可調和的矛盾，而且同拉狄克的現行“中国”路綫有不可調和的矛盾。

在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八下半年之間根本改变了自己对准则的看法的拉狄克，企图加罪于我，說我不了解“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复杂性”，我可以这样回答：二十三年前我在《总结与展望》中所发展了的基本思想体系，我认为事态的发展已經证实了它是完全正确的；而正因为如此，所以它同布尔什維主义的战略路綫是一致的。

111

特别是，我没有看到有一点理由把我一九二二年在我写的《一

^① 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中央委员会組織局會議記錄第二十一号摘录：“茲任命雅柯夫列夫同志……編纂一本关于十月革命史的教科书，由托洛茨基同志审定。”——列·托·

九〇五年》一书的序言中論述不断革命的任何一点收回。这本书在列宁在世的时候出版了无数版次，印刷了无数次，当时全党都在閱讀它和学习它。这本书只是到一九二四年秋天才使加米涅夫感到“不安”，拉狄克則到一九二八年秋天才第一次感到“不安”。

这篇序言中說，“正是在一月九日到十月罢工期間，作者形成了后来被称为‘不断革命論’的那些意見。这个有些不寻常的名称表达了这样一种想法，即直接面临資产階級任务的俄国革命絕不能停留在这些任务上。除非使无产階級掌握政权，否則革命是不可能解决它的迫切的資产階級任务的……

“这种估价已經被证实为完全正确，虽然經過了十二年的時間。俄国革命不能在建立了資产階級民主政制以后就結束。它必須把政权轉交給工人階級。如果說工人階級在一九〇五年还太弱以致不能夺取政权，那末，它必須不在資产階級民主共和国中而在六月三日沙皇統治^①的非法状态下成熟和壮大起来。”（列·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序言，第4—5頁）

我还想援引一段我就“民主专政”口号所进行的最尖銳的論战。一九〇九年，我在罗莎·卢森堡的波兰文机关报上写道：

“孟什維克从‘我們的革命是資产階級性质的’这一概念出发，而归結为这样一种想法，即无产階級的整个策略要适应自由資产階級的行动，一直到夺取了国家政权为止；布尔什維克則从‘民主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这一同样赤裸裸的概念出发，而归結为掌握政权的无产階級应当自我控制在資产階級民主的范围以內这样一种想法。二者在这一問題上的分歧的确是十分重要的：孟什維主义的反革命方面今天已經充分地表現出来，而布尔什維主义的反革命特点只有在革命取得胜利以后才有可能变成巨大的

^① 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俄历十六日），政变完成，从此正式开始了张牙舞爪的反革命时期。——英譯者注

危險。”

有这一段話的那篇論文，收在我的《一九〇五年》一书的俄文版中，我在一九二二年五月对这段話作了这样的注释：

“大家知道，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因为布尔什維主义在列宁的领导下（虽然并不是沒有內部斗争）在一九一七年春天，即夺取政权以前，在这个最重要的問題上完成了意識形态上的重新武装。”

这两段引证从一九二四年以来一直遭到猛烈的批評。現在，过了四年以后，拉狄克也参加到这种批評当中去了。然而，如果正直地思考一下上面所引证的話，那末就必须承认，这些引证包括一个重要的預断和一个同样重要的警告。事实仍然是，在二月革命的时候，所有的所謂布尔什維克“老近卫軍”都采取了用民主专政赤裸裸地对抗社会主义专政的立場。列宁最亲近的学生們根据他的“代数学”公式作出了一种純粹形而上学的解释，并且用来反对革命的实际发展。在最重要的历史轉折点，俄国的布尔什維克最高领导采取了一种反动的立場，如果不是碰巧列宁回国，他們是有可能在为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而斗争的旗帜下扼杀十月革命的，就像他們后来扼杀中国革命那样。拉狄克很虔誠地把党的整个领导阶层的錯誤立場說成是一种“偶然”現象。但是，对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斯大林、莫洛托夫、李可夫、加里宁、諾金、米柳亭、克列斯廷斯基、伏龙芝、雅罗斯拉夫斯基、奥尔忠尼启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以及十几个其他“老布尔什維克”的庸俗的民主立場进行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承认布尔什維克老代数学公式包含着某种危險，难道不是更正确些嗎？政治发展使这个公式有了一种敌視无产階級革命的内容，这是含糊不清的革命公式所常有的現象。不言而喻，如果列宁当时住在俄国，看到党每天特别是战争期間的发展，那末，他一定会及时地給予必要的糾正和澄清。

113

对革命幸运的是，列宁回国虽然晚了一点，但相当快地担負起必要的重新武装意識形态的工作。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和普通党员的革命压力（这是布尔什維主义以前进行的全部工作所准备的），使列宁有可能在反对最高领导的斗争中，不顾他們的反抗，而在充裕的时间內把党的政策轉到新軌道上来。

难道真的因而我們今天必須在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国家接受一九〇五年列宁的那个具有代数学形式的即含糊不清的公式，并且让中国和印度的斯大林和李可夫（即譚平山、罗易^①等人）用小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内容来充实这个公式，然后等待一个列宁及时地出現，进行四月四日的那种必要的糾正嗎？但是，对中国和印度來說，这种糾正有保证嗎？如果对这个公式进行已为俄国和中国的历史經驗证明为有必要的那些具体糾正，不是更合适些嗎？

上面的話是不是意味着，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口号簡直应当理解为一种“錯誤”呢？現在，大家知道，人的一切思想和行动都分为两种范畴：一种是絕對正确的，即符合“总路綫”的；一种是絕對錯誤的，即离开这条路綫的。当然，这并不妨碍今天是絕對正确的到明天被宣布为絕對錯誤的。但是在“总路綫”出現以前，思想的实际发展也会判断出不断接近真理的方法。即使数学中的簡單除法，在选择数字上也必須經過实验；开始选择的数字可能大些或者小些，然后在試驗的过程中选中一个而否定掉所有其他数字。炮兵在对准目标的时候，那种逐步接近目标的方法被称为“交叉”。在政治中，也絕對不能避免接近法。整个問題在于，及时地了解沒有打中就是沒有打中，并且毫不拖延地进行必要的糾正。

114

列宁公式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这一事实：在新历史时期的条件之下，它彻底地弄明白了最重要的理論和政治問題之一，即各种

^① Manabendra Nath Roy, 1893—，印度劳工領袖，一九二〇年任共产国际远东部領導人，后来叛变。——中譯者注

各样的小資產階級集团——首先是农民——所达到的政治独立程度問題。布尔什維克在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七年取得的經驗，由于它的完整性，牢固地对“民主专政”关上了大門。列宁用自己的手在这扇大門上写下了这样的字样：不准进入——不准出去。他用下面的話說明了这一点：农民不是跟着資產階級走，就是跟着工人走。然而，不肖門徒們却完全忽視布尔什維主义旧公式所得出的这个結論，并且同这个結論相反，他們尊崇一个临时的假設，把它写在綱領中。总的來說，不肖門徒的本质确实就在于此。

第六章 論跳过历史阶段

拉狄克并不仅仅是重复近年来官方提出的一些批評，如果可能的話，他有时还把这些批評簡單化。根据他的說法，無論是在一九〇五年或者今天，我对資產階級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对东方和西方，都根本沒有加以区别。拉狄克追随着斯大林，也在不容許跳过历史阶段这一点上教导我。 115

必須首先提出的問題是：如果在一九〇五年对我來說，只不过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問題，那末，为什么当时我认为落后的俄国可以比先进的欧洲更早些开始这种革命呢？是由于爱国主义嗎？是由于民族自豪感嗎？可是不曉得为什么，情况正好是那样。拉狄克是不是了解，如果民主革命作为一个独立的阶段在俄国已經实现，那末，我們今天就不应当有无產階級专政。如果无產階級专政来到这里比来到西方更早些，那正是而且只是因为历史把資產階級革命的主要内容同无產階級革命的第一阶段結合起来了——不是把它們混合起来，而是把它們有机地結合起来了。

把資產階級革命同无產階級革命区别开来，这是政治的 A B C。但是在 A B C 以后，接着来的是音节，也就是字母的結合。历

史所完成的正是这样一种結合，即资产階級字母当中最重要的字同社会主义字母当中最前面的字結合起来。然而，拉狄克却想把我們从已經完成的音节拉回到字母。这是悲慘的，但确是这样。

說阶段总的來說是不能跳过的，这是胡說。活生生的历史进程常常要跳过某些个别的“阶段”（这些阶段是根据整个的也就是最充分的发展进程从理論上分成的若干組成部分形成的）。在严酷的时刻对革命政策的要求也是这样。可以說，一个革命者同一个庸俗的演变主义者的第一个区别，就在于能否認識并利用这种时刻。

馬克思把工业的发展分成手工业、工場手工业和工厂，这是政治經济学或者更确切地說是历史經济理論的A B C。然而，在俄国，工厂是跳过工場手工业和城市手工业时期而产生的。这是历史音节中已經存在的一个音节。在我国，在階級关系和政治中也发生过类似的进程。如果不知道分成手工业、工場手工业和工厂这三个阶段的馬克思主义方案，就不可能理解俄国現代史。但是，如果只知道这一点，那还是一无所知。因为事实是，俄国的历史——斯大林不应当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待它——跳过了一些阶段。然而，理論上的阶段区分，对俄国來說还是必要的，否則就既不能理解这种跳过意味着什么，也不能理解这种跳过的后果是什么。

問題还可以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待（正如列宁偶然看待双重政权那样），这样就可以說，俄国也经历了馬克思所划分的所有三个阶段——不过，头两个阶段是以一种极其紧縮的、萌芽的形式出現的。这些“退化器官”，即手工业阶段和工場手工业阶段——只不过概括为音符的小点，姑且这么說——已經足以证实經济进程所固有的統一性。然而，这两个阶段在数量上减縮得这样多，以致民族的整个社会結構产生了一种崭新的质量。这种新“质量”在政治

中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十月革命。

在这种讨论中，最难以容忍的是斯大林的“理论化”，还有构成他的整个理论行囊的两件小装饰品：“不平衡发展规律”和“阶段不可跳过”。斯大林直到今天还不懂得，阶段的跳过（或者在一个阶段停留得过久）正是不平衡发展所包括的东西。斯大林针对着不断革命论，以无比严肃的姿态提出不平衡发展规律。可是，历史上落后的俄国可以比先进的英国更早地达到无产阶级革命这一预言，正是完全建立在不平衡发展规律上面的。然而，要作出这种预言，就必须从整个活生生的具体情况中去理解历史的不平衡性，而不仅仅是不断地重复列宁在一九一五年说过的话（这些话已经被人们弄得本末倒置和用粗鄙的态度进行解释）。 117

历史“阶段”的辩证法在革命上升时期，相对地来说是容易理解的。反过来说，反动时期自然可以成为廉价的演变主义时期。斯大林主义，这个很庸俗的思想意识，这个党的反动的掌上明珠，就创造了一种对它自己分阶段前进的迷信，以掩饰它在政治上的尾巴主义和为了一文不值的東西而喋喋不休的作风。这种反动的意识形态现在也卷走了拉狄克。

历史进程的这个阶段或那个阶段，虽然从理论上说不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某些条件下却可以被证明为不可避免的。反过来说，理论上“不可避免的”阶段，也可以为发展的动力压缩得无影无踪，特别是在并不是毫无缘故地被称为历史火车头的革命期间。

例如，在我国，无产阶级就“跳过了”民主议会主义阶段，而只容许立宪会议存在几个小时，甚至连这几小时也是在后院度过的。但是，在中国，反革命阶段是绝不可能跳过的，正如俄国的四届杜马时期不能跳过一样。然而，目前中国的反革命阶段，从理论上说绝不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斯大林和布哈林（他们将以失败的组织者载入史册）的灾难性政策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但是，机会主义

所帶來的結果已經變成一個可以長期阻撓革命進程的客觀因素。

118 任何試圖跳過真正的即為客觀所決定的群眾發展階段的做法，都是政治上的冒險主義。只要大多數勞動群眾還信任社會民主黨人或者姑且說國民黨或者工會領袖，我們就不能向他們提出立即推翻資產階級政權的任務。群眾必須為此進行準備工作。準備工作可以被證明為一個很長的“階段”。但是只有尾巴主義者才有可能認為，我們必須“同群眾一道”首先坐在國民黨右派內，然後坐在國民黨左派內，或者同工賊柏塞爾保持聯盟關係，“一直到群眾對他們的領袖的幻想破滅為止”——而在這期間，我們就用我們的友誼支持這些領袖。

拉狄克大概很難忘記，有許多“辯證學家”把退出國民黨的要求和同英俄委員會的決裂說成不是別的，而是跳過階段，此外，也是同農民決裂（在中國），同勞動群眾決裂（在英國）。拉狄克對於這一點應當記得更為清楚，因為他本人就是這種可悲的“辯證學家”之一。現在他只不過是正在加深和擴大他的機會主義錯誤。

一九一九年四月，列寧在一篇綱領性的論文《第三國際及其在歷史上的地位》中寫道：

“我們這樣說是不會錯的：正是俄國的落後和它向最高形式的民主的‘飛躍’（即越過資產階級民主而達到蘇維埃民主或無產階級民主）之間的矛盾，正是這個矛盾使西方了解蘇維埃的作用特別難或特別慢……”^①

列寧在這裡直截了當地說，俄國已經“越過資產階級民主”。誠然，列寧的話裡暗含著一切必要的考慮：畢竟辯證法並不就是每次都重複一切具體條件；作者假定讀者自己也已經有一些概念。但是，儘管如此，越過資產階級民主還是保留下來，而按照列寧的正

① 《列寧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 275 頁。

确看法,这种越过会使一切教条主义者和方案主义者(不仅“西方” 119
的,而且也包括东方的)难于了解苏维埃的作用。

关于这个问题,在《一九〇五年》一书(这本书现在突然使拉狄克这样感到不安)的序言中是这样论述的:

“早在一九〇五年,彼得堡的工人就把他们的苏维埃称为无产阶级政府。这个名称成为当时天天说的话,并且完全体现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纲领中。然而,与此同时,为了反对沙皇制度,我们也制定了一个精心写出的政治民主纲领(普选、共和制度、民兵,等等)。我们不可能有别的方法。政治民主是劳动群众发展中的一个必要的阶段——但有一项很重要的保留,即在一种情况下,这个阶段可以存在几十年,而在另一种情况下,革命形势却使群众从政治民主的偏见中把自己解放出来,甚至在这种制度成为现实以前。”(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序言第7页)

顺便指出,这一段话是完全符合上面所说的列宁的想法的。我想,这一段话可以充分地说明,为了反对国民党专政,必须制定一个“精心写出的政治民主纲领”。但正是在这一点上,拉狄克向左摇摆。在革命上升时期,他反对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在反革命专政时期,他反对在民主的口号下把中国工人动员起来。这就等于夏天穿皮大衣而冬天打赤膊。

第七章 民主专政的口号今天 对东方意味着什么?

沉溺于斯大林主义的——演变的、实利主义的而不是革命的——历史“阶段”概念的拉狄克,现在也努力为整个东方推崇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口号了。拉狄克根据布尔什维主义的这个“理论上的假设”(列宁使这个假设适应一个具体国家的发展过 120

程,把它加以改变,具体化,而在一定的阶段抛弃了它)却制訂了一个超历史的方案。在这一点上,他在論文中一再重复这样一段話:

“这个理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策略,是适用于一切資本主义发展还在青年时期的国家的,在这种国家里,資产階級还没有消除以前的社会—政治結構作为遺產留下来的問題。”

只要回想一下这个公式:这不是对一九一七年加米涅夫的立場的一种严肃的辯护嗎?俄国資产階級在二月革命以后是不是“消灭”了民主革命的問題呢?沒有,这些問題并没有解决,其中包括最重要的土地問題。列宁怎么能够不理解这个老口号还是“适用的”呢?他为什么撤回了这个口号呢?

121 关于这一点,拉狄克以前已經向我們作出了答复:因为这个口号已經“实现了”。我們考察了这个答复。这个答复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而出于拉狄克之口尤其不能成立,因为他的看法是,这个列宁主义老口号的本质根本不在于政权的形式,而在于无产階級和农民通过合作而真正消灭农奴制度。但这正是克伦斯基主义所沒有做到的。由此可見,拉狄克为了解决当前最尖銳的問題中国問題而扯到我們的过去,是荒謬絕伦的。应当加以調查的并不是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了解什么或者不了解什么,而是斯大林、莫洛托夫,特别是李可夫和加米涅夫在一九一七年二三月沒有抓住什么(当时拉狄克采取什么立場,我不知道)。因为如果认为民主专政在双重政权中已經“实现”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需要立即改变中心口号,那末,必須承认,在中国,“民主专政”通过国民党政权,即通过蔣介石和汪精卫的統治(而以譚平山为附属品)^①,实现得更充分更彻底。因此,最需要的是改变在中国的口号。

但是,难道“以前的社会—政治結構的遺產”在中国还没有清

^① 蔣介石是国民党右翼領袖,汪精卫是左翼領袖。譚平山是共产党部长,执行斯大林和布哈林在中国的路綫。——列·托·

除掉嗎？沒有，還沒有清除掉。那末，到一九一七年四月四日，列宁对整个上层“老布尔什維克”宣战的时候，这种“遗产”在俄国是不是清除了呢？拉狄克自相矛盾得不可救药，混乱不堪，左右摇摆。关于这一点，让我们指出，他使用“结构的遗产”这样复杂的说法，在这上面玩弄各种各样的花样，而显然避免比较清楚的术语“封建主义或农奴制的残余”，这并不完全是偶然的。为什么呢？因为拉狄克仅仅在昨天还最明确地否认这些残余，这样就摧毁了民主专政口号的任何基础。拉狄克在共产主义学院所作的报告中說：

“中国革命的根源的深度并不减于我們的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根源。人們可以肯定地断言，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在那里将比一九〇五年在我們这里强大得多，唯一的理由是，这个联盟不是反对两个阶级，而是只反对一个阶级——资产阶级。”

122

是的，“唯一的理由”。当无产阶级同农民一道把斗争指向反对一个阶级即资产阶级——不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残余，而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时候，如果你愿意的话，这样一种革命叫做什么革命呢？也许叫做民主革命吧？請只注意这一点：拉狄克說这一番話不是在一九〇五年，甚至也不是在一九〇九年，而是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如何理解这一点呢？很简单。一九二七年三月，拉狄克也离开了正确的道路，而走向另一个方向。反对派在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綱中，对拉狄克当时的片面看法作了一项最重要的改正。但是，在刚刚引用的那段話中，还是包含着真理的核心的：中国几乎不存在地主阶级，土地所有者同资本家的联系比在沙皇俄国密切得多，因此，土地問題在中国所占的具体比重比在沙皇俄国輕微得多；但是另一方面，民族解放的問題占很大的比重。因此，中国农民为了国家的民主革新而进行独立革命政治斗争的能力，肯定超不过俄国农民。这一点特别表现在这一事实上，即无论在一九

二五年以前，或者在中国革命的三年期間，都沒有出現一个民粹派，把土地革命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面。所有这些都表明，民主专政的公式，对于已經拥有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經驗的中国比对于二月革命以后的俄国，是一个更加危險得多的反动的陷阱。

拉狄克还有一次扯到甚至更为遙远的过去，但这正是无情地反对他自己。这次是关于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提出的不断革命口号：

“在馬克思方面，”拉狄克写道，“並沒有提出民主专政的口号，而在列宁方面，从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七年，这个口号却是政治軸心，并且形成他对于所有[?!]处于資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国家中的革命的概念的一个組成部分。”

拉狄克根据列宁的几句话，这样解释这种立場的不同：德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民族統一**，而在俄国，中心任务却是**土地革命**。如果不把这种对比机械化，而保持一种比例，那末，在一定的程度上，它是正确的。可是中国的情况又如何解释呢？在中国，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民族問題所占的具体份量比甚至一八四八至一八五〇年的德国土地問題要重大得无可比拟；因为在中国，民族問題既是統一的問題，也是解放的問題。馬克思在表述他的不断革命前景时，德国的所有王权还屹立不动，容克地主还掌握着土地，而資產階級只被容許进入政府的接待室。在中国，从一九一一年以来已經沒有君主政体，独立的地主階級也不存在了，民族資產階級国民党掌握着政权，而农奴制关系已經同資產階級剝削——姑且說——化学地融合在一起。因此，拉狄克对馬克思和列宁的立場所进行的对比完全說明，它是反对在中国提出民主专政的口号的。

但是，拉狄克甚至沒有严肃地而只不过是偶然地、枝节地采取馬克思的立場，他把自己局限于一八五〇年的传单，在这个传单中，馬克思还把农民看作小資產階級城市民主派的天然同盟者。当

时馬克思所期待的是在德国出現一个独立的民主革命阶段，也就是說，城市小資产階級激进派在农民的支持下暂时掌握政权。这就是問題的症結所在！然而，这也正是沒有发生的事。而且沒有偶然发生过。早在上世紀中叶，小資产階級民主派就表明自己沒有力量实现它自己的独立的革命。馬克思是考虑到这个教訓的。一八五六年四月十六日——即在上面提到的传单发表以后六年——馬克思写信給恩格斯說：

“德国的全部事情，都将以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农民战争来协助无产阶级革命为轉移。如果有这样的可能，那就好了。”^①

这一段被拉狄克完全忘記了的話，是了解十月革命以及我們在这里全面探討的整个問題的真正寶貴的钥匙。馬克思是不是跳过了土地革命呢？沒有，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他並沒有跳过土地革命。他是不是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合作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是必要的呢？是的，他是认为必要的。他是不是认为农民有可能在革命中担任领导角色或者甚至仅仅担任一个独立的角色呢？不是，他并不认为有这种可能性。他的出发点是，在独立的民主革命中沒有做到支持資产階級民主派的农民（这是資产階級民主派的过錯，而不是农民的过錯），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会处于支持无产阶级的地位。“如果有这样的可能，那就好了。”拉狄克显然不願意看到，这正是十月所发生的事情，而且发生得并不坏。

124

至于中国，从这里得出的結論是十分清楚的。爭論的并不是农民作为同盟者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不是土地革命的伟大意义，而是在中国是不是有可能进行独立的土地民主革命，或者“某种再版农民战争”是不是会支持无产阶级专政。問題只能这样提出。誰要是从另一个角度提出問題，誰就沒有学到东西，一无所知，而只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五年版第 454 頁。

会使中国共产党陷于混乱，使它脱离正轨。

为了使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有可能打开通向胜利的道路，斯大林和馬尔丁諾夫关于“阶段”和“步骤”的卖弄的反动理論，必須从一开始就消灭，必須抛弃，粉碎，用扫帚清除掉。布尔什維主义就是在反对这种庸俗的演变主义的斗争中成长到成熟阶段的。我們必須使自己适应的并不是事先提出的前进路綫，而是阶级斗争的实际过程。必須拒絕斯大林和庫西宁的这种想法——为各种发展水平的国家规定继承的次序，事先給它們分派不同的革命配給证。必須使自己适应阶级斗争的实际过程。关于这一点的一个难以估計的指南就是列宁；但是必須考虑整个列宁。

一九一九年，列宁特別联系共产国际的組織把过去一个时期所得出的結論統一起来，給予这些結論一个更加完善的理論上的闡述，当时他这样說明克伦斯基主义和十月的經驗：在一个阶级对抗已經有所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只能是公开的或隱蔽的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任何中間性的政制都根本談不上。每种民主，每种“民主专政”（这个带有諷刺意味的引号是列宁加的）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統治的一种面罩，这是最落后的欧洲国家俄国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即最有利于“民主专政”的时期的經驗所表明的。这个結論被列宁用来作为他的民主提綱的基础，而这个提綱只是作为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經驗总和提出来的。

像許多人一样，拉狄克也是机械地把民主問題同民主专政問題截然分开。这是鑄成大錯的根源。“民主专政”在革命时期只可能是带着假面具的资产阶级統治。这就是我們的一九一七年“双重政权”的經驗以及中国国民党的經驗所教导我們的。

不肖門徒們的不可救药最完整地表现在这一事实上，即甚至到現在，他們还企图把民主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但是这一点意味着，民主专政必須具有中間性质，也

就是說，必須有小資產階級的內容。無產階級參加這種專政並沒有改變情況，因為從本質上說，並沒有各種各樣的階級路線得出一個算術上的平均數這樣的事情。如果民主專政既不是資產階級專政，也不是無產階級專政，那末，就必然是由小資產階級擔任**斷定的和決定性的**角色。但是，這就使我們又回到三次俄國革命和兩次中國革命的實踐所已經回答了的這個問題：在帝國主義進行世界統治的條件之下，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甚至這種國家還是面前擺着需要解決其民主任務的落後國家這樣一個問題的時候，今天小資產階級能夠擔任領導的革命角色嗎？

126

過去曾經出現過一些小資產階級下層能夠建立其革命專政的時期。這是我們所知道的。但是在那些時期，當時的無產階級或者無產階級的先驅還沒有同小資產階級截然分開，恰恰相反，他們在自己沒有發展的條件下反而形成小資產階級的战斗核心。今天的情況完全不同了。我們不能說小資產階級有能力指導今天的生活，即使是在落後的資產階級社會，因為無產階級已經同小資產階級分開，同時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上同大資產階級展開了鬥爭，而這種資本主義發展使小資產階級成為無足輕重的東西，同時使農民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面臨着不可避免的政治選擇。每次農民決定支持一個從表面上看好像是小資產階級的政黨的時，實際上是用自己的脊背支持了財政資本。在第一次俄國革命時期，或者在頭兩次革命之間的時期，關於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獨立程度**（但只是程度！），還可能存在着意見分歧，現在，這個問題已為近十二年來的整個事態發展進程所決定，而且無可變更地決定了。

十月以後，這個問題在許多國家以各種可能的形式和組合在實踐中重新提出來，而在每個地方都是以同樣的方式解決的。在克倫斯基主義的經驗以後，一項基本經驗上面已經提到，那就是國

民党的經驗。但是，同样重要的还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經驗，在那里，小資產階級拿着武器从旧資產階級政党手中把政权夺取过来，然后立即通过自己的領袖把它拱手让給財政寡头。波兰也发生过同样的問題，在那里，毕苏斯基运动的目的是直接反对反动的資產階級—地主政府，它反映了小資產階級群众、甚至广泛的无產階級群众的希望。老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华斯基由于害怕“低估农民”，把毕苏斯基革命同“工农民主专政”混为一談，这并不是偶然的。如果我在这里分析保加利亚的經驗，即科拉罗夫^①之流和卡巴克契也夫之流对斯塔姆博利斯基^②党所采取的那种可耻的混乱政策，或者美国农工党的可耻的實驗，或者季諾維也夫同拉迪奇^③的浪漫史，或者羅馬尼亚共产党的經驗，以及不胜枚举的其他事例，那就会使我們离題太远。这些事实有一些基本上已經在我的《共产国际綱領草案批判》一书中进行了分析。所有这些經驗的基本結論充分证实并強調了十月的教訓——即小資產階級，其中包括农民，無論是在革命时期或者是在反动时期，在現代的即使落后的資產階級社会中都不能担任領袖的角色。农民可以支持資產階級专政，也可以成为无產階級专政的支柱。中間性的形式仅仅是資產階級专政的幌子，这种专政或者已經开始动搖，或者經過騷乱以后还没有重新站稳脚跟（如克伦斯基主义、法西斯主义、毕苏斯基政权）。

农民可以追隨資產階級，也可以追隨无產階級。但是，如果无產階級不惜一切代价試圖同沒有跟着它走的农民一道前进，那末，

① Василь Петров Коларов, 1877—1950, 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二至一九四三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員，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書記。——中譯者注

② Александр Стамболйиский, 1879—1923, 保加利亚农民联盟領袖。——中譯者注

③ Стефан Радич, 1871—1928, 克罗地亚农民党的組織者之一。——中譯者注

事实上它是在尾随着财政资本：如一九一七年作为祖国保卫者的俄国工人；中国国民党内的工人——其中也包括共产党人；一九二六年波兰社会党内的工人以及一部分共产党人，等等。

誰要是沒有把这一点想透，誰要是沒有从事态发展所留下来的新鲜痕迹当中去了解事态的发展，那末，他最好不要卷入革命政治。

列宁从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教训中所得出的——透彻地全面地得出的——基本结论，彻底地否定了“民主专政”的概念。下面是列宁在一九一八年以后说过不止一次的话：

128

“全部政治经济学（如果从中学到一点什么的话）、全部革命史、全部十九世纪政治发展史都告诉我们，农民不是跟工人走，就是跟资产阶级走……要是你们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奉劝这样的先生们……去想一想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任何一次大革命的发展和十九世纪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史吧。它会告诉你们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是这样的：能够成为统治力量的只有资本或打倒资本的无产阶级。在这个社会的经济中，其他的力量是没有的。”^①

在这里，并不是现代英国或德国的事情。在十八世纪或十九世纪任何一次大革命即落后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教训的基础上，列宁得出的结论是，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民主”专政，即中间性的专政。

* * *

拉狄克在理论上和历史上所进行的探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概括为资产阶级革命必须同社会主义革命区别开来这样一句相当肤浅的格言。拉狄克落到这种“地步”，只好直截了当向库西宁伸出一个指头，而库西宁从他的唯一靠山即“常识”出发，认为无产阶

^① 《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330—331页。

級專政的口號大概不可能既在先進的國家提出，也在落後的國家提出。庫西寧以一個一無所知的人所特有的那種坦率態度，斷定托洛茨基從一九〇五年以來“什麼也沒學到”。拉狄克跟在庫西寧後面也諷刺地說，對托洛茨基來說，“中國革命和印度革命的特點恰好在於這一事實，即它們同西歐革命根本沒有什麼區別，因此必須在採取最初的步驟[?!]時就導致無產階級專政。”

拉狄克在這方面忘記了一點：無產階級專政並沒有在一個西歐國家中實現，而恰恰是在一個落後的東歐國家中實現了。歷史進程忽略了俄國的“特點”，這難道是托洛茨基的過錯嗎？拉狄克還忘記了，資產階級——更確切地說，財政資本——在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着統治，而這些國家各有其發展水平、社會結構、傳統，等等，也就是說，各有其“特點”。同樣，不尊重這種特點的是歷史的發展，而根本不是托洛茨基。

那末，先進國家和落後國家的區別究竟在哪裡呢？區別是巨大的，但這種區別還在資本主義關係占統治地位的范围以內。資產階級統治的方式和方法在不同的國家有很大的不同。在這一頭，統治具有完整的和絕對的性質，如美國。在另一頭，財政資本使自己適應過時的亞細亞中世紀制度，它使這種制度從屬於自己，並把自己的方法強加在這種制度上，如印度。但是，在這兩個地方，都是由資產階級進行着統治。由此可見，在不同的資本主義國家中，根據社會基礎、政治形式、當前任務以及工作速度來說，無產階級專政也會有很不相同的性質。但是，要領導人民群眾戰勝帝國主義者、封建主義者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集團，只有在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導權之下才能做到，這種領導權在奪取政權以後將把自己轉變為無產階級專政。

拉狄克妄想，同我相反，他只要把人類分成兩個集團——一個“成熟”到可以實行社會主義專政，另一個則只“成熟”到實行民主

专政——就是已經考虑到不同国家的所謂“特点”。实际上，他端出来的是沒有生命力的老一套，这一套只能使共产党人忽視真正研究一个特定国家的特点，即这个国家历史发展的不同步調和阶段的活生生的相互交叉情况。

一个沒有实现或完成民主革命的国家，它的特点具有这样重大的意义，以致这些特点必須作为无产阶级先鋒队的綱領的基础。一个共产党只有在这样一个民族綱領的基础上，才能为爭取大多数工人阶级和一般劳苦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及其民主代理人而展开真正的有成果的斗争。 130

在这个斗争中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当然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于无产阶级在国家經濟中所担任的角色，因而也就是决定于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然而，这絕不是唯一的标准。同样重要的问题是，国内是否存在一个影响深远而迫在眉睫的“为了人民”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关系到民族的大多数，同时需要最勇敢的革命措施来解决它。在这一类问题当中，就有結合成各种不同形式的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在殖民地国家，由于存在着尖銳的土地问题和不可忍受的民族压迫，年輕而比較弱小的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的基础上可以比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在純粹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更早取得政权。自从十月以来，这一点本来似乎沒有必要再加以证明了。但是，通过意識形态反动的年代和不肖門徒們在理論上的墮落，革命的基本概念已經变得这样糟糕、这样丑恶以及这样……庫西宁化，以致人們不得不每次都从头开始。

根据以上所述，是不是可以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今天已經在这种程度上或那种程度上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呢？不，这是用一种虛伪的、死板的、学究的、斯大林布哈林主义式的方法提出问题。世界經濟就其整体来說，已經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国家单独地来說都成熟了。那末，在各种

应该译成:不仅落后的中国,一般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自己的民族界限以内建成社会主义,因为已经超出民族疆界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抵制在单个国家的框架内建成社会主义

131

131 各样的落后国家,在中国、印度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是怎样的呢?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回答是:历史并不是定做的。一个国家不仅在成熟到进行独立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前,而且在成熟到采取影响深远的社会化措施以前,就可以“成熟”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人们绝不能从社会发展的一种预先设想的和谐出发。尽管斯大林在理论上给以温柔的拥抱,不平衡发展规律还是存在。这个规律不仅在国家的相互关系中发生效力,而且在一个国家以内的不同进程的相互关系中也发生效力。经济和政治的不平衡进程,只有在世界规模上才能调和起来。具体地说,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不能完全在中国经济和中国政治的范围以内来考虑。

正是在这里,我们接触到两个相互排斥的观点:不断革命的国际革命理论和一国社会主义的民族改良主义理论。不仅是落后的中国,一般地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自己的民族界限以内建设社会主义,因为已经超出民族疆界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抵制在一个国家以内建设社会主义的,正像发展得不够的生产力抵制国有化一样。例如,在英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所遇到的困难和矛盾,同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将遇到的比起来,虽然在性质上的确有所不同,但是在程度上也许一点也不轻微。在这两种情况下,只有通过国际革命才能克服这些矛盾。这种观点没有为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熟”或“不成熟”问题留出余地。在这里不可辩驳的是,中国的落后使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极其困难。但是,我们要再说一遍:历史并不是定做的,因此中国无产阶级没有选择的余地。

这一点是不是至少意味着,每个国家,包括最落后的殖民地国家在内,如果说实行社会主义还不成熟,那末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成熟了呢?不,不是这个意思。那末,总的来说,特别是在殖

民地，民主革命的前途是怎樣的呢？什麼地方出現過這樣的說法——我用另一個問題來回答上面的問題——即每個殖民地國家都已經成熟到可以立即徹底解決其民族民主任務了？這個問題必須從另一方面去探討。在帝國主義時期的條件下，只有國家的社會和政治關係成熟到使無產階級作為人民群众的領袖掌握了政權的時候，民族民主革命才能取得徹底的勝利。如果情況還不是這樣呢？那末，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只會產生很有局限性的結果，而這種結果是完全反對勞動群众的。一九〇五年，俄國無產階級沒有強大到足以把農民群众團結在自己的周圍並奪取政權。就是因為這個原因，革命在半路上停下來，然後一點一點地消沉下來。在中國，儘管有非常有利的形勢，共產國際的領袖却阻止中國無產階級為奪取政權而鬥爭，結果在國民黨政權之下，民族任務只得到悲慘的、不穩定的和微不足道的解決。

一個殖民地國家在什麼時候和什麼條件之下才會成熟到對自己的土地問題和民族問題進行真正的革命的解決，這是無法預言的。但是，無論如何，今天我們可以完全肯定地斷言，不僅中國，而且包括印度，只有通過無產階級專政才會得到真正的人民民主，也就是工農民主。在這條道路上，可能還有許多階段、步驟和時期。資產階級在人民群众的壓力之下，還會採取一些步驟向左轉，以便日後更加無情地騎在人民頭上。雙重政權時期是可能出現的，或許會出現的。但是，將來不會出現也不可能出現的是一種並非無產階級專政的真正的民主專政。一種“獨立的”民主專政只可能是國民黨型的，即完全反對工人和農民的。我們必須從一開始就了解這一點，並教導群众了解這一點，而不把階級現實隱藏在抽象的公式後面。

斯大林和布哈林教導說，由於帝國主義的奴役，資產階級才得以在中國實現民族革命。這個嘗試已經進行過了。結果怎樣呢？

无产階級被置于工头的斧头之下。然后据說：民主专政接着就会到来。小資产階級专政已被证明为只不过是一种带上假面具的資本专政。这是偶然的嗎？不是。“农民不是跟着工人走，就是跟着資产階級走。”在头一种情况下，出現的是无产階級专政；在另一种情况下，出現的則是資产階級专政。看来中国的教訓是足够清楚的，即使从很远的地方研究它的教訓。“不然，”有人回答我們，“那只不过是一次沒有成功的实验。我們將一切从头开始，这次要建立‘真正的’民主专政。”“用什么办法呢？”“在无产階級和农民合作的社会基础上。”向我們提出这个最新发现的是拉狄克。但是，恕我冒昧，国民党正是在这同一基础上站起来的：工人和农民“合作”——为資产階級火中取栗。請告訴我們，这种合作的政治結構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呢？你們用什么来代替国民党呢？掌握政权的将是什么政党呢？至少大致上指出这些政党来吧，至少描述一下它們吧！关于这一点，拉狄克的答复（在一九二八年！）是，只有完全完蛋的、不能理解馬克思主义的复杂性的人，才有可能对哪个階級是馬和哪个階級是騎馬者这样次要的技术性問題发生兴趣；一个布尔什維克必須使自己从政治的上层建筑“轉移”，而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階級基础上。不，恕我冒昧，你們已經开过玩笑了。你們已經“轉移”得很够了。太过火了！在中国，你們使自己从階級合作如何表現在党方面这一問題上“轉移”，你們把无产階級拖进国民党，你們迷恋国民党到发昏的程度，你們狂怒地反对退出国民党；你們用重复抽象公式的办法避开政治斗争問題。而在資产階級很具体地打破无产階級的头顱以后，你們向我們建議道：讓我們再从头試一試；开始的时候，讓我們再一次使自己从政党和革命政权問題上“轉移”吧。不行！这些都是很拙劣的玩笑。我們不許自己再被人拉回去了！

所有这些奇技，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都被說成是为了工农联盟

的利益。拉狄克警告反对派不要低估农民，并且引证列宁反对孟什維克的斗争。有时当人们看到列宁的话被歪曲的时候，真是深恶痛绝这种冒犯人的思想尊严的做法。是的，列宁说过不止一次，否认农民的革命作用是孟什維克的特点。这句话是正确的。但是，除了这种引证以外，还有一九一七年，在这一年，孟什維克有八个月（就是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那八个月）同社会革命党人结成牢不可破的集团。在那个时期，社会革命党人代表为革命所唤醒的绝大多数农民。孟什維克同社会革命党人一道把自己称为革命民主派，并且忠告我们：他们正是使自己依靠工农（兵）联盟的那些人。由此可见，二月革命以后，孟什維克征用了——姑且这么说——布尔什維克的工农联盟公式。他们指责布尔什維克要使无产阶级先锋队同农民分裂从而摧毁革命。换句话说，孟什維克指责列宁忽视了或者至少低估了农民。

134

加米涅夫、季诺維也夫等对列宁提出的批评，只不过是孟什維克提出的批评的回声。而拉狄克现在提出的批评，又只不过是加米涅夫提出的批评的来得过晚的回声。

不肖门徒们在中国执行的政策，其中包括拉狄克的政策，是一九一七年孟什維克假面具的继续和进一步发展。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这一事实，不仅为斯大林所维护，而且也受到拉狄克的维护，他们都是以工农联盟有这种必要为理由。但是，当事实“偶然”表明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时候，就又同“左派”国民党进行尝试。结果还是一样。于是，同无产阶级专政迥然不同的民主专政的概念，就被高抬到这个没有实现巨大希望的可悲的现实之上——这是一次新的重蹈复辙。一九一七年，我们听到策烈铁里、唐恩等说过一百次这样的话：“我们已经有了革命的民主专政，但是你们却在奔向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奔向毁灭。”的确，人们总是健忘的。斯大林和拉狄克的“革命民主专政”跟策烈铁里和唐

135

恩的“革命的民主专政”根本没有什么不同。除此以外，这个公式不仅贯穿在共产国际的所有决议中，而且还写到它的纲领中。很难想像一种更为狡猾的假面具，同时也很难想像一种孟什维主义对于布尔什维主义一九一七年给它的侮辱所进行的更为厉害的复仇。

然而，东方的革命者还是有权要求对“民主专政”的性质这一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不是根据一些旧的臆断的话，而是根据事实和政治经验。对于什么是“民主专政”这个问题——斯大林一再提出这样一个真正典型的答复：对于东方来说，这种专政差不多就像“列宁对一九〇五年革命所想像的”。这种说法在一定的程度上已经成为正式的公式。这一点可以在关于中国、印度或者玻里尼西亚的书籍和决议中找到。革命者所听到的是列宁关于未来事件的“概念”，而这些其实早已成为过去的事件；此外，列宁所假设的“概念”被这样解释或者那样解释，而从来没有按照列宁自己在事件发生以后所解释的那样去解释。

“好吧，”东方的共产党人低着头说，“我们将设法按照你们所说的列宁在革命前所想像的那样去想像它。但是，有幸承蒙你们向我们说明这个口号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吗？它在贵国是怎样实现的呢？”

“在我国，这个口号是在双重政权时期以克伦斯基主义的形式实现的。”

“我们能够对我们的工人说：民主专政的口号在我们的国家将以我们自己的民族克伦斯基主义的形式实现吗？”

“喂，喂！绝对不能这样！没有工人会采取这样一个口号；克伦斯基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奴僕，劳动人民的叛徒。”

136 “那末，我们该怎么对我们的工人说呢？”东方的共产党人意气沮丧地问道。

“你們必須對他們說，”目前值班的庫西寧不耐煩地回答說，“民主專政是列寧對未來的民主革命的想像。”

如果東方的共產黨人不痴的話，他會設法再問下去：

“但是，列寧不是在一九一八年說，民主專政只是在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十月革命中得到了真正的確實的實現嗎？使黨和工人階級確切地轉向這個前景不是更好些嗎？”

“那可不行。甚至不能這樣想。唔，那是……不……斷……革……命呀！那是托……托……洛茨基主義呀！”

在這番嚴厲的申斥以後，東方共產黨人的臉色變得比喜馬拉雅山最高峰的雪還要慘白，再也不想多問了。隨便怎麼樣吧！

結果呢？我們知道得很清楚：不是可耻地爬在蔣介石的面前，就是英勇地冒險。

第八章 從馬克思主義到和平主義

在拉狄克的論文中，作為一種徵兆來說，有一段話是最令人感到不安的，這段話固然好像同我們感到興趣的中心主題沒有關係，但是由於拉狄克一貫向中派主義的理論家靠攏，這段話同我們感到興趣的中心主題還是有密切聯繫的。我說的是他在一國社會主義理論方面的多少有些隱蔽的進展。必須詳細地談一談這一點，因為在拉狄克的錯誤中，如果這條“傍綫”進一步發展下去，就有可能超過所有的其他意見分歧，這一點表明拉狄克的錯誤已經肯定地發生了由量到質的變化。 137

拉狄克在討論來自外部的威脅革命的危險時寫道，列寧“……意識到這一事實，即在一九〇五年俄國經濟發展的水平上，這種[無產階級]專政只有得到西歐無產階級的幫助才能保持下去。”（黑體是我標的。——列·托·）

这是錯上加錯；首先，这是非常粗暴地违背历史的前景。实际上，列宁說，而且不止一次地說，如果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俄国的民主专政（絕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保持下去。这种想法像一根紅綫一样貫穿在一九〇六年斯德哥尔摩党代表大会时期列宁发表的所有論文和演說中（同普列汉諾夫的論战、国有化問題，等等）。在那个时期，列宁甚至沒有提出在西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問題。但是，当时最重要的事情还不在这里。“在一九〇五年俄国經济发展的水平上”是什么意思呢？那末一九一七年的水平又是怎样的呢？一国社会主义理論正是在这种水平的差別上建立起来的。共产国际的綱領把整个地球分成許多方块，有些在水平上“适合”于独立地建設社会主义，另外一些則“不合适”；这样就为革命战略建造了一系列毫无希望的死胡同。毫無疑問，經济水平的不同对于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可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一九〇五年，我們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正如同就这一点來說我們也不能建立民主专政一样。在一九一七年，我們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专政也就吞并了民主专政。但是，在一九一七年經济发展水平上，正如在一九〇五年水平上一样，只有在西欧无产阶级的及时帮助之下，专政才能保持并发展到社会主义。自然，这种“及时性”不能事先加以估計；它是在发展和斗争的过程中决定的。同这个决定于世界力量对比（它具有最后的和决定性的发言权）的根本問題比較起来，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发展水平的不同，不管本身多么重要，只是一个次要的因素。

但是，拉狄克自己还不满足于含糊地提到这种水平的差別。在提到列宁看到革命的內部問題和世界問題之間的联系（哦，这倒奇怪！）这一事实以后，拉狄克补充說：

“但是，列宁并沒有单独把俄国社会主义专政的保持和西欧无

产阶级的援助之间的这种联系的概念尖锐化，像托洛茨基的表述所过分尖锐化了的那样，即援助必须是国家的援助，也就是已经取得胜利的西欧无产阶级的援助。”（黑体是我标的。——列·托·）

老实说，当我读到这几句话的时候，我真不相信我的眼睛。拉狄克需要不肖门徒的武库中的这个毫不值钱的武器，究竟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呢？这只不过是令人感到害臊地重述我们经常那样大加嘲笑的斯大林主义的陈词滥调。别的不说，这段引语表明，拉狄克对列宁道路上的主要里程碑知道得太少。列宁同斯大林不一样，他不仅从来没有把欧洲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政权施加压力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对立起来；相反，他表述来自外部的革命援助问题比我还要尖锐。在第一次革命时期，他不倦地一再重复说，我们不当在欧洲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下保持民主制度（连民主制度也不保持！）。一般地说，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以及随后的几年中，列宁除了从我们的革命同欧洲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的角度来考虑和估计我们的革命的命运以外，没有用过别的方法。例如，他公开断言：“没有德国革命的胜利，我们就注定了失败。”他是在一九一八年说这句话的，即并不是在一九〇五年的“经济水平”上；当时他心中所想的不是未来的几十年，而是就在眼前的时期，这个时期如果不是几个月的话，至多也不过是几年的功夫。

139

列宁曾经好几十次宣称：如果我们坚持下来了，那“……是因为当时侥幸凑成的条件使我们在一个短时期内免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害”（在一个短时期内！——列·托·）。接下去又说：“无论如何，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国际帝国主义……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平共处……在这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那末，结论是什么呢？不是对无产阶级的“压力”或者资产阶级的“中立化”抱着和平主义的希望吗？不是，结论是这样的：“在这里，俄国革命最大的

困难……必須喚起国际革命”^①。这些話是什么时候說的和写的呢？不是尼古拉二世同威廉二世就鎮压革命問題进行談判和我提出“尖銳”公式的一九〇五年，而是一九一八年、一九一九年以及随后的年代。

回顾过去，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說过这样一段話：

140 “我們懂得，沒有国际的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階級革命（在俄国。——列·托·）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們都是这样想的：或者是其他資本主义比較发达的国家立刻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或者是与此相反，我們非失敗不可。尽管有这种想法，但我們还是尽力去做，以便在任何情况下保存苏維埃制度，因为我們知道，我們的工作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是为了国际革命。这一点我們是知道的，我們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以及在簽訂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时期，一再表达了这种信念。一般說来，这是正确的。可是，实际上运动并不像我們所期望的那样直綫地进展。”^②

从一九二一年以后，运动开始不像我（同列宁一道）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而不仅是在一九〇五年）所想像的那样直綫地进展。但它还是沿着工人国家和資產階級世界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的路綫发展了。二者不可得兼！只有西方无产階級革命的胜利发展，工人国家才能得到保卫，不仅避免軍事上而且避免經濟上的致命危險。企图在这个問題上发现两种立場，即列宁的立場和我的立場，这是理論上最偷懶的做法。至少要重新閱讀一下列宁的

①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79—80頁。

②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467頁。

著作，不要誹謗他，不要用斯大林主义的发霉的玉米粥来喂我們！

但是，墮落甚至並沒有到此为止。拉狄克說，列宁认为世界无产阶级的“简单的”（本质上是改良主义的、柏塞尔式的）援助就够了，而托洛茨基却“夸大地要求”必须是国家的援助即革命的援助，拉狄克在捏造了这段故事以后继续說：

“經驗表明，在这一点上，同样，列宁也是正确的。欧洲无产阶级还不能夺取政权，但在干涉时期，它已强大到足以阻止世界资产阶级用巨大的力量来反对我們。因此，它帮助了我們保持苏维埃政权。除了资本主义世界本身的种种对抗以外，对劳工运动的恐惧是保证干涉结束以后的八年期间和平得以保持的主要力量。”

141

这段话从我們这个时代的官方文人所作的作业看来，虽然不是創举，但是由于它是历史錯誤、政治混乱和最大的原則錯誤的結合，还是值得注意的。

从拉狄克的話中会得出这样的結論：列宁一九〇五年在他的册子《两种策略》（这是拉狄克提到的唯一著作）中預言，一九一七年以后国家之間和阶级之間的力量对比将会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可以在一个长时期中排除对我們进行大规模軍事干涉的可能性。与此相反，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並沒有預見到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必然产生的形势，而只是考虑当时的现实，如强盛的霍亨索伦军队、非常强大的哈布斯堡军队、非同小可的法国证券交易所，等等。这真是莫大的时代錯誤，这种时代錯誤由于其可笑的內在矛盾而变得更为复杂。因为在拉狄克看来，我的第一个錯誤正是在于这一事实，即我是“在一九〇五年的发展水平上”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景的。現在第二个錯誤也很清楚了：我没有根据只是一九一七年以后才出現的国际形势来考虑我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夜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前景。斯大林經常提出的論据看来就是这样，我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我們很了解他在一九一七年以及一九

二八年的“发展水平”。但是，拉狄克是怎么掉进这一伙当中来的呢？

然而，甚至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况。最坏的是，拉狄克跳过了分别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界限，分别革命立場和和平主义立場的界限。这至少是一个反对战争的斗争問題，也就是如何和用什么方法能够防止或者結束战争的問題；是通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施加压力呢，还是通过内战来推翻资产阶级呢？拉狄克无意中把一个无产阶级政策的根本問題提到我們之間的爭論当中来了。

拉狄克是不是想說我不仅“忽視”农民而且“忽視”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施加压力，而只考虑无产阶级革命呢？很难說他会維持这样一种不愧为一个台尔曼、一个塞瑪尔或者一个蒙穆索的荒唐想法。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时的极左派（季諾維也夫、塔尔海默、台尔曼、貝拉·庫恩，等等）鼓吹在西方实行盲动主义策略，以便挽救苏联。我和列宁一道尽可能通俗地向他們說明，他們可以給予我們的最好的帮助是有系統地有計劃地巩固他們的陣地，为夺取政权进行准备，而不是为了我們而仓促地进行革命的冒险。当时，遺憾的是，拉狄克不是站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一边，而是站在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一边。但是，拉狄克一定記得——無論如何，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記錄記得——列宁和我的論据的实质正是攻击极左派的荒謬的“尖銳的表述”。在我們向他們說明党的加强和无产阶级的压力是国内和国际关系中很重要的因素以后，我們馬克思主义者补充說，“压力”只是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的一种职能，它完全决定于这一斗争的发展。由于这个原因，列宁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結束的时候在代表們举行的一次秘密會議上发表了一篇演說，反对消极和等待事态发展的傾向，最后大体上是用这样一个教訓結束了他的演說：不要冒险，但是，亲爱的朋友們，也不要裹足不前，因为单靠“压力”，我們是不能持久的。

拉狄克提出这样一点：欧洲无产阶级在战后不能取得政权，但是它阻止了资产阶级打垮我们。我也不止一次说过这一点。然而，欧洲无产阶级之所以防止了我们陷于毁灭，只不过是因为除了无产阶级的压力以外，同时存在的还有帝国主义战争所带来的很严重的客观后果以及被这一战争恶化了的世界冲突。在帝国主义阵营内部斗争、经济崩溃或者无产阶级压力这些因素当中，究竟哪一个具有比较决定性的意义，那是很难说的，问题不能这样提。单靠和平的压力是不够的，这一点已为帝国主义战争证明得太清楚了，因为不管有什么“压力”，这个战争还是降临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说无产阶级的压力在苏维埃共和国最初最严酷的年代已经得到证明是足够有效的話，那只是因为对欧洲工人来说，当时并不是施加压力的问题，而是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问题——而且这个斗争一再采取了内战的形式。

一九〇五年，欧洲既没有战争，也没有经济崩溃，而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却残暴嚣张，不可一世。当时社会民主党人的“压力”根本不能阻止威廉第二或者弗朗茨·约瑟夫向波兰王国进军，或者一般地说来，不能阻止他们去援助沙皇。甚至在一九一八年，德国无产阶级的压力也没有能够阻止霍亨索伦占领波罗的海各省和乌克兰，如果说他没有能够远征到莫斯科的话，那只不过是因为他的武装部队不够多。要不然，我们是怎样和为什么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呢？昨天的事是多么容易忘记啊！列宁并没有使自己只限于希望无产阶级施加“压力”，而是一再断言，如果德国不革命，我们一定会毁灭。从本质上说，这是正确的，虽然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已经过去。不要幻想了吧；我们已经接到一个没有日期的延期偿付通知了。像以前一样，我们还是生活在“喘息时机”的条件下。

有一种条件是，无产阶级还不能夺取政权，但能阻止资产阶级利用自己的力量发动战争，这种条件是一种阶级均势不稳定的最

高表現的条件。一种均勢被說成是不穩定的，正是因为它不能长久保持下去。它必然倒向这一边，或者倒向那一边。不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就是资产阶级通过一系列摧毁性的打击，充分地削弱革命的压力以重新取得行动自由，首先是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

144 只有一个改良主义者才会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国家施加的压力描绘为一种不断增长的因素和一种对付干涉的保证。正是从这个概念中产生了在世界资产阶级中立化的条件下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斯大林)。正如猫头鹰在天色微明的时候才起飞一样，在无产阶级的压力下资产阶级中立化的斯大林主义理论，也只是在产生这种理论的条件开始消失的时候才提出来的。

有一个时期，遭到歪曲的战后经验引起这样一种骗人的希望，即没有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而代之以一般的“支持”，我们也可以活下去。在这个时期，世界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无产阶级的失败为资本主义的稳定铺平了道路。战后资本主义的崩溃已经克服。没有尝过帝国主义屠杀的恐怖滋味的新一代已经成长起来。结果是，资产阶级现在可以比五年或者八年以前更为自由地运用它的战争机器了。

在劳动群众向左转的时候，这种进程进一步发展下去，必将再一次加强他们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压力。但这是一个两面都有刀刃的因素。正是来自工人阶级方面的日益增长的危险，可以在以后的阶段促使资产阶级采取决定性的步骤，来表明它是自己家里的主人，同时试图摧毁传染病的主要中心——苏维埃共和国。反对战争的斗争不是决定于对政府施加的压力，而是完全决定于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和平主义”效果，正像它的改良主义效果一样，只不过是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的副产品；这种效果只有相对的力量，容易变成相反的东西，这就是说，它可以促使资产阶级走上通向战争的道路。资产阶级对劳工运动的恐惧(这

是拉狄克非常片面地提到的一点), 是所有的社会和平主义者最大的希望。但是, 仅仅是对革命的“恐惧”, 决定不了什么。能够决定的是革命。由于这个原因, 列宁在一九〇五年說, 反对君主制度复辟(在一九一八年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唯一保证, 并不是无产阶级施加压力, 而是它在欧洲取得革命胜利。这是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提法。尽管“喘息时机”具有漫长的性质, 列宁的表述到今天还保持着充分的效力。我也是用同样的方法表述这个问题的。一九〇六年我在《总结与展望》一书中写道:

“正是由于害怕无产阶级起义, 资产阶级政党即使在投票赞成撥付巨額軍费时, 也不得不庄严地宣称赞成和平, 梦想国际仲裁法庭、甚至梦想組織欧洲联邦。当然, 这种可怜的宣言既不能消除国家之间的对抗, 也不能消除武装冲突。”(《总结与展望》, 《我们的革命》第 283 頁)①

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基本錯誤在于这一点: 为了挽救斯大林—布哈林的和平主义和民族改良主义前途, 追逐一些反对战争危险的革命—技术秘方, 結果把反对战争的斗争同夺取政权的斗争分裂开来了。

第六次代表大会的鼓舞者, 这些惊慌不安的一国社会主义的建設者——从本质上說, 这是一些吓坏了的和平主义者——企图通过加紧施加“压力”的办法来使资产阶级永远“中立化”。但是, 由于他們不能不知道, 他們的领导迄今在一系列国家都已导致革命的失敗, 并已把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远远丢在后面, 于是他們便首先努力扔掉馬克思主义的“尖銳的表述”——这种表述把战争問題同革命問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他們把反对战争的斗争改变成一种不需要别人帮助的任务了。由于怕本国政党错过决定性

① 見本书第 70 頁。

146 的时刻，他們宣布战争危险是永远存在的、不可延緩的和迫在眉睫的。世界上发生的每件事情，都是为了战争的目的而发生的。战争现在不再是资产阶级政体的一种工具；资产阶级政体倒是战争的一种工具了。結果，共产国际反对战争的斗争变成一套在各种场合下都自动重复而在失去效力的时候才消失的老公式。斯大林主义的民族社会主义就倾向于把共产国际变成对资产阶级施加“压力”的一种辅助工具。拉狄克用他的輕率的、散漫的和肤浅的批評所帮助的正是这种倾向，而不是馬克思主义。他已經失去指南針而卷入一股奇特的潮流，这股潮流可以把他带到遙远的彼岸。

一九二八年十月于阿拉木图

第九章 結束語

147 我在上面一章最后几行所提出的預見或意見，正如讀者所知道的，在几个月以后得到了证实。对不断革命的批評只不过为拉狄克提供了一个把他自己推出反对派的杠杆。我們希望，我們的这一整本书可以证明，拉狄克走进斯大林的陣营这一点，對我們來說并不是出乎意料的事。但是，甚至变节也有不同的等級，不同的恶劣水平。拉狄克在悔过声明中完全恢复了斯大林在中国的政策。这一点意味着达到最深的背叛程度。对于我来说，留下来要做的只是摘要引证我对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斯米尔加的悔过声明（这个声明把他們列入政治犬儒派的黑名单）作出的答复：

“正像所有有自尊心的破产者一样，这三个人当然不会不用不断革命来掩护自己。这三个投降分子力图用廉价的誓言抹煞近年来的全部机会主义失敗史的最具有悲剧性的經驗——中国革命，他們保证說，中国革命跟不断革命論毫无共同之处。

“拉狄克和斯米尔加頑固地維護中国共产党从属于資產階級国民党的做法，不仅在蔣介石政变以前是这样，在这以后也是这样。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則嘸哩咕嚕說了一些含糊其詞的話，正像在牽涉到政治問題的時候他經常表現的那樣。有一个事实是值得注意的：凡是反对派队伍里維護共产党从属于国民党的做法的人，都变成了投降分子。沒有一个忠实于自己的旗帜的反对派分子有这种标记，因为这是一种臭名远揚的可耻的标记。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了四分之三世紀以后，在布尔什維克党建立了四分之一世紀以后，这些倒霉的‘馬克思主义者’居然还认为可以維護把共产党人关在国民党籠子里的做法！拉狄克在当时对我的責难所作的答复中，正如在今天的悔过书中一样，已經试图恐吓我們，說共产党一旦退出資產階級国民党，无产阶级就会脫离农民而陷于‘孤立’。在这以前不久，拉狄克把广州政府称为农工政府，这样就帮助了斯大林掩盖无产阶级从属于資產階級的事实。这些可耻的行徑，这种盲目性、这种愚蠢、这种背叛馬克思主义的后果，究竟用什么来掩盖呢？的确，用什么呢！用对不断革命起訴！”

“早在一九二八年二月，正在找借口投降的拉狄克，立即附和了一九二八年二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會議对中国問題作出的決議。这个決議把托洛茨基主义者說成是取消派，理由是他们把失敗称为失敗，同时不願意把胜利的中国反革命看成是中国革命的最高阶段。在这項二月決議中，宣布了武装起义和苏維埃的方針。对于每个不完全缺乏政治感而有过革命經驗的人來說，这項決議是一个最背叛、最不負責任的冒险主义的例子。而拉狄克却附和它。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对待这个問題，巧妙的程度不亚于拉狄克，只不过是从相反的一端出发而已。他写道，中国革命已經失敗了，并且已經失敗了很长一个时候了。一次新的革命将不会很快地到来。值不值得同中派分子爭論中国問題呢？关于这个題

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写了一些长信。我在阿拉木图讀这些信的时候，有一种可耻的感觉。这些人在列宁的学校里究竟学到了些什么呢？我一次又一次地問自己。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前提同拉狄克的前提正好相反，但結論是一样的：他們两个人都受到这样一个伟大的願望的鼓舞，即希望通过明仁斯基的斡旋而使雅罗斯拉夫斯基能够兄弟般地收容他們。^① 哦，当然，他們这样做是为了革命的利益。他們并不是野心家。根本不是。他們只不过是一些无可救药的、意識形态上已經破产的人。

“針对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二月全体會議的冒险主义決議（一九二八年），当时我已經提出一个在民主口号下动員中国工人的方針，其中包括中国成立立宪會議的口号。但是，在这里，这三个倒霉的人却陷于极左的立場；这种行动是廉价的，對他們來說是一无所得的。民主口号嗎？絕不行。‘这是托洛茨基方面的一个大錯誤’。唯一的做法是在中国建立苏維埃——一点也不能改变！很难想像还有什么比这种立場——对不起——更荒謬的了。在資产階級反动时期提出建立苏維埃的口号，是嬰兒吵鬧，也就是說，是对苏維埃的一种諷刺。但是，甚至在革命时期，也就是在直接建立苏維埃时期，我們也沒有取消民主口号。在已經取得政权的真实的苏維埃在群众眼前同真实的民主机构发生冲突以前，我們沒有取消民主口号。用列宁的語言（而不是用实利主义的斯大林及其传声筒的語言）來說，这一点意味着：在国家的发展中不要跳过民主阶段。

“沒有民主綱領——立宪會議、八小时工作日、沒收土地、中国民族独立、国内各族人民的自决权——沒有这个民主綱領，中国共

^① 明仁斯基当时是国家政治保安局的首脑；雅罗斯拉夫斯基是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首脑之一，他在打击反对派和把許多反对派成員开除出党方面特别积极。——英譯者注

产党的手脚就被綁起来，而不得不消极地把陣地让給中国社会主义党人，这些社会主义党人在斯大林、拉狄克及其一伙的援助之下，是可以取得共产党的位置的。

“由此可見：拉狄克虽然仿效反对派，但还是放过了中国革命中最最重要的东西，因为他維持共产党从属于資产階級国民党的做法。拉狄克放过了中国的反革命，而在广州冒险以后支持武装暴动的方針。拉狄克今天跳过反革命时期和爭取民主的斗争，撇开过渡时期的任务，而贊成最抽象的沒有時間和空間的苏維埃概念。但是，反过来，拉狄克却发誓說，他同不断革命毫无共同之处。这是可喜的。这是令人感到安慰的……” 150

“斯大林和拉狄克的反馬克思主义理論，对于中国、印度以及所有的东方国家來說，意味着有改变地但沒有改进地重复国民党的实验。

“在俄国和中国革命的所有經驗的基础上，在受到这些革命考驗的馬克思和列宁学說的基础上，反对派坚决认为：

“只有以无产階級专政的形式，新的中国革命才能推翻現存的政体并把政权轉交給人民群众；

“‘无产階級和农民民主专政’，同领导农民和实现民主綱領的无产階級专政相反，是一种虛构，一种自己欺騙自己的东西，或者还要坏些——克伦斯基主义或者国民党主义。

“在克伦斯基和蔣介石政权同无产階級专政之間，沒有既非此又非彼的中間性革命政权，不可能有这种政权。凡是提出这样一种政权的赤裸裸的公式的人，都是在可耻地欺騙东方的工人和准备新的灾难。

“反对派对东方工人說：投降分子在党内施展阴谋遭到破产以后，正在帮助斯大林散播中派主义的种籽，向你們的眼中投擲沙土，堵塞你們的耳朵，迷惑你們的头脑。一方面，由于禁止从事爭

取民主的斗争，使你们在赤裸裸的资产阶级专政面前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另一方面，在你们面前展现了一幅某种超度的非无产阶级专政的景象，这种专政有助于将来出现新的国民党化身，也就是說，有助于使工人和农民的革命进一步遭到失败。

“这种說教者都是叛徒。东方的工人们，要学会不要相信他们，要学会蔑视他们，要学会从你们的队伍中把他们赶出去！……”

第十章 什么是不断革命？

基本論点

152 我希望，讀者不会反对我在結束这本书的时候，不嫌重复，試把我的基本結論简单明了地表述出来。

一、不断革命論現在要求每个馬克思主义者給予最大的重視，因为阶级斗争和意識形态斗争的进程終于把这个問題从回忆俄国馬克思主义者旧意見分歧的領域中充分地提出来了，并且使它变成一个关于一般世界革命的性质、內在联系和方法的問題。

二、对于资产阶级发展較迟的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說来，不断革命論意味着，要彻底地真正解决它們的**民主和民族解放**任务，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作为被压迫民族的領導者，首先是作为它的农民群众的領導者——的专政才有可能。

153 三、在民主革命中，不仅土地問題而且民族問題都給落后国家中占人口絕大多数的农民安排了一个特殊的地位。沒有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民主革命的任务就不可能解决，甚至不可能认真地提出。但是这两个阶级的联盟只有通过同民族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进行不可調和的斗争才能实现。

四、不管个别国家中革命的最初插曲性阶段的情况如何，无

产階級和农民的革命联盟，只有在組織为共产党的无产階級先鋒队的政治领导下才有可能实现。这也就是说，民主革命只有通过以无产階級和农民的联盟为基础并且首先解决民主革命的所有任务的无产階級专政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五、从历史的角度来估价，布尔什維主义的旧口号“无产階級和农民民主专政”确切地表达了上面所說的那种无产階級、农民和自由資产階級之間的关系。这已經为十月的經驗所证实。但是列宁的旧公式并没有預先解决在革命联盟内部无产階級同农民之間的相互关系問題。換句話說，这个公式有意保留了某种代数学的性质，这种性质就是要在历史經驗的过程中演算出比較确切的算术数字。然而，历史經驗表明，而且在不可能作任何歪曲解释的情况下表明，农民所担任的革命角色無論多么伟大，它决不能担任独立的角色，更不用說担任領導的角色。农民不是跟着工人走，便是跟着資产階級走。这就是說，“无产階級和农民民主专政”只有作为領導着农民群众的无产階級的专政才是可以設想的。

六、无产階級和农民民主专政就其階級內容來說，是与无产階級专政不同的一种制度，它只有在建立了一个独立的革命政党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这个党要能够代表农民的利益和总的來說也能够代表小資产階級民主派的利益，要能够在无产階級的这种或那种程度的援助下夺取政权，并且要能够决定自己的革命綱領。整个現代史表明，特別是最近二十五年的俄国經驗表明，在建立农民政党的道路上，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就是小資产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缺乏独立性及其深刻的內部分化。由于这种原因，小資产階級(农民)的上层分子在一切决定性的关头，尤其是在战争和革命中，总是跟着大資产階級走；下层分子跟着无产階級走；中层分子則不得不在这两个极端之間进行选择。在克伦斯基政权与布尔什維克政权之間，在国民党与无产階級专政之間，沒有也不可

154

能有任何中間阶段，即沒有工农民主专政。

七、共产国际要把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这个口号强加于东方国家的企图，早已为历史彻底粉碎，这种企图只能起反动的作用。只要这个口号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对立，它在政治上就会促使无产阶级溶解于小资产阶级群众之中，这样就会为民族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因而也会为民主革命遭到失败創造最有利的条件。在共产国际綱領中采用这个口号，就是直接背叛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維主义的十月传统。

八、无产阶级作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取得政权以后所实行的专政，必然立即面临同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有密切关系的任务。民主革命立即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从而成为**不断革命**。

155 九、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不是革命的完成，而是革命的**开始**。社会主义建設只有在民族范围和国际范围展开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在资本主义关系在世界舞台上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这种斗争必然要引起爆炸，即在國內引起內战，在国外引起革命战争。这里就包含着社会主义革命本身的不断性质，不論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个昨天才完成民主革命的落后国家，还是一个在民主革命后经历了漫长的民主制与議會制时代的老资本主义国家。

十、在民族范围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想像的。资产阶级社会发生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这种社会所創造的生产力不再能同民族国家的界限协调一致。因此，一方面产生帝国主义战争，另一方面就产生一种资产阶级的欧洲联邦的空想。社会主义革命在民族舞台上开始，然后发展到几个国家的舞台上，最后在世界舞台上完成。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为一种在更新和更广泛的意义上的不断革命；只有当新社会在我們整个地球上获得最后胜利之后，社会主义革命才告完成。

十一、上面关于世界革命发展的簡要論述，一笔勾銷了現在

的共产国际綱領迂腐死板地把国家划分为社会主义“已經成熟”或“尙未成熟”的問題。既然資本主义已經建立了世界市場，創造了世界的分工和生产力，整个來說它也就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世界經濟。

不同的国家将以不同的速度經歷这个过程。在一定的条件下，落后国家能比先进国家早实现无产階級专政，但要比它們晚进入社会主义。

一个落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它的无产階級沒有作好联合农民和夺取政权的充分准备，就不能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反之，在一个无产階級由于进行了民主革命而掌握了政权的国家，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未来命运归根到底不仅取决于本国的生产力，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

156

十二、从反对十月革命的反动势力方面发酵出来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論，是同不断革命論势不两立的唯一理論。

不肖門徒由于受到我們的严厉批判，便想借口俄国的特点(地大物博)而把一国社会主义理論的运用范围只限于俄国，这种企图是徒劳无益的，只能弄巧成拙。背离国际主义立場，就必然要走向民族救世主义，即认为本国具有一些特殊的优越性和特点，硬說这些优越性和特点使它能担任別的国家所不能担任的角色。

世界性的分工，苏联工业对外国技术的依賴，欧洲先进国家的生产力对亚洲原料的依賴等等，使得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建設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成为不可能的事。

十三、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理論同俄国革命的全部經驗背道而馳，它不仅机械地把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对立起来，而且把民族革命同国际革命割裂开来。

这种理論向落后国家的革命提出建立一种根本不能实现的民主专政制度的任务，同时又把这种制度同无产階級专政对立起来。

这样,这种理論就把幻想和虛构带到政治中来,麻痹东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妨碍殖民地革命的胜利。

从不肖門徒們的理論观点来看,无产阶级夺取到政权就意味着革命的完成(按照斯大林的公式,完成了“十分之九”)和国家改造时期的开始。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論和世界资产阶级“中立化”的理論,都必然是同一国社会主义理論分不开的。它們是息息相关的。

按照一国社会主义理論,共产国际已被貶低为一种只对反对武装干涉的斗争有用处的輔助性武器。共产国际目前的政策、制度及其领导人物的选择,是同共产国际被降低为不是要解决独立任务的輔助性机关这种角色完全适应的。

十四、布哈林所写的共产国际綱領,是彻头彻尾折衷主义的綱領。它妄图把一国社会主义理論同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而这种国际主义同世界革命的不断性是不可分割的)調和起来。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为了使共产国际采取正确的政策和建立健全的制度而进行的斗争,是同争取制訂馬克思主义綱領的斗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而关于綱領的問題又是同关于不断革命論和一国社会主义論这两种互不相容的理論的問題分不开的。不断革命的問題,早已不是列宁同托洛茨基之間的插曲性的意見分歧,这些分歧已經由历史彻底解决了。現在的斗争是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思想同中派的折衷主义思想之間的斗争。

(柴金如譯)

关于“不断革命”的一些历史材料^①

在这部历史第一卷的附录中，我們曾大量地摘录了著者于一九一七年三月在紐約写的許多文章，以及后来所写的駁斥波克罗夫斯基教授的一些論战性文章。上述两类文章都是分析俄国革命、部分地也是分析世界革命的动力。从本世紀初以来，俄国革命营垒中的一些主要的原則性分化，都是在这个問題的基础上形成的。随着革命浪潮的高涨，这种分化越来越具有战略綱領的性质，而最后，具有直接策略的性质。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六这几年，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內加紧形成各种政治派别的时期。我的著作《总结和展望》就是在这个时候写的。它是零零碎碎地、而且是为了許多不同的目的而写的。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著者被捕入獄，于是有机会比过去更加系統地来闡述自己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的观点。这些文章被集成一本书，于一九〇六年用俄文出版。为了让讀者能彻底了解下面从該书中摘录的文字，我們还得再次提醒一下：在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間，没有一个俄国馬克思主义者曾經捍卫过，甚或提出过关于一般地在单独一个国家，特别是在俄国，可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只是过了二十年之后，即到一九二四年秋天，这种想法才見之于文字。在第一次革命时期，以及在两次革命之間的那些年代里，爭論的問題是資产阶

^① 这是托洛茨基为他所著《俄国革命史》一书所写的附录，譯自該书伦敦一九三六年英文版(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第1258—1266頁。——中譯者注

級革命的动力，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机会和可能性。所有現在維護一国社会主义理論的人，毫无例外地，在那个时期都把俄国革命的前途限制于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国，而且直到一九一七年四月，他們一直认为不仅不可能建設一国社会主义，而且在先进国家建立无产階級专政以前俄国无产階級不可能夺取政权。

在一九〇五到一九一七年間，所謂“托洛茨基主义”是指这样一种革命观点，按照这种观点，如果不由无产階級掌握政权，則俄国的資產階級革命就不可能解决自己的問題。只是在一九二四年秋天，“托洛茨基主义”才开始表示这样一种观点，按照这种观点俄国无产階級在取得政权以后不可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建立一国的社会主义社会。

为使讀者方便起見，我們扼要地、以對話的形式把爭論表述如下，其中T表示“托洛茨基主义”观点的代表，S表示現今領導着苏联官僚的俄国“实践家”之一。

一九〇五——一九一七

T. 如果不由工人階級掌握政权，俄国革命就不可能解决自己的民主問題，首先是土地問題。

S. 可是，那是不是意味着无产階級专政呢？

T. 当然是。

S. 在落后的俄国嗎？在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建立无产階級专政以前嗎？

T. 正是这样。

S. 可是，你忽視俄国的农村，即忽視陷在半农奴制泥沼中的落后的农民。

T. 恰恰相反，开辟在俄国实行无产階級专政这一直接前景的，正是土地問題的深度。

S. 那末，你不承认資產階級革命？

T. 不，我只是試圖表明，資產階級革命的發展進程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

S. 可是，那意味着俄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條件已經成熟了嗎？

T. 不，不是這個意思。歷史的發展沒有如此有計劃的與和諧的性質。無產階級在落后的俄國取得政權，這肯定是由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各種力量的對比關係中產生的。無產階級專政會開辟什麼樣經濟前景，這取決於建立這種專政的國內和國際條件。不用說，俄國不可能獨立走到社會主義。但是，它一旦開辟了社會主義改造的紀元，就能給歐洲的社會主義發展一種推動力，從而緊緊跟在先進國家之後走到社會主義。

一九一七——一九二三

S. 我們必須承認，托洛茨基“甚至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前，他就提出了新奇的而現在特別值得注意的不斷革命論，在這個理論中，他斷言，一九〇五年的資產階級革命將直接轉入社會主義革命，構成一系列民族革命的第一個革命。”（摘自列寧生前出版的《列寧全集》中的一條注）

一九二四——一九三二

S. 那末，你否認我國的革命能夠走到社會主義嗎？

T. 和從前一樣，我認為，我國的革命在獲得國際性質之後能夠而且應當走向社會主義。

S. 這麼說，你不相信俄國革命的內部力量？

T. 奇怪的是，當你將無產階級專政當作空想而加以拒絕的時候，這卻沒有妨礙我預見和主張這種專政！

S. 不過，儘管這樣，你還是否認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嗎？

T.直到一九一七年四月,你总是責备我不承认資產階級革命。你的理論上的矛盾的秘訣就在于,过去你落在历史过程的后面,而現在你正在企图赶上和超越历史过程。老实說,这也就是你在經濟方面的种种錯誤的秘訣。

讀者如果想要正确地判断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各种派別和集团現在进行的斗争中的真正意見分歧,就应时刻記住俄国革命思想发展中的这三个历史阶段。

一九〇五年写的文章《总结与展望》中的一些摘录

第四章 革命和无产階級^①

无产階級随着資本主义的发展而成长和日益壮大。在这个意义上,資本主义的发展也是无产階級向专政的发展。但是,政权轉到工人階級手中的时日,决不直接决定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而是决定于階級斗争中的关系,决定于国际形势,最后还决定于許多主观因素,如传统、首創精神和战斗的准备……

經濟比較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階級,有可能比发展得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階級更早地取得政权……

认为无产階級专政在某种程度上机械地有賴于一个国家的技術力量和資源,是一种簡化到极点的“經濟”唯物主义的成見。这种观点同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根据我們的看法,俄国革命将創造出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之下,政权有可能(在革命胜利时应该)在資產階級自由主义的政客們有机会充分施展其政治天才之前轉到无产階級手中。

① 見本书第30頁以下。

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分析方法，——不是分析文句，而是分析社会关系。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軟弱必然意味着工人运动的軟弱，这对于俄国說来难道是真的嗎？

毫無疑問，工业无产阶级的人数、集中程度、文化程度以及在政治上的重要性，都依赖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程度。但是这种依赖性不是直接的。在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和它的各阶级的政治力量之間，在每一个特定时刻，都夹杂着許多不同的国内和国际性质的社会和政治因素，这些因素会使经济关系在政治上的表现发生偏差，甚至完全变形。尽管美国的工业生产力比我国高十倍，但是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它对本国的政治影响以及在最近将来影响世界政治的可能性，却比美国无阶级的作用和重要性大得难以比拟。

第五章 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农民

一旦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政权就会轉到在斗争中起领导作用的那个阶级的手中，換言之，轉到无产阶级手中。我們同时說明，这决不排除非无阶级的社会集团的革命代表参加政府，……整个問題在于：**誰来决定政府政策的内容，誰构成政府中稳定的多数？**人民的民主阶层的代表参加工人占多数的政府是一回事，而无阶级的代表以多少有点受尊敬的人质的身份参加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是另一回事。

无产阶级不扩大革命的基础，就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

許多劳动群众阶层，尤其是农村中的劳动群众，只有在革命先锋队——城市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才能第一次被吸收到革命中来，并在政治上組織起来。……

把资产阶级革命的全部重担放在无产阶级肩上的我国社会历史关系的性质，将不仅給工人政府造成巨大困难，并且也会（至少

在政府成立的初期) 給予它难以估量的优越性。这会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当中表现出来。

俄国革命现在不容許，将来在一个长时期內也不会容許建立任何可以解决最起碼的民主任务的资产阶级宪法秩序……。因此，农民——甚至是作为一个阶层的全体农民——的最基本的革命利益的命运，同整个革命的命运，即同无产阶级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

执政的无产阶级将作为解放农民的阶级出现在农民面前。

但是，农民是否有可能把无产阶级推开并取而代之呢？

这是不可能的。一切历史經驗都駁斥这种假定。历史經驗表明，农民绝对不可能起独立的政治作用。

俄国资产阶级将把一切革命障地让給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也不得不交出对农民的革命领导权。在政权轉归无产阶级的情况下，农民只能归附工人民主制度。即使农民在这样做的时候，其觉悟程度并不比他們归附于资产阶级制度的时候更高！但是，当每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在获得农民选票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利用其权力掠夺农民，使农民丧失对前途的一切希望和信心，然后在情况极其不妙的时候，把自己的位置让給另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这时候无产阶级依靠农民发动一切力量，以便提高农村的文化水平，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

第六章 无产阶级政治制度

无产阶级只有依靠全国的觉醒和全民的热情，才能取得政权。无产阶级将作为民族的革命代表，作为反对专制制度和封建暴政的斗争中公认的人民領袖，参加政府。但无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会开创一个新时代，一个具有革命立法和积极政策的时代，这里，它决不能保证其作为公认的民族代言人的作用。

执政的无产阶级的政策将一天天地加深，其阶级性质也将愈来愈明确。这样一来，无产阶级和民族之间的革命关系就会破裂，农民的阶级分化会以政治的形式表现出来，农民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对抗也将随着工人政府政策的明确化和由一般民主政策变为阶级政策而逐渐增长。

消灭等级制的农奴制，将得到作为纳税等级的全体农民的支持……但是为保护农业无产阶级而实行的法律措施，不仅不会得到大多数人的积极同情，而且还会受到少数农民的积极反对。

无产阶级会感到不得不把阶级斗争推进到农村中去，从而破坏无疑每一个农民都有的——虽然是在比较狭小的范围内——那种共同利害关系。无产阶级在它刚刚实行统治的时刻，就必须从农村的穷人和富人之间、农业无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中寻找支持。

但是政权一旦转到社会主义者占多数的革命政府手中，那时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之间的区别，就失去了原则上的和直接实践上的意义。无产阶级政府无论如何不能把自己约束在这种区别的范围之内。

无阶级的代表不是作为无权的人质，而是作为领导力量参加政府这一事实，将消除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的界限，这就是说，它将把集体主义提到日程上来。无产阶级在朝这个方向前进中究竟该在什么地方停下来，这取决于力量的对比，而决不取决于无产阶级政党原来的意图。

因此，根本谈不上什么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专政特殊形式，即无阶级的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工人阶级不可能在保持其专政的民主性质的同时又不越出其民主纲领的界限。对于这一点存任何幻想都是极端有害的。

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要为政权斗争到底。在维持和巩

固自己政权的这个斗争中的武器之一，是鼓动和组织工作，尤其是在农村中；另一武器是集体主义政策。集体主义不仅将成为从执政党地位继续前进的必然的道路，而且也将成为在无产阶级支持下保持这个地位的一种手段。

* * *

当社会主义报刊上表述不断革命的思想时——这种不断革命由于日益增长的社会冲突、更多的群众阶层参加起义、无产阶级对统治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特权不断进攻，而把消灭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我们的“进步”报刊齐声发出了怒吼。

同一民主派的更激进的代表们……不仅认为在俄国建立工人政府的想法是异想天开，而且否认在当前历史时期欧洲有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必要的“先决条件”现在还不具备。真是这样的吗？问题当然不在于为社会主义革命指定一个日期，而在于必须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的历史展望。

（这里接着分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一般先决条件，而且证明，现在，在二十世纪初，如果从欧洲和世界范围来看的话，这些先决条件已经具备。）

……无论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来看，社会主义生产在个别国家闭关自守的范围内是容纳不下的^①。

第八章 俄国的工人政府和社会主义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客观先决条件。但是，在这方面，关于俄国，我们能够怎样说呢？我们能不能希望，政权转归俄国无产阶级，会

^① 这段在第七章，见本书第52—53页。

成为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对我国国民经济进行改造的开端呢？

“馬克思說，巴黎的工人並沒有向公社要求奇迹。現在也不能指望无产階級专政立即創造出奇迹。国家政权不是万能的。如果认为无产階級只要取得了政权，就可以用几道法令来使社会主义代替資本主义，那就荒謬絕伦了。經濟制度并不是国家活动的产物。无产階級只能尽一切力量运用国家政权，来促使經濟朝集体主义方向发展，并縮短它的道路。

“生产社会化要从困难最小的部門开始。在最初时期，社会化的生产将像是沙漠中的綠洲一样，由商品流通規律同私营企业联系着。社会化的經濟占領的領域愈广，它的优越性就愈明显，新的政治制度就会感到愈穩固，无产階級的进一步的經濟措施也就愈大胆。在实行这些措施的时候，它一定能够、并且一定会不仅依靠本国的生产力，而且依靠国际的技术；正如其革命政策一样，它不仅要依靠本国階級关系的經驗，而且要依靠国际无产階級的全部历史經驗。”①

无产階級的制度一开始便必須处理与俄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攸关的土地問題。在解决这个問題时，正如在解决其他一切問題时一样，无产階級要把自己的經濟政策的基本目标作为出发点，就是說，要为組織社会主义經濟占領尽可能大的領域。在土地問題上的这种政策的形式和速度，应当决定于无产階級所拥有的物质資源以及不要把可能的盟友推到反革命队伍中去的必要性。

但是在俄国的經濟条件下，工人階級的社会主义政策能走多远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种政策在遇到国家技术落后的阻碍之前很久，就会碰到政治上的障碍。沒有欧洲无产階級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階級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的暫时的

① 这两段話出自托洛茨基給馬克思著《巴黎公社》俄譯本（一九〇六年圣彼得堡版）写的序言第 20 頁。——中譯者注

統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

政治上的乐观主义可能有两种^①。它可能过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和革命形势的有利方面，并且給自己提出一些在現有的力量对比关系下解决不了的任务。但是相反地，它可能乐观地給我們的革命任务定下一个框框，而这个框框是我們的地位的邏輯必然会迫使我們打破的。

我們可以給一切革命問題定下一个框框，硬說我国的革命就其客观目的、从而就其必然結果說来是**資產階級革命**，我們也可以无視这一事实：这个**資產階級革命**的主角是无产階級，而且无产階級将被革命的全部进程推动着去执政。

你可以安慰自己說，俄国的社会条件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建立社会主义經濟，同时你也可以不考虑这一事实：无产階級一旦取得政权，就必然会在它的地位的全部邏輯的逼迫下去組織国家管理的經濟。

一般社会学的定义——**資產階級革命**——决不能解决在某一**資產階級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政治策略任务、矛盾和困难。

在十八世紀末的其客观任务是建立資本統治的**資產階級革命**的范围内，无套褲党的专政表明是可能的。

在二十世紀初的就其直接客观任务而言也是**資產階級革命**的一次革命中，出現了无产階級在最近的将来取得政治上的統治地位的必然性，或者至少是可能性。无产階級自己必須注意，使这种統治地位不致如某些现实主义的庸人所希望的那样，仅仅成为暫时的“插曲”。但是，現在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問題：无产階級专政是不是不可避免地要打破**資產階級革命**的界限呢？或者在現有**世界历史**条件之下，它可不可以給自己开辟一个在打破这些界限之后

^① 从这一段起以下都不是属于第八章，而属于第四章。——中譯者注

取得胜利的前景呢？

（下面接着发挥这样一个思想：俄国革命可以、而且多半会引起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而后者又会反过来保证俄国的社会主义发展。）

* * *

必须补充一句：在共产国际存在的头几年中，上述引文曾经作为对十月革命的理論上的阐述，用几种外文正式发表过。

（边忆菊译）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